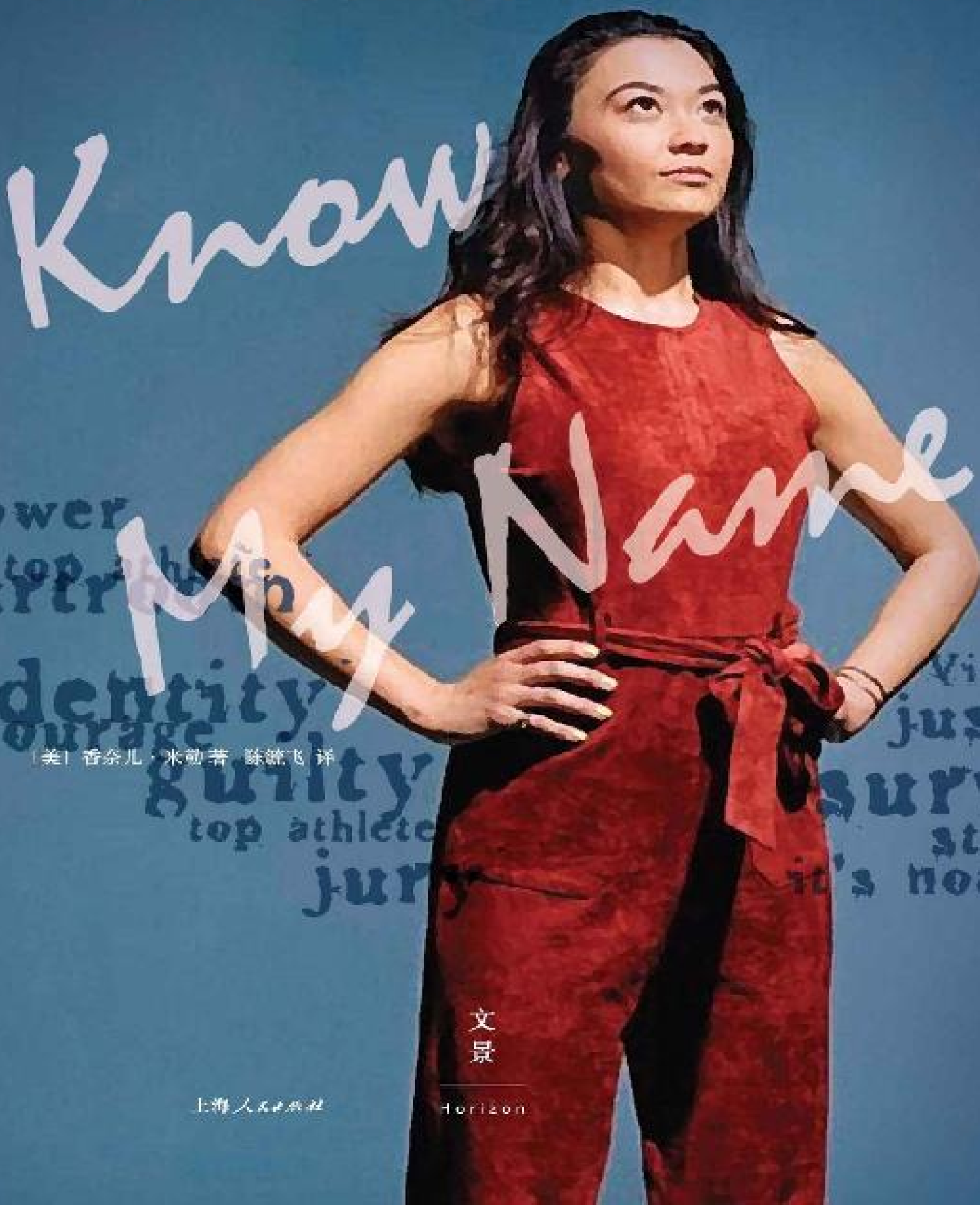


# 知晓我姓名 Chanel Miller



[美] 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Chanel Miller

# 知晓我姓名

[美] 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晓我姓名／（美）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著；陈毓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Know My Name ISBN 978-7-208-16495-6

I．①知... II．①香... ②陈... III．①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3421号

书 名：知晓我姓名

作 者：【美】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

译 者：陈毓飞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沁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495-6/I·189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 目 录

[前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致谢](#)

[埃米莉·多伊的受害人影响陈述](#)

*Know My Name: A Memoir* by Chanel Miller

Copyright © 2019 by Chanel Mill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妈妈、爸爸和蒂菲



## 前言

我总是把“subpoena（传票）”拼写成“suhpeena”，这似乎意味着我不够资格讲这个故事。但是所有的法庭记录都供全世界使用，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在网上。我写下的不是终极的真相，却是我尽一己之全力所做的述说。如果你想要通过我的眼睛和耳朵来了解我胸膛里是什么感觉，想要知道在庭审期间躲在卫生间是什么感受，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我尽我所能讲述出来，你可以自取所需。

2015年1月，我22岁，在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尔托工作和生活。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派对，然后在户外的空地上被性侵了。两个路过的人看到，阻止了他，并救了我。过去的生活离开了我，而新的生活开始了。为了保护隐私，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变成了埃米莉·多伊。

在这个故事里，我将称呼辩护律师为“辩方”，称呼主审法官为“法官”。他们将在这里展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不是针对个人的控诉，不是一场反击战，不是列举一份黑名单，也不是一次对事件的重写。我相信我们都是多维度的存在，而在法庭上，被扁平化、被特征化、被贴错标签、被诽谤，都会使人感到受伤，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我会使用布罗克的真名，但事实是：他也可以是布拉德、布罗迪或本森，名字无关紧要。关键不在于他们的个体意义，而在于他们的共性，在于所有人造就了一个漏洞百出的体系。我尝试消化体内的痛苦，面对这段过往，找到一种方式与这些记忆共同生活并与之成为一体。我想将他们抛于身后，继续前行。最终，我不给他们命名，我说出我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香奈儿。

我是一名受害者。对这个词，我没有疑虑不安，只知道这就是我的全部。然而，我并不是“布罗克·特纳的受害者”。我不是他的任何东西。我不属于他。我还是半个华裔。我的中文名是张小夏，翻译成英语的意思是“小小的夏天”。我以夏天命名，是因为：



我生于6月。

“夏”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夏”听起来像“香”。

香奈儿。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任何形式的插入行为都认定为强奸。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只有性器官插入行为才被认定为强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避免称他为强奸犯，害怕被人纠正。法律上的界定是重要的。我的界定同样重要。他把手塞进了我身体的一个腔孔。我相信，他不能仅仅因为没时间完成就逃脱这一称号。

除了罪行本身，类似案件最令人悲伤之处在于受害者开始相信她自身的存在是一种耻辱。我希望能消除这些观念。我虽然使用了“她”这个字，但不管你是男性、跨性别者或非常规性别者，无论你选择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确定身份并存在，如果你在生活中遭遇过性暴力，我力求能保护你。而对那些曾把我渐渐从黑暗中托举出来的人，我想道一声感谢。

你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你就必须记牢它，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用笔写下来并记住，  
你死后，它也会跟着消亡。

——托妮·莫里森

(1)

一开始，我太年轻，对自己太陌生，  
自我几乎不存在。我不得不走进世界，  
看见它，倾听它，回应它，之后我才完全了解  
我是谁，我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

——玛丽·奥利弗

(2) 《上游》

……这是我们的责任，关乎紧要。

——亚历山大·契

(3)

---

(1) Toni Morrison (1931—2019)，美国小说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有《宠儿》《所罗门之歌》等。——中译注，下同

(2) Mary Oliver (1935—2019)，美国当代诗人，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诗歌奖，著有诗集《夜晚的旅行者》《灯光的屋宇》等。

(3) Alexander Chee (1967— )，美国当代韩裔作家，著有《爱丁堡》《夜之女王》等小说，现为达特茅斯学院英语与创意写作系副教授。

# 1

我很害羞。小学的时候演一个关于游猎的戏剧，别人都扮动物，只有我扮的是草。在演讲大厅里，我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在体育课上，我总是躲在角落里。如果别人碰到了我，我会道歉。街上散发的每张传单我都会接。我总是把购物手推车归到原位。如果咖啡店柜台上的调味奶用完了，我就喝黑咖啡。如果我在别人家过夜，毯子看起来就像没碰过一样平整。

我从未给自己办过生日派对。在请别人打开暖气之前，我早已套上三件毛衣。棋盘游戏玩输了，我也不生气。我把硬币草草塞进钱包里，免得挡了后面排队结账的人。小时候，我想长大后去扮吉祥物，这样我就可以既跳舞又不被别人看到。

小学时，我是唯一连续两年被选为冲突调解员的学生。我的工作是一件绿马甲在操场上巡逻。如果有人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就会来找我，而我会教他们用“我的意思是”沟通法，比如，告诉对方“当你.....的时候，我感觉.....”。一次，有个幼儿园小朋友向我求助说，他们每个人可以有十秒钟玩秋千，但是在她玩的时候，孩子们会数“一只猫，两只猫，三只猫”，而轮到男孩们玩，他们就数“一只大河马，两只大河马”，所以他们玩得更久。于是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大家都数“一只老虎，两只老虎”。我一辈子都是用老虎来数数的。

我在此介绍自己，因为在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里，刚开始，我既无姓名亦无身份。我既没有性格特征，也没有主动行为。我被发现时身体半裸，孤身一人，不省人事。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明。人们找来警察，叫醒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让他来看看认不认得我，并询问相关目击者。没有人知道我属于哪个院系，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我的记忆如是告诉我：2015年1月17日，是个周六，我住在帕罗阿尔托我父母家里。我的妹妹蒂法妮在加州理工念大三，她沿海岸线开了3个小时车北上来度周末长假。在家里，她通常跟朋友一起聚会，但

偶尔也会留些时间给我。傍晚我俩接上她的朋友朱莉娅，一个斯坦福的学生，开车去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sup>(1)</sup>，看落日将群山染成金黄。天色暗下来，我们在一家墨西哥快餐店前停了下来。我们热烈讨论着鸽子会在哪儿睡觉，争论着把卫生纸折成方形的人多还是就把它揉成一团的人多（我认为是前者，而蒂法妮认为是后者）。蒂法妮和朱莉娅提起她们那天晚上要去斯坦福校园里参加一个卡巴奥发兄弟会<sup>(2)</sup>的派对。我正把绿色的洋葱调味酱舀进一个小小的塑料杯里，没怎么留意她们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爸爸煮了西兰花和藜麦。他把藜麦叫作“qwee-noah”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呼小叫，“这叫keen-wah，爸，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们用纸盘盛着吃，省得洗盘子。蒂法妮的另外两个朋友，科琳和特蕾，带来了一瓶香槟。原计划是她们三个去斯坦福跟朱莉娅会合。她们说：“你应该来啊。”我说：“我可以去吗？我去的话不会尴尬吧？”我会是聚会上年纪最大的人。我冲了个澡，还唱着歌，在一堆袜子里找内衣，在角落里找到一条发旧的圆点花纹三角裤。我穿上一条紧身的炭灰色裙子，戴上一条沉甸甸的红色小宝石吊坠银项链，套一件有褐色大纽扣的燕麦色羊毛开衫。我坐在棕色地毯上给我那双咖啡色军靴系鞋带，盘成髻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我家厨房的壁纸是蓝黄条纹的。一口旧钟和木制橱柜靠着墙，门框刻着我们历年的身高（如果量身高时穿了鞋就画个小小的鞋子的符号）。打开橱柜的门，我们只能找到威士忌；而冰箱里仅有的调酒软饮料是豆浆和青柠汁。仅有的烈酒杯是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和夏威夷毛伊岛家庭旅行时买到的，那时我和蒂法妮收集它们给我们的毛绒动物玩具当小杯子用。我毫无顾忌地喝纯威士忌，自由而随意，就像你常随口说的那样：“我当然会参加你表弟的成人礼，唯一条件是你得把我灌醉。”

我们让妈妈开车载我们去斯坦福，走福特希尔高速公路只要7分钟。斯坦福就是我的后院，我的社区，过去很多年里，父母在这里雇了好几个便宜的家教。我在这个校园长大，参加草坪上搭帐篷的夏令营，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炸鸡块溜出餐厅，跟教授们一起吃晚饭，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的父母。妈妈在斯坦福书店附近让我们下车，下雨天她会从这里给我们带热可可和玛德琳小蛋糕。

我们步行了5分钟，顺着人行道的斜坡向下，来到松树下一间大房子。一个上嘴唇留有细小胡须痕迹的人放我们进去。我在兄弟会的厨房找到一个提供苏打水和果汁的饮料机，便开始拍下按钮，调制软饮，并自卖自夸说这是红莓汁。“叮咚！现在为女士们提供红莓汁！卡巴奥发，卡巴奥发全天提供！”人群开始涌进来。灯熄灭了。

我们站在前门旁的一张桌子边，像个迎宾委员会，展开双臂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看着女孩们走进来的样子，头半缩在肩膀里，怯生生地微笑，试图在房间里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了解那种神色，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感觉的。上大学的时候，兄弟会是一个排斥外来者的王国，充满噪音、能量爆棚又激动不已，年轻人在那里欢呼雀跃，体格健壮的男性则占主导地位。大学毕业以后，兄弟会就充满令人生厌的酸腐气息、满地散落的薄纸杯，在那儿，你听得见鞋底从黏糊糊的地板上抬起来时发出的声音，潘趣酒<sup>(3)</sup>喝着像涂料稀释剂，坐便器边缘上粘着几缕黑色小卷毛。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塑料瓶的伏特加。我像是在沙漠中找到水一样小心抱着它。保佑我吧。我把酒倒进杯子，又把它扔回去。人们在桌上互相碰来撞去，像小企鹅似的摇摇摆摆。我独自站在一把椅子上，双手在空中挥舞，如同一片喝醉的海藻，直到我妹妹把我扶下来。我们上外头灌木丛里小解。我和朱莉娅开始肆意说唱。我开始唱“干燥的皮肤”，想不出任何跟“丝塔芙”<sup>(4)</sup>押韵的词，卡住了。

地下室里满是人，溢到了水泥露台上的光点那里。我们站在几个矮个子白人旁边。他们把帽子倒着戴，像是小心翼翼地防止脖子在这大晚上的室内被晒黑似的。我抿了一小口温热的啤酒，说这尝起来像尿，就把它递给了妹妹。我感到无聊，人很放松，喝醉了，非常累，而离家只有10分钟路程。我比周围的一切都更年长。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的记忆变成一片空白，卷轴在这儿断了。

直至今日，我仍然相信那天晚上我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是重要的，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记忆。但这些事会被无情地重新提起，一次

一次又一次。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将被切开、被衡量、被计算，被呈现给公众来评判。一切都因为，这个派对的某个角落，有他在。

---

太亮了。我眨了眨眼，看到双手手背上结着褐色的血迹。我右手绷带已经松动，黏合剂失效了。我想知道自己在这儿多久了。我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一张成人床，两侧都有塑料护栏。墙是白的，地板抛过光。有什么东西深深刺进了我的胳膊肘，白纱带缠得太紧了，手臂上的肉都凸了出来。我试着把手指插进绷带，但手指太粗。我朝左看。两个男人正盯着我。一个年长的非裔美国人，穿着斯坦福的红色防风夹克，另一个是白人，穿着黑色警服。我的双眼模糊起来，他们俩就变成了红方块，黑方块，斜靠着墙，胳膊放在背后，仿佛他俩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我又定睛看了看他们。他们露出我看着一位老人下楼梯时那样的表情：紧张不安，担心他随时可能跌一跤。

警官<sup>(5)</sup>问我感觉如何。当他靠近我的时候，他的眼神毫不踌躇，不含一丝笑意，只是一直定定地睁大眼睛，就像两个小池塘。我想，挺好的啊，难道我该感觉不好吗？我正扭头四顾找我妹妹。穿红色防风夹克的男人介绍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你叫什么名字？”他们的注视令人不安。我感到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去问我妹妹，她一定是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不是学生，只是来玩的。”我说，“我叫香奈儿。”

我睡着了多久？我一定是喝得太醉，摸进校园里最近的一栋楼里睡过去了。我是爬过来的吗？怎么会把双手都擦破了？是谁用这破旧的急救包给我包扎起来的？他们可能有点儿恼火，又有个醉酒的熊孩子得要他们来照料。着实令人尴尬，我已经过了这样肆意而为的年龄。不管怎么样，不能再麻烦他们了，谢谢他们给我这张折叠床。我扫视门厅，想知道哪扇门是出口。

他们问道，他们可以给什么人打电话，告知对方我在这儿。这儿是哪儿？我把妹妹的电话给了他们，然后看着穿防风夹克的男人走



开，一边跟我妹妹通电话，一边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听不见他们说什么。我的手机在哪儿？我开始在身边摸索，想看能不能碰到个发硬的物件。什么都没有。我懊恼自己把它弄丢了，还得转回去找。

警官转身向着我。“你现在是在医院里，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被性侵了。”他说道。我慢慢点头。真是个严肃的人！他一定是搞糊涂了，我在派对上没跟谁说话呀。我需不需要澄清？我难道还不够年龄自己签字出院吗？我想会有人进来说：“警官，她可以走了。”然后我向他们致意，离开。我想吃面包和芝士。

我感到肚子里一阵剧痛，要去小便。我问能不能用一下卫生间，他要求我等等，因为他们必须要留尿样。为什么？我想。我静静地躺在那里，憋着膀胱。终于，我被放行了。当我坐起来时，我注意到灰色连衣裙在腰上堆成了一圈。我穿着一条薄荷绿的裤子。我很纳闷，自己是从哪儿搞来的这裤子，又是谁把拉绳系成蝴蝶结的。我怯怯地走向洗手间，从他们的凝视中解脱了出来。我把门关上了。

我脱下新裤子，半闭着眼，再褪下内裤。我的拇指擦过大腿两侧，触摸着皮肤，什么感觉都没有。奇怪。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动作。我把双手平放在臀部，手掌顺着大腿摩挲，仿佛它们会突然恢复知觉，摩擦着，摩擦着，直到开始变热，我的双手停下来。我没往下看，只是呆呆地半蹲在那里。我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半弯着腰，一动不动，没法坐，也没法站，裤子褪落到脚踝。

我总是想知道为什么幸存者会对其他幸存者如此了解。为什么，即使我们所遭受的攻击的细节各有不同，幸存者之间对视一眼即了然于心，无须解释。也许我们所共有的并不在于攻击本身的细节，而是那一刻之后的事：你第一次独处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上溜走了。我去过哪儿了。什么被夺走了。一种被寂静吞噬的恐怖。从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中脱离。这一刻并非痛苦，并非歇斯底里，亦非痛哭流涕。而是你的内脏变成了冰冷的石头。是纯粹的困惑伴随着一丝察觉。慢慢成长的奢侈已经逝去。由此开始的是残忍的觉醒。

我慢慢俯身，坐到坐便器上。有什么东西在戳我的脖子。我摸了摸后脑勺，觉得打结的头发里有质地粗糙的东西。我到外面去了一小

会儿，是落下的树叶么？一切都感觉不对劲，但是我感到肚子里有一种麻木的平静。宁静而黑暗的海洋，平坦而广阔。恐怖就在眼前，我可以感觉到它在移动，改变着我的内脏，那里潮湿而沉重，昏暗不明，但在表面上，我只见到一道波纹。恐慌似鱼儿般出现，飞快地划破水面，掠过空中，又溜回水里，一切复归于寂静。我无法想象我会发现自己身处一间无菌室里，一个马桶，不穿内衣，独自一人。我不会去问那位警官知不知道我的内裤在哪里，因为我自身的一部分很清楚：我还没准备好去听那个答案。

我想到一个词：剪刀。警官用剪刀剪去了我的内裤，因为上面有阴道黏液，以防他们需要测试阴道黏液细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医护人员通过衣物做切片检测。我站起身，注意到地上的泥土。我把裤子弄平，把拉绳系成蝴蝶结。我在水龙头前犹豫了一下，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允许我把血迹洗掉。所以我就用指尖蘸着细水流，手掌碰了碰水，留着手背上结下的暗色污迹。

我回来了，像之前那样平静，礼貌微笑，爬回我的小床。系主任说已经把我的下落告知我妹妹，并递给我他的名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他走了。我拿着这张小卡片。警官告诉我SART<sup>⑨</sup>大楼要到早上才会开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楼，只知道我应该回去睡一觉。我平躺着，但觉得又冷又怪异，刺眼的灯光下就我们俩。我很庆幸不是一个人，但如果他能读本书或者去自动贩卖机那儿就好了。被人盯着时我没法睡着。

一个护士出现了，瞥了我一眼，立刻转身对着警官，“怎么她没毯子？！”警官说他已经给了我一条裤子。“好吧，给她拿条毯子！怎么没人给她条毯子？她就躺那儿连条毯子都没有！”我看着她激动地打着手势，提出更多要求，如此执着于我的保暖问题，毫无畏惧地提出要求。我脑子里回想着这句话：谁给她拿条毯子。

我又闭上了眼睛，这一次沉浸在温暖之中。我准备离开这个凌乱不堪的梦境，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躺在我的花面被子里，头上悬挂着宣纸做的灯笼，而妹妹就睡在隔壁屋里。



我被轻轻推了推，睁开眼睛，还是那样的亮光，还是那几条毯子。一位金发女士穿着白大褂站着，身后还有两位女士。她们对我微笑，好像我是个新生儿似的。这几位护士中有一位名叫乔伊，我把这当作冥冥中的一个好兆头。<sup>(7)</sup>我跟着她们出门，走进一个小型停车场。我觉得自己像个衣着邋遢的女王，毯子拖在身后，像天鹅绒披风，两旁还跟着随从。我眯起眼睛仰望天空，想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已经天亮了吗？我们走进一幢单层建筑，空荡荡的。她们带我进入一间办公室。我裹着几条毯子坐在一张沙发上，注意到一个架子上的活页夹脊上都标着“SART”字样。下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性侵应变小组。

这就是他们。我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两只眼睛安置在一具米黄色的尸体上，尸体上有一窝肮脏的棕色头发。那个早晨，我会看着银针扎进我的皮肤，沾血的棉签从我两腿之间取出来，然而，没有什么会令人畏缩、龇牙咧嘴或倒吸口气。我的感官关闭了，我的身体是具无力的人体模型。我只知道那些穿白大褂的女士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我服从每一道命令，当她们对我微笑时，我也报以微笑。

一沓文件放在我面前。我从毯子里伸出胳膊签名。如果她们解释这是要我同意的条款，我也听不懂。文件一份又一份，颜色各异，淡紫色、黄色、橘红色。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我的内裤不见了，为什么我的手在流血，为什么我的头发脏了，为什么我穿着可笑的裤子，但事情似乎进展顺利，我想如果我一直签字、点头，我就可以收拾干净，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重新开始。我把名字写在文件最下面，一个大大的弧形C和有两个凸起的M。当看到一页纸的顶部用粗体写着“**强奸受害者**”几个字时，我停了下来。一条鱼跃出了水面。我停了停。不，我不同意成为一名强奸受害者。如果我在这条横线上签了名，我就成为其中一员了吗？而如果我拒绝签字，我就能保持正常的自我了吗？

护士们离开去检查室准备了，一个女孩做自我介绍说她叫阿普丽尔，是性侵应变小组的辩护律师。她穿着运动衫和打底裤，头发看上去很有趣，一束杂乱的卷发扎成马尾。我喜欢她的名字，就像我喜欢乔伊的名字一样；4月是细雨飘落的月份，是马蹄莲盛开的时节。<sup>(8)</sup>她给了我一份装在塑料杯里的黑糖燕麦粥，我用一个劣质白色汤匙吃

了。她看上去比我年轻，却像母亲般照顾我，一直叫我喝水。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在星期天起得这么早，想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不是寻常的一天。

她递给我一个橙色的文件夹。“这是给你的。”里面是黑白复印的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信息包，歪歪扭扭地装订起来，令人费解的电话号码列表。一本小册子上画着一个穿眉钉的女孩，看起来那么焦虑，那么愤怒。紫色的大写字母写着：**你并不孤单。这不是你的错！**什么不是我的错？我干了什么？我打开一本小册子，《事后反应》。第一类写着：“0到24小时：麻木，头晕，不明的恐惧，休克。”我点了点头，惊人地相似。下一类别是：“2周到6个月：健忘、疲惫、内疚、噩梦。”最后一类是：“6个月到6年或更久：孤独，记忆触发，自杀念头，无法工作，药物滥用，人际关系困难，孤独。”这是谁写的？是谁在这张破纸上描绘了一个不祥的未来？这个心碎的陌生人的时间表，我该拿它怎么办？

“你想用我的电话给你妹妹打电话吗？你可以告诉她过几小时后来接你。”阿普丽尔拿出手机。我希望蒂法妮还在睡觉，但她很快就接了电话。我知道她在哭；当她把车撞瘪了，或者找不到衣服穿，或者电视里的狗死了，我知道她都会哭。但这次哭声听起来很不一样，就像鸟儿在玻璃盒子里拍打翅膀，一片混乱。这声音使我浑身发抖。我的声音变得平稳而轻松。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微笑。

“蒂菲！”我说。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是我的声音更加平静，让她的声音平稳下来。“姐们儿，我在吃免费的早餐！是啊，我挺好！别哭！他们觉得发生了些事情，不是，他们连这是不是真的都还不知道，只是预防措施，但我最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吗？你过两小时能来接我吗？我在斯坦福医院。”实习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说：“圣何塞，你在圣克拉拉谷医疗中心。”我迷惑地瞪着她。“哦，对不起，我在圣何塞的一家医院！”我说道，想着自己是在离家开车要40分钟的另一个城市？“别担心！”我说，“我准备好了再给你电话！”

我问阿普丽尔知不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救护车。”我突然担心起来，我付不起这费用。体检要花多少钱？松针像小爪子一样挠着

我的脖子。我拔出一根褐色的尖刺。一个路过的护士温柔地嘱咐我别去碰它，因为他们还需要给我的头部照相。我便把它放回去，像插一个发夹一样。检查室已经准备好了。

我站起来，注意到松果和松针散落在垫子上。这到底是哪儿来的？当我弯腰去捡的时候，头发散落肩头，让更多东西掉到了干净的瓷砖上。我跪在地上，盖着毯子，开始把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整齐地堆成一堆。“这些你们要么？”我把它们捧在手掌里问道，“我能把它们扔了吗？”她们说别担心，就放着吧。我又把它们放在沙发上，为自己弄得一团糟而感到尴尬，一尘不染的地板和家具上都留下了粗心的痕迹。护士用平淡的声调安慰我：“只是些枯枝败叶，枯枝败叶。”

两个护士把我领进一间阴冷的灰色房间，里面有一面大镜子。晨曦微露。她们让我脱衣服。这似乎有点过分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露出皮肤，但在我的大脑答应这一要求之前，我的手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听她们的。她们打开一个白色的午餐纸袋，我脱下肩带已发旧的米色带衬垫文胸放进去。灰色裙子被放进另一个袋子里，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它。还有关于检查精液的事。一切都消失了，我一丝不挂地站着，两个乳头回瞪着我，我不知道该把胳膊放在哪里，只想双臂交叉在胸前。她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的头拍照，告诉我别动。我习惯拍肖像照时把头发放下来，在一边侧分，但我当时不敢碰那团高低不平的乱发。我想知道是否应该露齿微笑，应该往哪儿看。我想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就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

一个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蓝色塑料尺。另一个拿着一个沉重的黑色照相机。“要对这些擦伤进行测量和记录。”她说。我感觉到戴乳胶手套的指尖爬过我的皮肤，尺子的硬边紧贴着我的脖颈、肚子、臀部和大腿。我听到了每一次咔嗒声，照相机的黑色镜头盘旋过每一丝头发，每个鸡皮疙瘩，每条血管，每个毛孔。皮肤一直是我自我意识最深层的来源，因为在孩提时代，我就开始饱受湿疹的折磨。即使后来皮肤愈合了，我也总是想象它会长斑或变色。我僵住，被镜头放大。但当她们弯下腰来绕着我转的时候，她们温柔的声音把我从脑袋里提了出来。她们像《灰姑娘》里的小鸟一样照顾我，嘴里衔着卷尺和布条，轻快飞动，为灰姑娘的礼服量尺寸。

我转过身去看她们在拍什么，瞥见我臀部上有一块红色的交叉影线。恐惧使我闭上眼睛，把头又转向前方。我总是对自己的身体极为苛刻：你的两个乳房离得太远。两个可怜的茶叶袋。你的乳头朝着不同的方向，就像鬣蜥的眼睛。你的膝盖变色了，几乎是紫色的。你的肚子软塌塌的。你的腰太粗，像个长方形。腿是挺长，但要是不够细，又有什么用呢？但当我赤裸裸地站在晨光中时，那个声音消失了。

她们继续上下左右来回移动的时候，我盯着自己看。我抬起头顶，伸长脖子，把肩膀往后拉，让手臂放松。晨光融化在我的领口，我的耳朵曲线，流向我的锁骨，我的臀部，我的小腿。看看你的身体，你胸部的曲线，你肚脐的形状，你漂亮的大长腿。在这间晃动着白大褂和蓝绿色手套的房间里，我是一块温暖的砂岩色的调色板，一个发光的容器。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清理我的头发了。我们三个人把松针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放进一个白色的袋子。我感到有碎片被发丝卡住了，当一根根头发从头皮上被拔下来时，我感到一阵剧痛。不停地拔，直到袋子里塞满了刺和头发。“这些应该够了。”她说。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清理出来，扔在地板上等着它们被清扫，这时候屋里很安静。我轻轻地在肩膀上吹了吹，把泥土吹掉。护士们梳理我打结的后脑勺的时候，我设法清理出了一根鱼骨形状的松针。这感觉永无止境。如果他们让我低下头，要把我的头发剃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低下脖子。

她们给我穿上一件软绵绵的病号服，陪我走进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把看上去像牙医用的椅子。我躺下，两腿分开，脚搁在脚蹬上。我的上方是一幅帆船的图片，用图钉钉在天花板上，看起来像是从日历上撕下来的。这时候，护士们端来一个托盘。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金属工具。在我的两个膝盖之间，我看到了她们三个：一座小山脉的样子，一个坐在凳子上，两个站在她身后，全都盯着我。

“你真冷静。”我不知道相对于谁来说我很冷静。我盯着头顶上的小帆船，想着它飘在这个小房间之外的某个地方，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我想，这艘小帆船有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分散

我的注意力。两根长长的木质棉签插进了我的肛门里。帆船尽了全力。

几小时过去了。我不喜欢冰冷的金属、硬硬的棉签头、药丸、注射器、大腿张开的状态。但她们的声音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我们待在这里是为了叙旧，她们递给我一杯霓虹色的药丸，就像那是株含羞草。她们一直保持眼神交流，解释着每次插入之前的每个动作，“你怎么样？我们这样做还好吗？这是根小小的蓝色涂笔，就在阴唇上涂一层。会有点冷。你是在这附近长大的吗？情人节有什么打算吗？”我知道她们问我这些问题是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知道，闲聊是我们一起玩游戏，是她们提示我的举动。而在谈话的背后，她们的手正紧迫地移动，镜头的圆形边缘正窥视着我两腿之间的洞穴。另一架微型照相机在我体内蜿蜒而上，我的阴道内壁显示在屏幕上。

我明白她们戴着手套的手是为了阻止我掉进深渊。无论什么东西要爬进我体内的走廊，都会被抓住脚踝拽出来。她们是一股力量，为我设置路障，甚至让我发笑。她们无法让已发生的一切不发生，但她们会将这一切记录下来，拍下每一毫米的照片，把它密封在袋子里，强迫某些人去看。她们一次也没有叹息，没有怜悯我，或叫我“小可怜”。她们没有把我的屈服误认为软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向她们证明我不仅仅是这样。她们知道。羞愧在这里无法呼吸，会被赶走。所以我放松身体，把它交给她们，而让思绪在轻飘飘的谈话中飘来荡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记忆中，每当我想到她们的时候，不适和恐惧退居其次，主要的感觉是温暖的。

几个小时之后，她们结束了。阿普丽尔带我来到一个靠墙建的大型塑料棚屋。里面每寸地方都塞满了毛衣和运动裤，一堆一堆地摞在一起，准备好迎接新主人。它们是给谁的，我想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会来领取我们的新衣服和装满小册子的文件夹。一个完整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还会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欢迎来到俱乐部，这是你的新制服。在你的文件夹里，你可以找到列明创伤和恢复步骤的指导方案，而恢复可能会花费你一生的时间。实习生笑着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就选吧！”就像选撒在冷冻酸奶上面的配料一样。我挑了一件蛋壳白的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的运动裤。

剩下的事情就是让我自己整理干净。警探已经在路上了。我被带回到那间寒冷、灰暗的房间，这时我注意到角落里的金属淋浴喷头。我谢过她们，关上门。挂好我的病号服。在一篮子随意摆放的酒店捐赠洗发水里仔细挑选，绿茶味、海风味、水疗檀香味。我转动把手。第一次全身赤裸独自站着，不再有轻柔的低语和温柔的手。一切都很安静，只有水拍打地板的声音。

除了那张纸，没有人说过“强奸”这个词。我闭上眼睛。在我的记忆闪烁消失之前，我只看到妹妹站在一圈灯光下。什么不见了？我低下头，伸手碰触阴唇，看到它被笔涂暗了，紫茄子色令人恶心。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听护士说过梅毒、淋病、怀孕、艾滋病，我吃过药片后再次获得了清晨。我看着清澈的水流过我的皮肤，毫无用处；我需要清理的东西都在身体里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一只肥厚、变色的袋子，然后想，让人把这也拿走吧，我没法单独跟它待在一起。

我想用头撞墙，撞散记忆。我开始拧瓶盖，把润滑的洗发水倒在胸前，把头发披在脸上，淋烫皮肤，站在散落的空瓶子中间。我想让水渗入我的毛孔，烫死每一个细胞并让它们再生。我想吸入所有的蒸汽，让自己窒息、失明、蒸发。洗头的时候，乳白色的水在我的脚周围旋转，流进一个金属地漏里。我感到内疚；加利福尼亚干旱难耐，正经历着一场无情的旱灾。我想起家里，爸爸在每个水槽下面都放着红色水桶，拿我们用过的肥皂水浇灌植物。水是奢侈品，而我却站着一动不动，看着一加仑又一加仑的水流入下水道。对不起，我今天得多洗一会儿。40分钟过去了，但没人来催我。

我关了水龙头，站在雾气中，沉默不语。指尖皱皱巴巴，泛起一条条长长的苍白纹路。我擦掉镜子上凝结的水珠，在镜面上留下了污迹。我双颊泛红，梳理了湿漉漉的头发，胳膊伸进一件棉质运动衫，把项链挂回脖子上，戴在胸前。我系好靴子上的鞋带，这是我被允许保留的仅有的东西之一。我把蓝色运动裤塞了进去，再一想，又解开，把裤脚拉出来，这样更好。我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时，注意到袖子上挂着一个标签。上面画着一幅晾衣绳的小画，写着“感恩服装”。

每年，安奶奶（没有血缘关系，但还是我们的奶奶）都会用可回收材料做一些夸张的纸帽子，梨形网格纸、彩色漫画、靛蓝羽毛和花朵折纸。她在街头集市上售卖这些帽子，并将收益捐给当地机构，其中包括“感恩服装”，一个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衣服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我离开医院时只能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袍和一双靴子。这意味着她所有花在餐桌上剪材料、贴帽子，在阳光下的小亭子里售卖的时间回赠了我一套温柔的盔甲。这是安奶奶把我抱在怀里，告诉我：我准备好了。

我走向办公室，双手抱膝坐着等待。警探出现在门口，修剪整齐的头发，长方形镜框，黑外套，宽肩膀，还有一个写着“金”的名牌，他一定是个韩裔美国人。他站在门口，满脸歉意，好像这是我的家，而他正要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进来。我站起来迎接他。我信任他，因为他看起来很难过，难过到我要微笑，以使他确信我一切都好。

他放下一个拍纸簿，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录音机，告诉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当然可以。”我说。他坐着，笔尖在纸上盘旋，录音带的小轮轴在滚动。我没有感到受威胁；他的表情告诉我他是来倾听我的。

他帮我回忆我爸爸做的是什​​么菜，我吃了多少，喝了几杯，我家离斯坦福有多远，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威士忌，为什么参加这个派对，到达的时间，派对上有多少人，喝了什​​么酒，是不是从密封容器里倒出来的，我什​​么时候在外面什​​么地方小便，什​​么时候回到里面。我一直往上盯着天花板，好像这样可以让我更好地思考。我还不习惯如此精确地回忆日常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潦草地写着，不时点一下头，一直在拍纸簿上做记录、翻页，一页又一页。当我讲到关于站在院子里的部分，我看见他用大写字母写下**她最后的记忆**几个字。他的钢笔咔嗒一声插上了。他看着我，仍然在寻找什​​么。就像我们要去某个地方，路却被切断了。我没有他需要的东西。

根据笔录，他只说那天早上有几个人看见我晕倒，警察来了，但我仍然没有反应。他说：“鉴于事件性质，你所在的地方以及你的情况，我们总是，我们必须考虑有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性侵。”性质，

你的情况。他说，调查结束后，那名男子的名字和信息将成为公开记录。“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希望没有。但是，最坏的情况是，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听到“希望没有”。

香奈儿：“嗯，你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找到我的吗？”

警官：“好吧。在那里和一幢房子之间，有一小块地方，嗯，我想是一个垃圾箱。不是在垃圾桶里面。”

香奈儿：“是的，不是在里面。”

警官：“不是，而是在后面那块地方。”

他说：“几个路过的人看到你在那里，他们好像说：‘等等，那边看起来不太对劲。’然后他们停下来，嗯，他们看见有人……然后另一个人路过，看到你。然后向我们报了，报了警……嗯，自然地从一开始，嗯，我们假设可能是强奸。”

我不明白。我怎么去到外面的？有什么看起来不对劲的地方？警探在他的座位上动了动，他问：“你和谁勾搭上了吗？”这时我感到有点畏缩。这是个让我觉得古怪的问题。我说没有。“所以没人得到允许可以碰你。”他看起来很悲伤，好像他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觉得身体僵硬了起来。我说：“他们昨晚就抓住了他，对吧？他是想逃跑吗？”

他说：“所以现在我们要确定是否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当时正在对你做什么，或是试图对你做什么的那个人呢？嗯，但是当时有人在你身边表现得实在可疑。”可疑。“我尽量谨慎地说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根据刑法典，我们可以根据可能的理由逮捕一个人，因为强奸是重罪，我们可以基于相信可能有重罪发生的理由去逮捕一个人。即使它并没有发生。”

潜台词是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但每句话都以另一种场景结尾，而在那种场景里我毫发未伤。即使它并没有发生。正在做或是试图做。希望没有。可疑。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找到了立足点：在一个世界里什么都没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可能被强奸了。我理解他



对信息有所保留是因为调查仍在进行中。也许他还看到我的头发在滴水，我穿错了衣服。也许他想到了我妹妹，她就要来了。

金警探说明天我可能会记起更多事，他会给我他的名片。我点点头，但我知道，我已经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一切。他说今天傍晚晚些时候我可以去警察局取我的手机。在他身后，我妹妹出现了，驼着背，面无表情。当我成为姐姐时，我身上的受害者就消失了。在录音带上，我的询问快结束时，你可以听到她到达的声音：

我说：“嗨。”

“哦，我的上帝。”

“嗨。”

“哦，我的上帝。”

“我真的很抱歉。”

“哦。”

“我让你担心了。”

“不，没关系。”

“哦，对不起。”

她说：“别道歉。”

我站得笔直，不可动摇，我是向她介绍房间里其他陌生人的成年人，他们都很友善，你可以和他们聊聊。阿普丽尔一边给她倒水，一边拉过一把椅子。蒂法妮哭个不停。警探开始问话的时候，我的目光一直落在她身上。她谈论着同样的饮料，朋友的名字，派对的气氛。她提到有个金发男人一直把脸贴在她的脸上，摸她的臀部，跟着她转。她所有的朋友都开始避开他。她说她觉得很奇怪，那家伙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身体前倾的时候用大大的眼睛盯着她。她说她因为感觉不舒服而笑了起来，结果他们的牙齿撞上了。

她说她离开我一小会儿去照顾一个喝吐了的朋友，以为我一个人不会有事。她回来时，警察正在清理派对。她问两个一直在门口服务的学生怎么回事，他们告诉她派对因噪音投诉被取消了。她在停车场

问一个警察，他说他不能说。她猜我是去帕罗阿尔托市中心见朋友去了。但她还在附近转来转去地问：“你见过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孩吗？”她和科琳打开兄弟会的每一扇门，我没接电话，她先是生气，接着是担心。她们朝着树林喊我的名字，而我当时正被推到轮床上，消失在四四方方的白色救护车里。

“学生们拦住了他，”我说，“很棒，对吧。”那天早上，我了解到是几个旁观者看到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并追上了他。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过身体接触。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我的衣服下面触摸过我，也不知道我身体哪个部位暴露了。我告诉自己，危机已经避免，坏人已经被捕，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离开了。警探谢过我们。晚上我们会去斯坦福警察局取我的手机。身穿白大褂的女士们给我拥抱，抱得很紧，然后放开了我。

太阳出来了，照在停车场稀疏的汽车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多么不真实的周日早晨。这是怎么回事？这简直是发生过的最荒唐的事。她们往我那里塞了太多东西。我甚至不能——看看我穿的是什么。这套衣服有多恶心？我展示着向后梳得溜光的头发，身上超大号的运动衫，昂首阔步地走着，有点头晕。蒂法妮仍旧泪眼汪汪，呼吸不顺畅，笑起来打嗝。

我们坐在车里，盯着铁丝网，她等着我告诉她该去哪里。看得出来，她还在发抖。我没有在想他是谁，我的感觉如何，或者这些照片会去哪里。我所有的思绪都围着她转，我的妹妹，为了她，我应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直以来我练就了为她保持冷静的本事。有一次，她晕机，身体前倾，在她的呕吐物掉到腿上之前我就伸手把它接住。当奶奶在我们的沙拉上撒蓝奶酪的时候，蒂法妮捏住鼻子，我就趁奶奶转身把她盘里粘了奶酪的菜叶塞进自己的嘴里。看过《E.T.外星人》<sup>(9)</sup>之后，她被那个干瘪的外星人和他皱巴巴的手指吓坏了，在之后七年里每晚都睡在我的床上。电影里有人接吻时，我就拿个枕头挡住她的脸，“不能看，你太小了。”我写了几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改了又改，最后说服父母给我俩买诺基亚手机。每次班级派对上，我都会把一半的甜甜圈或

思尼克饼干<sup>(10)</sup>用餐巾纸包起来，在课间给她送去。我喜欢马的时候，用狗链把她绑在椅子上，叫她“崔妮蒂”，在她背上放个浴垫当马鞍，给她梳头发，让她从我手里吃脆谷乐麦圈<sup>(11)</sup>。我还记得父母在“马厩”里找到她时的样子。“如果你想玩，就得你来当马。”父母说。你来为她牺牲，你来保护她远离外星人，你来吃蓝奶酪。我明白，那是我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家见父母。我需要时间思考。蒂法妮和我已经够大了，可以来去自由；没回家意味着我们住在朋友家，没有理由担心，我们街区很安全。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在医院里醒来，身上都是草叶，因为有人表现可疑，我无法让他们接受那个消息。我会说：“不过没事了。”而他们会说：“这可不好。”爸爸会问是谁，在哪里，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妈妈会让我躺在床上，喝一杯热姜茶。你告诉父母，他们就会大惊小怪。我不想要大惊小怪。我想让一切都过去。

我确信警察会告诉我有个人试图做什么但没有成功，很抱歉给我造成不便。事实上，我非常确定这完全是个错误，所以当妹妹问我是否要告诉父母，我说：“也许过几年吧。”我想象着有一天在晚餐闲聊时不经意地谈起这件事：“你们知道吗，有一次我差点被侵犯？”他们会说：“抱歉啊，我们不知道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们啊？”我就会说：“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后也没什么事。”然后我会挥手让他们把菜豆递给我。

坐在停车场里，我唯一能想到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快闪汉堡店。早上10点，吃汉堡有点早，但快闪汉堡不一样。我们把室内贴了白色瓷砖的汉堡店当作成长教堂。当我们中的某个人感到难过、高兴或心碎时，我们就会想要去那儿。那里所有的盐和酱都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但当我们到了那里，我觉得自己穿的衣服很尴尬，于是要了免下车服务。我们点了汉堡，然后停在路边吃。我咬了一口，但没尝到酱汁的味道。我把汉堡塞进包装纸里，放在脚边。我已经消磨了足够多的时间。我们知道现在家里一定空无一人，爸爸出去办事，妈妈和朋友们在一起，都出门去参加周日的例行活动了。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心理治疗师，他以前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倾听人们的心声。他引导人们穿过那些我们永远不会听到的故事，以此挣钱养家，为我们提供食宿。我妈妈是一位作家，她写了四本中文书，这意味着她的书我还不会读。尽管他们是开明的父母，但我对他们的大部分生活一无所知。

经过二十年的私人执业，我爸爸说听过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种生活。我母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长大的，她目睹过你想象不出的世间百态。他们俩都明白，生活巨大而混乱，没有什么是黑白分明的，没有什么会按照线性轨迹发展，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早上能醒来就已经称得上是个奇迹。他们在肯塔基州唯一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婚礼，结成了引人注目又看似不可能在一起的一对。

我家的家具都不相配。我们的毛巾既不舒服也不洁白，而是印着史酷比狗狗图案，用得旧旧的。有客人来吃晚饭的时候，蒂法妮和我会把所有的书、漏气了的篮球和乳液样品藏起来，直到一切都一尘不染。我们的目标是像朋友家的房子那样光亮。但聚会之后，就好像房子也可以解开它裤子的纽扣、放开肚子，我们所有的东西又会涌出来。

我的家是一个万物生长、旁逸斜出都被宽恕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来，都会受到欢迎。我的家人是在同一个小宇宙中运行的四颗行星。如果我们有一个口号，那就是“你可以自由地做你自己的事”。家是异于传统的，家是温暖的，家是亲密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独立，家是黑暗无法进入的地方。我下定决心不让黑暗进来。

当我们把车开进车道时，妹妹的手机响了，警探打来电话。她递给我。“你要起诉吗？”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说他无法告诉我太多过程的细节，这更多是由地区检察官部门负责的。他说，检察部门已经倾向于在法律上提出指控，但是否推进则取决于我自己。他说如果我这么做，对他们来说事情会好办一些，但我也不是一定要这么做。我问他能否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来决定，我会给他回电话。

我挂了电话，转身向着妹妹。我没有人可以问，蒂法妮也不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吗？应该，对吗？也许我不应该。但无论如何，他

们会继续，所以我也应该，我的意思是，这是什么？能怎么做？我四顾无措地坐着。我应该这么做，对吧？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当时我以为这相当于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在上面盖个小小的同意的章，表明我支持警方追查此案的决定。我害怕如果我说不，那就意味着我站在了陌生人的一边。我甚至没有想到过法庭，那只不过是发生在电视上、模糊而充满戏剧性的终极对决。再说，那家伙已经进监狱了。如果事实证明他什么都没做，他就会获释，否则他就会留下来服刑。他们有定罪所需要的一切证据。这只是个形式。我给他回了电话，“嗯，是的。是的，我会的。谢谢。”

那时候，我不知道钱能打开牢门。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如果一个女人喝醉了，她不会被认真对待。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如果他喝醉了，人们会同情他。我不知道我的失忆会成为他的机会。我不知道受害者就是不被相信的同义词。

坐在车道上，我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是”会把我的身体再次打开，会磨得我的伤口刺痛，会向公众撬开我的双腿。我不知道预审听证会是什么，不知道审判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有人会阻止妹妹和我相互交谈，因为那样的话辩方会指控我们合谋。那天早上我说的“是”这个字开启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我将度过23岁、24岁、25岁和26岁，直到这个案件结案。

我穿过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告诉妹妹我一会儿就会出去。我锁上门，又洗了一次澡，把医院从我身上冲走。她把客厅里的折叠沙发拉出来，打开电视。我躺到她旁边。她的胳膊像镇纸一样抱着我，好像担心我会被风吹走。电视单调地播放着，午后的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洒进来，父母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而我们则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参加派对，后来分开了，现在又在一起了，但不再是从前的样子。

夜幕降临，我们起来告诉父母我们要去买冰激凌。我后悔这么说，因为现在当我吃冰激凌的时候，妈妈就会看着我，而我则不得不说：“我保证，真的是冰激凌。”

我们先去接朱莉娅，她一直在学校图书馆学习。她和蒂法妮从她们开始戴牙套时就一直是朋友。朱莉娅总是很活泼，但当我把车停下来时，她看起来有些颤抖。

我看着车里的她俩，意识到我的秘密已经变成了她们的秘密。我明白我们不该以这种方式处理事情。如果是蒂法妮住院，我希望我的父母会知道。但我的处境很奇怪。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告诉父母？”我就会反问：“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在我知道事情的更多信息之前，我需要让这个故事处在我的把控之下。

停车场很安静，很黑。我以前曾多次经过这座大楼。它很小，由一条壕沟围着，岸边种着枝干发褐的低矮灌木，蛾子在街灯明晃晃的光束间飞来飞去。门嗡的一声响，我们被领进了阴暗的大厅，里面的软木公告板上贴满了布告和传单。金警探不在那里。相反，一位身穿防风夹克的警官负责接待我。她有橄榄色的皮肤，稀疏的黑发几乎垂到腰间。我跟着她进了一个小房间，桌上放着一个记事本和一个录音机，蒂法妮和朱莉娅在楼下大厅的一个房间里等着。我以为她会告诉我那个男人的事，把我的手机给我，祝我一切顺利。但是门关上了，百叶窗拉了下来。提问又开始了，她要求我回忆前一天晚上的每一个琐碎细节，这次甚至更精确。我们的谈话笔录最终长达79页。这一过程让我感到乏味而多余，我无法理解我所说的话有何意义，也无法理解它将如何发挥作用。

一阵敲门声，另一个警官，身材高大，穿着橡胶制服，髭须浓密，黑色的皮带上满是不同的黑色形状。他看上去严厉而疲惫，说他很高兴看到我没事。他说话的方式让这件事听起来像个奇迹，好像我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他告诉我，一个发现我的人说起这事的时候忍不住哭了，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警官说他自己也差点哽咽了。我想，大男人们都哭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警官从一个大信封里拿出我的手机。蓝色的手机壳上满是泥土，沿着边缘结成了一条发脆的棕色边线，仿佛手机被埋了又挖出来。手机里有几十个来自蒂法妮和朱莉娅的未接电话和短信：“你在哪里，我很害怕。”警官让我把那天晚上拍的所有照片发邮件给她。有一

张我拿着一个红色的杯子，故意做对眼。为什么我不能笑得正常点，就这一次。我给她发了所有的照片和截图，没有意识到它们都将作为证据存档。她给了我提问的机会。根据记录，我说：“嗯，他们说出了什么事。我没有真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还是……真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她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汇报。她说我“是被两个斯坦福的学生发现的”，没再说别的。然后我问她那个人为什么逃跑。她告诉我是因为“有些事看起来不对劲”。我试图更靠近犯罪现场，慢慢靠近停着的警车和黄色胶带引起的骚动。但每次我走近些，她就走过来挡在我前面。当我走到右边时，她躲开了。我伸长脖子想看看他们在隐藏什么，但没用，那个地方禁止入内。我要待在一些没有明确标记的界线之后。

只有这些是我能理解到的。我走进房间，空气就变了。人们的表情黯淡下来，他们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犹犹豫豫地向我走来，就像他们不想惊到一只动物一样。他们在我脸上搜寻着什么，而我茫然地回望。然后他们都说，看到我做得这么好，这让他们钦佩。她说：“我不得不说，你非常冷静，你非常……你一般都是这样吗？”我点了点头，说当妹妹在场时，我会淡化自己的情绪。但他们似乎仍被我的镇定所迷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反应似乎应该完全不同，而正是这点让我不安。

我解释说还没有告诉父母。“这可以理解，”她说，“你懂的，你在努力，我认为你在努力从情绪上拯救你的父母……直到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发生了什么。”她很善良，能理解我的感受，但她把我所有的问题都改变了方向。

询问结束前，我讲清楚了两件事：

1. 在我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谁都不可以联系我的父母。
2. 我不想再次见到或接触到那个人，无论他是谁。

蒂法妮进去做询问笔录时，我被带进一间等候室，里面的奖杯落满灰尘。警官把下列笔记打了出来：



另外一个人很安静，不说话。科琳和蒂法妮觉得他很奇怪，因为他很有侵略性。蒂法妮说他大约5英尺11英寸到6英尺高，有着金色卷发和蓝眼睛。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反戴棒球帽。他穿的是长裤，不是短裤。她不记得他穿的是什么衬衫。她觉得他看起来像她大学里的一个朋友。那个咄咄逼人的家伙正在分发啤酒。有一次，他走到蒂法妮跟前，开始亲她的脸。然后他去吻她的嘴唇。她吓得大笑起来。科琳和朱莉娅看到后也笑了。那个人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当蒂法妮们面对面交谈时，那个咄咄逼人的家伙回来了。他迈步插进她们之间，试图再次和蒂法妮亲热。他从前面抓住她的腰，吻了她的嘴唇。她告诉他她得走了，然后从他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

到家后，我坐在车里，蒂法妮走了进去。我意识到我的男朋友卢卡斯会奇怪我为什么一整天都很沉默。他住在费城，我们交往了几个月。他在第一声铃响后就接起了电话。“昨晚我还担心你呢，”他说，“你顺利到家了吗？”

我不知道我还给他打过电话。我翻看了一下通话记录，发现漏接的电话里有他的名字。我在半夜给他打电话，在他那边凌晨3点的时候吵醒了他。“找到蒂法妮了吗？”他问道，“我担心你会在灌木丛里醒过来呢。”我的腹部发硬。他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说。他说，聊到最后，我不是在说英语，而是一直在胡言乱语。每次我停下来不讲话了，他都会对着电话大喊，让我去找蒂法妮，但我却毫无回应。他知道我孤身一人，无法行动。我觉得自己在下沉。“你给我的语音信箱留了言，”他说，“你听起来完全醉了。”我说：“别删，答应我你不会删除它好吗？”

“一切都还好吗？你听起来很难过。”他说。我点了点头，好像他能看到。“只是困了。”我说。我走进去，把我的苹果手机从它脏兮兮的壳里拿出来，但没有洗。我把运动服叠好，塞进抽屉里。我把橙色文件夹放到架子上，把医院的手环剪下来塞到里面。我有一种奇怪的



愿望，想要保存所有的东西，那些能证明这一替代性现实存在的人工制品。

第二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sup>(12)</sup>，长周末的最后一天。在蒂法妮开车回学校之前，我想让她知道，我们不应该在此时避开或疏远家人，我们必须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我提议一家人出去吃晚饭。我们站着等位，旁边有红色剪纸装饰、一碗甜瓜糖、一缸皱着眉头的鱼。我们点了一整只北京烤鸭。和往常一样，妈妈给我们做示范：把圆饼铺平，抹上一层梅子酱，再加一小块脆脆的深红色鸭肉、几根葱和黄瓜条，把它们整个包起来。妈妈正在卷鸭子。妈妈，妈妈你看，嘎嘎嘎。晚饭后，妹妹驱车200英里回学校，穿过一望无际的平原，吉尔罗伊，萨利纳斯，金城，回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sup>(13)</sup>。她说她害怕让我一个人待着。“为什么啊？”我说，“太傻了，我会没事的。”

那时候事情很简单；我把那天早上的记忆放进一个大罐子里。我搬着这个罐子，一层一层又一层地往楼下搬，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锁起来，然后轻快地走上楼去，继续过我以前建造的生活，那个与他无关，或者与他对我做了什么无关的生活。罐子不见了。

我不知道，在前一天晚上11点，他以15万美元保释出狱。在被逮捕不到24小时之后，他已经获得了自由。

---

(1) Arastradero Preserve，自然保护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尔托市。

(2) Kappa Alpha，美国大学内的男生社团组织。

(3) Punch，一种由葡萄酒、烈酒或果汁添加糖或香料而成的饮料。

(4) Cetaphil，日化品牌，其润肤乳产品比较知名。

(5) 原文为deputy，即deputy sheriff，美国警察体系中县治安官辖下的助理治安官、乡村警察。本书统一译为“警官”。

(6) SART，性侵应变小组（Sexual Assault Response Team）。

(7) 乔伊“Joy”有欢乐、喜悦之意。

(8) 阿普丽尔“April”有4月之意。

(9)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电影，1982年上映。

(10) Snickerdoodle，一种饼干，用黄油或油、糖、面粉并粘上肉桂糖制成。

- (11) Cheerios，美国一种谷物即食麦片圈品牌。
- (12) Martin Luther King Day, 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联邦法定假日，以纪念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
- (13) Gilroy, Salinas, King City, San Luis Obispo，都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

## 2

帕罗阿尔托市的街道两旁种着白玉兰树，上面开满了奶油色的花朵，道边还有蓝色的邮箱，橘子树上的果实像圆圆的小点。平均温度在七十多华氏度，你可以闻到掉落晒干的桉树皮碎片的味道。公园里一尘不染，树荫斑驳，狗儿都吐着粉色的舌头。艾克勒式房屋<sup>(1)</sup>间的巷道，木制车库门，日本枫树。人行道铺得平平整整，孩子们骑自行车上学，大人们骑自行车上班，每个人都有学位，每个人都参与资源回收。

我和十一位同事挤在一个房间的办公室里创业，为孩子们开发教育应用程序，我们的桌子挨得很近，旁边是几间有玻璃墙的会议室。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六个月，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制造了一种成人生活的表象，早起，少出门。我在谷歌日历中输入会议时间和同事们的生日，使用淡紫色和橘红色高亮显示标签。我订购打印墨盒，用第一份薪水买了一辆豪华的白色公路自行车，给它取名为“豆腐”，尽量减少在正式邮件中使用感叹号的次数。

在我试图建造的世界里，我没有给诸如强奸、受害者、创伤、擦伤、律师之类的词留出空间。我有自己的词汇体系：丰田普锐斯，电子表格，费奇牌酸奶，建立信用，去纳帕<sup>(2)</sup>旅行，改善体态。我成年生活的表象可能是牙签和棉花糖<sup>(3)</sup>的复制品，但无论这个框架多么脆弱，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周末过得怎么样？”我的同事说，“你妹妹回来玩得愉快吗？”星期六，我去了派对。星期天，医院和警察局。星期一，北京烤鸭。“是啊，挺开心。”

我站在办公室厨房的荧光灯下。我的卷饼在微波炉里转着。我交叉双臂，注意到手上有奇怪的阴影，仔细一看是瘀伤。它们在我的皮肤下盛开，是牵牛花的颜色。我挽起袖子，发现胳膊肘内侧有更多的紫色瘀点。我按了按这些小点，它们在我拇指下面变白了。我着了

迷，仿佛看着自己变成了另一种生物。一年级的時候，我发现手的两边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银色。“我是美人鱼。”我悄声告诉一个朋友。她解释说那是铅，是我的铅笔写在纸上晕开了。简单而乏味的解释；我相信这些瘀伤也有一个这样的解释。我给每个瘀点都拍了照，以证明它们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把袖子拉了下来。一切都已料理完毕，为什么要看呢？卷饼烧着了，微波炉在冒烟，我挥着抹布，免得烟飘进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搬到精神深处的罐子正坐在房间的正中央，等着我。真有趣，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我再次搬起它，打开门，走下楼梯，一层又一层，把它锁起来。

我在凌晨4点钟的纯然静谧中醒来。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我咔嗒一声戴上头盔，里面是一层干塑料泡沫，然后骑着豆腐上了街。我在铺满碎石的小路上骑着车，骑过蔓生的橡树，骑过小木桥。当我穿过院子回来的时候，我从厨房的窗户看到爸爸，头发蓬乱，正在煮咖啡，光脚穿着旧的蓝色浴袍。他惊呆了。“你已经起了？”他说。“我试试新自行车，”我说，“我爱它。”

洗完澡涂上乳液，我的皮肤又刺又痛。我想象着有长小牙齿的蜜蜂在啃啮我的肉。我不去在意这疼痛，提醒自己什么都没受伤。每当我的思绪开始游离到那些令人不安的场景中，我就说：“停下。已经结束了。我回家了，蒂菲的家。”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胳膊上到处都是淡紫色的斑点。我告诉自己，希望。我告诉自己，可疑。与此同时，不安在我的内心深处翻腾。

骑自行车，日出，工作，日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手机一直没有收到信息。我感到不安，开始在晚上骑自行车，沿着高速公路骑很长的路线。这让爸爸很担心，又给车加了个前灯。我转动车把，光线向四面八方射去，使我不致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曾经养过一只叫梦梦的白猫。我们爱了它整整12年。圣诞节前两个星期，梦梦不见了。蒂法妮和我冒险出去找，呼唤着它的名字，打着手电筒在田野间搜寻。过了圣诞节，父母告诉我们，梦梦几周前在路边被一辆车撞了。他们把它的骨灰装在一个盒子里交给我

们，还有一张火葬场的证明，印着一道彩虹，下面写着“梦梦·米勒”。他们等了段时间才告诉我们，因为不想破坏圣诞节的气氛。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让我们到田野里去四处找，而那时死猫就放在壁橱的一个箱子里。现在，我又有了一只死猫。我可以把它藏在壁橱里，保持一种“我没事”的错觉。或者我可以说，我可能被强奸了，就在我家附近。然后给他们看一个装满骨灰的盒子。我决定不着急，我不想毁了圣诞节。

我从来没有依赖过别人。在成长过程中，每当妈妈想抱我的时候，我就会拍着腿用中文说：“我自己走！”而妹妹则会赖着站在地上，举起双臂，直到有人把她抱起来。我更大一些时，看到过妈妈因为我们一只新出生的小狗窒息而哭泣，看到过爸爸因为肺栓塞住院时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裙子。我开始明白，他们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需要能够照顾我们姐妹两个。

星期四，妹妹被传唤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当地的警察局。警察想带她浏览斯坦福警察局发给他们的一组照片。她要做的是找出此前她告诉他们的那个有侵略性的男性。警察展示出一堆头发蓬乱、长着粉刺的白人男子的照片，一张张点击过去，当那个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她锁定了他。警方报告称：“蒂法妮毫不犹豫地指认了4号的照片。”当被问及她有多肯定时，她说：“百分之百。”她打电话给我：“我看到他了。”

“你什么意思？”我很困惑，警察是怎么知道是谁试图吻她的？他们给派对上的每个男人都拍了照片吗？这是一个排查的过程吗？为什么他们要花时间追捕他，而不是在攻击者身上集中精力？

“不，”她说，“一定就是那个人。”

“那不可能。”我说。

“是那个企图吻我的人盯上了你。我搞砸的，”她说，“操蛋。”

那天晚上他盯着她的脸看。我没法将他的样子从脑海中抹去。但这个他仍然没有名字。仍然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每当我想起那个早晨，就会多一个罐子。我的脑海被这些密封罐子塞满了。我没有地方堆放它们。它们塞满了楼梯间，没法藏在柜子里。我的世界里堆满了罐子，我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走，也没有地方呼吸。

空荡荡的十天过去了。我被一条短信吵醒。妹妹给我发了一张《斯坦福日报》“警察日志”板块的截屏。其中一条要闻是这样的：“据报道，一名受害者用U形锁锁住的自行车在周五下午3点到周日上午10点之间的某个时间在罗夫莱宿舍楼门前被盗。”另一条是：“周日，1月18日，凌晨1点，一名男子在洛米塔路附近因强奸未遂被逮捕并送往圣何塞监狱。”第一次确认这是真的。在这个句子里，我甚至不存在。我理解了“未遂”这个词。那个潜伏的男人一定没有成功。他一定是看见我晕过去了，怀疑地看着我，然后有几个人把他打跑了。一部分的我心存感激，但一部分的我很难过。就这些吗？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短句，隐藏在一些小偷小摸的报道中。如果确切的侵犯案件就是这样报道的，我曾错过了多少？那天早上，我相信这就是我的案子所能得到的全部新闻报道，能写进幸运饼干纸那么点儿大地方的一句话而已。

后来，我坐在办公桌前，喝着一杯咖啡，浏览着午餐的三明治菜单。我点击回到主页上的新闻版块，看到“斯坦福运动员”，看到“强奸”，看到“昏迷的女人”。我又点了一下，满屏是两只蓝眼睛和一排整齐的牙齿，雀斑，红领带，黑西装。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布罗克·特纳。我读到他被指控犯有五项重罪：强奸醉酒者，强奸无意识者，用外物性侵醉酒女性，用外物性侵无意识女性，伴随强奸意图的攻击。太多的单词，混杂在一起。再读一遍，慢一点。我在谷歌输入：“什么是外物。”恐慌来得平静而缓慢。它被定义为“一个物体进入它不应该在的地方，如一个活体或机器”。例如：“眼睛里的一粒灰尘，碎片，木片，鱼钩，玻璃。”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

这篇文章提到受害者遭受了手指插入（digitally penetrated）。我想到了数码相机。我也用谷歌查了。Digital，拉丁语词根digitalis, digitus有“手指，脚趾”之意。他一定是对她用了手指，对我。谷歌终于让我坐下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懒懒地坐在转椅上，听着键盘敲击的声音，有人在给自己倒水。我盯着这个人，他也对我回以笑容。

我被告知，有人发现我晕倒了，身旁还有一个男人。从来没有人说：“那人被发现时正在侵犯你。”

我的电话响了。我关掉标签页，走进儿童测试室，那里有玻璃墙，角落里放着黄色的懒人沙发，驼背鲸图案壁纸，桌上放着一罐蜡笔。一位女士向我打招呼，介绍自己是副地方检察官，“我叫阿拉蕾。”她说，“发音是Ah-lah-lei。”我说了一遍，又重复了一遍。三个音节，像花瓣飘落，左右左。Ah-lah-lei。我拿起一支绿色蜡笔，一张小纸片。

她好像说，你还好吧我希望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见面在DNA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无法确认这是强奸它们已经被送往实验室但强奸证物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由于媒体的压力你的案子可能会加快进度但现在我们将假定阴茎插入并推进五项重罪现在起诉要比以后再起诉容易得多但如果找不到精液两项强奸指控就会撤销我们就只剩下三项关于侵犯和强奸未遂的重罪只是要知道他的团队可能伪装成支持者来试图联系你和你的家人所以告诉家里人不要和Ah-lah-lei未许可的人说话如果媒体试图联系你别回应他们是不允许联系你的将会有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如果他们问起受害者我会告诉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我们会给你指派一名律师他可以回答任何法律问题听起来不错吧很高兴认识你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保重。

我走出去拿了支笔，中途停下，电话响了起来，我又走进屋里。从斯坦福大学打来的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她是什么部门的负责人，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他已经不能再进校园了，好吗？我认为这很好，但我也不在学校。他在什么地方？这几分钟将是我在之后两年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来自斯坦福的消息。

金警探打来电话解释说，当报告归档后，公众就可以看到它了，媒体就是这样发现的。他为媒体如此迅速地关注到这个案子感到惊讶。他说布罗克雇了私家侦探，所以目前最好不要向任何朋友透露消息。在这些话里，我的整个世界坠落了。“侦探吗？他们要找什么？”我问。他说：“没办法知道，因为现在最好保持低调，我们保持联系。”



另一个陌生号码，是我的辩护律师，她的名字叫布里，来自基督教女青年会<sup>(4)</sup>，我感谢她，因为她的声音很亲切，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手里仍然拿着那支蜡笔。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安静地坐着，我关上又打开玻璃门，手机一直贴着脸。电话都打得不长，最后都是这样结尾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告诉我。”我有成千上万的问题要问。但是，“明白了，明白了，”我说，“谢谢，谢谢。”我说。我想说：你是谁？你从哪里给我打电话？什么是辩护律师？她是我的心理治疗师吗？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哪里？申请受害者援助是什么？他们支付心理治疗费用吗？布罗克是个什么名字？他住在俄亥俄州？他是什么时候出狱的？我可以匿名吗？他会回来接受传讯，传讯是在星期一，什么是传讯？电子邮件出现在我的收件箱，包含我需要的联系人和后续信息。我把新号码录入手机，每个名字旁边都设一个红点的表情符号。

蒂法妮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和朱莉娅的全名在一些文章中被泄露了。朱莉娅被曝光了，校园里议论纷纷，她的母亲安妮已经收到斯坦福大学忧心忡忡的家长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安妮告诉我们要保持冷静，并提供了法律建议：“人们会接近你，说他们是‘法庭调查员’——听起来很官方，但他们很可能是为辩方或媒体工作的。这些人可能会出现在你的宿舍或家门口。准备好说‘无可奉告’。坚持住，姑娘们。”

我们正被追捕。我又给我的检察官打了电话。阿拉蕾说妹妹的名字不受法律保护，只有你，只有受害者的名字受保护，我们无能为力。我拒绝这一点。我会用假名建个邮箱，亲自给媒体发邮件。但是他们怎么知道那不是随便哪个人呢？我怎么才能让他们听我的呢？我很激动，告诉蒂法妮我正在想办法，我只需要1分钟。我告诉她我和检察官谈过了，她人很好，她的名字是，我看着我的纸，上面用绿色蜡笔潦草地写着几个字母，AYLEEELEE。我又继续读那篇文章。

“受害人说，她喝了两杯威士忌、两杯伏特加，和姐妹一起走出兄弟会派对，之后‘晕了过去’。”他们怎么如此准确地知道我喝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和任何记者说过话。然后我想起自己在医院里，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湿漉漉的头发浸湿了我的棉质领口，我含着胸以免被看



出来没穿文胸，我里面仍然因为刚做的检查而感到疼痛。我所回忆起的一切，笨嘴拙舌地找出来提供给那台小小的黑色录音机的细节，都已被输入为文字记录。记者们一定是对这些记录进行了筛选，用我的话构建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供公众仔细阅读。我感到我生活的围墙被推倒了，整个世界都爬了进来。如果在检查强奸的医务室里的轻声细语都能用扩音喇叭放出来，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我放心地说话呢？

我翻到一篇文章的结尾，看到：“这名女性正在医院康复。特纳是一名大一新生，曾三次获得全美高中游泳冠军，并在两项自由泳比赛中保持州纪录……”我看到“医院”后面无缝对接了“纪录保持者”。最后一句是：“如果特纳被定罪，这名2012年伦敦奥运会美国选拔赛参赛者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如果我的名字曝光了，他们会怎么说？香奈儿做着朝九晚五的入门级工作，她从未去过伦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担心这件事。“杰维斯说特纳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也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这是非常不幸的，他很好，很好……”我停住不读了。为什么他“优秀，优秀，很好，很好”？我的同事正好问我一个问题。关于推特的一些事。推特，一个老师发了一条推特，他发了什么？“我来办吧。”我对她说。办什么，我不知道。她谢了我，我不知道她谢我什么。

新闻链接到一份警察报告，我点击，滚动页面，寻找受害者，受害者，受害者。我看到了警官仔细写下的笔记。我看到“那名女性对象，后来被确认为**受害者**”。我看到她“倒在垃圾箱后面的地上”。我看到她“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连衣裙”。我看到“她的裙子被拉到臀部，堆在腰部附近。她的整个臀部都露了出来，而且她没有穿任何内衣”。我看到“可以看见她的小腹和耻骨区”。我看到“她的阴道和屁股”。我看到“她的长发乱蓬蓬的，打着结，满是松针”。我看到她“躺着，脚和腿弯曲成45-90度角（胎儿式），双臂放在胸前，双手放在脸旁边的地上”。我看到“她的裙子从肩头垂落下来，文胸被拉了出来”。我看到“它只盖住了她的右乳”。我看到“项链一直绕在她的脖子上，吊坠现在正挂在背后正中央”。我看到“一条白色带黑色圆点花纹的内裤，皱成一团扔在地上，离**受害者**的腹部大约6英寸”。我看到她的“银色苹果手机落在她屁股后面的地上。一个蓝色手机壳扔在约4英寸远的地方，

与手机分开”。我看到“她穿着系好鞋带的棕色靴子，鞋带系成蝴蝶结”。

我在文章末尾看到了第一条评论：“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兄弟会做什么？”我不明白。我们读的是同一篇文章吗？我关上报道页面。我当时就断定那不是真的，没有一点是真的，因为我，香奈儿，正坐在办公室里，而那具被公开拆解的身体不属于我。我想这就是埃米莉·多伊诞生的时刻，是我，但又完全不是我。突然间我恨她，我不想要这些，不想要她的赤裸，她的痛苦。那是埃米莉，那一切都是埃米莉的。

---

在帕罗阿尔托整洁的草坪上，微风轻拂，特斯拉宛如新上过漆，这一切都覆着一层膜。刮开阳光和微笑之下的这层膜，压力就露了出来，那种压力并非鸣壶中的沸水一般，而更像是文火煲汤。

在冈恩高中，我们唯一占优势的运动是羽毛球。没人能告诉你足球赛的比分，但全国数学竞赛的获奖者照片会被贴在橱窗里。我们学校以培养温和谦逊的天才而闻名。但你见不到迷惘和混乱。没有人渴望成为画家、水手或文学隐士。你必须做“有意义”的事，必须与顺利上进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挣扎只会让你慢下来，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那么多要求要去符合，心理健康排在我们的清单末尾。精神不稳定就意味着落后。

2009年春天，我在冈恩的第三年。午餐时所有老师都被叫到了体育馆。不一会儿，他们慢慢地走出来了，走得很慢很慢。我注意到他们肩膀弯驼，脸色苍白，没有一个人说话。午饭铃响了，我们走进教室，老师读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一个同学在加州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大家显然受到了惊吓，学生们都用惊狂的声音议论起来。一个月后，老师又向我们读了一遍这封信，“很抱歉告知大家……我们失去了……如果你需要帮助请不要犹豫”，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名字是一个女孩。她跟我一起上过法语课，她的空桌子上放着一朵红玫瑰。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低着头，抽着鼻子。我的朋友开始大哭起

来，老师让我陪她去辅导员的办公室。把她送到之后，我一个人站在过道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想逃跑。

她葬在学校街对面的墓地里。我迟到了，大家都走了，我徘徊在绿草地和半圆形的石头之间，看着推土机的曲臂把泥土轻轻撒在她的坟墓上，发出沉闷而持续的撞击声。金属的撞击声使我的牙齿发疼。我想告诉他们，温柔点，她在里面。

不久之后，我们又读到了同样的信，一个新名字。又是个新名字。六个月内有四个人卧轨自杀。晚上，我们打开新闻，看到一辆摇摇晃晃的轮床拖着一个圆筒形的东西离开。其他学校因为下雪天停课，我们则因为有学生死亡，考试取消，孩子们悲伤地从墙上滑下来。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你只要悄悄告诉你的老师，然后你就会被送回家或者去辅导员的办公室。

在第一次死亡事件之后，每个人出现在学校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但到了第四次，我们被警告不要“美化”，不要“引发”。玫瑰花和信件被取下，粉笔留言被冲洗掉，蜡烛被吹灭，毛绒玩具被放进袋子里。人们的所感和所见之间突然产生了脱节；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我认识到庆祝一个生命可能会点燃一个死亡。

那些公开自己抑郁的朋友会立即得到药物治疗，拿到分发的药片，背包像沙槌<sup>(5)</sup>一样响个不停。有些人住进医院，处于自杀监视之下，离开学校几个星期，而我们其他人则很有礼貌，在他们“度假”回来时都不会提任何问题。你要么被当作一个站在死亡边缘的极端案例，要么被期待着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中间道路。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无休止的麻木。

铁轨周围的灌木丛被清除，巨大的树篱消失了。一名男子受雇来看守这个十字路口，他戴着一顶无檐便帽，穿着蓬松的黑色夹克和霓虹橙色的背心，坐在一张折叠式椅子上。下雨的时候，一顶干净的小帐篷搭在他的头上。他坐在那里，守着铁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在经济学中，我们学习过如何创造就业以适应需求。那这是份什么工作？雇一个人来阻止我们自杀，这是什么意思？

许多夜晚我们都陷入恐慌。如果你的朋友状态不好，你不确定第二天一早他们是否已经死了。搜寻队兴盛起来，争先恐后地跑到铁轨上抓人。一场黑暗而扭曲的比赛。一天晚上，我准备去铁轨旁放些雏菊。到达的时候，我看到巡逻警车停得横七竖八。我呆呆站着。一个学生刚试了一次，但没有成功。他独自坐在警车后排，低着头，眨着眼睛忍住眼泪，双手铐在背后，鼻尖上挂着鼻涕。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我看见了，当他回到学校时，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我应该做的，这是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新规则。

我在辅导员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申请单，要求召开讨论会，但这些事都积压了下来。我参加了一个心理健康项目。我们接受指导，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在肚脐上放一个橘子，通过观察橘子的升降幅度来监测呼吸。我呆呆地盯着肚脐上的橘子看，脑中一片空白。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又发生了三起学生自杀事件。毕业后，我搬回帕罗阿尔托，三个月内还会发生三起，其中两起是卧轨。2014年11月，当我得知最近一起自杀事件时，我把老板拉到一边，泪流不止，然后他让我先回家。

十起自杀，换了十个名字。这些不是吞药、跳桥、割脉自杀，因为那样至少还有一线生存机会。这些都是必死无疑。没有人被时速80英里的铁墙击中后还能幸存。令我震惊的是，铁轨上的血迹和残留物那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火车也恢复了整点时刻表，急着送通勤者按时上班。看着汽车如此随意地在他们死去的十字路口不断通行，看着轮胎在轨道上颠簸而过，这是多么令人不安的事。

因此，在2015年1月的那个早晨，我读到斯坦福大学性侵新闻的报道，就像读到一封信，遗憾地通知你，客观而平静，但它不是关于铁轨上的死亡，而是关于当地校园里一件令人感到悲伤又莫名其妙的强奸案，关于发现一具衣衫不整的身体。这一次，名字成了我。

我向外望去，阳光明媚，鸭子在池塘里戏水，每个人都在工作。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前，就像多年前我坐在教室里一样。我知道第二天早上我还会再来上班，就像轮胎在轨道上颠簸而过一样，就像你在得知了死亡的信息之后，会拿出课本继续上课一样。我身体里所

有被拉响的警报都被消音，恐惧令我不敢靠近。我的眼睛湿了，我会暗自哭泣，但我知道我会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超脱出来，继续前行。

那天晚上我到家后把车停在我家那幢粉色小房子外面。我仔细欣赏着屋前的小鹅卵石，它们闪烁微光，犹如翡翠的蜡质叶子。我想到屋里的两个人，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受害者就住在他们的屋檐下。我想象他们在考虑着晚上干点什么，爸爸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硬币，妈妈正把葱切成小圈。我想要保持他们的平静生活。

我的父母是保护者。成长过程中有任何意外，他们都会很好地保护我们免受其害。我和妹妹很早就知道，他们会在遛狗的时候进行严肃的讨论。他们晚上出门时挽着胳膊，口袋里塞满皱巴巴的袋子。蒂法妮和我会跟踪他们，躲在停着的汽车后面偷听。“爸爸担心你的阅读效率落后了！”我盯着房子看时，忽然意识到它太小了，我无法隐藏那么大的秘密，无法把它拖过走廊，塞进我的房间。一想到要宣布这个消息，我就感到胃疼。每次下雨，爸爸都会说：“植物一定很开心！”如果他知道他的女儿被强奸了，他会是什么感觉？怎么告诉他们呢？我会希望有人能看着我的眼睛，放低声音，温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也许我可以这么对他们。

如果他们感到失望，如果我失去了他们的信任，又该如何是好。你一直瞒着我们？你从医院溜回了家？如果你这么善于伪装，你还隐瞒了什么？

我最害怕的是，当我从他们眼里体验那次侵犯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悲伤会吓到我。如果我平静地说出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他们需要冷静地回应，不要张大嘴巴，不要哭泣。如果你的朋友剪了个糟糕透顶的发型，大家会心照不宣地说看起来不错。如果你说“上帝啊”，她会用手捂住脸哭丧着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能这样出门！”然后你会意识到你本应该让她的头发长回一点原样时再说出真实想法。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是啊，那个发型简直令人发指。”

我想如果我的传达方式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完全避免痛苦。我不会说衣冠不整，身体弯曲，浑身是血，赤身裸体。我坐在床角上，低

声练习着要说的话的片段。我要强调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得救了。新闻里说，是两名骑自行车的瑞典研究生路过时救了我。我大声说：“两个骑自行车的。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挺身而出。幸运的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追上了他，把他扑倒了！然后，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抓住了他，拦截了他，把他推倒在地！他们追着他，多亏了他们，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挺身而出。”

我准备好了，走过门厅，偷偷地看了眼爸爸的房间，他正坐在躺椅上，穿着他的勇士队运动衫看勇士队的篮球赛。“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有事要跟你说！”我说，“不急的！”妈妈坐在屋子另一头的客厅角落里，敲着电脑，嗑着瓜子，尖尖的瓜子壳丢在地板上。“你在忙吗？爸爸出来的时候，我有事想告诉你们！”

他们走向餐桌，而我站在餐桌的最前面，好像在主持一个小型的董事会会议。我说：“有个新闻，不是现在看新闻，你们之前看到新闻了吗，斯坦福性侵案的那个男的？”他们摇摇头。爸爸说：“有点印象。”他总说这句话。“还记得我们去的那个派对吗？蒂法妮和我，那个家伙想要，被抓了。我不确定，但我想只是他的手指，所以还不错。”我耸耸肩，“我不记得了，就这样。但是从新闻里读到还是挺可怕的，所以你们不需要读，请不要读，真的。”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站在那里笑着，像个疯子。他们盯着我，等着我把我想说的话讲完，不管我想讲的是什麼，然后我等着他们说：“好吧！很高兴你没事！”但是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好像一个动作就会引爆什么东西似的。

我爸爸说了些什么“亲爱的”，什么“我很抱歉，你还记得吗，你能告诉我们什么……”但我一直看着妈妈一动不动的脸，她的表情越来越阴沉，她的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平静。“那人是谁？”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天晚上？是你在厨房喝酒那天吗？我载你的那晚？他在哪里？”我无法再看着她，只能低头看着桌子，摇着头，半耸肩。气氛使我只能沉默。我无法忍受这个房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到了游泳池。我6岁，妹妹4岁，我们在后院游泳。妈妈正坐在阳伞下面看杂志，戴着太阳帽，穿着长及脚踝的橙色连衣裙。我肩

上披着一条毛巾，有了个鬼点子，想披着毛巾游泳。但我没有意识到妹妹看到我拿着毛巾下水，就抓起自己的毛巾，也跟着我入水了。她沉了下去，毛巾把她带到了水底。我听见妈妈尖叫，看着她跃入水中，空中抹过一片橘色。在水下，她变成一团长着黑色长发的火焰，把妹妹从水底捞了起来。她浮出水面，太阳镜歪在一边，裙子贴在皮肤上，妹妹抱着她的身体，太阳帽像睡莲叶子一样飘在身边。妹妹双眼紧闭，嘴巴像条小鱼一样张开，大喘着气，号啕大哭。妈妈将妹妹的湿头发轻轻从眼睛里捋出来，带她游到浅水区。

我站在餐桌前端，当我无法填满沉默的时候，我就打破沉默。我弯下身，张开嘴，痛苦地叫着，喘着粗气。我听见椅子刮擦木板的声音，是妈妈推开桌子，立刻跳了起来，就像妹妹溺水时她的反应一样。她紧紧地抱住我，一条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身体，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轻声说：“妈妈没有生气，妈妈只是吓到了。”她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呼吸，直到我感到脚下的土地给了我安慰。

那天晚上，我的身体终于软下来，可以呼气了。我想象着，当我睡觉时，他们会在听不到的地方讨论这件事，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我告诉妹妹“爸爸妈妈都知道了”，很高兴能让她解脱。我挺过了这一关，最艰难的告知父母这部分过去了。在北卡罗来纳的费灵顿村，我的祖父母曾住在一个池塘边，那里的鹅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伸着弯弯的长脖子嘎嘎叫着。我爷爷米勒解释说，在迁徙过程中，鸟类会排成V字形飞行。排在前面V字形顶端的鸟，面临风最大的阻力，飞行得最为艰难。从领头者扇动的翅膀下吹来的空气把后面飞着的鸟儿都托起来了。作为领头者是很辛苦的，所以鸟群会轮流来领头。当一只鸟筋疲力尽的时候，它就会落到后面去，这样它就不需要那么用力地拍打翅膀了，它可以凭借其他鸟儿已经击散的一阵阵风飞翔。它节省了能量，以便再次去领头。这是确保旅程成功的唯一办法，可以逃离冬天，到达温暖之地。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扇动翅膀，保持一张冷静的脸，以保护我的鸟群不受恶劣条件的伤害。但韧性需要休息。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一直在退步。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后面，慢一点，并不意味着你不是一个领导者。

第二天，柜台上放了一个柠檬派，旁边有一张纸条。清晨在我熟睡的时候，爸爸从后院摘了柠檬，在炉子上煮了糖和鸡蛋，用指尖按压面包皮边，在上面洒上糖粉。我把它带去办公室分享。我拿着一片黄黄的派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浏览器。

《斯坦福游泳运动员否认强奸指控》。我几乎要窒息了，感觉自己的胸口承受了重重的一击。这篇文章触发了我的警觉，这个版本更为清楚具体，我把吃的放在一边，点开警方报告，来来回回地看。“整个晚上，**特纳**勾搭了几个女孩。”在报告中，他吻过的所有人都会被称作“女孩”，但因为他侵犯了我，我没有被称作“女孩”，只是“受害者”。“他声称自己在地上吻了**受害者**。他脱下**受害者**的内衣，用手指触摸她的阴道。他还触摸了**受害者**的胸部。”我吃不下那个软塌塌的派了，我的前额发烫，大腿紧紧地夹在一起，紧握着我的叉子。被捕时，警方注意到布罗克的**胯部有一处隆起**。

“**特纳**不知道**受害者**的身份。他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她。他称如果再次见到**受害者**，他可能认不出她。”在他看来，我既没有脸也没有名字。但是那篇文章说我们“是在一次派对上认识的”，就好像我们之间互相吸引，还亲切地聊了天。

“他和**受害者**玩得很开心，并称她似乎也很享受这个过程。”**享受**。我盯着这个词，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东西。我想扑向他，一只胳膊像蛇一样伸到他的喉咙里，像抓绳子一样抓住他的食道，把它拽干净。

“**特纳**开始觉得不舒服，觉得时间不早了。他说他起身离开时突然被一帮人拦住了。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要逃跑时，他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逃跑。”说“时间不早了”，应该是当你把餐巾从膝盖上拿下来，放在铺满面包屑的盘子上，然后说你应该回家了，因为你早上还有工作。“时间不早了”并不是把你老练的手从女人身上抽出来，完全勃起地站起来，把自己擦干净，小跑着离开，把一具躯体留在身后。这应该已经足够了。这条线应该能够堵塞齿轮，使它们不再转动。

我给我的检察官打电话：“嘿！你看到新闻了吗？他说我喜欢！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敢相信，你能相信吗？这算什么？”我半笑半疑。但



她的语气和我不一样。“我知道，”她说，“我知道。”她叹气的口吻就像你要以“很不幸”或“很遗憾”来开始一个句子那样。她解释说，无罪辩护是预料中的程序。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说，“我没有享受。我不知道他是谁。他甚至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心里并没有准备要辩论。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一种可怕的清晰的推理：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你。这感觉就像你眼睁睁地看着狼被割断了绳套，而有人在你耳边悄悄说肉已经缝进你的口袋了。他被无罪释放的唯一机会就是证明，据他所知，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他会说我发出了呻吟，指责我行为淫荡，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当我被指派了一个DA时，我以为这两个字母代表的是辩护律师。“地方检察官。”阿拉蕾纠正说。布罗克有辩护律师，我想，但是需要辩护的人是我，需要自我辩护，保护我不受他的伤害。他聘请了湾区最有名望的律师之一。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意识到，在这场侵犯中幸存下来只是第一个挑战。如果我想和他对质，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那就得上法庭。现在，我们不得不假定他是无辜的。在司法体系里，侵犯尚未发生。他把我看作一具躯体，但却会试图把我当作一个人来摧毁。

直到那一刻之前，我一直憧憬着无限的未来。现在灯光熄灭了，两条狭窄的走廊亮了起来。你可以走上一条试图忘记并继续前行的路；或者，你走入一条把你带回去见他的路。没有正确的选择：两条路都漫长而困难，都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我的手还在墙上摸索着，寻找第三道门，那道门通往一条从未发生过这种事的走廊，在那里我可以继续过原计划的生活。

词典对“否认”一词的定义是“拒绝承认事实或事物的存在”。这种拒绝本身就是另一种伤害。我否认你的事实，它不是真的，它不存在。这会让你头脑清醒。我所知道的真相将会复杂得难以理解。它会淹没在法律术语中，淹没在人身攻击和操纵之中，直到它变得如此阴暗晦涩，连我自己都无法再看到它。

我回到家，重新打开那些文章，一个个正方形堆叠在屏幕上，像他那两排整齐的牙齿。我已经准备好看到举起的长柄叉，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不会相信这些报道。当我开始阅读时，屏幕滚动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才19岁！她勾搭一个大一新生吧？这难道不是她主动挑起的吗？你没听说过印度的轮奸吗？那里的女性才正遭受着真正的虐待，而你想把这称为性侵。无聊的郊区孩子藏不住他们裤子里那玩意儿。站不住脚的。他又不是拖着她去的。如果她有男朋友，为什么他不在那儿？年度母亲奖。什么样的母亲会把她的两个女儿丢进兄弟会派对？不是要责怪受害者，但如果你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那就有问题了……她甚至没上过斯坦福大学。她是不是尿尿的时候脱了内裤就晕过去了？两人同行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项指控能达到重罪这么严重的程度，除了双方自愿的下流行为外，可能根本就没有犯罪。他给她钱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女人会喝得这么醉？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灌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生气的点似乎在于我让自己变得易受攻击，而不在于他对我的脆弱采取了行动这一事实。饮酒并不是天然地不道德：整晚大量饮酒之后需要雅维止痛片和水。但醉酒和被强奸似乎需要受谴责。人们对我没能保护好自己感到不解。

“这才是真正的谜：他是顶级运动员，一个非常聪明又好看的男生！人们会觉得他能找到很多想和他上床的女孩！相反，他却干这种事来毁了自己的生活？很难相信。”

我想象中跟我一样的义愤并不存在。有些人写他的坏话：“漂亮男孩在监狱里是没机会逃脱的。”有些人写了善意的评论：“埃米莉，请不要让这些定义了你。找回你自己的身份，过上精彩的生活！！！如果布罗克·特纳是无辜的，我就是一只已经灭绝却仍在飞翔的居居鸟<sup>(6)</sup>。这是胡扯。”这些话暂时使我振作起来，但它们的温暖很快就消失了。我发现人们无动于衷，对整件事略感厌恶，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那天晚上，我明白了有几件事是真的：我知道他带领奥克伍德队连续两年夺得俄亥俄州冠军。我知道他是一名“经常入选的运动员”，一名“举足轻重的运动员”，在200码仰泳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我知道有很多关于“蛙泳”<sup>(2)</sup>的笑话。我知道他们说我“好吃到舔手指”。我知道我不配得到帮助，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创伤。他只是个孩子，而非罪犯。他有成就，并不危险。失去了一切的人是他。而我只是碰上了这种事的一个无名小卒。

整个上午在我胸中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的怒火，现在只剩喉咙里几块将灭的余烬。我合上电脑，躺下。我想知道我的身份如何在瞬间变成了一个丧失意识的被强奸的女人。这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榜样，充其量只是一个警世故事。我知道如果有人发现了这是我，我就会被当众羞辱，被永远打上烙印。我的这一部分必须被切割掉。我把所有这些混乱、这些新的障碍、不确定的未来、被玷污的身份，都交给了埃米莉。当我呼出水汽的时候，当我放任那说着“飞翔的居居鸟”“胡扯”的亲切声音离开，我的肋骨在颤抖。

第二天，我站在一家咖啡店里，看到一沓报纸，头版是一个亮蓝色的长方形。那是游泳池里的水。我看到布罗克苍白的的手臂、黑色的眼睛、戴着泳帽的头。我周围的桌子上散落着蓝色的长方形，布罗克在咖啡馆里游来游去。一个穿圆领马球衫的人坐下来，把报纸拿在手里摊开。我环顾四周，想知道写评论的是不是这些人，我是不是该憎恨他们，害怕他们，质问他们。

我告诉妹妹不要看评论。我告诉她，大多数人阅读这些文章的时间不到两分钟，而文章中许多事实明显是错误的。这只是一小部分样本；如果你真的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你会发现他们的回答更通情达理，更富有同情心。所以不要读它们，好吗？谁在乎呢？

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正在查看每条评论，所以她不用这么做了。我想，我当然可以读它们，这些是属于我的信息。我把评论区当成埃米莉的个人受害者收件箱。我每晚都刷新，消化每一条有害的信息。当他们说：“为什么她大冬天出门穿个裙子？”我就说：“这是加利福尼亚的冬天，你个笨蛋，我们在圣诞节还穿着短裤徒步旅行。”我想修复

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修好。解释解释解释。但这种防御性会延续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当父母问我一些与案件无关的简单问题，“你有没有空去邮寄”，“你有没有把衣服叠起来”，“你能不能把回收垃圾拿出去”，我就会紧张，会有一种孩子气的敌意。没空，我很忙。不要责备我，停止攻击我，你是在说这都是我的错。我害怕得到更多关于“我不好”的指认。

我知道我不应该看这些评论，但我想了解。有些人支持我，但另一些人却赋予自己一项重任，去建构一切可能的解释和借口，把错误算在我头上。是我疯了吗？是我夸张吗？甚至这算是悲哀吗？

这种犯罪的独特之处在于，行凶者可以暗示受害者体验到了快乐，而人们却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世界上不存在好的刺杀或坏的刺杀，两相情愿的谋杀或非两相情愿的谋杀。但在这种犯罪中，痛苦可以被伪装和混淆为快乐。我去过医院，那是人们的身体生病或受伤时去的地方。但我还是拉下袖子盖住瘀伤，因为我害怕自己不能像一个受伤的人那样得到同样的安慰。

在强奸案中，我很奇怪人们会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他？”如果你醒来发现家里有人抢劫，看到他拿走你的东西，人们不会问：“你为什么不反抗他？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不行？”他已经违反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为什么他会突然决定要遵循理性呢？如果你告诉他，你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会停下来？在这件案子里，我那时失去了意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

还有另一种说法让我心烦意乱：认为男孩子就是忍不住。好像他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在每个女儿要去上大学的时候都告诉她们：如果你走在一辆半挂货车前面，就会被撞到。所以不要走在半挂车前面。如果你参加兄弟会派对，你会喝醉，会被下药，会被强奸。所以不要去参加兄弟会派对。”你去兄弟会然后被侵犯？你在想什么？我在大学里就听说过，兄弟会上的大一女生就像屠宰场里的羊。我知道你不应该走进狮子窝，因为你可能会被咬伤。但狮子是野生动物。而男孩们是人，他们有思想，生活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摸别人并不是一

种自然反射，不是生物学上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他们能够控制的认知行为。

似乎一旦你顺从地走进兄弟会的大门，所有的法律和规定就停止了。他们不被要求遵守规则，而对女性来说则有无数必须遵守的准则：盖好你的饮料、紧跟着别人、不要穿短裙。他们的行为是不变的常量，而我们是被期待改变的变量。什么时候进行全面预防和管理成了我们的工作？如果有很多年轻女孩在一些房子里受伤，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房子里的男人有更高的标准，而非训斥这些女孩？为什么人们觉得晕倒比用手指侵犯晕倒的人的行为更应该受到谴责呢？

我也明白这个案子的环境对我不利。真正的犯罪会发生在学校吗？疯狂的事情总是在校园里发生。如果有人在居民区街道的小水池里大便，人们会说：“这太脏了，不可接受，绝对不行。”如果有人在兄弟会草坪上的小水池里大便，人们会说：“好吧，那是大学，哈哈！”你穿着袜子到处跑？大学。星期三下午穿着长颈鹿装喝得酩酊大醉？大学。人们宽容对待大学里的形势，不认为这些出格举止有什么严重性，任何形式的严肃以及任何真正的惩罚都被从中剥离。人们读了这个故事，听到“兄弟会”“运动员”“勾搭”“享受”。他们只需要这个词库就能使整个场景活色生香。我们懂了，他们说，他们勾搭上了，事情失控了，我没这么干过吗，你没有过吗。甚至连发生在地上这一事实似乎也毫不令人惊讶；在大学里，人们不是常钻到雕像下面、楼梯间里、钟楼里、图书馆里乱搞吗？媒体帮不上忙。他们数着我喝了几杯酒，数着布罗克游200码的秒数，把布罗克系领带的照片放在文章最上面，好像在展示他在领英上的简历。

我想撇掉这个故事里所有虚浮的东西，所有让人分心的东西，让你看到实质。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去参加聚会，亲吻了三个女人，发现有个女人落单，而且没法说话，他把她带到树林里，剥了她的衣服，把他的手伸进她的身体，他被两个男人抓住了，他们注意到她一动也不动。然后他否认自己逃跑，关于受害者除了说她“享受”之外，他什么也说不出。所以，在10点15分拿着威士忌走出来，小便，妹妹的名字，奥林匹克自由泳，这他妈的就是你们嘴里的整个故事。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音乐声开得很大，玻璃在震动，门把手在颤抖，我把自己淹没在音响中，开始尖叫。“我恨你，我恨你，离我远点。”我猛敲方向盘，想发泄出来的东西让我喘不过气来。我驶离高速公路，去往宜家，减速驶入一个光线充足的拥挤停车场，把车开到正中央，把自己锁在一排停着的汽车里。我关掉音乐。我无法呼吸，双手剧烈地颤抖，眼泪不仅仅是湿的，更让我感觉整个内脏在往外漏，厚重，疼痛。救救我救救我。我感觉大脑缺氧，如果我不能呼吸，我就要死了。视线模糊了，我翻看包里的文件，拿出一直收藏在里头的小册子，搜寻热线电话号码，那么多号码，打给了描述中写着斯坦福的那个。我不想让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到接电话的那个女人。“我很安全，我只是需要有人和我在一起，我需要有人。”我几乎无法把这些声音拼凑成完整的句子，“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我就是那个人。”我仰着头，肩膀颤抖着，手贴在额头上，脸湿了，下巴湿了，脖子湿了。我能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撕扯我的喉咙两侧，我知道接电话的人永远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她，但至少有人在听我说话。

她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很关心我。接着我又听到了那句话：“这不是你的错。”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就像念咒语一样。我发现愤怒正慢慢侵入我的意识。是他的错。是她的错。受害者必须多快就投入战斗，把感情转化成逻辑，在法律系统里找到正确的行进方向，抵挡陌生人的入侵，还有无情的审判？我该如何保护我的生活？如何防范那些调查员、记者？我配备了一名检察官，准备投入战斗，但没有人能告诉我如何承受所有的敌意，承受这种毁灭性的悲伤。我孤身一人，我的故事现在被封存在我的体内，而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士正通过电话向我灌输着陈词滥调。

---

(1) 从1949年到1970年代中期，由房地产开发商约瑟夫·L.艾克勒（Joseph L.Eichler）的公司建造，主要分布在加州，主要特点是：现代设计、完整的木质镶板、人字形天花板和落地玻璃墙，对加州现代设计影响深远。

(2) Napa，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之乡，位于加州旧金山以北。

(3) 一种儿童游戏，以牙签插入棉花糖拼接建筑造型，由于牙签容易脱落，比较脆弱。



- (4) YWCA，全称是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服务团体。
- (5) Maracas，一种摇奏体鸣乐器，亦称沙球、响葫芦，主要用于拉丁美洲音乐，起源于南美印第安人的节奏性打击乐器。
- (6) Jujubird，美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笔下的一种怪兽鸟。
- (7) “蛙泳”在英文中对应“breaststroke”一词，字面上有“摸胸”的意思。

埃米莉和我过着各自的生活。我的日子异乎寻常地平凡，充满了动感和质感：新鲜的脆皮鲑鱼晚餐，和卢卡斯煲电话粥，和爸爸骑自行车穿越湾区，轧过松脆的盐和盐角草。我剪出心形的情人节卡片，上面有手写的对联，送给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我把发票归档，贴好信封，闻闻咖啡调味奶，确保它还没过期。我画电线杆，画滑稽可笑的鸟，和朋友盘腿而坐一起喝咖啡。外表的生活天衣无缝地继续着，而埃米莉生活在一个狭小而封闭的世界里。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只是偶尔去法院、警察局，或者在楼梯间里打电话。我不喜欢她的脆弱，她说话那么安静，似乎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她渴望滋养，渴望得到认可和关心，但我拒绝承认她的需求。我不想多了解法院制度，拒绝接受心理治疗。“你不需要。”我告诉她。

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擅长自我分离。你永远也察觉不到我的痛苦。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裂缝。很多个晚上我都是流着泪入睡，第二天上班时眼皮又红肿又紧绷。我开始在冰箱里放一个勺子，一边刷牙，一边把这冰冷的金属壳按在两只眼睛上。我把冰块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开车去上班的路上，我听着旧金山公共广播电台，一只手把冰块压在脸上，另一只手把住方向盘。晚上，我带回那袋放在杯托上的温水，把它倒在草地上。

有一天，我告诉老板下午要离开一会儿去看医生。“一切都好吧？”我挥了挥手，说只是去做体检。到时间了，我开车去法院。在过去的路上，我变身为埃米莉，让一天的温暖逐渐消失。

当我把车开进停车场时，那座矮矮的建筑物显得难以逾越、冷漠无情。法院大楼就像一个废弃的医疗诊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没动过。卫星信号接收器和金属棒立在屋顶上。两棵白桦树像骨头一样从泥土中钻出来，黑色的树枝像稀疏的头发。我穿过玻璃门，走到安检处，在一张破旧的垫子上擦擦脚。我注意到地上纠缠在一起的绳子、一个来苏水喷壶、两个橙子、一个金属保温瓶，还有一排方格状的屏幕。六名身穿米色制服的警员，靠在桌子后面脏兮兮的摇椅上。



我把手提包放进一个特百惠筐子里，然后通过破破烂烂的安全检测门。我看着一只手在我的包里翻来翻去。我盯着白色的走廊，荧光灯的强烈反光被困在走廊上方带纹路的塑料顶里。他把筐子推给我，我茫然地站在安全门的另一边。“你知道怎么走吗？”他问道。我摇了摇头。他指给我看墙上的指南。四楼。

电梯门打开，通往一个更加空旷的空间。走廊尽头有两扇木门。右边的门通向一间小的等候室，我后来把它叫作“受害者休息室”。我会在里头待上很多个小时。左边的门通向一个房间，里面有灰色的小隔间和笨重的打印机，阿拉蕾的办公室就在后面。这两扇门的右边，有一条狭长的走道通向法庭。

我去见阿拉蕾和我的律师布里，跟布里还是第一次见。我的父母正在路上。我问过父母我是否应该带上花向她们道谢。他俩说要等这一切都结束再给她们送花。但我以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只需要一名检察官就和解条款进行谈判并结案。我们不知道从现在算起差不多四年后才能了结。

布里二十五六岁。她长着一头红褐色的长发，脸上有雀斑，显得亲切而热情。阿拉蕾有着深色的头发，榛子色的皮肤，笑容灿烂。她穿着一件合身的运动夹克，绿得像菠菜叶子的尖头高跟鞋。她看上去三十出头，有一种善良的活力和天生的刚毅。每次再见到她，我都会发现蒲公英黄色的耳环、紫红色的指甲，在她烟灰色的装束中总是点缀着一些跳动的色彩。我后来才知道，她出生在一个伊朗移民家庭，父母开了一家爱尔兰酒吧，她上法学院时就在那儿兼职。

我坐在中间，妈妈在左边，爸爸在右边。阿拉蕾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她背后的窗户框住树顶，书架上堆满马尼拉文件夹。我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叶在风中瑟瑟发抖，但屋里却一片寂静。在楼下，我看到莫莉·斯通连锁超市，想起里面的陈设：呆笨的玉米壳和眨眼的奶牛在唱歌，蒂法妮和我在鼓掌。从四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我的家乡，而我却与之隔绝，真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妈妈把我的手放进她自己那柔软的、信封般的手里，为我按摩穴位。我握着她的手，不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孩子，但妈妈和人主要的交流方式一直是触摸和食物。在美国

文化中，有些女孩每天都和妈妈通电话，分享汤的配方、男孩的问题、洗衣服的方法。我总是对这种谈话很感兴趣。在我一生中，我总听到妈妈往一个银色的小电子词典里输入英语短语，无论她学的是什么词，这个电子词典都会大声地读出来：“意大利面。反讽。有害的。马萨诸塞州。”这是我们家的第五个声音。她把“洗漱用品”读作“洗漱用平”。当她读出“耶稣玛丽和约瑟夫”时，我以为她说的是“耶稣玛丽昂约瑟夫”，以为那是耶稣的全名。我知道她的英语口语可能听上去有些蹩脚，但这掩盖了她的天才。我们总是在门口的台阶上收到一些盒子，我看着她从包装物件中随意地打开中文写作的奖品，就像打开从杂货店买来的梨子一样。我可以和她谈论死亡、爱情、外国电影、跨文化的普世主题。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她担心我，她会给我做一碗比我脑袋还大的面条，或者把她的手指按在我的太阳穴上，我的压力就会从她的指尖溜走。

阿拉蕾想了解一下我的背景。我住在帕罗阿尔托吗？我有工作吗？我的饮酒经历如何？我说我上的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我听出自己变得有戒心了，因为我知道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以派对闻名。我说我在大学里喝酒，主要是和喜欢文学的孩子们聚会，他们在梯子顶上读诗，还有以保龄球为主题的客厅聚会。我和一个叫卢卡斯的人约会，是的，我以前喝醉过。我发现自己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想要解释什么。我想让她知道我是正常的：我饮酒，当然，但我不喜欢在失去意识的时候被人侵入。她说她也上过大学，她理解。

爸爸开始提问题，我能听出他的沮丧情绪。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紧张、恼怒的表情，就像航班延误时我看到的那样。“我是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明白，这不是有点可笑吗，如果你不能确定地告诉我这事会发展成什么样。”阿拉蕾肯定了他的怀疑：“毫无疑问，这些事情是很不幸的，我知道很难，幸好我们有经验，最好是持观望态度。”但她也暗示这只是开始，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我后来得知，她已经遇到过布罗克的辩护律师，他向她保证，他的客户只会因为扰乱治安而被判轻罪。战争已经开始了，而我并不知道。

我开始明白，我对这个过程知之甚少，我是多么盲目地表示同意。我原以为我会花一个小时躲在父母身后，他们会在这片严酷的领地上保护着我。而现在，我觉得自己从父母手中移到了阿拉蕾的手中。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就会被单独置于显微镜之下，在证人席上，不会有妈妈握着我的手。

我的角色现在是成为地方检察官需要的资产。调查人员可能在监视我。我需要维护形象，而非鲁莽行事。“表现出你最好的一面。”我反复斟酌这句话。如果我继续喝酒，辩方会说我当时丝毫未受到酒精影响吗？如果我上传自己在派对上微笑的照片，辩方会说我从未遭受过痛苦吗？而且最糟糕的是，如果我再次被侵犯，他们会不会说，被侵犯两次，很明显是她有问题，而不是布罗克？

会面结束后，我坐在车里，无法回去工作。我想要确认它会消失，但我没有得到这一确认。“坐好，”她说，“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现在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我告诉老板我去看医生了，但最后感觉像赴了一场求职面试。他们在决定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受害者：她的品格正直吗，她看起来能坚持住吗，陪审团会觉得她可爱吗，她能和我们一起前进吗。我离开的时候觉得，你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并不想要这份工作。我想要以前的生活。但让他扬长而去？我不能让这发生。他们会说，起诉是我的选择，但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阿拉蕾向我要卢卡斯手机的语音信箱，但我问她可不可以再等等。他一周后会来看我，我想亲自告诉他。他们在一心一意地搜集证据，而我却试图保全自己的生活。

我开车去机场接他，当我在人群中看到他的脑袋，我的胸中迸发出一束火花。我们开车去买晚上吃的零食。当我们把车停好，下车的时候，我只是拥着他，把脸扭过去，不让他看见。他以为这是一个欢迎回家的拥抱，开始认真想我们应该买些什么零食，而泪水从我的眼角滑落，整整齐齐地流到了嘴角；我对这种流泪方式已经十分熟稔。我的两只眼睛后面各有一个满溢的茶杯，我已经习惯了会时不时地溢出一点。我擦了擦脸，然后投票给了毛毛虫软糖。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被另一个人的双臂围绕。当我们想到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个男人将自己插入一个女人，但是我们忽略了很多其他方式。耳朵像图画用纸一样薄，让我可以把脸的一侧靠在他的胸口上。手指可以交错而不纠缠。一只手可以给一个下巴当一把小椅子。我们天生可以弯曲和折叠身体，以此来安慰自己和彼此。我们有太多的小部件需要照料。在被侵犯之后，我感受到自己有被触摸的需求，但并不想要“侵入”“注入”“插入”，只想要一种被什么东西安全包裹起来的亲密感。

那天晚上，我们侧躺着，他的膝盖妥帖地弯在我的膝盖里，我觉得我很可能会失去他。我们只约会了几个月，我记得爸爸说过，每段感情都会有一个幻灭的时刻：第一个障碍出现之时，你决定是去克服它还是分手。现在我被这种丑陋的、公开的乱局所缠绕。如果他要选择退出这个噩梦，我会把门敞开，让他可以离去。

我仍然在探索如何去爱和被爱。如果你问我在高中和男生相处的经历，我会告诉你，有一次我邀请一个男生参加舞会，我在学校里摆开一卷卫生纸，引导他顺着纸道找到我，而我拿着一张指示卡，上面写着：“如果你要走，那就跟我走！”

在认识卢卡斯之前，我经历过一段漫长而认真的恋情：高中第四年，有一个男生，有一半日本血统，善良的眼睛，聪明的头脑，宽阔的肩膀。我只知道在田径运动会上，看着他在跳高时弓起背就让我头晕目眩。在毕业前，所有的学生都逃课，爬下陡峭的悬崖，通过一个沙崖凹壁，进到一个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的快闪村<sup>(1)</sup>，每个人都在喝酒，生篝火，直到午夜才睡觉。17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喝过酒、抽过烟，也没有吻过任何人。这家伙和我都是清醒的，坐在一根圆木上，望着面前黑暗的河水，世界在我们身后沉睡。我们一直聊到太阳升起。当睡意未消的朋友们从帐篷里出来，他们低声说：“发生了什么事？你俩干吗？”我耸耸肩说：“没什么。”他们感到失望：“没什么？”但感觉一切尽在不言中。在我18岁生日那天，我们在我家的车道上分享了各自的和我们共同的初吻。我制作了一张事无巨细的人生地

图，追溯我们在同一段时间、同一所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试图理解宇宙是如何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把他交给了我。

他和我在相反的两个海岸上学，我的学校在海滩上，他的学校在雪地里。我给我的教授写了便条，说我的“表亲”要“结婚”了，然后乘飞机去看他。我称这是“有作业的蜜月”。他养了一条宠物鱼，当它的下颚难以张开时，他就用他的拇指指甲把饲料丸切成一口大小的碎片。他就是这么细心，这么有爱。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我被他保护着，在安全而自信的环境中成长，睡在他的房间里，听见管道因供暖而叮当作响。大学快结束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积木塔，我们把积木一根接一根地抽出来，这个建筑变得越来越脆弱。在我毕业之前，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到处是红色的血泊，而就在同一个周末，他正乘着一条小船，在波光粼粼的蓝色湖泊上泛舟。我意识到，难以想象的暴力和平凡生活之间的界限薄如蝉翼。我们被扔进不同的宇宙：我的身边突然暗了下来，他那边充满光亮。我们吵架，更确切地说，我对着电话尖叫，而他越来越沉默。我们毕业后回到帕罗阿尔托的家中，发现塔倒塌了，积木块撒得到处都是。

我听过歌曲里的心碎，当然，但是天啊，该死。这种感觉该如何形容。真让人心烦。没了这个人还怎么活下去？在他的庇护下，我充满勇气，我被爱着。我变回单身，22岁，天真，饥肠辘辘。剩下的空间宛如洞穴，我发誓要把它填满。

我记得人们总是告诉我“海里还有其他的鱼”，我说：“是啊，它们他妈的是生活在那里。”但他是一种稀有的狮子鱼<sup>(2)</sup>，而我失去了他。当你失去某个人，或者他们选择失去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尝试以凤尾鱼、胖乎乎的鲈鱼、浮夸的天使鱼取代他。性一直是一种温柔、神圣、一夫一妻制的事情。但那个夏天，我知道它也可以是一件滑溜溜的事，一件软绵绵的事，一件皱巴巴的事，一件没感觉的事，一件瞬息即逝的事，一件无聊透顶的事，一件“我只想要你的东西”的事。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我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力量。或者至少我认为那是种力量，因为我让自己被鱼吃掉了，整个吞了下去。

那个夏天，我从不谈论枪击案，从不谈论失去他的事。我在一家中餐馆找到一份工作，接受把米饭装进外卖盒的培训，每小时赚10美元。我选择的饮料是亮蓝色的AMF<sup>(3)</sup>，是“永别了混蛋”的缩写。我说了“永别”，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的朋友就告诉我，我失控地哭了起来，把她吓着了，她说我一直坐在浴缸边上，前后摇晃，自言自语：“你没事，香奈儿，你没事，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我从来不记得这回事。饮酒被伪装成开派对，而我现在知道这是一种可悲的屈服。我无法接受被赋予的新的现实，无法再忍受内心的感受，我认为自己价值甚微。我喝酒，关掉灯，一口袋的死亡，一个脚趾浸入又退出，承诺自己会再次醒来。

但是我慢慢累了。我受够了把自己扔进这汹涌的大海所带来的自我厌恶。当我终于找到一份新工作，我被带入稳定的生活之中。我喜欢自己的新办公室，有自然光，有飞机从窗口飞过。我分到一台薄如纸张的笔记本电脑，如此精致，意味着我是有价值的。我开始待在家里。我和自己约会，开车去旧金山市郊的伯纳尔山，躺在草坡上读几个小时的书，在动物园里画大猩猩，一个人去看电影。当这个沉湎于酒精的阴沉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开始相信，独自做一个成年人也不错，也许。

一个星期五的深夜，我被朋友的电话吵醒。她在酒吧，有个男的一直烦她，问我能不能过去陪她。我到了，把那家伙轰走了。突然，参加婚礼派对的人蜂拥而至，穿着灰色西装和条纹袜子的伴郎们跟在跳舞的新娘后面。其中一个朝我走过来。他叫卢卡斯。

他在帕罗阿尔托附近长大，现在住在费城，即将开始在沃顿商学院的第一年学习。他又高又瘦，笑起来很轻松，比我大几岁。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西班牙语、橄榄球、数学、自信。他在日本上过中学，知道秘鲁羊驼毛的质地，在这个小小的蓝色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探索过。帕罗阿尔托只是个小点！我知道了他在高中时赢过一次肚皮翻筋斗比赛，在五年级时做过刺突头<sup>(4)</sup>。回费城的前一天晚上，他约我共进晚餐。我们开始约会几个月后，我刚从午睡中醒来，他突然对我说：“我爱你。”出乎意料，自然得就像他要告诉我“外面在下雨”一样。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我们在唐人街买了奶茶和蛋挞，



他从路边小贩那里给我买了一枚绿松石戒指。在这平凡的一天，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我笑了，但告诉他他疯了。他说“爱”的方式就像它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而我知道它可能是可怕的痛苦。但卢卡斯似乎并不介意，他头脑冷静、有耐心，我意识到他不只是另一条鱼。

2014年12月，他要我去费城看他。我到的时候，他买了一大块白色的广告板给我画画用，还有一个装满了冰激凌的冰箱。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们的关系，只知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的手机背景是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而现在是我的一张照片，我穿着他那笨重的棕色滑雪服微笑着，像一个被雪迷住了的快乐的土豆。

2015年1月，妹妹要回家了。我们会去参加一个派对，在那儿我被发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快进几周，他在帕罗阿尔托，坐在我的书桌前工作，阳光透过百叶窗，而我躺在床上。也许是宇宙把他的存在借给我，让我再次感受爱的可能，现在又要把他收回去，让我去应付这一次新的爆发。22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成年是否只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失去。成长有什么好处？在你的余生中，你是如何感受这些沉重的事情的？看着外面美好的天气，听着他在打字，我不想告诉他。我想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让阳光倾泻进来，和坐在我书桌前的这个男人一起享受这个下午。我想要这一刻，抓住它，吃掉它，永远生活在其中。然而我就要毁了它。

“你还在用那个语音信箱吗？”他停止打字，看着我。“怎么了？”他问道。“我只是想听听。”我说。他继续看着我。他的电话噗的一声落在我的毯子上。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捂着脸第一次听。录音的文字记录如下：

**香奈儿在2015年1月18日凌晨3: 39: 34给她男友的语音邮件：**嗨。嗯，（听不清）他妈的（听不清）你好，（听不清）你的手机。但是所有的男男性存在（听不清）或随便什么，我最最喜欢你（听不清）。所以我（听不清）嗯。呃（笑）。你个，你个笨蛋，你知道的。虽然你工作很努力，夏天我也会奖励你的。如果你一天工作24小时，每天工作30小时，呃，一天工作多少小时，但是不管你不工作多

少小时，或者工作多少小时，你知道吗。但我在做有趣的事情。我，我喜欢你，我非常喜欢，我想，我想告诉你（笑）。好的，再哎哎见。我，我真喜欢你，胜过你对我的思念。好的，呃，再见（听不清）。

这些话很难分辨，我的声音像热锅里的奶油，从一个地方淌到另一个地方。任何和我说话的人都会立刻明白我丧失了行动能力。另外，信息包含了我真实的真相：即使在我头脑一片混乱的时候，我想要的也是卢卡斯，打电话送去一个草率的情人的问候。我感谢那个失去意识的香奈儿。然后我感觉到了别人的目光：用“他妈的”这个词开始的一条信息会成为我性格上的一个标记。辩方可以用这点来证明我粗俗不堪。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好的受害者，我必须清理我的语言。我需要遵守这么多新标准。

我抬头看到卢卡斯在观察我。“发生什么事了？”他问道。我耸了耸肩。“没什么。”我说。他那样紧张地看着我，把我吓坏了。我看着他在脑子里计算着，合上笔记本电脑，爬上了床。我们坐在一片静默之中。“你被强奸了吗？”他大声说出来的方式，这种直率，使我震惊，这些话语太强烈了。我摇了摇头：“我不记得了。”

他靠在枕头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某个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没什么。”我说。“这不是什么没什么。”他说。“两个人阻止了，”我说，“他们认为只是用了手指。我不记得了，但是那家伙逃跑了。他们抓住了他。”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讲述我的故事。我笑了笑。看起来一定很恐怖，我多想表现得泰然自若。

“我就知道，”他说，“我就知道，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应该跟你保持通话。你一个人的时候，我应该跟你保持通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摇摇头说不，这不是事情发生的原因。看着他逐渐了解这些信息，我真想就此消失。他沉默了很久。“我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当时我让自己相信了。我把头靠在他的胸前，他继续直视前方。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静静的午后互相拥抱，太阳在外面，在没有我们的地方燃烧，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他本可以离开，但他觉得这样太过分了。但他就匍匐到疼痛的旁边，稳稳站在那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这里。”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回费城的飞机上读了警方的报告，感到恶心，于是解开安全带，侧身穿过过道，吐到了小池子里。我想到他在那个卫生间里，那扇可折叠的手风琴门，外面排着长队，等着他把我身体的形象从他身体里吐出来。爱一个人是痛苦的。

最近在我写完我们相遇的混乱时间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之后，我向他询问了所有相关的问题。我说：“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愿意和我约会呢？”他说：“因为，你啊。”我追问道：“是的，但是性侵，我喝了酒，所有这些，你不在意吗？”他说：“那你呢？”

---

2月下旬，我在上班前被叫到警察局。金警探说目的是为了“深入调查这段关系”。我把车开进停车场，雾还挂在桉树上。我被领进同一间奶油蘑菇色墙壁的小房间，黑色录音机放在桌子上。我已经学会了对这种小事保持警惕。他们问我卢卡斯的全名，我们在一起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关系变得比聊天、视频、发电子邮件、发短信更深入了，我们是否有亲密关系，是否专一，他来自哪里，我们如何见面，我们交流的频率，在性侵发生之前我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之后我是否见过他。然后他们问我对他的感觉。

我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布罗克·特纳在我昏迷时用手指侵犯了我”。但我努力思考，试图明确我们确切的时间表：见面频率，相互说“我爱你”，跟我父母见面。我们去过联合广场溜冰，这能证明我们是一对吗？我不知道。我意识到有些答案可能是错误或不充分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该由谁来判断？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如何将爱作为呈堂证供。我从来没有记录过我们之间关系的确切节奏和发展。我只是随着它的展开而把它纳入生活。生活，像人们一样生活。

我问这个信息在庭审中会如何出现，我会被问到吗？如果卢卡斯必须做证，我们的答案会被用来互相参照吗？我问是否会有审判。他

说，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现在就谈这些还为时过早”。但他估计，有了我们所有的新证据，布罗克会着手从聚光灯下退出，开始在私下里重建自己的生活。“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这么做。”这让我感到安慰。

他陪我走回车里，说很高兴看到我在好起来。我回想起他初见我并向我点头的那个早晨。雾气散去，天色发亮，我上班迟到了。我喜欢金警探，在他身边我有安全感，他似乎总是为采集我生活的碎片而真诚地感到抱歉。我也喜欢谈论卢卡斯，他想让我谈多久都行。

但当我坐进车里、手里拿着钥匙的时候，我意识到卢卡斯原本是我生活中除了这片混乱之外的美好的一部分，而现在他被牵扯进来，充当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所有的小故事、我的私人和亲密的时刻都被打印出来，寄给了布罗克的辩护律师，供记者通读，在这个过程中甜蜜会被稀释和重新定义。我已经想要收回我说过的每句话，把每句话带回家。什么属于我，什么属于他们，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很庆幸拥有卢卡斯。但让我烦恼的是，有男朋友和被侵犯这两件事会被关联起来，好像单单我这个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在医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别人约会这件事有多重要：我只想着自己和我的身体。我只要说“我不希望一个陌生人碰我的身体”就够了。而说“我有男朋友，所以我不喜欢布罗克碰我的身体”则怪怪的。如果你被侵犯了，而你又不属于某个男性，怎么办？交男朋友是让别人尊重你的自主权的唯一途径吗？后来我还读到有人说，我是因为对男友不忠感到羞耻才去哭诉被强奸。反正受害者永远都是理亏。

如果我是在去年夏天上段关系破裂时被侵犯的呢？警察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哦，我的约会生活？是的，嗯，我星期二和一个人去埃塞俄比亚餐馆吃饭，但星期天和另一个人睡觉，他从来没有带我出去约会过，但那天晚上他穿了很酷的袜子。是的，我确实和一个身上有断头鸽子文身的人一起回家，他到凌晨两点还在给我发短信。是的，我点了四杯莫斯科骡子<sup>(5)</sup>，是的，都是给我自己的。我会有任何可信度吗？我的私生活会不会暴露出来，让人觉得我太放荡，我的生活方式

不体面？我永远也无法解释这些只是我的选择，是在悲伤和自尊受伤的时期做出的选择。我们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自我疗愈，渡过难关。否认我的混乱就是否认我的人性。我不相信有无瑕的过去或完美受害者这种事。然而，现在我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纯洁标准所高举着，担心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成为布罗克强奸我的理由。他的律师会简化和概括我的经历，并给我贴上错误的标签。

在其他醉酒的事情上，我要为我的愚蠢行为负责。但当我醒来时发现麦当劳空袋子和面包屑落在胸口上，与我醒来时发现身上有干掉的血迹和没穿衣服，是不一样的。在丧失意识的晦涩不明中，存在着的一处关键的不同。强奸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当我被粗暴地扯进他的故事时，我的故事戛然而止。当我终于摆脱了他的控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他的手从我身上滑落时，我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但正是在那段短暂的间歇，在他掌握权力的那段时间里，我失去了一切。

我去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中午才到办公室，也不做任何解释。其他受害者是如何在不同世界之间来来回回、自我运转的？你不能早上赞美你同事在毛伊岛拍的照片，中午溜出去跟强奸你的人作战。它要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忧虑、规则、老板、情绪。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就不能去了再回来，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辞去工作，放弃现在的生活。我祈祷他会先放弃。

每次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时，我的脑子就会发热。我很警惕调查人员，他们跟踪我，监听我。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一个朋友。每一封关于这个案子的邮件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它们不是分散注意力，而是清除思想，我忘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情绪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不断下沉。

医院账单到了，我还差1000美元。爸爸把我叫进客厅，问我是否知道如何报销。我告诉他有关赔偿的事情以及布罗克将如何被法庭勒令付清，但这要等到最后。会偿还的，我保证。但我想知道这得耗费多少成本。我明白了被侵犯是很昂贵的。

另一封信出现在家里，盖着圣克拉拉地区法院的章。信里问我是否要布罗克做HIV检测，并提供了一张表格让我填写。我不知道，我

应该知道吗？他会生我的气吗？他知道是我要求的吗？难道你不能不问我就要去做这件事吗？我从来没有回复过。当一个朋友走过来的时候，我飞快地把信从桌子上拿了下来。我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就是不去处理它，把收到的信扔掉，拒绝研究这个过程到底如何进展。

我的强奸检测包还没有在犯罪实验室里化验过。他们告诉我，由于媒体的压力，将会加快这一程序，但几个月后，我仍然在等待。我认为这是因为检测本身很耗时，一些DNA科学的东西，谁知道呢。但后来我被告知，这是因为积压。在我之前还有好几百个这样的检测包在排队，有些证据因为保存得太久，长出了霉菌，有些被扔掉了，幸运的则被冷藏。我立刻感到不舒服。怎么能这样呢：这些不是烂掉的水果，而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小碎片，一个不可或缺的故事。这也意味着在我的周围有一群受害者，伪装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去上班，给咖啡续杯，晚上则睁大眼睛，继续等待。

大多数晚上，我下班后都避免回家，对“今天过得如何”之类的简单问题心怀警惕。相反，我会把车停在市中心，沿着大学大道上的林荫小道独自行走，从别人那里得到安慰。一天晚上，我路过一个金属报箱，在右上角看到了布罗克的名字。我抽出一张报纸，小跑回车里。我打开微弱的灯光，翻开纸张，发现了一篇斯坦福学生写的评论文章。她问，为什么在特纳的案件中，会有那么多对受害者饮酒行为的关注和谴责。我能听到泪水从我的脸颊滑落到纸上发出轻柔的扑扑声。她不停地询问着，不停地推搡着，一只手伸出来，尝试替我减轻一直扛着的沉重负担。我把报纸折了四折，塞进手提包里保存着。

每次我在外面待到很晚，就会收到妈妈的短信：“妈妈等你回来再睡。”这是最近才有的事。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从来没有禁止我晚上出门。现在我的父母问我在哪里、我怎么样、我和谁在一起、我什么时候回家。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边界缩水了。

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没有发现精液。我心里一个小小的结解开了：我没被他的阴茎碰过。“谢谢你！”我说，我的同事就在旁边，“也祝你今天过得愉快。”由于没有阴茎插入，五项重罪将减少到三项；强奸指控被撤销，性侵指控依然保留。当我意识到这

将会出现在新闻里时，我的愉快之情渐渐平息下来。人们会说：“看！他们错了。很快他们也会把剩下的指控都否决掉。为什么受害者不用为诬告罪付出代价？地方检察官在追捕他，他的名声已经被毁了。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当作替罪羊，真让我恶心。她什么时候道歉？”

预审听证会定于2015年6月8日举行。预审就像没有陪审团的小型审判，是为了衡量证据是否充分，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要进行一场全面的审判。蒂法妮会错过期末考试周，需要提前考试。她本打算告诉她的教授这是“家庭事务”，但六次听证会中，她有三次在教授拥抱她、盯着她或轻拍她的时候崩溃了。“这很尴尬，”她告诉我，“我累了。”我需要告诉老板以便请假。我深深地钦佩她，但我还是很紧张。由于意识到了所有人对我的评论：草率、不负责任、鲁莽，我担心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我。

在一间有玻璃墙的房间里，我坐在她对面，不知从何说起。“你读过斯坦福大学的游泳员性侵事件了吗.....那是我。”她的嘴微微张开。我每说八到十二个字就会感到喉咙痛。我低头看着桌子，眼睛火辣辣的。她语调温和地问了几个问题，但我不停地摇头，屏住呼吸，直到她的声音消失。我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日程安排。但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一颗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我感到一种小小的震动，内心的某种东西在觉醒和软化。我没有遇到麻烦。我不是愚不可及。这是悲哀的，她是悲哀的。我惊呆了。

5月5日，阿拉蕾通知我们，由于辩护律师不能出席，我们不得不重新安排听证会。新的日期选择范围一直延续到9月。我不知道可以这样。我的公司很小，我该怎么解释我奇怪的缺席呢？每个人都以为我6月休假，但现在我得告诉他们我将在7月、8月或9月休假。蒂法妮也得在秋季学期告知新一批教授。“下次听证会时间我会和你联系的。”阿拉蕾说，“如果有什么事，请随时打电话给我。”后来我们发现听证会甚至会推迟更久。这是愚蠢的体系的一部分：固定结构并不存在，计划从来跟不上变化。

这种双重生活我还要过多久，假装一切都很顺利？我工作进度落后了，桌上堆了一堆东西。我追不上进度，也不能一直盯着那堆东

西。有时我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什么也不做。每天早晨，我都要更加努力地活动四肢。想象有一具骨架，把它的器官扔进它的骨质外壳，密封好它的皮肤，昂首阔步走进这个世界，说着“你好！很好，谢谢。你好吗？我今天之内交给你。是的！那太有趣了，哈哈，再见”，坚持撑到回家，然后重新散落，滚到角落里。

家不再是家了。家是地狱，远离法院，远离庞大的斯坦福大学校区。我对那些明明知道客观上是安全的地方生出一种荒唐可笑的恐惧。我无法停止阅读网上的评论。现在我已经对那些热心肠的人充耳不闻，因为尖刻刺耳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要再读了。然后可能再读一两条。它们像蚂蚁一样排队进来，有一只出现了，突然我注意到有条线，然后它们就停在我所有的碗里、盒子里和遗漏的勺子里了。它们是没有脸的小点，成群结队，微妙地、持续不断地提醒我，我永远无法消除它们。我和所有这些蚂蚁。

卢卡斯准备搬到洛杉矶去参加他的MBA项目的暑期实习。他提出让我跟他一起住。我想到沿着威尼斯海滩<sup>(6)</sup>在沙子上慢跑，还有深夜的拉面。但我需要证明我能找到自己前进的路。

在我家客厅里，有一幅我妈妈裱起来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画像，我一直以为他是我的曾祖父。不然为什么我们家墙上会挂一个老人家？在我的一生中，艺术和写作一直是我的支柱。安奶奶常说生来手里就握着一支铅笔。当我难过的时候，当我无聊的时候，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画画。父母让我直接在墙上画，用墨水画相扑手从烟囱里爬出来，长了长胳膊的茄子。在物理考试中，如果我填不出答案，就画一个男人耸耸肩说“我根本不知道”，然后用考试时间给他眼睛下面的眼袋涂阴影。上大学时，我的书架上堆满了鲁米、伍尔夫、琼·狄迪恩、温德尔·贝里、玛丽·奥利弗、吉本芭娜娜、米兰达·裘丽、李昌莱、卡洛斯·布洛桑<sup>(7)</sup>。我睡在图书馆里。我学习版画，晚上在印刷室里刻油毡块，给桶上油墨，把围裙弄脏，看日出。当我写作的时候，当我画画的时候，世界慢下来，我会忘记世界之外的一切。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几次妈妈为了参加驻地作家的活动，会离开我们几个星期。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等她回家的时间



里，爸爸每天都会给我们吃同样的罐装豌豆、鸡肉和米饭。最后，我们开车穿过陌生的小山，去参加森林里的画廊开幕式，大人们衣着飘逸，涂着口红，饼干那些霓虹橙色的鱼子让我作呕。妈妈告诉我们，她整个上午都在写作，下午去远足，壁虱粘在她的袜子上，然后我就想，你怎么能为了噬血的虫子和海鲜鱼子酱而离开我们呢？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开，她说：“我想做自己。”这有点无法反驳。

在帕罗阿尔托，我开始强烈地感觉到，我不再适应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身份，或者我所以为的身份。我想要一个我可以有所创造的地方，一个我可以消失的世界一隅。我选择了一个最小的州，离加州越远越好，和我素未谋面的人们一起生活。童书写作班已经满了，不过没关系。我打算辞职，到3000英里外的罗得岛设计学院参加一个名为“从光到墨”的版画制作工作坊。招募办公室的女士名叫乔伊，和那位护士一样。我把这当作好兆头。父母问了一些常见的问题：“安全怎么样？你确定吗？你回来后要做什么？”但他们予以理解。到现在，我已经攒够了学费、房租和机票费用。我以为庭审会在年底结束，而我的存款刚好可以维持到那时。我在设计学院的申请表上写上名字，在支票上签好名，封上那个暗黄色的信封，躺在地毯上，胜利。爸爸偷偷观察着我的状态，我说：“我太高兴啦。”

在离开之前，我想告诉一个人。克莱尔，我的好朋友，她长着雀斑，戴着小鼻环，准备去法国做一年的互惠生<sup>(8)</sup>。最后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坐在她的车里，一边吃冰激凌一边听法语磁带。我总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但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只知道我快没时间了，现在我得告诉她。她在只有18岁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报警，完成强奸检测包测试，但即使她做了身为受害者所能做的一切，她还是被告知，证据不足，无法推进。在我的房间里，我告诉了她。她立刻靠过身来，用双臂搂住我，奇怪的是，我根本不用说什么。她明白。她挺直身体，直视着我的脸说：“这是你的机会。”

几个月来，我一直认为这个案子是强加在我身上、我想摆脱的负担。我很沮丧，为什么我要做这些，我没有时间。但在她看来，这是个机会。这是她四年前试图做的事情，结果却遭到不耐烦和冷漠的对待，被机构部门磨得筋疲力尽，搁置一旁，直到她只能选择离开，强

迫自己忘记。有段时间，她一直努力想要抵达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某种程度上，我重新打开了前行的道路。“你是要做这件事的人。”我想到她18岁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家伙做的事，我明白了自己必须要做什么，明白了现在这意味着什么。

---

- (1) Pop-up village，一种快闪活动场地，利用场地的设计感来增强活动效应。
- (2) Lionfish，身体带条纹，有狭长而多刺的鳍，性孤僻，喜独居。
- (3) Adios Mother Fucker的首字母缩写，一种由伏特加、朗姆、龙舌兰、金酒、蓝柑橘利口酒和汽水调制的鸡尾酒。
- (4) Frosted tips，用发胶将头发做成尖钉状，并染成浅金色。
- (5) Moscow Mule，由伏特加、姜汁啤酒、柠檬等调制而成的鸡尾酒。
- (6) Venice Beach，位于洛杉矶。
- (7) Rumi（1207—1273），波斯伊斯兰教苏菲派著名学者、诗人，著有《玛斯纳维》等。Joan Didion（1934— ），美国随笔作家和小说家，著有《向伯利恒跋涉》《奇想之年》等。Wendell Berry（1934— ）美国学者、诗人、经济与文化批评家。Banana Yoshimoto（1964— ），日本当代小说家，著有《厨房》《月影》等。Miranda July（1974— ），美国电影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著有《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第一个坏人》等。Chang-rae Lee（1965— ），美籍韩裔小说家，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著有《母语者》等。Carlos Bulosan（1913—1956），美籍菲律宾裔作家，著有《美国在心中》等。
- (8) Au pair，年轻人出国后为学习语言而住在当地人家里并照看小孩，以服务换取膳宿。



## 4

我的新家是一座暗绿色房子里的一个黄色小房间，和一位插画师、一位油画家合住；房间原来住着一位舞蹈家，夏天时要离开一段时间，便把她的床位转租给我了。房子每月租金400美元，位于普罗维登斯<sup>(1)</sup>西区，带一个大后院，还有一只名叫埃尔维斯的猫。舞蹈家给我留了一个枕头，干净的床单，柔软的纱毯，抽屉里放着小银鱼。到达后的那个早晨，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惊慌失措，直到看见房子奶油色的墙壁，树叶压在窗户上。没人在家。我环顾四周。厨房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砖，挂着巨大的丛林油画。有新摘的西红柿和胡萝卜，螺纹状的根上沾满了泥土。一个装满香料的木架子，一个硬质蜂蜜罐，一个绿色的水壶，一个鳄鱼雕像。我顺着一串灯走过一个深蓝色的沙发，一把芥末色的灯芯绒椅子。一份报纸摊开，一边是做了一半的填字游戏，旁边是小幅山水画和桃色纱线。我已经喜欢上两位不在家的室友了。

去学校的路有两英里远。罗得岛天气很热，阳光不像西海岸那样只是轻吻你的额头。我的路线两侧是铁栅栏，杂草像黑色的火焰一样排列在人行道上。旧家具躺在街上，宛如海狮搁浅在沙滩。人们坐在酒店和自助洗衣店外面的草坪椅上，白色的香烟散落在路边。角落里停着一辆马车；我可以花1美元买盛在泡沫塑料杯里的水果冰糕。

接近校园时，街道开始向上倾斜，路面变得平整，树木张开双臂，生出一片灰色的阴影。这里的草长得茂盛，不像加州那种干巴巴的草，叶片总是萎黄而卷曲。有的男孩女孩染了火烈鸟似的粉色头发，穿棉质连衣裙，高跟鞋，戴羽毛耳环。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旧运动衫，用手指摸了摸我特意为了装扮而戴上的廉价珍珠耳环，心想，我一定看起来特土。

上课的地方是在一幢小砖房里，上两层楼梯。整片玻璃的大窗户。软木墙板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小孔，上面钉着艺术作品供人品

评。我看见了晾纸架，我们的版画很快就会在那里摆好。一个只用来创作的房间。

我的老师留着浓密的胡子，戴着圆圆的眼镜，系着一条几乎垂到脚踝的长围裙。他让我们四处走动，做自我介绍，讲讲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的。这十名学生让我想起专门制作精美工艺品的精灵：吹制玻璃、纺织布匹和制造无踏板自行车。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是本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暑假来补学分。你呢？他说。“我刚搬到这里，为了这门课，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辞职了。我喜欢版画，我在大学里修了一门课，主要是凸版印刷。”老师说：“真好！令人兴奋啊！”他让我们把名字写在胶带上，选一个抽屉，贴上标签。我用大写字母写了我的名字，“**香奈儿·米勒！！**”，准备在抽屉里放满新的版画。

他分发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有我们需要购买的所有物品，以及已经提供的物品：单面磨砂聚酯薄膜、醋酸盐、宝石红、胶膜刻划刀、点状凸版或磨砂玻璃、亲水涂层板、松香、酸、BFK丽芙版画纸、硬挺的粗棉布、聚酯单丝、脱脂剂、直接乳胶、涂料器、凯兰帝水溶性蜡笔、吸墨纸等等。下课后，我在美术用品商店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拿起东西，看看价签。我没有把材料费计入我的预算。

下节课他让我们跟着他回到暗室。他教我们如何使用放大机，如何装底片架，如何将胶片转到合适的镜头，将乳胶试纸朝上曝光，如何显影，如何完成冲洗、定影、放水。如何将透明感光乳剂置于正片印版中心，置于真空床中，除去印版上的油脂，在印版上涂上松香粉，在印版上涂色，在硝酸中浸泡；把边缘磨成斜角，把印版放在印刷机上，混合墨水，把纸浸湿，拍干，调节压力。最后转动滚筒，把刚印出来的图案取下来，轻轻放到晾纸架上。经过几个小时的演示，一幅版画诞生了。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踮起脚尖站在同学身后，疯狂地做着笔记。最后，我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最初的45步里就已经迷了路。学生们开始用素描把想法画出来。我坐在凳子上，盯着我潦草的

小字，它们就像死去的蚂蚁在我的书页上留下的痕迹。终于下课了，我匆忙走下楼去。

到了第三堂课，我落在更后面了，羞于问“什么是粗棉布”之类的问题。我一个人吃午饭，一个人吃晚饭。我已经毁掉了一张照相印版，因为我把它带进了一个有阳光的房间。其他每个人都很熟练，目标明确，一步步准备他们的材料。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想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下课后，我去了行政办公室。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选一种不同的课。现在换已经太晚了。我点了点头。

我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发现一条浅蓝色的条纹，是一条河。我走了很远，找到这条河，然后又沿着河走了很远，最后扑通一声坐倒在一片草地上，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前这条河的名字。我搬到一个拼图般大小的地方，远离所有熟识的人，就为了来学习过时的印刷技术。这是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我认为我可以做到？埃米莉一直跟着我，提醒我是个无路可走、一事无成的**受害者**。这种生活过于甜蜜。这种快乐、创造，属于那些除我以外的人。

可就在一个月前，老板要给我加工资，有什么东西使我摇头。男朋友提出让我跟他一起住，但又有什么东西使我摇头。大老远跑来这儿，似乎不合逻辑，费用高昂，令人费解。然而我却在这儿，坐在那个想法里，在那个想法里汗流浹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做过的选择。没有人告诉我我能做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不能做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这就需要我信任自己，完完全全地信任一次。我小时候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我是不是个艺术家。我只是在桌子上腾出足够大的地方来放纸张。我收拾好东西，慢慢走回家，为第二天做准备。

我开始在休息日也去上课。我告诉自己我不笨，然后开始问问题。我的老师总是花时间帮助我，鼓励我做更大的版画，很快我的版画就有桌面那么大了。我教自己寻求帮助，作为回报，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晚上，我听见室友和他们的朋友在客厅里商量着要去打保龄球。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不敢去洗手间，也不敢向那么多人介绍自己。我一直在等着他们离开，这样我就可以洗个很久的澡，把一个西葫芦切成圆片，在静静的屋子里炸着吃。接着我听到了敲门声。

我等了一会儿，装作在忙乎什么事，然后打开门。室友问：“你想去打保龄球吗？”我没有计划，我当然没有什么计划。我本能地要拒绝她的邀请，担心这是出于怜悯或只是客气，就像收银员问你是否需要帮忙把袋子拎到车上。但我还没来得及礼貌地摇头，桌边的人就插话说：“我们打完保龄球去麦当劳吃冰激凌！你要给屏幕上选个什么保龄球昵称呢？别忘了袜子。”于是我点点头，把一团袜子放进包里，跟着他们出了门。

我不想家，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家，但我感受到了在世界上漂泊、没有立足之地的不安。这个小邀请和其他的小邀请拯救了我：把车开进池塘，在雷鸣的警告声中躺在磨损的毛巾上。和安吉一起开着小红莓色的面包车，车里缺了张座椅，就坐在压扁的卷心菜盒上。在一张悬挂的床单上投影放《紫雨》<sup>(2)</sup>。吃着樱桃派，听着电子混音版的《宋飞正传》<sup>(3)</sup>序曲。我在他们的夏天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我的存在可能在他们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被接纳在内的感觉。

我在克雷格列表网站<sup>(4)</sup>上买了一张桌子。一对很好的夫妇来送货。那位女士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外边。“我们可以帮你搬进去，但如果你不想让我们进你家，我也能理解，因为你也知道，克雷格列表网站上认识的人。我只是不想——”那位男士说：“不然她怎么搬这桌子呢？”我明白这位女士的意思，就连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拿一件家具这样简单的交易，都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威胁，任何时候跟网友相见，我们都必须审视其中是否有侵犯、强奸、死亡等等的迹象。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个人没有用这种语言说话：他只是看到了一张桌子。

我每天平均步行6英里，自己去公园、电影院、书店，一心想发现自己的新领地。不管我去哪里，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一开始是一位老先生，他点点头说：“早上好，美女。”然后我转过身去看他在跟谁

说话，直到意识到他是在跟我说。带着困惑，我说：“早上好。”甚至觉得自己本来不应该说什么。善待老人。一个秃头男人说：“嘿，美女，你真漂亮。”他的笑容慢慢地扩展开来，好像他的脸拉开拉链，于是我就回答：“谢谢您！”

这些话伴随着我的散步，就像树上的鸟一样常见，陌生人问我：“你好吗？”我就回答说：“很好，你好吗？”这些评论让人感觉太过微小而不重要，就像一个小图钉扎进了厚厚的轮胎。我有时会责备自己太过友善，也会责备自己报以微笑的速度太快。当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本能地挥挥手。我的默认设置是回应每一个问候。但我意识到，我不认识按喇叭的人，我几乎不认识普罗维登斯的任何人，下次也不需要挥手。无须挥手，无须道谢，无须问候，我告诉自己。

我路过坐在车里的三个人，他们盯着我的腿，咂着嘴，口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模仿着召唤猫时的声音和手势。当我走开时，我感觉到六只眼睛都在抚摸我的小腿肚。我不知道非语言行为是否比语言更困扰我，我是更喜欢点击还是评论。我只是想要安静。有一次，几个男人聚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当我走过他们肚子之间的狭窄通道时，他们寸步不移。

我开始避开某些街道。如果有人让我走一条路，我会选择另一条路回来，然后发现自己绕了好几个街区。我训练自己把头埋起来，避免眼神接触，假装看不见。我不会抬头看树，而是坚定地走着，或者低头看自己的脚。有一次，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说：“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我开始加快脚步。“让我和你一起走吧。”当他的脚步追上我时，我只是摇了摇头，双手紧握背包的提手，等着他落后几步。有些男人会因为我没有回应而生气，有个男人说：“我只是想让你今天有个好的开始。”但当我的肢体语言传达出我不想被人看、不想被人搭讪的信息时，这些赞美就不像是赞美了。当他们把这些话硬塞给我或是用只有我能听到的低语说出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是礼物。这些话的潜台词都可以理解为：“我喜欢我所看到的，我想要它。”“但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我想。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吃着三明治，有人说：“该死，那看起来像个美味的三明治，我可以咬一口吗？”你会想，我为什么要让你吃这个三明治？这是我的三明治。于是你继续边走边吃，然后他们会说：“什么？你毫无回应？别生气，我只是想赞美你的三明治。”假设这事一天发生三次，陌生人在街上拦住你，让你知道你的食物看起来有多好吃，问你他们是否可以吃一点。如果人们开始在车里大喊他们多么想要你的三明治呢？“给我一点儿！”他们会惊叫着，按喇叭开车经过。你是不是应该说“对不起，不行，谢谢”，每次都这样？你是否觉得有义务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你不想分享，因为这是你的午餐，而且你不认识他们？说你不欠他们任何东西？他们跟你要东西这事儿首先就有点不合理？你想要的只是安静地在街上边走边吃三明治。也许我把一个女人的身体比作一块三明治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开始在经过一群男人时用手机谨慎地录下视频。我发了一段给卢卡斯。“这种情况多久发生一次？”他问。“每天。”我说。他问我是否需要一辆车，说他会帮我付租车费。我说我喜欢散步：这是观察一切的唯一方法。再说，我有那么多时间，从不赶时间，散步是我少有的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一天下午，当我放学回家时，一辆面包车从我身边驶过，并鸣响了喇叭：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已经很熟悉了，懒得转过头去看。但引擎的声音并没有消失。我听见车轮在柏油路上慢慢转动，他掉头停在我旁边，摇下车窗。“跟我说说话。”他说。我立刻穿过街道，一边走一边开始拍摄。他大概五十上下，头发蓬乱，戴着一顶帽子，脖子又粗又软。“来跟我说说话，”他说，“我很寂寞。”“不。”我说。

“为什么不？”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对他的问题有些哭笑不得。

“就一会儿，我很寂寞。”

“不。”我说，摇着头，低头看着脚。我没有再说什么，太生气了。为什么我得关心你是否寂寞？“求求你了。”他说。他继续在我后面喊着，我加快步伐，假装走进一所房子，直到他慢慢离开，然后跑



到我真正住的房子，关上所有的百叶窗。我把视频发给了卢卡斯。他立刻打电话给我。

“我要你租一辆车，”他说，“钱我来付。不要拖延，如果今天租车行还开着，就去吧。好吗？”

“好的，”我说，“我去。”

“谢谢你，”他说，“不要再发视频了。我没法看他们，他们太让我生气了。”

我说好的，他回去工作。我坐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把视频发给他，让他心烦意乱。他似乎在说：如果他们打扰你走路，你为什么还要走路？这一点也不像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强迫我把自己关在一辆车里。我不想放弃我的人行道。

我给卢卡斯回了电话。“这不公平，”我说，“我只是想从学校走路回家，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本就应该可以这么做。你可以走路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不想再看这些视频是不公平的。你可以拒绝再看，你可以有选择地观看，而我没有这个选项，将它们排除在生活之外。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感受。我做什么都不重要，我穿什么都不重要，我怎么做也不重要，因为骚扰是不变的。我没有钱搞辆车，就算我有钱，我也喜欢步行，我想继续步行。”我哭起来。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我在这里感到无能为力。我不想有什么事发生。”我知道“发生”是什么意思。他听起来很痛苦，被困在了国土的另一端。一天晚上，当我告诉他我在画室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有人通过文莫支付<sup>(5)</sup>给我的账户转了些钱。“用来坐来福车<sup>(6)</sup>，”他说，“安全回家。”我明白，他在小心照顾着我。我答应他不会在黑暗中独自行走。但即使坐来福车，我也从来没有填写过我的真实地址，司机永远不会知道我住在哪里。安全总是一种幻觉。

走在街上就像会被扔炸弹一样。我疯狂地拨弄着金属线，把每根金属线都弄断了。每次我都不确定哪根金属线会爆炸，汗流浹背地在那儿修修补补。女人被教导要机敏，要时刻保持心灵手巧。她得知道如何处理一连串的炸弹，如何善意地拒绝给出她的号码，如何让手从

她牛仔裤的纽扣上移开，如何拒绝一杯饮料，这些都是她该做的。当一个女人遭受了侵犯，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不了吗？”，这个问题的预设答案总是“是”，而她要做的就是撤销协议。她需要拆掉扔来的炸弹。但为什么在我们用身体击退他们之前，他们有权接触我们？为什么门是开着的，直到我们不得不砰地关上它？

有一天，我试着戴上耳机边走边看书，希望能显得沉浸其中，正忙着。我走了一英里。在高架桥上，一个男人把车停了下来，说：“嘿，你看起来像个领导，我喜欢。我从没见过一个女孩一边走路一边读书的。”我开始仰天大笑，仿佛终于看透了世界的真相，我逃无可逃！你想要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停下脚步，掏出耳机，走到他的窗前，投降了。那个人问我在读什么，我告诉他，他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他发表演讲的会议，我说没有，接着他问我以后忙不忙，我说是的，然后我担心给了他太多信息，所以撒了个谎，说我会在未来三天内搬回加州。他给了我他的名片，我接过来，谢了他。后来我把它扔掉了。

我做到了，我给了别人我的时间。我能不能不要浪费精力，参与这种单方面的谈话？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店看到一张传单，上面有一只扑过来的小猫的照片，是由一个旨在制止喝倒彩<sup>(2)</sup>行为的组织制作的，附带一张假的商务名片，上面写着“**别跟我说话**”，打算发给那些爱猫人士。有人也有这种感觉，甚至还印制了传单。

那年夏天，卢卡斯休了一天假，飞过整个大陆来看我。我带他去学校的路线。我向他展示，我付出这么多汗水是多么难以置信。我带他去印刷厂，带他领略我学到的每一样东西。晚上我们在河边打开汉堡包。我很自豪能和另一个人分享我的世界，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他一走，我就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空虚而痛苦，像个缺了核的桃子，缺了最结实的部分，而我成了裹在周围那软乎乎的一团。我已经忘了被人照顾的感觉，有人给我买新鲜的冰沙，给我的房间杀蜈蚣，拿张纸给我扇风，用冷毛巾给我的四肢擦汗。我已经忘记了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轻松地睡觉、无须时刻警惕是什么感觉了。最重要的



是，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街上没有人跟我说话：他的出现让他们沉默了。

男人有别的男人不能跨越的界限，一个不言而喻的受尊重的空间。我想象卢卡斯周围画着一条粗线。男人对我说话时，那条线却好像不存在，每天我都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画一条线。为什么我的界限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继续每天去工作室。我花了更多的钱在美术用品上，没有钱出去吃饭，就坚持吃速冻比萨和生蔬菜。有时我花了几个小时工作，结果印出来的版画要么黑乎乎的，要么一片模糊或者有污点。我又从头开始，忘记了时间。我把笔记翻来翻去，直到烂熟于心。

一天晚上，我在日落时分离开工作室，但太阳比我预想的要落得快很多。就在我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穿过一家卖酒商店的霓虹粉灯光时，一个男人开一辆银色的车停了下来。可不要是现在，我想。我不喜欢。我听见车窗摇了下来：“让我载你一程吧！”他微笑着，好像他是驾着一辆金色战车，而不是一辆口香糖铝箔包装纸颜色的小雪佛兰。他很兴奋，就像我们是久违的朋友一样，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他微笑的宽脸，如此自信。我开始拍摄，朝他的车走了三大步，弯下腰，把头探向他的车窗。在视频中你可以听到我在问：“你说什么？”请他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上车吧，让我载你一程。”

**“上你车你他妈疯了吧我凭什么上车！”**我怒喊道，声音飘忽而尖厉，简直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操你妈！”**我说。我记得他的笑容迅速消失，就像一滴水落在滚烫的路面上，他飞快地打着方向盘加速离开了。不错。我想。然而我的四肢开始颤抖，都怪肾上腺素，我摇摇晃晃地走向人行道。我看着停着的车，试图与那些司机眼神交流。如果他回来，你会帮我吗？你看到我了吗？当人行道上一个容光焕发的小个子男人被灯光照亮时，我开始奔跑，背包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背。

我没有把视频发给卢卡斯。我向自己保证，我会小心，早点从工作室回来。我本想省下6美元的车费。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花6美元，想想真是搞笑。我知道我不应该在大晚上落单的时候对着一个人大喊大

叫。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别人的目光：这不能算作是为自己挺身而出，这算不上勇敢。如果这件事传到我的检察官那里，我会受斥责；辩护律师会说她疯了，她会做出各种举动，大声说脏话，激怒男人。她就不该理他，为什么她要一个人走路？她冒着生命危险，自找麻烦。

总是她，总是她。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声音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为什么他相信我会上车，如果我上了车他会怎么着。人们期待着我该拿取多少、吸纳多少、忽略多少，而他们如此自由地叫嚷着，啪嗒啪嗒地动动舌头，不必害怕去亲自面对。我想步行是太固执了吗？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厚厚的轮胎上现在扎满了图钉和钉子。我感到轮胎变形，倾斜，漏气。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运作。

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在离家很远的塞耶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我的来福车。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他转过身来，说：“你想尝尝甜椒吗？”他戴着眼镜，穿一件柔软的棉衬衫，口袋里有一个小记事本，看上去既满足又安详。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片青椒，腿上的手帕放着剩下的青椒。我盯着那片青椒。如果他在种子里下了毒呢？如果他是个变态，用甜椒摩擦过他的阴茎，想看着我吃下去呢？如果他拿小刀割我怎么办？小老头耐心地拿着甜椒准备递给我。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想，我正在失去它。在一个温暖的夜晚，有一个戴着软呢帽的善良的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着甜椒。你可以谨慎行事，但不必总是担惊受怕。允许自己享用这块小蔬菜吧。我接过来，一整片吃下去，谢过他。

---

每天晚上，当灯光在天空中消失，卖水果冰糕的小贩的车铃声渐行渐远，埃尔维斯蜷成一个完美的圆圈，而我无法入眠。我像海星那样把四肢摊在毯子上。“太热了，睡不着。”我在一个小小的绿色聊天气泡框里告诉卢卡斯。第二天，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包裹。他给我订了一个不错的风扇，不是那种铁笼里装个螺旋桨的廉价产品，而是带有定时设置和发光按钮，附带的纸条上写着：“来自你的头号粉丝

(8)。”但热并不是我睁着眼睛的原因。让我保持清醒的是，我知道布罗克很快就要开始研究我的脸了。在法庭上，我将被迫放弃我的匿名权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保护。我不想让他认出我。我想坐在屏幕后面，戴上太阳镜，考虑是否应该剪去头发，给头上套个袋子。上法庭的那天，就是我交出我的安全的时候。

上大学时的一个周五晚上，还有几周就要毕业了，我正往朋友家走，两辆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不觉得奇怪。在伊斯拉维斯塔(9)经常能听到警笛声：这是一个靠近海崖的小镇，住着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街道两旁排列着破旧的木屋，自行车丢在草坪上，阳台拥挤不堪，兰花种在可回收的风时亚葡萄酒盒子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你可以看到美丽的女孩穿着泳衣，头顶巨大的木筏，就像面包屑下面的蚂蚁一样，沿着街道走向海里。男人们骑着自行车，一只胳膊下夹着冲浪板，他们的潜水服像香蕉一样剥了一半皮。在伊斯拉维斯塔，大家都睡在沙发上，朝任何方向走一个街区都能遇到朋友。这个狂野而明媚的村庄，我们将它视作家园。

但当我到达她的公寓时，警报器已经开始响了，怒放，爆发。我走进门，五个朋友都安安静静地听着警报。我们收到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紧急邮件：

IV 2区枪击案嫌犯被拘留，调查仍在进行中，

就是这些。以逗号结尾的一行字。不同版本开始流传：也许是团伙作案，抢劫案，毒品交易失败，是飞车枪击不是枪战，是炸弹，是鞭炮，是醉酒司机。他是波斯人，不是亚洲人？是两个人，一个人，坐在一辆车里，黑色的车。可能有人死了，一个，可能三个，也可能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变态的恶作剧。

有一段视频在流传，有人说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所以我们围着手机看，他就在那儿，坐在驾驶座上，脸被夕阳染成橙色。“你好，我是埃利奥特·罗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女孩子不喜欢我，但我会惩罚你们的。我会走上伊斯拉维斯塔街头，杀死我在那里看到的每一个人……我以屠杀你们为乐……”恐慌爆发了，一个朋友尖叫着要把它关掉，另一个在地板上抽泣着，抽搐着，好像她的胃被一根绳子牵

着。他还在说话，污染着周围的空气。我摇着头，不想听。他要来伊斯拉维斯塔杀女孩，我们就是伊斯拉维斯塔的女孩，但我们不可能是他说的那些人。“你们不让我过幸福生活，反过来我也不让你们所有人活，这样才公平。我恨你们所有人。”是我们剥夺了你的幸福生活？恨他妈的谁？我愤怒至极，拿起电话，走出房间，把它放在浴室的台子上，然后走出去，紧紧地关上浴室的门。我觉得我把他困在了那里，视频还在播放，他在黑暗中对着空无一人说话。

下一封邮件告诉我们要待在家里。我们锁上门，关上百叶窗，“离窗户远点”。我们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克莱尔的室友中枪了。什么都无法拼凑起来。

凌晨3点，我们盯着电视新闻，听到了“大屠杀”。“七”这个词以大大的白色字母显示在屏幕底部。把死者归为一类似乎不对。不是七：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每个人都有一整个人生，每个人都有名字。

晨光从未出现，空气静止不动。在这样的日子里，雾从海里飘进来，吞没海水和海岸，吞没我们的小房子。我们眨着眼睛，筋疲力尽，不知道离开是否安全。我们跪在沙发上，小心地拉开百叶窗。我接起一个十一位数字号码的电话。是我妈妈，从北京打来，她在探亲时看到了新闻。“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醒来后看到新闻的亲人们纷纷来电话，手机震动个不停，我们躲到角落里。“我在这里，我也爱你，我们不知道，奶奶在打电话。”有传言说还会有模仿的罪犯，有一些人赞美埃利奥特的行为，称他们是他们的领袖，是“至尊绅士”。

当我们终于走到外面时，周围静得出奇。在街上，人们都结成紧密的小团体出行，成群结队。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人散步，没有人长板冲浪，也没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从屋子里传出来。新闻发布会安排在下午4点。发布会开始之前，我们各自去淋浴，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重新聚集在公寓里，那是我们的安全屋，我们拒绝独处。

埃利奥特曾住在一幢棕色的公寓楼里，离“甜品巷”只有一个街区，我经常去那儿买酸西瓜糖，帮我度过在图书馆的长夜。周五晚上，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杀死了三个人：两个华人室友和他们来访的朋

友；总共有142处刀伤，走廊上有血迹，尸体被拖来拖去，用毛巾盖着。他拿着刀和手枪，开着他的黑色宝马，冲到阿尔法菲姐妹会<sup>(10)</sup>，使劲地敲门。没人应答，他开枪击中了外面的三个女人，其中两个倒在草地上流血而死。他迅速离开，向伊斯拉维斯塔熟食店的玻璃窗里开枪，屋里一名男子倒地死亡。他在主干道德尔普拉亚大街上撞了车，车头嘎吱作响，然后他拿枪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警察发现他时，他的头已经爆裂，路边飘满血。救护车不够用，学生们跪在流血的同学旁边。街道上散落着弹壳、玻璃和大块的窗户碎片。警方在他的车里发现了548发未用的弹药，他没有时间把它们用完。有六个同学从我们身边被夺走了，埃利奥特是第七个。我在这里不列举受害者的名字，因为名字是神圣的，我不希望仅根据他们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来确定他们的身份。

性侵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我辞职了，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我走过铺着地毯的门厅，打开储物柜，蹲在路由器和坏了轮子的椅子后面，给警探打电话。“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你认为布罗克会伤害我吗？”我解释道，“我上学时，学校里有个人非常生气，制造了一起枪击事件。”我不知道怎么问出我的问题，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没法知道，”警探说，“但希望不会，我们正在努力控制局面。”

对啊，当然，我想。我感到疯狂。我想听到什么呢。你永远安全。我没再提起这件事。但我从未见过现在站在我对立面的那个男人，这种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能力做什么。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利奥特那长达137页的宣言开头的一行字：“这是一个关于我，埃利奥特·罗杰，如何成为.....的故事。这场悲剧本不必发生.....但人性迫使我出手。”他的残忍有一个叙事结构。他说得好像他从来就不想做自己所做的是，他是被逼迫的。是女人让他受苦，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的最后审判。在视频中，他说：“我被迫忍受孤独、拒绝和无法满足的欲望，这一切都是因为女孩们从来没有被我吸引过。”他的敌意源于自认为拥有应得的权利和自怨自艾。

“我会惩罚所有的女性，因为她们剥夺了我的性权利。”在埃利奥特的世界里，不成文的法律是女人都在性方面亏欠他，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接受他。那是规则，那是我们的目的。性是他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在他的世界里，对违反法律、拒绝性的惩罚就是死亡。性侵事件发生后，新闻头条第一次出现报道，布罗克微笑的照片就伴随着每一篇文章。评论者说：“他在公众面前受羞辱，而她却躲起来，这不公平。”既然我已经看到了羞辱导致的结果，为什么我还想去羞辱他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变得谨慎起来。他辍学了，我失业了：我们俩都脱离社会，漫无目的地漂流着。所有那些空虚的日子。你变了，你忘记吃东西，你不知道怎么睡觉，你离自己很远。在我变得沮丧的同时，他是否也变得充满怨恨呢？我问他是否在看心理治疗师，但没人能回答。“大学是每个人都经历性、乐趣和快乐的时期，”埃利奥特说，“那些年我一直在孤独中煎熬，这不公平……你们逼我受尽折磨，现在我要让你们受尽折磨。”每个人都得受责备。他和我都处于某种痛苦之中，但是他的痛苦会点燃什么样的暴力呢？如果他伤害了任何人，我都无法活下去。我着魔似的沉浸在这个问题中。要是他生斯坦福大学的气，在校园里搞破坏呢？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的生命已经完了并自杀呢？“你应该被消灭，我会消灭你。你从未对我仁慈，所以我也不会对你仁慈。”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尽管我知道这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想要问责和惩罚，但我也希望他能好起来。我不是为了了结他而战斗，而是为了让他站到我这边而战斗。我希望他能理解，承认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并改过自新。如果他真的相信自己的未来被毁了，自己已经失去一切，就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

各种情景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用木板把窗户塞得严严实实。我检查后院，寻找灌木丛下的脚印。我讨厌自己离俄亥俄州这么近，他可以来找我，可以坐火车来。我关闭了位置跟踪，删除了社交媒体。我查了枪支法。埃利奥特合法购买了三把半自动手枪，弹匣里子弹充足，就像买葡萄柚一样容易。我快要疯了。如果听证会是个圈套呢？我想象着法院外的枪战，爆发混乱，躲在车门后，窗户破碎，法警冲

刺，鲜血从尸体中喷涌而出。我不知道这是合理的还是疯狂的，只知道疯狂的事情是有可能的。我静静躺在我的黄色房间里，这样就能听到一切，我的灯泡总是亮着。我把自己浸在光里。睡眠不再是休息，而是脆弱。清晨6点，整片整片黑压压的树木终于分裂成一片片独立的叶子，我感到如释重负。光线冲走了我的思绪，我终于可以有一段时间失去意识。

我只睡一到两个小时，上课时几乎无法保持清醒。我从来没有时间打包午餐，也不愿意在校园里花钱，就让自己饿上八个小时，直到晚上回家。在艺术画廊里，我用餐巾纸包上免费的葡萄和抹了鹰嘴豆酱的薯片。我总是疲惫不堪，越来越不健康。我想吃妈妈做的菜。想让卢卡斯抱着我睡觉。

我在床上方的风扇上贴了一张便条，就像一张薄薄的捕梦之网。我贴了一张父母的照片，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手牵着手站在水族馆蓝色的鱼墙前。还有一张，我和婴儿时期赤着身的妹妹并排躺在有小鹅图案的床单上。他们是我的小小保护者，晚上在我的上空盘旋。

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在躺了几个小时后，我掀开毯子，拿起一支铅笔。我画出了发现我的那两个人的两辆自行车，赋予它们生命，一条钢丝一条钢丝地画着。我从警方的报告中已经知晓了他们的名字：

卡尔-弗雷德里克·阿恩特

彼得斯·拉斯·琼森

我画了平滑的车把，小踏板，凹凸不平的不对称车轮。我把它贴在枕头上方的墙上，按平。保护的象征。散发着帮助意味。我滚回被窝吸了一口气。如果他们在外面，我就可以休息了。我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在我最后一次考评的前天晚上，我把我的版画叠好；经过数小时的尝试，再尝试，最后终于完成的一堆作品。我为教授和助教做了感谢卡。我设了三个闹钟。我拿出自己最喜欢的红裙子。我躺在床上，希望这一夜能睡个好觉。六个小时过去了。睡意始终不来，所以我决



定就这么醒着，直到8点钟出门。然而，睡意却在早上7点悄悄袭来，我昏昏沉沉，连闹钟都没听见。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

没有慌乱的嗡嗡声，唯有一股深深的悲伤。考评快结束了。我错过了同学们的报告，整个暑假的终曲。我还是叫了辆来福车，穿上红裙子。在车里，我拨出眼屎，思考着世界上所有比错过艺术考评更糟糕的事情。这事太小了。但我很伤心，因为甚至连这么小的事情，我都没法完成。我要向我的教授道歉，确保他知道我的缺席不是出于不尊重。

我进去的时候，最后一个人正在做展示。每个人都看着我。我没有解释，也没有假装要解释。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位，想要隐身起来。我觉得我的作品不值得展示。然而，教授示意我应该去，非常热情。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钉起来，背对房间，大家静静地坐着。“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很快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介绍每一件作品。

迎接我的是一片安静。然后教授开口了，他的大胡子下露出了温暖的微笑，他说这些棒极了。同学们指着我画的双头公鸡。他们赞美我的想象力，充满邪恶，异想天开。他们问我从哪里获得这些想法，我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称赞我的用色。我也惊讶地坐着，他们在评论时，我一定看起来疲惫不堪，但又笑容满面。看着我所有的作品贴出来，一张挨着一张，我创造的美丽而怪异的东西，尽管在创作的间歇中我苦苦挣扎。

下课后我买了一卷新胶带。我站在椅子上，把它们都挂在房间里，尽管我很快就要搬走了。我做了一个只给自己看的画廊。我从一个无知的爱哭鬼变成了一个多产的版画家。这就是我的证据，当我的精神因焦虑而枯萎时，我的心却一直忙碌着，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看到了自己坚持生存下去的那一面。

为了庆祝结业，班上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街区派对，那里有雪糕，还可以跳舞。我提前到了。最后，我的朋友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出现了，她是个雕刻家，两人喝了些威士忌，眨眼都是慢悠悠的。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加菠萝的伏特加，看着孩子们抓萤火虫，用红色吸管



糖喝着奶油苏打水。我们在临时搭建的舞池周围跳跃；我把夹克袖子系在头上，像耷拉的兔耳朵。几个人走了过来，身上散发着古龙水的霉味，夹杂着橡树苔和烧焦圆木的味道。他们问我们是不是艺术系的学生。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人是否是从绑在我的头上的衣服知道这一点的。“只是夏天来学习的。”我说。“你是本地人吗？”他问道。“不是，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说，“你呢？”但他的朋友们已经往前走了，叫着他的名字，着急地打着手势表示想走。他看着他们，转过身来，一边严肃地看着我一边靠近：“如果我留在这里，你会和我做爱吗？”没有过渡。我们从微不足道的闲聊进入了这个直率的问题。“不。”我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向他的朋友们跑去了，而我站在那儿，衣袖从头上垂下来。我们三个人都怒不可遏。他的朋友也问了她们同样的问题。那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的朋友也这么问你？那个头发上了发胶的吗？

我们结束了这一晚，回到朋友的公寓，想要奶油面包和凉水。我们边走边聊，聊着与男生们的滑稽遭遇，聊着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有一次是咖啡店里的一个男的，有一次是我朋友的兄弟，有一次是我的哲学教授，还有一次……”

“女士们，你们要去哪儿？”一辆黑色的福特野马停在红灯前轰轰作响，三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舒适地坐在座位上。“你们想去夜总会吗？”夜总会！我感到脱水，伏特加和小菠萝从我的身体里流走，我的脑海里充满了“有一次”的故事，我突然对自己还要忍受多少这种事产生了一种妄想。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离酒吧只有几个街区之遥，除了黑窗户的房子和停运的灰狗巴士外，什么都没有。我走到空荡荡的街道中央，握紧拳头，把头往后一仰，开始尖叫。

我尖叫着，胸膛敞开，毫不留情。我的朋友们都惊呆了，开始放声大笑，男人们变得恼火起来，不安地环顾四周，盯着红灯。他们开始冲我的尖叫回敬：“疯婆子！疯婆子！”但我不在乎。他们锃亮的野马车，他们头发上的污迹，他们愚蠢的逻辑；即使我们真的想去夜总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人都塞进那辆小车里。我不想和你做爱，我不想去夜总会，我不想让你走在我身边，问我要去哪里，我过得怎么样，声音环绕着我，把我的肩膀拉进耳朵里，让我想变成聋子，然后

消失。扎满钉子的轮胎爆了，叮叮作响，像雨点落在他们的车上。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很吓人，很疯狂。我不在乎全世界是否会被吵醒。灯变绿了。“追上他们。”我的朋友说，然后我们开始奔跑。

我们三个女孩在追赶一辆黑色轿车。她在下一个红绿灯赶上了他们，啪的一下拍了尾灯。“离我的车远点。你他妈敢弄坏我的车！”他们对我们很生气，这些女人变成威胁，越过了界限。我还在大喊大叫，肾上腺素飙升。“你们这些蠢猪。”但当我往车窗里看时，我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正怒视着我。

突然之间，我感觉不像是在玩游戏，我迅速进入了防守模式。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后退了一步，他们加速跑了。目击证人，如果他们回来，我们需要一个目击证人。我环视一圈。在我们后面大约3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似乎吃了一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我们也要攻击他似的。我暗自庆幸他在那里。我扶着额头，上气不接下气，我们的胸膛仍然起伏不已。

虽然我计划在这里待到8月，但那天晚上我决定离开。家不是可以选择的地方，除了真正的家，任何地方都是攻击的温床，不断恶化的记忆。我需要继续我的逃避路线。

卢卡斯实习结束的那天，他登上一架飞机，开着一辆租的车来接我。他帮我打点行装，轻轻卷起我的版画，我的整个人生，放进这辆蓝色的车里。我们开车去费城，在那里我可以和他在一起，直到听证会开始。他在车里等着，给我时间与这里道别。我站在那间黄色的房间里，我的避难所，我的卧室，记得所有那些令人窒息的炎热夜晚，那些凝结在墙壁上又会在每天清晨消融的恐怖。我留下了电扇，让它独自立在房间中央，希望它能给下一个租客带来清凉和宁静。

---

(1) Providence，罗得岛首府。

(2) *Purple Rain*，音乐人王子（Prince）的自传式剧情片，1984年上映，由艾伯特·马尼奥利（Albert Magnoli）执导。

(3) *Seinfeld*，1990年代美国颇受欢迎的情景喜剧，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制作播出。

(4) 美国一家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 (5) Venmo，一款小额移动支付应用。
- (6) Lyft，一款打车应用。
- (7) “喝倒彩”原文为catcall。
- (8) 原文为fan，同时有“风扇”和“粉丝”之意。
- (9) Isla Vista，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邻近社区，2014年发生枪击事件。
- (10) 美国大学内的女生社团组织。

## 5

听证会定在9月27日。我有三个星期。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我从来没有把整个故事大声说出来过。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越来越感到没有准备好，我的焦虑在体内膨胀。我站在悬崖边上，手里拿着纸巾和棍子，被告知要建造一个能让我和妹妹安全着陆的东西。

阿拉蕾要跟我通个电话着手准备。在费城的一个月里，卢卡斯问了我很多次：“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她吗？”“有啊。”我说。“你想把它们写下来吗？”“现在不行，”我说，“我不想谈这个，以后再说吧。”打电话那天，他递给我一张问题清单，他列出这些问题，并进行了概述和分类：听证及审讯、计时、与对方的沟通、最终结果的范围、和解、证人、支持香奈儿？我用铅笔潦草地写了几个字，歪歪斜斜地写在纸角上。我有很多问题，但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可以空腹服用赞安诺<sup>①</sup>吗？我的证词会被采用吗？他的精神状态稳定吗？我失心疯了吗？

电话定在下午5点。我让卢卡斯和我一起接听，多一双耳朵来吸收信息。5点钟，我的电话响了，却是蒂法妮：她正步行回家，希望有人陪着她。你能相信吗，她告诉我，她看了一部关于信天翁夫妇如何共同生活的纪录片。卢卡斯拍了拍我的胳膊，指着时钟，轻声说：“该打电话了。”

我摇摇头。

“挂电话，时间到了！”他又示意。

我看着他。“蒂菲，我再打给你好吗？谢谢。”

我站起来。“你说什么？”

“你该打电话了。”他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5点钟有电话吗？”

他一动不动。

“什么，你以为，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妈的时间？以为我看不见他妈的炉子上的时间？以为你能决定我什么时候能和我妹妹说话，什么时候不能？嘿，那天晚上谁在那儿？你吗？没有？谁？哦，她吗？对啊。你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吗？我会接她打来的他妈的每一个电话，**他妈的每一个电话**。你想帮我？你以为**坐**在这里就能**帮**到我吗？”

我的怒火一泻而出，恶毒而直接。我提高音量，仿佛别人的手在不停地转动旋钮。他往后退，呆呆地站在房间的另一边，盯着我，害怕我，我也害怕自己。我的话语像血一样自由流淌而出，没有东西来止住它：“你怎么可能知道经历这种事是什么感受，你他妈到底能做什么。”我把手机砰地摔在柜台上。我们俩都听到它碎了。

屏幕不是裂开，而是碎了，玻璃散落在凳子上、地板上。我觉得很丢脸，尖叫着要他滚出去。他递给我他的手机，我说：“滚出去。”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楼下。”他身后的门咔嗒一声关上了。我颤抖着跑去，从抽屉里抓出一只袜子，套在手上，用它把破碎的手机捡进一个密封袋里。我拿着他列的问题清单，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跪在垫子上蜷曲起来。那袋玻璃在发光，阿拉蕾打来了电话。我套着袜子的手指在玻璃碎片上滑来滑去，手机屏幕表面上几乎没有足够完好的地方来接起电话。**操操操**。“你好？是的！不错啊！你好吗？”

通话结束后，我躺了下来，手上依然套着袜子。我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稳定，愤怒，一碰到那个话题就会爆炸。不久我就要独自飞往加利福尼亚，而卢卡斯要继续他的学业。我想象着我们之间的鸿沟在扩大，我在逐渐瓦解，我们的关系在崩溃。如果我回来的时候更加脆弱、更具破坏性，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10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露营，营地在一座长满糖松的山上。我爸爸把他大学时代的羽绒睡袋给了我，但上面有一个小洞。当我醒来的时候，小小的白鹅羽毛散落在我的头发上，到处都是，就像下过雪一样。我没有请指导老师来修理，而是决定等安排我们去艺术教室的时候再去拿胶带。我拿了一长条，大约6英寸长，卷在指尖上。艺术课结束后是游泳课，所以我把它藏了起来，挂在长凳上，避免碰到背

包、双腿和水。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条胶带带上山。但那时它已经变得又湿又脏，并未像我希望的能粘上去。在遭遇性侵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带着一小块胶带，打算靠自己把一切都修补好。但这不够。你需要告诉别人，你需要封上这些洞，恢复你的温度，停止清理那些羽绒。第二天，我同意去看心理治疗师。

我爸爸就是心理治疗师，我却拖延了这么久，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我仍然完全否认这个案子在我生命的重要性。只有当它正盯着我的脸时，我才会屈服，决定去解决它。

从小到大，我对心理治疗的理解就是，在成人“带孩子上班的日子”里，我从来都不需要去。爸爸忙于帮助那些离婚、婚姻不和、酗酒的人。在我还小的时候，我认为爸爸是一个治疗头部损伤的医生；如果你撞了一下，他会给你一个创可贴，就这样。我还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所有答案的。他有秘密的指导手册吗？“我不告诉他们答案，我引导他们。”

以前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都会去爸爸的办公室。我会掸掉木制书架上的灰尘，给无花果树喷水，耙一耙石头花园里的沙子，把他的黄色便笺簿擦起来，给他的鱼喂食。我喜欢蓝绿色和粉红色的鹅卵石，银色条纹的米诺鱼<sup>(2)</sup>，橙子鼓胀的脸颊。然后我会收取报酬：当人们斜靠在软垫椅子上时，硬币会从他们的口袋里掉出来，然后我就把手伸进缝隙里，掏出硬币和口香糖。

我希望我是一条鱼，这样我就可以倾听这些把秘密托付给爸爸的陌生人。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安心地放松下来，尽情哭泣，说一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不会说的话，等时间到了，他们又会把自己捆绑起来，投入到喧嚣的世界中去。

但在我想象中，他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从来都不像我：他们是打领带的成年人，拿着大手提包的女人，总是吹毛求疵。我是那个喂鱼的人，不是坐在座位上的人。我打电话约了一位曾在“反强暴妇女组织”工作的治疗师。一幢高楼。我在一张签到纸上潦草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生怕被人发现。一张米色沙发。德布，一个有着棕色卷发和蓝眼

睛的女人。在她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簇开满花的小仙人掌，还有绘着树枝花纹的夹棉挂毯。如此安静自在。我在这里会恢复得很好。

我要带她去见埃米莉，带她回到在树下被发现的那个场景中。我第一次递给别人一个手电筒，说：“跟我来。”她跟在我后面，拨开树枝，而我把光照在她身上。治疗师看着我。我告诉她，我们有三周时间让埃米莉振作起来，让她做好准备。

讲述的过程很好，并且之后我感觉更轻松了，就像我把一些重量留在了大楼里，让自己更轻松地上街。我买了一个红色的小笔记本，写上：“当故事在我身外时感觉更好。”我记得去好市多超市的时候，爸爸会买一大堆纸巾和卫生纸，我和蒂法妮把它们堆在一起，在购物车里做成垫子当作我们的王位。也许他需要这么多纸巾，是因为人们一直在哭，把他们的五脏六腑都哭出来，就像我一样。

当治疗师问我是否察觉到这次性侵影响了我生活的其他部分时，我本能地摇了摇头。“重点是，它与我的生活完全分离，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她没有回答，我们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有时我想知道我的证词是否对辩方更有帮助，因为如果他问：“你没有受到影响？”我会想说：“没有。”我坐在自己的双手上。“也许，我察觉到了一些事情。愤怒，我察觉到。我猜我的举止变得更紧张。我几乎每天都穿这个。”我举起双臂，卢卡斯外套的黑色袖子长过我的手，就像空空的寿司卷。当我说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性侵已经从边缘转移到了正中心。

我把我听到的所有关于自己最糟糕的事情，从阅读评论中做出的判断和记忆，都和盘托出。“他们认为我，他们告诉我，我不应该，”等等。她说：“我能问一下你是否亲耳听别人说过这些吗？”我想了一会儿，抿着嘴，然后摇了摇头。“没有，一次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把网上陌生人的意见等同于真人的意见。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启示。我从来没有真正听人说过那些可怕的话：当这个消息被传递给一个人的时候，沉默就会包围他们，一种明显的悲伤，一滴眼泪，一个拥抱。我开始把真实的体验和网上的体验区分开来。我脑子里反复念诵着咒语，在洗碗时，在睡觉前。

我没做错什么。



我是坚强的。  
我有自己的声音。  
我说的是实话。

阿拉蕾来电。9月27日的听证会取消，延至10月5日。我可以不假思索或不看一眼我的日程表就说“没问题”，这种反应中有种令人悲伤的东西。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的日程表一直是空的，心理治疗每周只占用一小块时间。你想要我的哪一天就哪一天吧，我已经为你把它们都腾空了。“太好了，”她说，“你能让你妹妹知道日程有变动吗？”

我总是第一个知道最新消息的人，负责让蒂法妮知情的人。我坐在床上，手里拿着电话，知道在正常的生活中，日期的改变意味着剧变和崩溃。上次她已经重新安排了期末考试。现在她有六堂课，两份兼职。我害怕打这个电话。“对不起。”我说。

我遭遇了长时间的沉默。“但我已经重新安排了一切，”她说，“我总不能老是去解释。”我能听到她声音里的紧张，压力在蔓延，变成了“我不能，我不能”，可以听到这一切在她脑海里堆积起来，“但是我已经”。

“他们会理解的，”我说，“我会去和他们谈。我来帮你安排日程。你可以辞掉一份兼职，我帮你完成阅读作业。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搞定。”但她说不不，她自己能想办法。我听见她在退缩，渐渐安静下来。“我很好，”她说，“我不想再说了。我得走了。”

“我会补偿你的。”她挂电话时我说。

我知道她已经有好几次走出教室，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因为情绪太不稳定而无法回到教室。我知道她已经放弃了和朋友去警察局队列辨认嫌疑人的计划，放弃了音乐会的门票，错过了朋友的生日和补考。对我伤害最大的就是知道这一切。我的事显得比她的事更重要，我的生活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阴影。法院体系的冷漠把我们的生活搅乱了。

1分钟后，妹妹拨回电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生你的气，只是这种情况让人生气。我不是故意对你大吼大叫的。我会想办

法的，好吗？”我眨了眨眼，眼睛又湿润又紧绷。我点点头，明白了。我知道那种无处发泄的挫败感是什么感觉，它感染了我们的生活，导致我们互相攻击并且同时败落。

我已经为10月5日做好了准备。在乘飞机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小行李箱塞得满满的，拉好拉链，放在门口。我的红色笔记本里满是镇定技巧和鼓励的话：“你比任何伤害过你的人都更强大。敏感地感受和做出反应并不可悲。你比你所知道的更为强大，即使你现在还未感觉到。”我为坐飞机准备了柔软的裤子和干净的袜子。我穿着法兰绒睡衣，拿着剪刀站在厨房里，修剪着一株盆栽，这是我为了给卢卡斯公寓增添生气而买的。我的电话在晚上11点响了起来。

“很抱歉，听证会推迟了，”我的检察官说，“明天别上飞机了。”我拿着电话，一言不发，盯着门边的行李箱，它塞满了，密封着。我试着想象自己把它推回卧室，拉开拉链时里面的东西溢出来。花点时间把每件衣服都塞回抽屉里，把盥洗用品放回水池边，蜷缩进床上。醒来时又是一个空虚的日子，等着被告知再次收拾东西。为出庭做准备是我生活的唯一目的，所有这些动力现在都停止了。她还说，既然他们为我的第一次飞行买了单，到时候我就得自己买票了。我买不起。

“我要回家。”我说。我告诉她，我会一直待在帕罗阿尔托，直到一切开始，不管是什么时候。“好吧，”她说，“我会告诉你最新消息的。记得通知你妹妹它现在推迟了。”那天晚上，我没有给蒂法妮打电话。我会等上几天，听听最终的结果，然后再让她重新安排她的生活。我受够了把她玩得团团转。

我父母的家是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避难所，用旧木头建的平层小屋，两个砖砌的烟囱，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漆成橙红色，还有一条开裂的水泥车道。屋前是火山岩、小香蕉树、大棕榈叶和爸爸种的薰衣草灌木丛。门上钉了一排小钉子，全年都挂着圣诞彩灯。但当我下车的时候，我讨厌周围的环境，讨厌阳光，讨厌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流逝、绿叶似乎从未改变的感觉。我讨厌棕榈树，太他妈勇敢了。我想念费城杂乱的街道，想念生活的重叠，想念拥挤的电梯，想念撞到我

腿上的购物袋，想念公交车的尾气，想念银色清真餐车上的薄盒子，里面装着抹白色奶油的烤鸡。而我的街道空无一人，公园空无一人，房子空无一人。我讨厌这样。

我去看望外公，他住在父母家附近。他不知道这次性侵，妈妈说如果他知道了会很伤心。我4岁时，他来到美国，帮忙带大我和蒂菲。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我的房间里，用双手捏我的枕头。“不好。”他说。接下来我看见，在罗斯商场，他把所有的枕头都捏了一遍，找出一个更结实的枕头来支撑我的脖子。当他说“香奈儿”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中文的“小鸟”。他像养小鸟一样亲手喂养我和妹妹长大，每次我到帕罗阿尔托，我吃的第一顿饭都是在他那里。

我坐在他的矮桌旁，桌上铺着中文报纸和银行里的免费日历，用来做餐垫。我吃了几碗饭，帮他翻译邮件。电话响起。听证会又可以举行了。阿拉蕾说如果我有空，可以过来看看地方。我把空碗扔进水池，拥抱了他，飞快地跑向我的车。

法庭很小，比我预想的要小得多，黑暗、拥挤、发霉。自然光从高高的天花板上透过铸模的小方格射进来。屋角里有一面枯萎的旗子，它从来没有飘扬过，只是挂在那里，形成了永久的褶皱。一切都停滞而沉闷，就像空气已经在那儿储存了很多年。我会从后面的门进去，像新娘一样走过过道。我不喜欢这个脆弱的过程，当我走近证人席时，每个人都盯着我的后背。我更愿意像时钟那样“嘀嗒”一下不经意地在他们面前出现。法官会坐在我的左上方，仿佛我们待在同样的鸟巢里，而他是一只更大的鸟。我的检察官会站在我前面的台上。我会直视着她。

“你会坐在这里，感受一下。布罗克会坐在那里。”她指着我旁边的一张空椅子。我点了点头，但似乎无法想象，很快那些座位就会坐满了人。她向我强调了一些事项：我先要宣誓。一定要说得清楚大声。我不能点头表示同意，必须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人反对，我必须停下来，等待法官允许我再次发言。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哭是可以的，但要避免过于情绪化。我的辩护律师会坐在证人席旁边的椅子上，但在做证期间，她不允许和我说话。我会被要求指认布罗克。

他们会在法庭上使用我的名字，称我为香奈儿·多伊。不要把辩方律师的争执当成针对你个人的评论。他的问题将帮助她了解他的观点并为庭审做准备。你必须永远说实话。

我全都听到了，但还是盯着布罗克和他的律师将要坐的椅子。我感到喉咙有点痛，好像只要我眨眼的次数足够多，他们就会出现似的。她说即使他的辩护律师在和我说话，我也不用看着他。我可以看着观众，和朋友对视。但我知道没有朋友会来。

克莱尔在法国。蒂法妮不能作为证人进入法庭。妈妈本打算要来法院的，但我不想让她看到这一幕，因为我知道自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保护她这件事上。我害怕自己因为不想伤害她而有所保留，无法公开全部真相。我会一个人来做这些事。

阿拉蕾递给我一个厚厚的马尼拉文件夹，里面装满了我在医院和警察局的询问笔录。“你不用像准备考试那样研究这些，”她说，“这只是为了帮你梳理记忆。”法庭记录员走进来做自我介绍。她留着短发，戴着一副锐利的眼镜，走起路来轻松自如，就像她掌管着这地方一样。她会坐在法官旁边的桌子旁。“别怕。”她微笑着说，把眼镜往下一拨，好让我看清她的眼睛。“如果你紧张，就看着我。”她眨了眨眼。

这种场景有些令我感觉熟悉。18岁时，我上了富贝克教授的一门口语表演<sup>③</sup>课程。每次演出之前，我们都会去场地，检查灯光、舞台，测试麦克风。我日常生活里很害羞，但一上舞台就不同了。当我踏上舞台，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大一的时候，一个同学告诉我，她一觉醒来，发现有个男人在和她做爱，她晕晕乎乎地失去了童贞。她说这就是她几周没去上课的原因，但没关系，她耸耸肩。一周之内，我写了一篇朗诵文章叫作《好人》：“我厌倦了做个好人，做个好人，在这种人生中，一晚上不戴牙套就是叛逆。我想唤起感情，创造敌人，表现得有点败坏，我想骂些婊子，我想搞砸些事情。”在这时候，如果作品非常精彩，人们会笑着鼓掌，当作品针砭时弊时，人们会觉得好笑，直到我丢出这一句：“致那个把他的老二插进我昏迷的朋友的家伙。”突如其来的沉默。

“你是否因为你的老二比尺子还短而感到难为情，所以你把她灌醉，然后去统治她？因为你那肉棒不觉得你的手有多好看，你的王记香肠需要一个真正的伙伴，所以你把她单独留下，把剑插进石头里，你侵犯了她，侮辱了她，你比儿童泳池还浅薄，我可怜你缺乏尊严，可怜你——”我一边和观众对视，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

“你骂我下流的时候，我要让你为你的蛋蛋失声大哭，我也会用这种方式打败你那胎儿般大小的阴茎，把它做掉……我会一枪爆了它。”人们爆发了，叫喊着，跺着脚。当我凭《好人》参加大奖赛时，裁判给出了满分十分。我的父母很吃惊，但还是支持我。每次我都希望那个人他在看。

写作和表演这篇作品是容易的，因为那时我和我爱的第一个男孩在一起，我因为感觉安全而变得强大，而且性是美好的，那篇文章是写给她的，不是给我的，我可以使用花哨的文字游戏，语速飞快，通过口头上消灭一个混蛋来博得满堂喝彩。而现在我成了在昏迷状态下被侵犯的那个人，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在空荡荡的法庭里，我坐在麦克风前，只是点了点头，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大胆地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蒂法妮在听证会前一天晚上开车回家，她在帕罗阿尔托待了不到24小时就得赶回去上课。她从没见过法院，也没见过阿拉蕾。奇怪的是，我们经历了同样艰难的过程，但没有人照顾她或帮助她准备。我认为做证对她来说会更难，因为她记得，她必须描述他盯着她时干了什么。而且她还有作业要做，第二天早上还得上课，装作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天。

“我们应该穿什么？”她说。我们在谷歌上搜索到的“女性法庭着装”图片显示，高个女性把手放在腰上，长发扎成柔软的一束，铅笔裙，楼梯扶手般细长的腿穿着尖头高跟鞋。真见鬼，我们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呢。外面很黑，我们在科尔士百货公司闪闪发光的白色地板上漫步。我给辩护律师发短信请她指导。“比较舒服的、庄重大方的。”明白了。妹妹从更衣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大衬衫，上面有个没穿裤子的小黄人。“如果我穿这个，他们会怎么做？”我说：“蒂法妮，这

是严肃的事儿。”我穿着镶钻的紧身裤和一件写着“上帝保佑”的衬衫，戴着遮阳帽走了出来。

当提醒关店的通知在我们头顶嗡嗡作响时，我们放弃了游戏，终于屈服于商务休闲装，我们的胳膊被土色的毛衣压得越来越重。她穿着一件前短后长的褐红色圆领毛衣走了出来。“你这是要做证还是在你孩子的意大利面晚餐募捐活动上发表演讲？”那些带花的纽扣把我们变成了邋遢的秘书。“该死的，贾尼丝，你记得把我的W-9表格<sup>(4)</sup>传真出去了吗？”最后我找到了一件旧牛奶色的毛衣，柔软而安静。埃米莉的新制服。我看起来像是会借给你铅笔的人。妹妹点头表示同意。

天已经黑了，是时候研究一下这些文字记录了。我们坐在餐桌的两端，手边一沓沓纸。我听到爸爸对妈妈说：“你不高兴女儿们在这里吗？”我真的很感激这些临时的家庭团聚。不过，我们聚在一起的原因还是隐隐压迫着每一个人。我们在沉重的寂静中阅读，只有偶尔翻页的刮擦声打破这种寂静。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是，我和蒂法妮不能讨论这个案子。如果我们描述的事实过于严丝合缝，我们就会被指控合谋。但她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礼物，使我能够开始回想那个夜晚。

当我仔细阅读这些纸页，我的感觉开始苏醒。阅读每一行字，就像是待在一个慢慢注满水的房间里。它越来越满，直到只剩一点呼吸的空间，在水和天花板之间留出一丝空气。就在我以为要沉下去的时候，注水停住了。我知道我不会被再次淹死。这是过去的事了，性侵卡在这些文件里。水开始流出去。

我保持专注，打印好笔记，整理好所有的事实。我把所有的细节都牢记在心里，直到我能在15分钟的时间内把那一晚的事背得滚瓜烂熟，从我决定去参加派对的那一刻，一直到我出院的时候。“我很紧张。”妹妹说。“没关系。”我说。

“如果你感到紧张，看看法庭记录员。她向我眨眼。他们不希望你记住所有的事情，已经十个月了！很简单，我们只是说实话。每个人都会说，哇，她是个天使，只有那个家伙会让我他妈的紧张兮兮。另外，我们在科尔士百货公司花了70美元，所以我们得让它值这个价。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这是真的，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现在笑了。我让她看她的笔记，然后走回我的房间。我的眼睛开始流泪。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她：“我也紧张。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塑料安检框是我进入那个陌生世界的入口。保安们把妈妈、蒂法妮和我带进狭小的受害者休息室，里面摆着一张脏脏的黄色沙发，看上去像是用耳垢雕刻出来的。金属腿的桌子上堆满了过期杂志。一个污迹斑斑的袋子装着马克笔，盖子没了，笔头干了。积满灰尘的制止家庭暴力宣传册。一张红色叠层海报，上面用醒目的黄色粗字体写着：**在青少年刑事司法程序中，受害者有权得到公平对待，隐私和尊严受到尊重，免遭恐吓、骚扰和虐待。**后面的纸上有孩子们的图画。有一幅画着一颗心，里面用狭窄的字体写着：“因为我害怕。”妈妈对这个肮脏的地方感到不安，想让它变得好点儿，于是她离开了，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给我们买了热牛奶、饼干和蜜瓜切块。

朱莉娅的母亲安妮正在赶来的路上，她主动提出要来出庭，是我唯一的支持者。朱莉娅那个学期在国外。后来我知道，当她回到校园后，她患上了恐慌症，每次晚上路过兄弟会时都会发作。这种情况将持续两年。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的辩护律师布里来了。我看到她剪了头发。谈论她的发型感觉很好，就好像我们是正常情况下的朋友，她不是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了让我不再孤单而分配给我的。她看到我坐立不安，就让我把脚底贴在地板上，这是一种镇定技巧。她把手伸进手提包，掏出一个玩具：一只长长的亮蓝色腊肠狗，它的毛像橡皮做的意大利面。“你在庭上的时候，如果有东西可以捏一捏，可能会有帮助。”她说。我把它展开，摇来摇去。妹妹拿到了一个黏糊糊的头骨。

他们准备好以后，阿拉蕾就会来接我。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牛奶凉了。听到敲门声，妹妹捏了捏我的手。我跟着布里和阿拉蕾穿过走廊。我应该举起右手还是左手宣誓？如果我都忘记了怎么办？我的拉链拉上了吗？我看起来还好吗？我开始踱步，吸气和呼气时发出声音。我对自己发出的声音很敏感，为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慌而尴尬，但我想她宁愿让我喘粗气，也不愿让我晕倒。“先看看。”她说。透过门



上一扇薄薄的长方形窗户，我扫视了一下房间，一小群观众，他的后脑勺。我僵住了，目光锁定在他裸露的脖子上。我想要停在我保持隐藏状态的最后一刻。但阿拉蕾拉开了门，无路可选，只能走进去。

“现在检方宣第一个证人，香奈儿·多伊。”我走进去，大家都转过头来，我不知道该把目光投向哪里。我把蓝色腊肠狗换到了左手，这样我就可以举起右手宣誓了。我说：“我愿意。”这句话我原以为会在自己婚礼上说，而不是在审理强奸案的法庭上说。我感到那双眼睛在看我。我想，他们是否对我是亚裔感到惊讶，我看起来像个女人还是更像个女孩，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平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漂亮，为什么他没有选一个更漂亮的人呢，停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安静。当我走向证人席时，我想不停地走，但当我碰到椅背，我坐了下来，脸朝前，我就在这里。

有人告诉我不要拘束，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试着把椅子抬起来，让它向前挪一点，所有人都看着我迟疑地向前挪了一两英寸。阿拉蕾提醒我说话要清楚大声。我用颤抖的双手把麦克风的细杆掰向自己。我听到有人清了清嗓子。布里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坚定地面对着观众。观众寥寥无几，但零星的人已经足以让我焦虑，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注意到金警探站在阿拉蕾旁边，一张熟悉的面孔，让我松了一口气。

在我左边的外围，布罗克只是一团面目模糊的存在。我看着阿拉蕾的脸，让她周围的一切都融化掉。她站在台后对我微笑，就像母亲们对她们蹒跚学步的孩子露出鼓励的微笑，示意他们迈出第一步，而我也尽量报以微笑。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名字，请拼出来。”

“香奈儿，”我回答，“C—H—A—N—E—L。”我说。感觉就像一下子剪掉了一大片头发。损失迅速，不可逆转。我的名字不再是我的了，我现在必须相信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时间停留，我们继续讨论我的年龄、教育背景和居住区域。我谈到了日落时的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蒂法妮和朱莉娅，墨西哥餐馆，我的墨西哥鸡肉卷，因为太辣而喝水，回家，爸爸做的晚餐。“除了炒菜、西兰

花和玉米卷饼之外，你那天还吃了什么吗？”“没有了。”我回答，然后停了下来，“嗯，那一天，那一天我不记得了。”十个月前的那一天，我一定吃过午饭，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她问我为什么要去斯坦福，我说我要去兄弟会派对，和朱莉娅碰头。“显然，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但如果她们提议去市中心买冻酸奶，我也会去的——如果斯坦福大学国际俱乐部举办一个不同的派对，我也会去的。我没有动机非去参加兄弟会的派对不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左边响起：“法官大人，我请求删除后半部分，大约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回答。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已经得到了回答。”

我望过去。辩护律师正板着脸坐在那里，头发是白的，衣服是黑的，弓身记着笔记，说话的样子好像我不在场。法官说：“好吧。我会删去回答中的最后两句话，它们与问题无关。”我看着我的话像鸟儿从空中飞过。我此前没有意识到，他有能力不动一根手指就抹掉我的证词。最让人不安的是，他反对一句关于冻酸奶的话。当我们到了实质性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呢？

阿拉蕾继续问我去兄弟会的决定，他一次又一次地打断我的话。好吧。备受打击。我是一只脖子上戴着电项圈的狗，遥控器在辩方手里。每次我一说话，我就感到震惊，不知所措。我开始小心翼翼地避免越界，希望避免被打断。他正在引导我对自由说话心生畏惧。

阿拉蕾把问题分解了，这样我可以充实我的答案。“你想去兄弟会派对吗？”“不想。”我说，紧张得说不下去了。“为什么不呢？”一个详细说明的机会。“我为什么要去兄弟会派对？”我的恼怒使我吃惊，“我没有参加兄弟会派对的必要，也不着急要跟谁见面。”让一个问题通过是多么困难。最后，我们进入了一种美妙的节奏，来回敲击词语。很快，夜晚的每一寸土地都活了过来。当我开始看到厨房破旧的油毡地板、黑边的座钟、蓝黄相间的细条纹墙纸，法庭消失了。当被问及喝了什么，我能看到玻璃瓶里的赤褐色液体，还有放在木质台面上的马克杯。当被问及是哪种威士忌，我眯起眼睛，仿佛能唤醒记忆，读出酒瓶上的商标。下楼梯，成堆的红色杯子，大木桌子，溢出的果汁，人头攒动的地下室，身体涌出滑动玻璃门，蹲在树下，尽量不洒在我

的鞋子上，回到水泥露台的柔和喧嚣，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

所有这些问题都问得如此严肃，让我感到震惊，仿佛回忆每一个琐碎的细节，把晕乎乎的随意饮酒划分为消费时间表，把每次小酌精确标记到分钟，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时间被分割到每一分钟，长度具体到码，液体具体到盎司。开车去那里花了多长时间（7分钟），我们什么时候到的（11点15分），我和谁在一起，我们在哪里下车，不算我们一共有多少人（60人，20分钟后有100人），我去洗手间走了多远（15码）。我的自信几乎让人觉得可笑，怎么会有人这么肯定呢？我被她断断续续的提问节奏和脑海中嗡嗡作响的沉思弄得筋疲力尽，以至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正慢慢接近我最后的记忆。我看见我自己，手里拿着啤酒，微笑着，肩膀轻轻摇晃。蒂法妮在那里，她的一两个朋友在附近晃荡。我一直看着她们，想着我是多么想念大学，但实际上我也没有真的太想，即使我能重返校园，那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我现在看见蒂法妮了，她在夜晚甜蜜的野性中高兴地跑来跑去，这样一个夜晚，我也身在其中。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脑子里的小电影停了下来，音乐渐渐远去，门廊灯光下的人群也消失了。黑色，只有黑色。我看着她；一阵沉默的恐慌，一个闪烁，我无言以对。她抓起我的肚子，让我在水里划来划去，然后她松手了，看着我滑入水里。“我在医院里醒过来。”话刚说完，我的头就低了下去，思绪也一片零乱。她问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回答。在笔录中，法庭记录员只打了“（摇了摇头）”。

我听到一个声音，一声长长的哀号，一声高高的细语，升起又落下。声音越来越大，我阻止不了。我想有人能扶着我的肩膀，但我意识到没有人会过来。当我哭到悄无声息，一屋子陌生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把所爱的人关在门外，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双手捂着脸，遮住双眼。如果我看不到任何人，他们也就看不见我。

法官：“你想休息一下吗？”

检察官：“是的。”

法官：“我们休息一下。我会离开审判台。谢谢你！”

检察官：“哦，这里有个杯子。”

我听到每个人都从寂静中挣扎出来，好像在说：“结束吧，我们失去她了。”我想象着所有注视着我的目光都像线一样断了。我听到法官走下审判台。我能听到检察官的高跟鞋向我这边走来的咔嗒声，她把水倒进证人席上的一个泡沫塑料杯里。我继续捂着脸，把脸埋进那只蓝色腊肠狗。布里让我站起来，带我走出法庭的大门，穿过走廊来到洗手间。

门关上了。终于安静了。“这太难了。”我说。我的声音很小，很模糊。我没有想到事情是这样的。在那间屋子里的每个人面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喝得东倒西歪，现在对着麦克风发出湿乎乎的喘息声。

阿拉蕾触碰到了一些柔软的中心，它们轻轻跳动而又若隐若现，那是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晨之间失去的记忆的一部分。她必须绕着那个中心走一圈，确定应该在什么时候、怎么进去，否则如果她就突然进去，她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我，我敢肯定。我想象着她会变得沮丧，“我们手上这人太弱了。”我的信心正在衰退。

“你做得很好。”布里说。我看着她。她微笑着，不带怜悯，而是一种近乎钦佩的神情。她手里拿着一卷纸巾，似乎满怀希望，为今天上午感到兴奋。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我只感到疲乏，脸颊沾上了炭灰色的化妆品痕迹。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很好”看起来的样子。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布里扶着，跟着她穿过法庭的大门。当她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时，我觉得我们俩像是从一个秘密俱乐部回来了。我很好。这个事实变得和她的存在一样确凿。

当我们重新开始的时候，阿拉蕾又回到我最后一次站在户外露台时的记忆，然后再次触碰到那个柔软的中心。“你能描述一下你刚醒来时的感觉吗？”她凝视着我。我无法描述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有多少幸存者能做到。我想说，我至今还在醒来的过程中。但我明白，在我开

始回答之前，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我们会暂停，再返回，不管中间需要多久。所以我决定试一试。

我哭着说起血迹和消失的内裤，面容扭曲，胸口起伏。我的话语中夹杂着呼吸声，我觉得自己很丑陋，把自己弄得一团糟，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我听到了快速的咋嗒声，法庭记录员的手握着我，键盘的轻微敲击声，向前跑，我们正在移动。“你需要休息一下吗？深呼吸。好吧。你能描述一下，你的头发上只有一根松针吗？你头发里有多少根松针？”不断逼近，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感觉。“护士检查过你的生殖器吗？这是一项侵入性很强的检查吗？”

听到这话，我停下来坐了一会儿，擦了擦脸。如果我说得太多，会让每个人都不舒服。但她在问我。我何必因我身体所遭受的行为而背负羞辱呢？“我的身体里放了喙形的塑料检测器，”我说，“我的肛门里塞了棉签。他们把我的阴道涂成蓝色，我想是为了寻找擦伤。他们把我的腿撑开。给我拍照。他们拍了我的裸体。所以，是的。”

我感觉轻松了点。我毫无歉意地说出了我的真相，有那么一会儿，我掌握了主动权，让男人们坐立不安，垂下了眼睛。我想再次对着麦克风说“肛门”。我想摆出随意的姿势，我的头发从发夹里散开，我疲惫不堪。我们一定快结束了。

“香奈儿，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展示，告诉我你是否认识展示中拍摄的物品。”照片？在我的意识里，性侵从来都是一个由对话叙述出来的场景。她翻看着桌上的几张大照片，我瞥见那些折叠起来的照片是我赤裸的手腕和脚踝。她拿着一张很大的照片走近我的证人席，一个方形的实景图滑到我案上，我本能地往后靠了靠。

整个方形图片是明亮的赤褐色，上面布满交叉的阴影。我仔细看了一眼，意识到那是成千上万的松针。其中有一小块白色的布料和一个蓝色的手机壳。我留在现场的两件小东西。这就是我被发现的地方。

在那之前，我一直试图活在当下，但又超然物外，坐在我左边的那个金发男人只是个陌生人。在医院的那个令人困惑的早晨，从我头发里拔松针的麻烦事，是我拥有的唯一现实。但现在，场景开始连接

起来，这种明亮的赤褐色渐渐填充起我脑海中的黑色碎片。陌生人看到照片会看到白色的布料；我看到了我的内裤，如果你仔细看，还可以看到褪色的黑色圆点花纹，腰带上松脱的线。受害者是你。这就意味着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那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用手摸着我不露的臀部，而我被压在他的身体下面，我的头发拖地，他的手掌贴着我裸露的乳头，他的嘴张开贴着我的脖子。他打开我的腿，手指在我的身体里蠕动。这一切现实太过巨大，扩张得太快，恐慌倏地腾起。我盯着照片，现在才完全意识到他的存在。

阿拉蕾把照片拿开，换上另一张，这张是我手机的放大截图，显示了妹妹打来的九个未接电话。接下来是卢卡斯的短信截图：“让蒂法妮来照顾你，拜托，我很担心你。”他们恐慌的证据。我把胳膊贴在身体两侧，脸很干，下巴在颤抖。“香奈儿。”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你当时有没有兴趣和法庭上的某个人勾搭上？”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看着他的头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他是真实的，真的是他。我想确定他在听。抬起你的头。

“没有。”

从这个词周围散开一片寂静。我的头脑变得清晰起来，所有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你能在法庭上认出任何你可能勾搭上的人吗？”他拒绝看我，我便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能。”

我舌头上的这个单音节就像某种营养，尝起来有一种新鲜的味道。我想让这个字像种子一样滑进他的耳朵里，在他的肠子里安顿下来，扩张，挤压他的肺、他的心，让他从里到外透不过气来，直到他被征服，从他的纽扣衬衫里跳出来。

我的检察官笑了，点了点头，把她的文件放在台子上。“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她说。我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疲劳似乎战胜了我内心的恐惧。我一直对辩方心怀畏惧，人们告诉我他有名望，很杰出，是最好的律师之一，但当我等着他把所有的文件整理好时，我的心变软了，我意识到他的年纪已经很大，可能是某个人的爷爷，我想象着他

打棒球时低手投球的样子。只有当我看他站起来时，我才感到有点刺痛。他的脸自然地皱起了眉头，我想起来，他来这里是为了肢解我。

“早上好，香奈儿。”他笑了，但我相信一个微笑出现的时间必须超过一个节拍才是真正的微笑，而他的笑消失得太快了。但我依然报以热情的微笑，教他该如何保持微笑。“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主要是基于已经问过你的问题。只是为了澄清。”他说。他的神情很轻松，好像这只是一次友好的谈话，我们正在一起散步。这使我感到烦恼，一种假装的礼貌，一种毫无根底的热诚。

他的盘问又从墨西哥快餐店开始。回想起来，如果我知道现在会有那么多关于快餐店的问题，那天我就根本不会去了。“你回家前在一家快餐店吃了晚饭？你就是在那儿吃的墨西哥卷饼？你什么都没有喝，没喝水，没喝可乐，什么都没有？”他从笔记上抬起头，斜视着我，然后点了点头，又回到笔记上，好像在确认什么。他的做法出人意料：他停顿了很长时间，在他的拍纸簿上慢慢地来回翻动着，写着，让我们等待着。我本以为他会对我进行连珠炮式的盘问，但他似乎在仔细考虑，对我说的每一个字进行评估。长时间的沉默使我感到不安。我继续盯着他。

他的问题和检察官的一样，重复着我们已经问答过的一切，听起来就是：“炒菜，你做证说，威士忌，自助餐，西兰花？是谁准备的？和谁一起喝的？你在那儿，喝了四杯，半小时？正确吗？酒？整个过程？和你妹妹一起，相信你，喝了几杯，香槟，我相信，所以多少，她也，喝了，大概？派对？之前？你说？她不是？你们两个都？多少？在什么期间？抱歉？斯坦福大学？同时？大约？或是跟她？跟谁？你什么时候？你看到了？”不是猛击，而是戳洞。我确保每次他抬起头来时我的眼睛都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我会陪着他走完这一路的每一步，虽然他让这一切变得越来越难。与阿拉蕾的问题不同，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非线性，让我很难在脑海中保持一种视觉连续的叙述。“当你喝完你在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间所述倒进红色杯子的酒，这是在你出去小便之前还是之后？你提到过那天你去斯坦福，又去卡巴奥发兄弟会，你穿了一件米色的开襟羊毛衫，对吧？那是件毛衣？”他是在问我羊毛衫是不是毛衣吗？他以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一些琐碎的问



题，认为这些问题多少有些分量，这让我感到不安。他问我在派对上有没有唱歌，问我一杯有多少盎司。“在你的证词中，我记得你曾把自己的行为描述为‘站在一把摆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独自跳舞’？”听到这个问题，我笑了，想象着家具堆在一起，我的头擦着天花板。“在一把摆在桌子上的椅子上？”我说。“是的，”他说，“我说错了吗？”他看着我，面无表情。“在椅子上，”我说，“摆在地上。”我等了一会儿让他写下来。“其他人都在桌子上。”

“好。”他说，“所以你只是在椅子上跳舞？当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你身上有任何受伤的地方，是吗？”我几乎要说是的，迅速表示同意，直到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为什么他要这样问我，就像我说过这话一样？他从桌椅的位置无缝过渡到身体伤害，语调和步态一致。我突然怀疑他是否在开我的玩笑，因为他那些简单的问题让我太放松了。作为回应，我开始谈论干掉的血迹，但他很快摒除了这点，把它归咎于注射静脉点滴的针头。“那么除了那个，你没有注意到你身体上有任何伤痕对吗？”他的问题是伪装的陈述：“你没注意到，你没注意到。”他在逼我做什么事。“除了我脖子上有一道划痕。”我说。他反驳道：“那是你唯一注意到的伤，对吗？”“是的。”我说。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我觉得他在给我喂答案，以一种引导我同意的方式来组织它，让事情顺利进行下去。

这时，一段记忆浮现出来，我站在家里浴室的镜子前，转过身，拉下运动裤，露出我屁股上的红块。我赶紧把裤子拉起来，洗了洗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蹭过似的。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想过这件事了，现在它自动出现在我面前，把记忆从锚中释放了出来。但我该怎么解释呢？被压抑的记忆浮出水面？我已经说了“是的”：做证说没有受伤，永远记录在册，而我已经被开啤酒罐的问题绕晕了，如果那个人用钥匙扎罐子，那真的是个钥匙吗？就像钥匙链上的钥匙那样？

结局很突然。他坐了下来。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吗？我看着阿拉蕾，好像在说，你确定吗？如果我现在走出去，没有人会阻止我吗？当她点头，我就离开了。当我回到受害者休息室，我注意到两件事。首先，我的腊肠狗被紧紧地打成了个结。我吓了一跳，我差点杀了我的小狗。我小心翼翼地解开了它。然后我看到我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之

间的皮肤上有很深的红色月牙印，一直延伸到手腕。当我上半身一动不动的时候，我的指甲已经掐进了皮肤，掐进了手掌和前臂的肉里，以释放紧张的情绪。这种在法庭上养成的习惯此后从未消失：现在，当我在努力思考或处于紧张状态时，我的手会不由自主地紧握起来开始掐捏。晚上，当手和前臂发疼，我幻想着把它们剥开，把埋在那里的又热又厚的疼痛挖出来，直到我的胳膊和手指软弱无力，空无一物。

我完成了出庭，但妹妹还没有。她的朋友伊丽莎白来看她。蒂法妮打算一直和她保持眼神交流，甚至在阿拉蕾提问的时候也这样。她不觉得有必要以自我救赎和矫正的方式死死地盯着辩方，她只是想熬过去。我喜欢她这一点，她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用积极的力量包围自己。想象着不管是谁在说话，她俩都紧紧凝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感觉很亲切。

当她们俩回来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们的眼睛，目光呆滞，毫无反应。这告诉了我一切。我想起我们去接朱莉娅的那天晚上，而现在看到蒂法妮拿着笔记站在那里，茫然而沮丧。她开车回学校的时间到了。我跟她说：“我和你一起去。”我害怕如果我们分开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不能好好地痊愈一样。我本来没打算去南加州，也没办法回来。我只知道我得坐到副驾驶座位上陪着她。我告诉妈妈，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去看她和爸爸。

蒂法妮和我很少有不笑的时候。我和初恋男友吵架时，蒂法妮会在她的房间里大声播放肥皂剧的原声带，这样每当我们吵架停下来盯着对方的时候，就有戏剧性的钢琴片段当背景音乐。但那时坐在车里，我们两个都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消除沮丧的情绪。

那天晚上，我躺在妹妹铺在地板上的无框床垫上，身后是洗衣机的轰鸣声，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很高兴终于有了片刻安宁。我拿出自己的红色小笔记本，用手机照亮页面，写下：“我感觉我已经赢了。”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肯定；我完成了出庭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那些看着我在证人席上哭泣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很脆弱，但我相信这是我开始显露力量的静默的起点。我做了一件我从未想过自己

能做的事，莫名其妙地被扔到了另一边，虽然离终点线尚远，但我还活着。我俩肩并着肩，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看到新闻标题：《**斯坦福大学性侵案当事女性出庭作证**》。我急切地点击链接。埃米莉被描述为做了“情绪化的证词”。据报道，埃米莉在医院醒来之前，她和妹妹“喝过三个男人给她们的啤酒”。“阿拉蕾逼问埃米莉，问她是否还记得这两个事件之间发生的事情。埃米莉回答‘不记得’，然后哭了起来。”“哭”这个字眼从未如此渺小，跟一滴水似的。感觉一切都扁平化、简单化了。

在一篇文章中，他们提到了我的大学、我在费城的男朋友，蒂法妮的名字被提及八次。他们和她曾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曾和我坐在一起，然后竟能如此随意地把我们曝光出来，我无法理解。

“埃米莉把自己的醉酒程度描述为‘醉得我都不知道自己喝醉了’。”看着记录，我可以数出所有的问题：我的检察官问了220个问题。辩护人问了102个问题。那天早上我坐着回答了322个问题，而这就是他们选择的引人注目的摘引。我往下翻到评论区：“我有年幼的女儿，我希望她们在大学和毕业后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潮水不会改变方向。没有理由庆祝。我感到自己因为出庭而受了惩罚。不断接受评判令人筋疲力尽，我一直担心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我的骄傲很快就消失了，让位于那些批评和嘲笑我的声音。现在我知道我能做到。我也知道那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目标是疗愈，是继续生活，这不是前进的方式。疗愈需要隐私，需要耐心，需要呵护。疗愈需要在柔软而黑暗的地下播种。记者们像铁锹一样挖开泥土，挖出种子，剥了皮扔回地面。我只能跪在泥地上挖洞，把破碎的壳往下深埋，用手拍平泥土。但总是会有更多的铁锹，更多的干扰，隐约迫近的开庭日期。事情发生得越多，我继续挖掘的力量就越少；相信总有些什么东西会生长出来的信念愈发麻木。

那个星期，我不再说话，也停止在我的红色小笔记本上写东西。我每天睡好几个小时。叠好一堆蒂法妮的衣服，戴上她的项链，扔掉干的旧睫毛膏，压平皱巴巴的纸。我不会让这个案子毁掉我们俩。我

打算回费城，不再变成埃米莉，总穿着单调的衣服，总是哭个不停，而且回归自我。

晚上，我独自一人，我感到胸口有压了二十个沙袋那般沉重，就打开警察的报告读起来：

“**琼森**追上**特纳**，一个扫堂腿把他绊倒。**特纳**倒在地上，想站起来。**琼森**说，他看起来像是想再次站起来逃跑，所以他把他按倒在地。**琼森**跨坐在**特纳**身上，按住他双手，而**阿恩特**按住他双腿……他告诉**特纳**，他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起来，他想确保**受害者**没事。”

我提醒自己，这不仅仅是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战斗；还有第三个因素，瑞典人。他们代表了见证者与行动者，他们选择采取行动，并改变了这个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陈述过程中，**琼森**好几次变得非常沮丧，甚至在叙述的时候哭了起来。他不得不停下来，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才能继续向我陈述他的观点。他说，目睹并被卷入这一事件，对他来说非常令人不安，但他只是不假思索地对当时的情况做出反应。”

我们需要在别人身上唤醒这种本能。在瞬间辨别是非的能力。清醒地面对它而不是忽视它。我得知他们在追捕布罗克之前，已经先检查过我的情况了。男子气概通常被定义为身体素质，但他们最初跪地检查的姿态和扫腿、阻截一样有力。男人的阳刚之气存在于他们的脆弱和哭泣之中。

在听证会上，两名瑞典人都出庭做证了。我得知袭击的那天晚上，他们把他按在地上，然后说：“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她失去意识了。”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你笑个什么劲？”

“跟她道歉。”

我没有把生存下来的原因归结为意志力或乐观，因为这两点我都不具备。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恢复，随之而来的将是抑郁。但就在

那个10月，瑞典人把这个新的声音引入了我的内心。我必须教会自己像他们那样说话。有一天面对攻击者，我会说，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

- (1) Xanax，一种抗焦虑与镇定药物，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于精神治疗。
- (2) Minnow，米诺鱼是一个泛称，用来指淡水和咸水的小鱼，特别是用作诱饵的鱼。
- (3) Spoken Word，美国一种以口语为基础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多样，包括诗歌朗诵、爵士乐、嘻哈、喜剧和散文独白等。
- (4) 美国公民填写的提供税籍编号的表格。

卢卡斯住在费城市中心核桃街一幢楼的16层。我喜欢每栋建筑上一块块堆叠着的网格灯。街上的栅栏门里冒出滚滚热气。意大利熟食店里有斑点香肠和粉红色的肉，屠夫的工作服上印着玫瑰色的指纹。汤里有拳头大小的无酵饼丸子<sup>(1)</sup>。博物馆里铺着乳白色大理石的地板。小书店。四肢瘦削的大学生们在河边欢快地跑着。兜售野花的门诺教派<sup>(2)</sup>家庭。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卢卡斯说起几条主要的街道：“栗子街，核桃街，他们应该给一条小一点的取名为腰果街。”他把我介绍给大B，那人每天坐在公园里下棋，还给我介绍卖他最喜欢的烤牛肉三明治的地方。他给了我一份他学校里所有我能参加的俱乐部的名单，四处带我去见他的朋友们。“他在帮我适应，”我想，“他是在告诉我他想让我留下来。”我喜欢幻想这个地方今年能成为我的家，但我没有记住公园和公交线路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去熟悉这个很快就会被夺走的世界毫无意义。

寒假快到了，卢卡斯说要带我去一个温暖的地方，也许是印度尼西亚。我让他和他的同学一起去旅行，在正式开庭日期确定之前我不能离开，而且我需要攒钱。“如果我们去了以后必须回来，我们就回来。”他说。我想象着我们在透过香蕉树洒下的斑驳的光线下，骑着一辆轻型摩托车沿着一条土路前行，随后收到了庭审开始的通知，梦想的温暖消失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告诉自己，我没有资格再拥有快乐了。我开始把所有我希望做的事情都称为“方糖想法”。这个案子就像一锅热水，会很快把正常生活的外观给溶解掉。在我回家的一个月里，我申请了几个行政类工作，但当他们回复时，我已经在费城了。

那一次性侵已经过去几乎一年了，但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一对夫妇的周年纪念是庆祝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一个生日则标志着一年的成长。而那一次性侵的周年纪念标志着一年的停滞不前。到庭审时，我们会再次全部从头开始。

创伤拒绝遵守任何时间表，似乎与时间不一致。有时它像星星一样遥远，有时它可以完全吞噬我。

我本以为法律程序是由一连串戏剧性的法庭场景组成的。没有人提醒过我等待的滋味，庭审之间飘忽不定、无形无状的几个月，它先是要求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然后又不需要任何人。今年我只花了一天时间在法庭上做证，但正是围绕着那一天，我的生活瓦解了，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我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花了几周的时间来准备，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做证，所有这些时间都用来恢复，而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

我终于收到了进展，但并不是我期待的信息。我的律师打电话告诉我，她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准备搬走。我将被指派一个新的律师，一个她信任的人。她打电话来说再见，说她为我感到骄傲，并会继续为我打气。挂了电话，我被那一刻的悲伤击中，意识到在生活中人是不断前进的。每个人都如此，每个人都应当如此。

我的检察官也被调到了一个新的部门。当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谈话上，直到我听到她说她要求保留我的案子，会跟进到底。我保持沉默：要不是她坚持和我一道，我就会被移交给一个新的检察官，一个新的律师，想到这里我感到震惊。

如果她们俩都离开了，我想我会很难坚持下去。我为什么要继续？此时此刻，我在为谁做这些？我自己吗？如果这是为了我，那我为什么还独自坐在床上，没有工作，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们为结案而战，为正义而战。不是为了我，而是以我为代价，我们才能够到达那里。

卢卡斯买了2016年1月1日的机票。印尼的概念似乎仍然很抽象，离我太远，难以理解，但机票本身给了我一点希望。连受害者都会去印尼。受害者的皮肤上有阳光。他不停地提醒我：我是一个值得拥有生活的人。

每天早上卢卡斯离开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他的嘴唇轻轻压在我的额头上。接下来我会听到门的咔嗒声，这个信号是说，在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里将是一片寂静。我会起床，一边刷牙一边盯着



镜子里的自己看10分钟，然后裹着床单坐在沙发上，穿上裤子，再把它们脱下来，然后爬回床上。偶尔我会听到卢卡斯室友进屋，用厨房的水槽，打开电视。这让我更有理由钻进被窝深处，不发出声音，消除自己的存在。每天下午，我都会爬到楼顶上阅读，看着邻近阳台上的人们在休息时吸烟。有时我会在卢卡斯回家前10分钟换上干净衣服，向他暗示我可能已经离开过公寓，出去了，做了些什么。虽然通常情况并非如此。

这种百无聊赖消磨时间的生活看起来很懒散。但这样的日子并不像星期天的午后那般自在。我大脑中长久以来未被触及的那部分被唤醒了；我在1月时储存的罐子封口被打开，撕破，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了。我还记得自己在办公室的日子，那时我总是在倒计时，想着什么时候能躺回床上。现在我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工作，可以不受打扰地躺在床上，但这种自由是伴随着空虚而来的。

我每周有一个小时去看心理治疗师，在那里我可以谈论自己的想法。但在那一小时之外，我更喜欢沉默或轻松的闲谈。如果卢卡斯提起这个案子，我就会被激怒：“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事？”我把我们所有的谈话都限定在正常生活的范围之内：决定去哪里吃晚餐，我们要不要去河边慢跑。我想要简单的决定、我能掌控的情况。

克莱尔时不时从法国跟我网络通话。我的白天是她的夜晚，她低声说话，小心翼翼，避免吵醒她费了好大力气才哄入睡的孩子。她在没有窗户的卧室里戴着亮粉色的耳机。我叫她“地牢里的小电音师”。她告诉我如何学习驾驶手动挡汽车、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腹泻时弄脏袜子、孩子们和他们的丝绸睡衣。我告诉她我对律师们的恐惧以及费城凉爽而放松的夜晚。如果我很痛苦，我会告诉她我很痛苦。她不会说“真的吗？”或者“我无法想象。那一定很难。多么不寻常啊”。她只是点点头，认同。奇怪的是，这让我觉得一切都在正轨上。她也参观了这些情感的里程碑。虽然她远在千里之外，但世界上有个人完全了解我，有个人仍然在给我讲有趣的故事，对我一视同仁，这是一种安慰。

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到地毯上有一小团头发，然后又看到一根头发卷在沙发腿上。我捡起它，它又把我引向地板上的一些灰尘，每面墙的贴墙板上都有。很快我跪下身，拿着一卷纸巾把整个公寓擦了个遍。把餐具抽屉里的塑料叉和酱油袋清理出去，外卖菜单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我把垃圾袋塞进大厅尽头的金属垃圾槽，就像圣诞老人的袋子从烟囱里掉下去一样。这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卢卡斯回家的时候，我的脸涨得通红，身上泛着微光，他惊呆了，所有的东西都擦得锃亮，散发着柑橘的香味。“噢，你没必要这么做的。”他说。“我就是干完了。”我说。这是我几周以来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天没有盘子要洗，没有柜台要擦。我不得不把盘子弄脏。我小时候经常看见这样的场景：回到家，妈妈坐在餐桌旁，身边围着12个包饺子的女人，她们的手抖动着，做出一堆堆面团状的美味佳肴。我从不参与，只是坐在房间里做作业，然后就有一碗接一碗的好吃的端过来。现在，我走去唐人街，又走回来，胳膊上挎着塑料袋，袋子里是绿色的韭菜和用塑料包装起来的粉红色猪肉末。通常我会避免买生肉，因为接触动物潮湿的内脏会让我感到不安。但现在我把韭菜切成绿色的小圈，洒在肉末上，用手指蘸着水，沿着每个圆形面片的月牙形边缘，抓一小块肉放在中间，把它们封在柔软的面片里。我不像生产流水线上的女工那般熟练，只是坐在那里独自哼着歌，在厨台上弓着背，做了两百个饺子。我的寂寞变成了一种可以吃的东西，一种有营养的东西，一种蘸了辣椒和酱油很好吃的东西。

有两张嘴吃饭，而不是我一个人，这就足够了。每天，我都会撕下一张白纸，写一份食谱，把它塞进我的手提包里，然后去买齐需要的蔬菜、肉类和调味料。在炒菜的时候，卢卡斯告诉我他要去看三天的橄榄球比赛。“就三天。”他说。“整整三天？”我说道，把甜椒移到锅边。72小时不间断的工作能很快让我倒下。我需要把我从自己的脑袋里取出来。咖啡店是不够的。

我在网上找到一张20美元理发的优惠券。在他离开那天，我穿过一个建筑工地，爬上楼梯，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竹子和塑料洗涤箱，一尊小佛像前供着橘子。“只简单修一修”，我说，这比起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需要和人类交谈，我需要你温柔地抚摸我的头”要容易。

我想念妈妈柔软的手，想念她的关怀。我的脖子向后伸着。那个女人留着黑色的刘海，系着一条橙色的围裙。她把一股热水淋到我的头上，我的头发湿漉漉、沉甸甸的，满是薰衣草的味道。我询问她的生活，她的每一个回答都让我远离自己一点，她的烦恼、她的情感关系、她的怀孕、她的兔子，其中一只正好名叫蒂法妮。她猜我是泰国人，我说我有一半中国血统。“我来自加利福尼亚，是的，海滩很美，但是海水实际上很冷。”这一天得救了。

第二天。我从来没有修过眉毛。另一家小沙龙，镜子边缘装饰着塑料樱花，柜台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喷泉。我跟一群女士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抱歉让您久等啊。”不要紧，我说。我是认真的，我无处可去。轮到我了，我斜靠在另一个女人柔软的手里。

第三天。美甲，15美元。天正下雨。我细看墙上五颜六色的玻璃球，选择了橙色。我的大手看上去就像一块呆板的煎饼，被那个女人灵巧的手指端着。我在灯火通明的客厅里感到温暖，外面的人行道又黑又湿。旁边的女孩正在庆祝，她刚刚在阿普尔比连锁餐厅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切都开始好起来了。”她说。

卢卡斯回来了，我的头发很光滑，指甲是交通指示灯的颜色。我又回到自己创造的节奏和路线中。一天下午，我坐在洗衣机旁边的地板上，想弄清楚应该把漂白剂倒进洗涤盒的哪个格子里，这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这是在干吗呀？

我变成了小小的清洁鱼，而他成了鲸鱼。我们彼此欣赏，彼此受益，但不同的是，在他的环境中，他是一种威严的动物，而我却像一条米诺鱼般渺小。他正在攻读硕士学位，而我正在从烘干机里取出绒布。

卢卡斯提过校园里有个喜剧俱乐部，由他的英式橄榄球队队友文斯管理。一天晚上，卢卡斯出门时邀我一起去。在第一次会议上，大约有15个男人和2个女人坐在圆桌旁。每个人都在献计献策，修改关于教皇即将来访和奶酪三明治的笑话。气氛轻松又宽容。我穿着黑色雪地服坐着，上紧发条，沉默不语，我的椅子挨在他的椅子后面，我只是观察着。

第二次会后，我和卢卡斯步行穿过大桥回家，碰上了他另一个队友。“你们从哪儿来啊？”他问。“喜剧俱乐部。”卢卡斯说。“我们在尝试做个演出。”我说。“好啊！”那个朋友说，“等等，你参加吗？”他转向我，歪着头，好像我告诉他我要去月球似的。我本能地耸了耸肩，很快又轻轻摇了摇头，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点了点头，好像在说，对。这很微妙，但他越过了线。他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个原则：我来决定我能做什么。每当我被轻视的时候，我就会想，你错把我的安静当成软弱。如果你想象不出我站上舞台，那我就偏要上。

第二天早上，卢卡斯一走，我就起了床。我坐在沙发上，把我对商学院所不了解的一切都写了下来，把我静静地听过的所有对话都写了下来。我怎么把阿里巴巴当成了《阿拉丁》里的一个角色，原来做P. E.工作的人实际上并不是教体育<sup>(3)</sup>。当卢卡斯问我是否知道什么是小额信贷时，我说：“知道，小的资助。”我把自己新获得的角色设想为“合伙人”，这是给重要人物的标签。合伙人盯着窗外，就像猫儿等着主人回家。我告诉他们，他们考虑给我的签约奖金比我之前的实际工资还高。我详细描述了自己是怎样艰难地念出斯库尔基尔河（Schuylkill）这个发音的。我在浴室里对着自己大声朗读，把每个单词像砖头一样压在地上，直到我背下长达10分钟的内容。

试镜那天，我一个人走在校园里，穿过桥，一路上轻声自言自语。卢卡斯给我画了一张小地图。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亨茨曼厅<sup>(4)</sup>，把自己关在卫生间的隔间里，背诵我的表演内容。时间到了，我乘自动扶梯下楼，仔细查看每扇门，找到房门号码。俱乐部的两位主席文斯和利兹，双手合十坐在那里。我关上门，把背包放在地板上。我凭记忆慢慢地说着台词，看着他们的眼睛不时睁大，笑声此起彼落。他们满面笑容地说：“谢谢你，我们会再联系你的。”我点点头就离开了。如果我没被选上，也没关系。我想。

两天后，我的收件箱里出现了确认邮件。阵容已经公布。我在最下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是八名男生外的两名女生之一，是唯一的非学生演员，他们让我最后一个上台表演。我要做压轴的闭幕演出。我记得我深呼吸，握紧拳头，用脚做跑步的动作，在椅子上转来转去，然后张开嘴，好像要告诉别人这个喜讯，然后转身对着屏幕，才

记起那里没有人。瞧瞧他们把我放在哪儿。既然他们给了我一个挑战，让我做压轴表演，他们一定是相信我会成功。我的神经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这是九个月来第一次，焦虑没有让我畏缩和封闭起来。它促使我开始。

晚上我们在河边的一间公寓里排练。有些人来晚了，因为刚下课或系着领带赶了场面试后才来。我总是早到，刚洗过澡，准备好材料，我的背包里只有喜剧笔记：这不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们轮流拿着电视遥控器当麦克风，不断地打断对方的讲话，不断地调整和重复笑话，直到我们记住对方那套台词。在夜晚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那里所有的苦难都转化成了素材。我内心的一小部分在等待着出现一个毫无品味的强奸笑话，做好了掩饰退缩的准备，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害怕成为敏感的人而发出不适的声音。但强奸笑话从来没有出现。相反，我们谈论没毛的猫，并告诉文斯，他在七月看到一只六月甲壳虫<sup>(5)</sup>的梗并不好笑。

一天晚上，我们的会议悄无声息地过了午夜。我们一群人一起离开，在寒冷中艰难地步行，讨论着当晚演得最砸的部分。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两个人离开队伍回自己家。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住得最远。人群慢慢缩小，陪我同行的人越来越少。我想起了夏令营时的一首歌，唱的是朋友们拍着翅膀，一个接一个地飞走了，只剩下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只有一只短颈秃鹫，我说，一只短颈秃鹫，坐在一棵枯树上。

我开始做打算：最后一个人转身离开后，我就会停在明亮的锥形街灯下。我会叫卢卡斯来接我。但如果他已经睡着了呢？我会跑。我看了看这条街的其他地方是否亮堂，周围是否可能有目击者。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扫视了一眼人行道，评估着走哪条路才能避免穿过公园。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可以跑到两条街外的便利店。那里会有人的。但我已经听到了这些问题：大晚上她一个人在做什么？为什么她不找人陪着她呢？她打哪儿来？喜剧？她有趣吗？她喝了多少啤酒？她的笑话是关于什么的？她的男朋友呢？有通话记录吗？她穿的是什么？我在听证会结束后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大，在脑海中无休止地展

开，令我心神不宁，以至于我没有意识到身旁最后一个人停下了脚步。

“我要往那边走了，”他说，“你确定走回家没问题吗？我可以陪你一起走。”我看着他，有点吃惊；有那么一秒钟，我以为自己一直在大声说话，我的脸扭曲而恼怒，自己却毫无意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出于礼貌才这么问，其实更想回家。但他还是耐心地站着，耸着肩。“我很乐意。”他说。那些声音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黑暗中，我们俩在费城的一个寻常夜晚走在寻常街道的寻常人行道上。

有许多这样微妙的时刻，我停下来看着那个人的眼睛，试图说“要是你知道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就好了”。一个小小的动作，只是想起我的名字，或者问我是否需要一点帮助，当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麻木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像皮肤上的温暖。我住的那栋楼的管理员安东尼总是把五楼的热可可机注满，因为他知道我晚上要喝两杯。在苏家市场工作的韩国妈妈戴着小圆眼镜，梳着椭圆的发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会抬起头，微笑着说：“嗨，香奈儿，一切都还好吧？好几天没见到你了。”还有三个看门人，艾丽西亚、赫蒂彻和乔达，他们一天24小时都在大楼的前台工作。当大厅里很安静的时候，我会穿着拖鞋、拿两个椰子冰棒坐电梯下来，跟他们聊几个小时。他们总是告诉卢卡斯带我去吃饭，或者一看到我拎着太多东西就对他大喊大叫。当人们指责他们送错了食物，或责备他们送迟了包裹，他们总是能保持冷静。一个醉汉告诉一个人他更喜欢她的头发长一点，为什么她要剪？我看着他们平静地回应，即使他们完全有理由生气，但他们挺起肩膀，我记下了这个做证技巧。最后是喜剧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确保我在晚上安全到家。这些都让我得以在这世界上重新生长。他们叫我香奈儿，不是布罗克·特纳的受害者，也不是卢卡斯的女朋友。就只是香奈儿。

演出那天，我紧张得吃不下饭，全身心投入，话都不想说。我告诉苏家市场的每个人以及大楼里的员工，我要在“氦”喜剧俱乐部表演，他们祝我好运，让我录下视频给他们看。晚上7点和10点有两场演出，几百张票都卖光了，座无虚席。在决定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我偶然发现我在出庭时穿的燕麦色毛衣。我穿上它，配了条牛仔裤。我用所有的时间试图埋葬埃米莉，忘记她，压制她。现在我想让自己知

道，那个在法庭上哭泣的人就是在舞台上表演喜剧的人。二者共存于我。

我们十个人聚在拥挤的休息室里，这里看上去就像一间精神病病房：喃喃自语，对着墙壁说话，蜷缩在角落里热情地低语。我们听到人们挤满场地，房间里嗡嗡作响。时间终于到了。司仪文斯走出门迈步上台，开弓没有回头箭。

每当有人走上舞台，身后的门关上时，我们就安静地期待着，知道沉闷的笑声会在哪个确切的时刻从墙壁那边传过来。每个回来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肩膀放松下来，半笑着跟我们击掌。

我开始注意到，每个上台的人都获得了朋友们花样百出的尖叫和欢呼。卢卡斯下一场才会来。谁会欢呼我的名字呢？我一个捧场的人都没有。独自坐在证人席上的感觉又来了。他们用来压轴上场的那个女孩是谁啊？她太闷了。

但这时我看到了那天在桥上遇到的那家伙的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等等，你？”我看到辩方律师扬起眉毛，记下我的话。我看到记者们在法庭上看起来很无聊的样子。我看到阳光透过羽绒被的羽毛，在羽绒被下度过的每一个小时，还有那些我以为自己将化为乌有、无比孤独的日子。我想起了痛楚，胸口的阵阵刺痛。

然后我看见自己在淋浴，我的日常事务便笺贴在玻璃上，记住我的台词，生动地说出来。我现在多么渴望站上台去啊。我能听到我前面节目的最后几段。掌声。我听到播报我的名字，就走了出去。

四周一片漆黑，灯火通明，一片寂静，只有零星的掌声。我看向观众，黑压压的一大片。在寂静中，我的头脑变得清晰起来。我又一个人站在麦克风前，但这次我说话了，他们听着，没有反对意见。当我开始说话时，我听到我的声音把几百人带到了我想带他们去的地方，突然，他们大笑起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努力保持面无表情，但内心却像个孩子一样在微笑。我不得不等着噪音平息下来，但我并不着急。我觉得自己是独立而完整的。就像把房间握在手里，我可以转身，把他们举起又放下。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你会听我说话，我们都会很开心。



演出结束后，每个人都分散在观众席中，接受朋友们的祝贺。我在后面的房间里犹豫了一会儿，喝着水。去吧。我对自己说。我试探着走了出去。

几个月来，我一直受到专业人士的问候，他们用平静的声音，带着同情的眼神与我交谈。人们总是给我递纸巾，轻轻地拍着我，好像我很容易就会碎掉似的。当我穿过人群时，我看到人们的脸都亮了起来。我很快就成了合伙人中的凯特尼斯·伊夫狄恩<sup>(6)</sup>，被女人们包围，被誉为领袖。这一次，我不是被人怜悯，而是受人尊敬。“哇，你真的，哇。”有人说。我是“哇”。我的脑海里重复着。

第二场演出结束后，我跑出去见卢卡斯。他一把抱起我原地打转。“我甚至认不出你来了。”他说。我觉得自己重生了，那个羞怯的自我脱落了，数百人见证了我的蜕变。我听到有人问卢卡斯：“你是她的男朋友？”

我的心理治疗师曾经告诉我要“接受受伤的自我”。当我终于离开人群时，我想起了她，相信她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第二天我醒来，卢卡斯已经去上课了。午后的阳光柔和下来。当我躺在床上，我慢慢地意识到，我不再有喜剧俱乐部的会要开，不再有排练，不再有在脑子里反复念诵的咒语。下一季的试镜要等到春天。整件事就像一场梦。前一天晚上吃的是七道菜的大餐，而现在我盯着个空盘子，舔着面包屑。突如其来的悲伤袭上心头，就像我胸中的一口井被凿开了一样。我想起了我的现实，那个我永远也逃不掉的现实，然后又陷入沉睡。

几个小时后，我睁开眼睛看到卢卡斯坐在床上，扶着我的肩膀，轻轻地摇着我。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每个人都在谈论你。”他说，“你知道今天学校里有多少人过来跟我说话吗？看，看看这些邮件。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看看他们说了什么。”但我看到他很快意识到我出了严重的问题，我的眼睛红红的，我的思想已经被拖入深渊，而他也同样迅速地把我拉进他的胸膛，抚摸着我的头发，轻轻摇晃着我，试图再次把我拉回来。

第二天，我给妈妈打电话，没有说话，只是哭着，她开始给我讲故事：当她还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图书馆关闭了，书页被撕下来当厕纸用。她会找一页开始创造自己的故事。她曾目睹她的母亲在中国农村接生，见过那些未能成功分娩的年轻女人。在大学里，她学习文学，成为校园杂志主编。她告诉我她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当酒保，学了第一句脏话，当地人叫她苏丝·黄<sup>(2)</sup>，一个虚构的人物。她如何在新年派对上遇到我爸爸，他们在午夜接吻，然后结婚了。他如何教她开车。他们如何在一个刷成粉色的家里养育两个女儿和两只博德牧羊犬。在我看来很平常的事，她却从来没有忘记过。事情本可以有无数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她却以某种方式来到了这里，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某种奇迹。当她年轻的时候，她编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从来没有想象过生活中到处都是游泳池，女儿们喝着冰咖啡，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上到处都是野生罂粟。

当我听她说话时，我明白了：你必须坚持下去，看看你的生活如何展开，因为它很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这不是一个你是否能活下来的问题，而是在你活下来以后，等待你的是什么美好的东西。我不得不相信她，因为她就是活生生的证据。然后她说：“好事和坏事冥冥中总是相伴而生。等待好事的来临。”

随着冬天临近，湿漉漉、灰蒙蒙的石头上覆盖着厚厚的暗红色和黄色的树叶，英式橄榄球运动员吃着我做的玉米饼汤，学生们邀请我去喝咖啡，我对这一切心存感激。我加入了讲故事俱乐部，观看变装秀，还参加了巧克力主题派对。我忙着写故事，在校园里把它们印出来。有时我和卢卡斯一起去上课，在课上画画。但我永远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不是我真正的生活，现实在法庭里等待着我。我心里总是感到孤单，我只能选择我的环境。

阿拉蕾打来电话，说庭审要到“明年的什么时候”才能进行。蒂法妮哭着打电话给我说：“我做不到。”我是在她大三的冬季学期被侵犯的。庭审可能会在她大四的春季进行。每个学期她都有更繁重的工作量，如果想准时毕业，她就不能总是调整时间。损害是持续性的。

一天晚上，我独自去参加一个讲故事的活动，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妇女讲述了一个名为“起来”的争取民权非营利组织的故事，他们正在起草《性侵幸存者权利法案》，其中包括免费的法医检查和保存强奸检测包的权利。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皮肤紧绷。后来我过去跟她说话，我的话不由自主地磕磕绊绊，强奸检测包，如此具有攻击性，你等了这么久，不公平。我说个不停，像水龙头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想讨论这些问题。她听得很认真，很兴奋。“你知道这么多。”我撒了个谎，说自己以前是个律师，找了个借口。我太紧张了，不敢再和她联系，担心会暴露自己，但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新的希望。

在整个法律程序中，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努力跟上形势，避免搞砸，学习法庭术语，集中注意力，遵守规则。我想发挥作用，证明我可以做需要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制度本身可能是错误的，应该改变或改进。受害者可以要求更多。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对待。这并非意味着我费力的经历毫无用处，它们具有启发性。进入这个系统让我受到了启发：我遇到的问题越多，就越能看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以把我的痛苦转化成想法，可以用我的思考为受害者寻找不同的未来。

走在校园里的时候，我在一份报纸的头版上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四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的性侵犯？我不记得了，校园里有太多太多的女性遭到性侵犯。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数排女性符号组成的图表，那种你在洗手间里看到的符号，占据了整个版面，五分之一是红色，其余则是灰色。

我看到这些红色的人影在呼吸，几乎出现了幻觉。我的整个人生都在这次性侵犯的重压下扭曲了，如果把这种伤害施加到每个红色的符号身上，这种程度足以令人震惊。她们在哪里？我环顾校园，看到路过的戴着耳罩、穿黑色打底裤、背着蓝绿色背包的女生们。如果我们的身体真的被涂成红色，我们就会在这个四方院子里到处看到红色的身体。我想把那份报纸拿到人们面前让他们看看。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一场流行病，一场危机。你怎么能一边看到这个标题，一边继续往前走呢？我们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已经熟视无睹。但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还算不上陈旧。

我想起了一个词，“又一个”。我记得，在学校得知第三起自杀事件后，人们无可奈何地摇头：“我不敢相信又有一个。”震惊已经减弱。不再是砰的一声巨响，而是一种疼痛。如果孩子们被火车撞死这种事都能成为常态，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

这不再是一场与强奸犯的斗争，而是一场人性的斗争。我必须坚持我的故事，想办法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如果我不去突破，我就会成为一个统计数据。表格中的又一个红色符号。

我们的印尼之行临近了。那是12月的费城，我们散步的时候，凉风轻咬着我的耳根，卢卡斯提起了水肺潜水。“我可不会水肺潜水。”我说。“我也不会，”他说，“我们很快就会了。”

一周后，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室内游泳池的边上，背着一个沉重的气瓶，昏暗的护目镜贴在脸上，空气中弥漫着氯气的味道。水肺潜水的首要规则是不断地呼吸。这听起来很直观，但我记得恐慌症发作时，我感觉自己是在通过一束缠绕的吸管吮吸空气，数呼吸次数的感觉没那么简单。永远要记得呼吸。

在浮出水面之前，潜水员必须在水下20英尺处停留3分钟，这被称为安全停留，让你的身体减压。上浮太快可能会使你的血液中形成气泡，我想象着那就像一种痛苦的香槟流过你的血管，让你生病。浮出水面后，你必须等待48小时才能飞行，因为气压下降会使你的血液起泡，这足以致命。

这些规则令我着迷：身体规定你必须做什么。我已经养成了忽视自己身体的习惯，常常忘记喂它，当我受到侵犯时，我甚至拒绝看它一眼。现在我的身体在说，你必须听我的。你必须尊重我的需求。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否则你会受伤。

教练向我们展示了“章鱼”，就是每个背包上都有的备用调节器，潜水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它和同伴共同呼吸。教练指着我说：“假装你没空气了，给卢卡斯发信号。”我点点头，卢卡斯和我都沉了下去。我的手在喉咙上来回比画，表示“我没气了，没有了”。我取下调节器，用手指轻敲嘴巴，表示我需要他的空气。他张开双臂划了两下，就游到了我身旁，把附在背包上的“章鱼”递了过来。我把它拿到嘴

边，大口地吸气，我的肺如释重负地扩张着。模拟完成。我们坐在池底，用同一个金属肺呼吸。我的眼睛突然变得滚烫，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想，这就是过去几个月的感觉。

1月初，我们来到印尼一个花生形状的岛屿——吉利特拉旺安岛。我们坐在一条长长的木船上，太阳舔着我们的脖子，我们就往脸颊上抹防晒霜。我站起来，把杠铃系在腰间，坐在船边，两腿腾空，后翻着跳进大海。卢卡斯在我旁边跳了下去。

我慢慢地从浮力控制装置中释放空气，放出喷气背包里的气，轻轻地滑到水面下。下降的时候，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耳膜里有一种尖锐的脉动，眼镜也渐渐绷紧。我潜得越来越深，告诉自己要耐心地让身体适应。

一切都安静下来。我睁开眼睛，在一间泛着冷光的蓝色房间里徘徊，太阳就像茶袋一样坐在海洋里，用柔和的光线稀释着海水。我再也听不到我的思绪，只能听到我的呼吸声，仿佛有一阵平静的风拂过我的整个脑海。给予的，索取的，走来的，远去的；当我漂浮在一片带着金光的蓝色中，我的呼吸平静了。

鱼儿像五彩纸屑一样，在我周围自由地游来游去。有大块的石头，发光的意大利面条般的海葵。细长的白尖鲨身体紧贴着沙滩。芦苇一样的海带摇摆着，又长又懒。我给一条长着绿色大嘴唇的土豆形的鱼让路，它跌跌撞撞地匆匆而过，就像面试迟到了一样。“叮叮叮。”教练用一根金属棒轻敲他的氧气罐，指着一条正在摇头的鳗鱼，就像它正在吵架一样，完全不敢相信你刚才说的话。“叮叮叮。”一只螃蟹正在梳理它的胡子。“叮叮叮。”一条睡眼惺忪的小鱼正在大嚼一块松软的海藻蛋糕。我看着所有这些生物过着它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这个无言的世界里，自己如此渺小，无人注意，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

这里没有雪，没有走廊，没有建筑物，没有水泥，没有鞋子，没有文件，没有电子邮件。没有铃声，没有喊叫，没有钢笔的咔嗒声，没有机器的轰鸣。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整个世界静悄悄的，遗忘一切

噪音，只剩我的呼吸声。我觉得自己融化在水里了，只有一颗跳动的心和两只眼睛。

我想象着辩护律师穿着西装在水里扑腾，眼镜滴着水，前额晒得黑黑的，他的领带像海草一样起伏，一只擦得锃亮的鞋慢慢地往下沉。他会发疯似的踢来踢去，而我则安安稳稳地待在下面，静静地穿梭在粉红色和黄色的鱼群之间。你不能碰我。

我往更深处游。如果一个焦虑的念头冒出来，我就长时间地呼气，让鱼把它吞下去，释放，消失。我在70英尺深的地方，有六个水池那么深，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离开了痛苦，那种让我盲目的痛苦，让我梦想着陷入虚无的痛苦，让我想要消失的痛苦。如果这就是世界，你怎么会想离开呢？所有这些美丽和奇异。我觉得世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在它的表面下是霓虹之山，有浴缸那么大的蛤蜊。我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更深入，克服最初的痛苦，教会自己呼吸。

一个地方是冬天，另一个地方则是夏天。当我回到帕罗阿尔托，看到法庭苍白的墙壁、法律文件和媒体头条，听到高跟鞋踩在瓷砖上的回声，我也会听到“叮叮叮”的声音。我要记住这个世界也是存在的，我也可以存在其中。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一样真实。

- 
- (1) Matzo balls，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的食物，传统上配鸡汤食用。
  - (2) Amish，基督新教派别，崇尚简朴生活，不愿接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
  - (3)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与“体育”英文缩写均是“P. E.”。
  - (4) Huntsman Hall，位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所在的大楼，以毕业于该商学院的富豪亨茨曼（Jon M. Huntsman）命名。
  - (5) 美国初夏时会出现多种甲壳虫，统称为“June bug”。
  - (6) Katniss Everdeen，小说及同名电影《饥饿游戏》中的女主角。
  - (7) Suzie Wong，英国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1957年出版的爱情小说《苏丝·黄的世界》中的虚构人物。小说于1960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苏丝·黄也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性感女性符号。



## 7

透过椭圆形的窗户，我凝视着加利福尼亚犹如地毯覆盖的山丘，漫山秋色，上面点缀着黑色的灌木。我希望这架飞机就像一辆巴士，这样我就能坐过站，沉沉睡去，然后在火奴鲁鲁醒来。着陆时，我看见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小点越来越大，海湾灰色的水在我们下方展开，飞机的腹部掠过地面，一切都变得细致、响亮、清脆，而我又变小了。

我来这里是为了打一场人生中最艰难的战斗，但帕罗阿尔托没有人知道我回家。我用肩膀撞开了父母家的门，行李箱摇摇晃晃地滑过门框，轮子在地毯上减速，我把燕麦色毛衣挂在壁橱里的塑料衣架上，牙刷放在一只陶瓷船里。

还没有人通知我将在哪一天出庭做证。我给我尚未谋面的新律师迈尔斯发了电子邮件。她写道：“陪审团的遴选将在下周进行，从3月14日开始，可能在3月16日结束。你可能需要在17日或18日做证，但更可能是在21日或22日。”该如何照此安排计划呢？阿拉蕾告诉我，庭审时间会视其所需往后拖延，三周或更久。我该如何分配我的精力？我还要忍受多少？如果我不能坚持下去呢？我觉得我不应该在法庭里待太久，就像你不应该在车库里待太久一样，车里的废气会杀死你的脑细胞。

蒂法妮冬季学期的期末考试将在陪审团进行选拔的那一天开始。在她结束最后一门考试之后，她就会打包一个小行李，开车穿过黑暗的山丘，在法庭上度过她的大四春假。卢卡斯会在做证的前一天飞过来。在做证之后，他们将离开，回学校开始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春季学期。而我会留下来等待判决。

庭审两周前有一场“庭审预备会议”，这是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会议，以确保他们准备就绪。当这一切进行的时候，受害者正在某个地方，躺在床上，把奶酪棒削成柔软的碎片。她无须参加预备会议：证人们不会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发表鼓舞士气的讲话，也不会



把手叠在一起，大声喊出全队加油的欢呼。我也不能出席其他证人的作证，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漫无目的地等着。后来我得知有18人作证，但他们大多数人的存在我都不知道。我们像马一样，站在不同的马厩隔间，戴着眼罩，对周围的人浑然不觉。当你听到砰的一声，感觉到鞭子，你就拼命奔跑。

我对法庭上没有足够多的人感到紧张。布罗克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会乘飞机过来，他身后那一排排的座位会坐满了人，而我这边却寥寥无几。“他的祖母会来。”阿拉蕾说过。她说这话就像是在传达一个坏消息。我不知道陪审团会保留一些心照不宣的记录。两名瑞典人会来出庭作证，还有警探迈克·金、警官杰夫·泰勒、警官布雷登·肖、性侵应变小组的护士克里斯廷·塞特伦德、朱莉娅、科琳、蒂法妮和卢卡斯。我所有的证人都不允许坐在法庭上。只有金警探能进入我的观众席。妈妈和安奶奶会来看我和蒂法妮作证。爸爸工作之余会开车过来。安奶奶每天都要过来坐上八个小时，有多久就坐多久。在所有的变动中，她是唯一不变的：冷静，敏锐，一个母亲，一个斗士。

当我看着空座位时，不得不提醒自己有很多人关心着我。我想解释，香奈儿的社交生活很健康，朋友也很多，但作为埃米莉·多伊，我的世界要小得多，是一个缩小了的密友圈子，这让我感到孤独。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花在一个强奸犯身上的时间比花在朋友们身上的时间还多。

外面很暖和，白色的花落了下来，让我想起打孔机打孔时落下来的白色小纸片。我的黑色羽绒服像个睡袋一直垂到我的脚踝，不止是为了保暖，更多的是为了与其他一切隔绝。一天晚上，几个高中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吃小吃。我穿着我的及踝雪地服加入了，他们拿这个开玩笑，我也不介意。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从我身上移开。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你可以凭“工作”这个词摆脱多少麻烦。这个词几乎可以应付所有问题。“你怎么回来了？”“因为工作。”“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了。”“因为工作。”“我们下周应该一起吃个午饭。”“不行啊，”我说，“因为工作。”“你看起来很累。”“因为工作。”我说。他们说：“我完全理解你。”我想说的是“庭审”。当他们说“你好吗？”，我想说“吓坏了”。有人说：“你看起来好瘦啊！”我想说：“这并不总是一件好

事。”他们走了，以为我们联络了感情，而我心底却清楚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开始担心自己会在杂货店撞到熟人的手推车，或在慢跑的小路上和他们偶遇。我的世界很快就缩小到自己的房间：我16岁时买的花卉图案的床上用品，只能用很久以前已经弄丢的遥控器才能打开的吊扇，棕色地毯，桌面剥落了一半的贴纸。我需要让头脑清醒一下。

一天晚上，我穿着旧球鞋和破旧的连帽衫溜出家门。我沿着高中母校小跑，经过几英里，来到了有保安站岗的铁轨旁。我从街灯周围的光晕里走出来，躺在人行道上，皮肤热得刺痛，呼吸沉重，胳膊肘搁在膝盖上，躲开他的视线。我喘息着，注视着，观察着，等待着。

保安站了起来。金属遮板挡住的光点开始闪烁，变成红色。两块又高又细的垂直木板慢慢地降低到水平位置，挡住迎面而来的车辆。我听到远处传来叮当声，那是一种笨拙而混乱的铃声，就像一头巨大的奶牛沿着铁轨飞奔而下。喇叭声碎落在空气里，白光刺穿了它，银色的火车头扎进十字路口。一排拉长的银色车体，车厢中部镶着黄色的窗户，视线模糊起来，一排乘客的脑袋飞驰而过，左歪右斜，不是在读着什么就是闭着眼睛，转瞬即逝，头，头，头，然后消失了。静止。笨拙的叮当声的残留。枕木颤抖着，摇晃着，指向天空，宣告演出结束。保安在写字板上做了个记录，在塑料椅子上坐了下来，突然，红灯灭了，十字路口再次陷入黑暗与寂静。

我坐着，头发被吹到另一边。死亡的气息吹到我身上，把我摇回生存之中。在高中，死亡成了我们的同学，一个永恒的存在，回到我们短暂的生命中接走我们。我开始在每个孩子的头顶上看到一个黑洞，一个水坑大小的黑色椭圆。在这个黑洞下面，生命的颜色、质地和日常属性散发着光芒。我祈祷的不是黑洞会消失，而是我们所有人首先都能有机会在它下面成长，经历人们在爸爸的诊所里谈论的所有事情，结婚、离婚、心碎、抵押贷款，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生活。

有时我真想爬进洞里去。有几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抬头看着那洞在我头顶盘旋。这不是更容易吗？我盘点了一下：我23岁，遭受侵

犯，失业，唯一的成就是成为本地报纸上一个无名人物。当我想到自己的未来，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想停下来。

但当我坐在街上，盯着街口，孩子们消失在里头那一片刺眼的红灯光和阵阵铃声中，我告诉自己，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他们，你必须待在这里。我告诉自己，我终究会被吞噬，但在漫长的人生中现在我要要求自己应该活下去。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被羞辱、被撕裂，害怕那些在前面等着我的诋毁。但我也知道，我总是会选择人行道上冰冷的水泥，我过分娇气的心跳，肚皮褶皱里的汗水，洗了太多次的薄羊毛衫。我总是会起床，转身，慢跑回家，因为这是我唯一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

阿拉蕾和我回到了空荡荡的法庭。我像受过训练的动物一样走进了分配给我的框子里。我扫视了一排排软垫座位，这里就像一个悲伤的小电影院。很快强奸我的那个男人的家人就会把座位坐满。眨眼的法庭书记员不在那里。我问她去了哪儿，阿拉蕾回答说是别人在值班，我点点头说当然了，只好自己吞下失去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的悲伤。

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法庭上，一切都停滞不前。时间不是移动，而是加深，这种方式真是奇怪。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访那个夜晚。问题生出更多的问题，像树根的分叉。

这一次，我想知道受害者要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语气？她警告我不要生气。我明白了，如果你生气，你就是在防御。如果你淡然，就显得冷漠。太积极向上，就会被怀疑。如果你哭，就是歇斯底里。太情绪化会让你显得不可靠。但不流露感情会让你看起来未受影响。我该如何平衡这一切？冷静，我告诉自己，镇定。但在听证会上我曾失去控制。如果就那样发生了呢？我的检察官提醒我，陪审团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困难的。“做你自己就好。”她说。

哪个自己。我想回问。她说辩方要用理论来反驳我，提醒我这是对对方的工作。如果他想带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就把它引回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驴，辩护律师晃着胡萝卜，不要跟着胡萝卜走。如果你

不知道答案，就说你不知道。要诚实。预演简短而乏味：她从来没有提过具体的细节，也没有警告过我她会向我出示什么证据。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她是否很小心，没有过早地把我的情绪调动出来，而是呈现给陪审团看。

布罗克唯一的陈述是在他被捕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他承认用手指插入我，并否认逃跑。他将首次出庭做证。我期待阿拉蕾会说“别担心他”。他的初次询问已被记录下来，他无法收回那些话。但从那以后，他学会说“我不记得了”。所以她说：“他会去编剧本的。”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想说那不公平，那真相呢，整个真相呢？他不能进来后只说他想说的话。

一开始，我以为这很简单。当我第一次听说布罗克聘请了一位杰出的高薪律师，我想：哦，不。然后又想：那又怎样？即使他这样的人物也无法改变事实。在我看来，我方是要说服陪审团，天空中那个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太阳。而他那一方必须让陪审团相信那是一个蛋黄。即使是最杰出的律师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它是一颗巨大的炽热的恒星，而不是一个可笑的漂浮的鸡蛋。但我还没有理解这个体系。如果你付出足够的金钱，如果你说了正确的话，如果你花了足够的时间去削弱和稀释真理，太阳可能的确会慢慢地开始看起来像一个鸡蛋。这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

走出法庭时，我注意到贴在门旁边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加利福尼亚州人民诉布罗克·艾伦·特纳案<sup>(1)</sup>**。我想：什么人民？加州大概只有三个人知道我在这里。奇怪的是，本来他才是对抗整个州的人，但现在感到寡不敌众的人却是我。阿拉蕾递给我一沓装在马尼拉文件夹里的记录，现在已经厚得像本电话簿了。过去十五个月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被录音并打字录入。我将和另外三个自我一起坐在证人席上：医院的我、警局的我和预审听证会的我。四个“我”的说法必须一致。她说我不需要逐字背下来。“要熟悉它们。”她说。我明白记住不同于熟悉：熟悉意味着我要在骨头里感受它。这不是一堆文件，而是那个夜晚本身。我用双手托住它的重量。你会认为现在我应该开始准备：一个蒙太奇镜头，显示我正热情地翻着材料，与我的检察官面对面坐着，快速地回答问题。相反，你会看到我推着红色购物车穿过塔吉特

百货，在那里我可以平静下来，在那里整个世界都被一排排组织好。该买一款新的除臭剂了吗？我蹲在洗发水区，想闻一下味道，却不小心把洗发水喷到了鼻尖上。我该买一个新锅吗？我需要一顶帽子吗？我给父母买了一个速易洁除尘器，给自己买了一支木兰香味的蜡烛，还有曲奇饼。我睡觉前要吃掉半包生面团。庭审将于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开始。

## 星期一

我一生都在听大人对“陪审团职责”的抱怨。12个人被从自己的生活中硬拉出来。这12个人宁愿去别的任何地方也不愿待在法庭上。而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需要这12个人。投票必须一致通过。当我被告知此事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你的意思是‘匿名通过’吗？”<sup>(2)</sup>另一种意思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真的需要他们的全部12票才能获胜。在我读过的新闻文章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连续12条正面的评论。

如果有一名准陪审员曾遭受性侵，她或他将立即被除名。后来我才知道，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有几个女人站起身离开了。陪审团中没有性侵幸存者。

我的检察官后来告诉我，在强奸案的陪审团中，女性不受欢迎，因为她们可能会拒绝同情受害者，坚持说“她一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我想到那些评论我的母亲们，她们说：“我的女儿们永远不会……”这让我很伤心，因为这样的评论并没有让她的女儿更安全，只能说明如果她的女儿被强奸，她可能会少一个可以求助的人。

我的朋友雅典娜刚刚回到帕罗阿尔托的家中。我们从六年级起就是好朋友——她是越南裔美国人。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夏威夷的一个生菜农场工作。我去机场接她，她告诉我睡帐篷、搭便车去海边、在大岛上看星星都是什么感觉。我们去我家。当谈话从她的岛飘回我的小房间时，她问我一直在忙什么。

总有那么一刻，就在我要告诉别人之前，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悬崖边上往水里看。我做了最后几次呼吸，摆动着手臂，告诉自己我能做到。当我告诉她游泳运动员强奸案的受害者就是我的时候，我正在自由下落，为掉落地面那一刻的撞击做准备。毕业后，我们去了一家在现场音乐表演的酒吧。她告诉我她被侵犯了。“这件事发生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她喊得很大声以便让我听清楚，“我只是没有告诉过很多人。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我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混蛋！”当时，愤怒是我唯一知道的回应办法，比同情、安慰和沉思更重要。现在我很抱歉，那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更好地照顾她。她身体前倾，用双臂环抱着我，就像克莱尔那样，就像她能在一瞬间看到我这一年的生活。我们在地板上紧紧抱在一起。坠落，坠落，突然被接住。我说我需要她跟我一起参加庭审，她说：“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 星期二

陪审团的遴选还在继续。阿拉蕾没有任何消息。我仍然拒绝去碰那些案件笔录，只有蒂法妮和卢卡斯到达后我才会去看。我剪了头发，只是稍微修剪了一下。我把车开到洛扎诺洗车店，那里提供免费的爆米花和柠檬水，我还可以一边沉思一边看着我的卡滑过肥皂味的、蓬头散发的野兽形刷卡器。我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找工作，求职信上写了三句话。我骑自行车去买墨西哥卷饼，喝过期的罐装可乐，戴着头盔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拍了一张墨西哥卷饼的照片并把它传到网上，收到了32个赞。这是我跟自己开的玩笑，跟这个世界开的玩笑。人们以为我在享受下午时光，但实际上我即将面对强奸我的人。我们能隐瞒这些故事，而这一点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假装是多么容易。我们展示着碎片，却隐藏起山脉。

吃饭的时候，爸爸说我为他感到骄傲。“我真为你骄傲，亲爱的，真的很骄傲。”他这么说的时，我从没有回应过，也不理解。我几乎被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评价激怒了，对此不屑一顾。骄傲什么？他的骄傲和我目前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令我尴尬。他没看见我穿着睡衣在

屋子里走来走去吗？我不会因为被侵犯而获得奖杯。半裸着被丢弃能有什么尊严？我笑了，但什么也没说。

## 星期三

陪审员遴选的最后一天。卢卡斯会在晚上抵达。我很早就到了机场，不在乎四处兜圈儿。他肩上挎着西装袋，小跑着走向汽车。他用拳头做了一个快速旋转的动作，示意摇下车窗。他走到驾驶座边吻我，一个穿着黄色背心的女交通指挥员对我们吼，让我们继续往前走。“给我一点时间，女士。”

通常我一看到他就会放松下来，穿上他的大衣服，像一只寄居蟹搬进了新家。但我知道他只会在这里待四天，然后就要飞回去上学。这一次，我不能让他成为我的中心。

阿拉蕾说她第一次见到卢卡斯就松了一口气。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男朋友会让布罗克相形见绌。我想象着法庭的后墙分开，卢卡斯穿着西装轻松地跑出来，向鼓掌的观众挥手。“我们这里有一位魅力十足、有体面职业的商人，26岁！在业余时间，他喜欢木工、潜水和英式橄榄球。他带她去了印度尼西亚，他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幢高层建筑里。他打算通过两相情愿的交合与她享受浪漫。”

聚光灯会飞快转向，光锥包裹着布罗克。“他刚满二十，梦想成为一名奥运选手！她从未见过他，但他游得比鱼还快，还喜欢喝火球威士忌。他打算在户外的一地松针上和她谈情说爱。”然后就是我了，穿着花裙子，露出灿烂的笑容。“她狂野，富有同情心，傻，但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女孩！还是她会轻易放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长号发出刺耳的声音，灯光闪烁。“现在有请你们的主持人，尊敬的法官！”

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什么时候提起这个案子，卢卡斯都会目睹我尖叫、分裂，离开公寓，在被窝里哭，在卫生间里哭。每当我的呼吸终于稳定下来，他都会找借口出去跑步。不管是晚上还是下雨，我



都会看着他奔跑着消失在黑暗中。我觉得他已经麻木，被我的情绪消耗殆尽，我也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过这些情绪对他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他内心是否也有什么东西在作怪，一种使他狂奔的愤怒。那天晚上，当我看着他准备第二天早上去做证，他擦鞋、熨衣服的严肃态度让我一动不动，所有的嬉闹都消失了。

## 星期四

我醒来时，卢卡斯已经梳好头发，把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今天做证，而我是在明天。我打算开车送他去法庭，去GAP买一条商务裤。蒂法妮会在晚上到达，他们两个都到家了，我终于可以打开文件夹，一口气研究完。我明白我应该早点看它们。但你不能一次做一点，不能每天都做。我没有能力控制这些材料所带来的汹涌的压抑和焦虑感。读一小段就是把染料滴进水里：你无法阻止染料扩散，把一整天都毁了。所以我宁愿一次做完。

我随便套了条牛仔裤。我在找一只袜子。一声铃响：阿拉蕾发来的短信。“可能会多出些额外的时间，所以做好出庭准备。”我慢慢地倒在地板上，惊恐在滴答作响，就像快要着火的炉灶。“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没有裤子。我不行啊，我还有几个小时？”我用手指梳了梳头皮，“我得洗头了。”我开始把衣服从抽屉里扔出来。我坐在那里，双颊湿漉漉的，疯狂地眨眼睛，来回踢脚想把牛仔裤脱掉。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升级，我在计算还要多久才能准备妥当。如果我今天出庭做证，没有人会在那儿陪我，我的律师计划明天才来。“我又要孤零零一个人了，我不行的。”

卢卡斯走了进来，看见我穿着内裤乱踢，衣服像疲倦的海洋生物一样堆在地板上。“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我得做好准备，”我说，“我今天要去，我没有裤子。这件夹克太皱了。”我又回到了7岁，弱小无助，想起要去上学的早晨，伤心欲绝，“我没有衣服穿。”

“告诉她你更愿意明天去。”他说。我看着他，好像他疯了一样。“我不能。”我说，“有一个时间表。你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法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我准备一下。我需要学习，我时间不够。”我怒气冲冲，直到我听到他响亮而坚定的声音：“没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没有你他们办不成。如果他们必须等，他们就会等。这件事你说了算。告诉她你明天才能去。”

我光腿坐着，头发乱蓬蓬的。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坚持自己的立场，除了盲目地服从，我还能做什么？我已经习惯于接受每一次行程的改变，接受每一个被问到的问题，不管它是多么令人沮丧，多么私人，多么突然。我忘记了还可以有界限。我起了条信息草稿：“嗨，阿拉蕾。嘿阿拉蕾！可不可以如果。我觉得如果这样更好。你好，希望一切都好。我想为我的妈妈和我的奶奶。抱歉。我今天不能来了。早上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按计划明天去。”

她说那也行；如果进展太快，她会设法拖延。这么简单，我只要开口问就行了。“好点了？”他说。“好点了。”离卢卡斯出庭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开车去了埃尔卡米诺街上的浮木简餐店。我穿着牛仔裤和皱巴巴的夹克，脚上穿着破烂的鞋子，坐在阳光下，感到如释重负。我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天。我把他送到法院，看到他穿过前门才离开。他结束后会给我发短信。

我走进Gap。“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一名员工说。很多啊。我想说。三个小时过去了，卢卡斯还没有消息。我买了灰色直筒裤和便宜的黑色平底鞋。终于收到了去接他的短信。“怎么样？”我问。他说他们甚至还没有进行到对他的盘问，他们明天会继续。在一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预测会有额外多出来的时间，但实际上他们时间不够。排在他前面的做证程序比计划进行得慢，他在受害者休息室里等了三个小时。我觉得很糟糕，没有人在那儿陪他。“很难让肾上腺素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承认有什么事是困难的。那天晚上，蒂法妮很晚才到，因为期末考试没睡好。

每个人都回家了，我准备好了潜入水中，回去见那三个自我。记忆常被认为是受害者的弱点，我却相信记忆是受害者最大的优势。创

伤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穿越时间的方式：岁月在瞬间流逝，我们可以唤醒恐怖的感觉，仿佛它们就发生在当下。我把笔录摊在地板上。当我沉浸在过去时，地毯就像一条绳子绑在我的腰上。我用一只手轻轻地擦着地毯。在所有这些记忆中，没有地毯。我可以看到长长的湿头发团成一团包裹着我的脸，我的头耷拉着。我在强奸检查医务室。水灌进我的耳朵，模糊我的视线，堵住我的鼻子，流过我的嘴。外面有一条高速公路，车辆川流不息，一辆车停在路边。那是我的妹妹，她哭得那么厉害，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想过来接我。地毯。我坐在强奸检查医务室的塑料椅子上，头发湿漉漉的。蒂法妮坐在我旁边，疲惫，不安。我怎样才能让她感觉好些呢？地毯。我告诉女警官，请不要打电话到我家。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地毯。当他看着自己的膝盖，我看到他黄色的卷发，看着那些空座位，我哭了。地毯。

我擦了擦鼻子。泪水顺着我的脖子从衣领滑落，从胸膛滑落。在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边翻页一边打字，双腿抱在胸前。我列出了框架，1月17日的每一分钟，每一口酒，位置，评论，观察，渗透到我的脑海。混乱渐渐被秩序所取代。我在首页上写下鼓励自己的话：用真相了结它。我把记忆里所有的小洞都堵上了。我没有理会那个裂开的洞。这不是自怨自艾、喋喋不休、当事后诸葛亮的时候。努力研究这些材料。熟悉时间线。回到地毯上。

## 星期五

卢卡斯在日出时就醒来，去接受辩方的拷问，而我被安排在下午1：30做证。我本应该开车送他去的，但他吻了吻我的额头，叫我回去睡觉，所以我又缩回了他身体留下的温暖之中。几个小时后，我感觉阳光浸透了床，听到他从门里进来，眯着眼睛看他脱掉锃亮的皮鞋。他穿戴整齐地爬回床上，抱着我。我没问他进展如何。如果是坏消息，我还不想知道。

我的手臂穿过燕麦色毛衣，变成剪短了头发的埃米莉。我拿着睫毛膏犹豫了一下，轻轻地画了睫毛。漂亮，但不要太漂亮。化妆会使

我的眼泪变成黑色的污点，眼睛像在滴墨水。但是素面朝天会让我看起来很疲惫。

卢卡斯开车。我默不作声，坐在手上，端详着放在膝上的指导手册。我没有胃口，但我知道最好不要空着肚子。面包店没有地方停车，所以他靠边停车，我走进店里。我找到了米色面包圈的玻璃陈列柜。但我想不起任何一种百吉饼<sup>(3)</sup>的名字。她问我想要什么，我只是用手指了指。我拿着一个白色纸袋，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的。我盯着周围所有的陌生人，无法融入他们的谈话和咖啡构成的温暖现实。我推开门，拖着步子回到自己那辆沉默的车里，回到自己的笔记里。百吉饼又干又厚，难以下咽。

我们把车开到法院。我折下小镜子，检查牙缝里有没有留下食物的籽。“你确定没有吗？”卢卡斯点点头。他和蒂法妮会在外面等我。脸颊上的一吻。我下车，他走了。

我想让这一幕以我昂首阔步走过大厅开始，但当我跨过塑料安检框时，我感觉我的皮肤上竖起了一根刺，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以前见过那些警卫。我盯着走廊，空荡荡的，但我感觉上面有一堆尸体。我躲进一楼的卫生间，蹲在残疾人专用间的角落里，把文件卷起来，低声对自己说要集中精神。我的检察官给我发短信：“你在哪儿？”“在路上。”我的手一直在颤抖。

我闭上眼睛。我能看到法庭的内部，法官就像一个漂浮在黑色梯形上的光头，是这场比赛的调解人。队伍将被分成两方，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永远不能越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而我的身体已经做好了疼痛的准备。

再多的准备也无法保护我，使我免于消除自我，免于举止失当。即使在我离开之后，我也知道我的思想会在那里停留很长一段时间，耗费掉几个星期。

我走出卫生间，急切地按下电梯按钮。阿拉蕾溜出法庭，让我进入受害者休息室。她不得不回去整理一些证词；性侵应变小组的护士正排在我前面做证。我的心一亮：护士，这个比赛中的保护者。我想知道是哪个护士：我记得有三个围聚在我裸露的膝盖周围。我喜欢把

她们想象成一条披着白大褂的三头龙，有着能把东西咔嚓咬断的嘴，拿着金属工具，能击退任何在追赶我的东西。

我的新律师迈尔斯走出电梯。她体态优美，头发整齐，举止端庄。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很快，妈妈和安奶奶、雅典娜一起到了。“嗨，小香面。”安妮已经在里面了。我们把椅子挪来挪去，调整到适宜的位置。我能听到奶奶问迈尔斯她来自哪里，她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多久，她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我不听了，从头到尾翻看我的笔记。每次看完，就再把它们重新过一遍。每隔10分钟，我都会找借口去趟洗手间，最后一次上厕所，梳理头发，整理发夹，反复检查裤子有没有拉上拉链。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提醒自己这很简单：陪审团会对真实性、确实发生过的事做出回应。我的律师递给我一个小圆球，上面有橡子的图案，我在证人席上有新玩具可以捏了。雅典娜告诉我想象面前有一朵玫瑰：所有来自辩方的负能量将被玫瑰吸收，而不是我，这样我就可以坐在安全距离之外观察他的话语。我的心理治疗师说过：“想象你周围的女人们在你身后，抚摸你的肩膀，和你同行。”如果我愿意，我甚至可以召唤玛雅·安吉洛<sup>(4)</sup>。安奶奶拿出一袋黑巧克力。她还戴着我给她的枚红色小手推车胸针。我和蒂法妮小的时候，她会把我们装在一辆红色的金属手推车里，推着我们在巷道玩儿。我想起治疗师告诉过我的另一件事：“记住你是谁，你喜欢自己什么。”

现在，我想，随时准备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所有人仍然挤在房间里，在我们的小座位圈里膝盖碰着膝盖。我一定上了12次卫生间。终于有了敲门声。房间里的人都走了，在律师的引导下，每个人都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独自待了几分钟。感觉对了。当我站在证人席上时，我知道只能靠自己。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将不得不向内求助。完成这次做证所需要的一切，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需要知道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我需要成为的一切，我也已经做到了。

我放下包，闭上眼睛，站在寂静中。片刻之间，坐立不安的状态停止了，紧张的情绪也慢慢消失。在过去的一年里，雪落了又融，我的头发剪了又长，世界在不停地前行，我本可以继续前行，但我回来

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这个小房间里，放弃了有序的生活而继续战斗，这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什么都不算吗？

我把包放在桌上，走了出去，门在我身后锁上了。我走下走廊，湿漉漉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阿拉蕾和迈尔斯站在法庭门外。“你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叮叮叮。下去时深呼吸。她把门拉开。我紧握双手，再次深吸一口气，然后走了进去。

房间里的拥挤使我感到局促不安。走进咖啡店会让人焦虑。走进法庭，每个人都盯着我。我没有正视任何人。我感觉到的是形状，法庭过道两侧和席位上满是无形的躯体，比我在听证会上感受到的更加密集。我双眼盯着脚，告诉自己要走路。到你的证人席上去。

我无法告诉你在法庭上有多少男女，哪些种族，什么样的服饰打扮。一半的陪审团成员脸上可能都涂着老虎彩绘，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法官，我还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只知道他光滑的头颅和长袍的苍白曲线，在我身边出现的一道若隐若现的影子。

我听到：“你庄严宣誓……只有真相。”我的手抬了起来：“我发誓。”我把自己塞进掏空的椅子上，盯着阿拉蕾的眼睛。我被告知要对着麦克风拼写我的名字。我担心会把字母弄混，就慢慢地开始拼。

检察官：“你能不能把麦克风拉近一点？你的声音太温柔了。”

没错。就好像我的喉咙里塞满了绝缘材料，我的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但我仍能听到每一个字落入寂静的房间，被几十只眼睛和耳朵所吞噬。

第一个问题总是很简单；出生在帕罗阿尔托，有个妹妹，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主修文学，身高5英尺8英寸。我干得不错。“你体重多少？很抱歉问你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在麦克风前被问及这个问题。我担心如果我猜的数字太低，他们会认为不可能。我的驾照上写着140磅，但我上大学时体重是163磅。“可能是158磅。”我说。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变轻了，手腕细了，身体从不感到饿，裤子也掉了两个码。不管我有多重，我都不应该羞于说出来；一块石



头的重量和一头狮子的重量和一堆芒果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这些都不重要。

“好吧。现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月——2015年1月17日和18日的周末。”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这里要做的事情上。我们从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开始，然后转到墨西哥快餐馆，“哪家墨西哥快餐馆？”她问。我从来没有查过那家店的名字。扣一分。我想。她问我点了什么，一个墨西哥卷。加一分。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问题，盘问的过程像跳石头一样轻快；我妹妹的哪个朋友在派对之前来过我家，如果我认识他们，我见过他们几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我说过永远不会跟蒂法妮去派对，因为我觉得自己更像她妈妈，而不是她姐姐。我谈到了卢卡斯，他是谁，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住在哪里，你怎么维持你们的关系，你去看望他吗，你怎么描述你们的关系。

她问我是否参加过希腊生活<sup>(5)</sup>这种学生社团，是否参加过姐妹会，没有，没有。回到斯坦福，举行派对的确切地点，说出你的交通方式，确切的到达时间。

我：“门边有一张桌子，朱莉娅、蒂法妮和我站在桌子后面，就像一个小组，我们决定组成一个欢迎委员会。我们只是唱着歌，表现得真的挺傻。我让我妹妹很尴尬，但我绝对不是为了想引起谁的注意。”

检察官：“你是怎么让你妹妹尴尬的？”

我：“大声唱歌，跳搞笑的舞。”

检察官：“好吧。你能分辨出你妹妹是不是感到尴尬吗？”

我：“是的。她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我听到陪审团放松了，没有那么大的笑声，只是快乐地从他们的鼻子里呼出气来。我笑了，我总是笑着谈论我的妹妹，即使是在证人席上。我觉得自己放松了，问题乏味但无害，什么牌子的伏特加，倒入什么样的杯子，是不是免费的。

检察官：“你跳舞的时候，你怎么跳的？”



我：“挺可笑的。并不性感……手臂摆动，左摇右摆。”

我已经在新闻上看到了，据报道，受害者“左摇右摆”。我说到了出去小便。

检察官：“好的。我知道这有点具体，但你们是蹲在树后面吗？……你们俩有没有替对方挡住外面人的视线？”

我试着让他们明白，即使是在小便的时候，我也是小心谨慎的。在外面撒尿的女人和在外面撒尿的男人会被区别对待。她问是不是在篮球场附近。我再也没有回到现场。也许我应该去看看，但我却怎么也去不了。“我不记得了，”我说，“天很黑。”回到露台，看见比我矮的白人。我递给蒂法妮的淡啤酒，还有那些一口气喝下啤酒的人。

检察官：“你一口气喝下过整罐啤酒吗？”

我：“我不行。”

检察官：“为什么你不行？”

我：“因为这太难了。”

一阵轻笑声。他们能听到我的诚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200个问题过去了，记者们在后排胡乱写着。我承认不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没有漏过每一篇恶意的报道。她问我的下一个记忆。“我在医院里醒过来。”我说。

这事在我知道它发生之前就发生了。我的眼睛变得模糊，呼吸突然急促，我说不出来，看不见东西。

检察官：“在那之前你还有什么记忆吗？”

我：（证人没有回应。）

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从鼻子里流出来，我担心它们会从耳朵里、嘴里流出来。一切都温暖、潮湿、黏糊糊的，我的呼吸飘忽不定。我很羞愧，好像我在玷污自己，每个人都看着我擦脸，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辩方：“我很抱歉。我们能得到口头答复吗？”

我已经忘记了那个问题，关于记忆之类，我有记忆吗？

我：“没有。”

辩方：“谢谢。”

检察官：“你需要一点时间吗？”

我：“我没事。”

检察官：“这里有一些纸巾。”

我想把纸巾塞进嘴巴和鼻孔，堵住七窍。想让手顺着脸颊拽下来，抹去我的五官。阿拉蕾试图继续进行，我能察觉到辩方的愤怒。控制好自己。

检察官：“当你在医院醒来的时候，你能告诉我们——你知道那是几点吗？”

我再次在那种感觉中醒来，我的思想被困在白色的走廊里。我盯着外面，试图回到现在，看到周围的西装，尝到鼻涕的味道，用舌头舔干净上嘴唇，咸咸的。

检察官：“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感觉如何，你的身体感觉？”

我口齿不清，浑身冒汗，突然发现自己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出。

我：“然后那个——我看到了系主任和警官，他们问我——”

辩方：“反对。这是传闻证据。”

我惊得说不出话。

检察官：“这不是为了说明事实，法官大人，而是为了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和她对自己身处何地的理解程度。”

法官：“好吧。我允许——提——出这个问题。”

检察官：“当你说‘他们’时，你能具体说明是谁在问你吗？”

我：“当然。警官和系主任在跟我说话，问我是谁，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号码，让他们可以联系我。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被性侵了。”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这是传闻证据。”

我突然意识到对方的手掌紧紧地压在我的头顶上，把我按在水下，对我说：“不要上来。”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最痛苦的部分，想在陪审团听到之前让我闭嘴。我告诉自己要还击，你必须用力还击。

我：“我要去卫生间……他们说我必须等一会儿，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收集尿液样本。就在那时，我——我——觉得这事听起来很严重，因为我还没有——我以为他们是——”

辩方：“反对。传闻证据。这也是一种主观叙述。”

检察官：“所以当你说你想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们允许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但开始的时候被拒绝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收集我的尿样。”

辩方：“反对。请求删除记录。个人理解。”

法官：“好吧。我会删除‘最后去了’之后的话。”

个人理解？一切不都是个人理解吗？我的记忆像灯一样忽亮忽暗。她错了，闭嘴，快点，停下来别说了，如此受挫，继续，叙述，反对。我找不到方向。中断的感觉就像挨揍一样。

检察官：“你除了对自己身处何地感到困惑以外，还对什么感到困惑？”

我失去了控制，张开双臂分辩道：“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解释。然后他们告诉我，而我想：‘你们找错人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想：‘我只想找到我妹妹，然后回家。’”我尽情地说着，把肺里的东西都倒进一粒葡萄大小的麦克风里。喉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来，又长又响。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没有喝一小口水，没有优雅地轻抚眼角，没有说“我很好”，只是决定了，你要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事实，各位。这就是你做的。

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般疯狂的号啕大哭。但我终于不被打断地将答案倾吐而出。我感到狂躁，感到兴奋，每个人都被迫吞下我的哀号。冷静、镇定、集中、坚强。扯淡，我放弃了这一切，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已经失去了告诉我要蜷缩起来的小小声音，只想着释放、释放、再释放。

我听到检察官说：“法官大人，我们能休息一下吗？”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卫生间，我最喜欢的地方，逃避！我站起来，一个脆弱的贝壳，跟着迈尔斯走过过道，泪水还在从胸中喷涌出来。当我从亲人们那一排走过时，一阵耻辱感涌上心头，我真希望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一幕。迈尔斯领我走出漆黑的木门，我把脸埋在掌心里。

终于，到了平静的避难所。橙红色的瓷砖和发旧的盥洗室让我安静了下来。我很感激迈尔斯，她站在门口，充当我的守卫。我有点想拿出一面小白旗，把它扔进法庭的大门。我觉得丧失了意志，筋疲力尽。我的脸就像被毒葛和凡士林擦过一样，又红又亮，还脏兮兮的。我打开水龙头，把棕色纸巾放在冷水里，金属水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揉了揉浮肿的眼睛，闻到泥土的味道。我漱口，流鼻涕，吐痰，擤鼻涕。照镜子时，我发出一阵轻笑。

我意识到，我触底了，触底了。已经不会变得更糟了。在我的强奸案庭审的中途，我站在一个破旧的卫生间里，卫生间里只有一张卫生纸。我的尊严消失了，我的镇定化为粪土。我害怕发生的一切都会发生，都已经在发生。现在除了慢慢地爬出来之外，别无他法。当迈尔斯打开门，我身体里的指南针指引着我回到座位上。

检察官：“那么，香奈儿，就在我们短暂的休庭之前，我正在跟你谈论在医院里醒过来的事。你还记得吗？”

每次我都能看到自己睡在轮床上。现在我不想吵醒她，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能看见自己举起包扎得松松垮垮的手，眨巴着眼睛，四处张望。我想走过去对她说：“早上好，回去睡觉吧。”我悄悄地把轮床滚回救护车，我们让时光倒流。我又在颠簸的车上睡着了，医护人员把我送回地面。布罗克的手会从我身体里滑出来，我的内裤会套

回到腿上，我的文胸会盖住我的乳房，我的头发会变平整，松针会游回地面。我倒退着走进派对，独自站着，妹妹回来找到我。在外面，瑞典人骑着自行车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世界还将继续，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尽管我非常想要这个场景，但总会有未解决的问题：布罗克。我逃脱了他的控制，但如果他在那个派对上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也会在下一个派对上得到。我们被教导侵犯是可能发生的，但如果你穿着得体，你被侵犯的概率就会降低。但这永远不会根除问题，只会把攻击者转向另一个不知情的受害者，再实行暴力。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但我宁愿让他看见我在袖子上擦鼻涕，也不愿让他自由自在。一个小小的胜利。

我继续说下去，讲到我的内裤不见了，这时另一个器官似乎像水球一样在我体内爆开了。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的脸上竟然能产生这么多的水。我讲到有人给了我一条毯子，然后我睡着了。我担心，那天晚上我这么快就睡着了，这会削弱我所感受到的震惊。

检察官：“现在我要给你看几张照片，然后问你是否认得。我要给你看15号、16号和17号人像……香奈儿，我想让你看看15号人像。如果你认出那张照片，就告诉我。”

我不知道有我在医院里昏迷的照片。现在，放在证人席台上的是我的头部，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房间里，棕色的头皮上插着长长的赤褐色松针。我的肚子收紧了。是我，那是我。我感到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检察官：“什么——15号人像展示的是什么？”

我：“我的头发。”

检察官：“那么当你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发现头发上有松针——在你的头发上，15号人像展示的就是你刚才向我们所描述的吗？”

我惊呆了，我的下颚剧烈地颤抖着，仿佛牙齿都快掉出来了。他们还有其他什么照片吗？

检察官：“我要给你看16号人像，如果你能认出16号人像，你可以告诉我。”

我：“是。”

检察官：“那么你是——这是什么？”

我：“我的头和头发。”

检察官：“你还记得以这样的姿势躺在医院里吗？”

我：“不记得。我不知道还有照片。”

检察官：“你以前看过这些照片吗？”

我：“没有。”

检察官：“为了让陪审团能看到那张照片，香奈儿，我要再公开展示一次这些照片。”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转过身来，走向投影仪，大屏幕投向左边墙上。我直视着我的家人，试图与他们对视并警告他们，不要看它，看着我，看着我。但我看到他们的目光跟随着她，他们的头齐刷刷地转了过去，仿佛被她脚后跟发出的咔嗒声吸引住了。“这是15号人像。那是你吗，香奈儿？”我向左转身，我的头就在那里，一颗棕色的星球绑在某种背板上，布满了整个房间。

我看到妈妈用手捂住嘴。我想对着麦克风轻声说“妈妈”，但每个人都会听到。我环顾四周，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那张照片。我的眼睛开始发热，我的脑袋里跳动着，求求你们了，有人能遮住她的眼睛吗？我想说：那不是我，我就在这里，就坐在你面前。我紧握双手，蜷曲双脚，困在我的座席上，没有力量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

检察官：“那是你吗，香奈儿？”

“是的。”我说。

当检察官回到证人席上时，我的怒气已尽，眼泪也干了。我带着某种奇怪的既悲哀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超然地坐着。辩方可能会对着我大喊大叫，而我则会一言不发。布罗克要是把水泼到我脸上，我也不会动的。我以为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人，试图把伤害掩盖起来。但我

失败了。对于这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仅此而已。接下来的问题无关紧要。我不在乎结果，不在乎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我不相信玫瑰，召唤不来玛雅·安吉洛。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家”，我准备好回家了。

她让我描述一下性侵应变小组的检查。“侵入性的。”我说。声音很平淡，连续讲了打开的双腿、金属针和红色棉签。那种毛骨悚然不再使我害怕。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她给我看了我在听证会上看到的照片，那是我留在现场的内裤。“你的手机和内裤掉在这些灌木和松针之中，你对这里还有任何印象吗？”

我：“没有。”

检察官：“你是自愿和别人一起去那样的地方的吗？”

我：“不是。”

辩方：“她不记得。她不能做证——”

检察官：“法官大人——”

辩方：“——个人理解。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

检察官：“谢谢。”

我：“我永远也不想去那里我的——”

法官：“那——没有问题了。那么下一个问题。”

我在脑子里想完了答案：我的妹妹找不到我的地方。我说什么或不能说什么，都不重要。

检察官：“那天晚上，你去斯坦福的时候，有没有打算要见什么人？”

我感到有什么在闪烁，在摇曳，溪水中出现一个可以抓住的树枝。

我：“没有。”



检察官：“你有和谁勾搭上的打算吗？”

我总是在脑海中幻想回到过去。很多次，我试着想象他把我按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每次我都想象自己的眼睛突然睁开，高声尖叫。我的身体在他下面苏醒过来，扭动着，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我爬到他身上，挺起身，把胳膊向后再一甩，撞在他的胸膛上，我的膝盖像一根攻城槌戳进他的胯部，使他发出一声叫喊，一声哀号，还有他刺耳的呼吸声。我想象着俯身靠近他的脸，用拇指和食指撑开他的眼睛，把灰尘洒在他蓝色瞳孔下方湿润的粉红色眼睑上，对他说看着我，告诉我你“对此很享受”。你以为我软弱，你以为这很容易。我把手掌按进他的脸中央，血从他的鼻子里漏出来，弄湿了我的手腕。我会站起来，在他两腿间跺上最后一脚，然后走开。

检察官：“你有亲吻被告的意图吗？”

我抬头看着布罗克，他的眼睛已经在望着我了。我瞪了回去。受害者已经觉醒。也许你认为我永远都无法完成这件事。也许你以为，她没有记忆，但我永远不会让你忘记。

检察官：“你对他有兴趣吗？”

我想爬上我的证人席，手拿一支红色的大画笔，在法庭的后墙上用长长的红色笔画写下**NO**，每个字母有20英尺高。我想要一面旗帜从天花板上展开，释放出深红色的气球。我想把每个人的衬衫都掀起来，在他们毛茸茸的肚子上画上字母**N**和**O**，**NONONONONO**，两个字母像波浪在滚动。我想说，再问我一遍。问我一百万遍，那将永远是我的答案。“不”，这是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我可能不知道我小便的地方离房子有多远，也不知道我在那个1月某日的早些时候吃了什么。但我永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终于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从未征询过我的问题。

我：“没有。”

检察官：“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法官：“好吧。现在我们暂时休庭。”

我感到飙升的肾上腺素慢慢平息，从骨头深处泛起一股疲乏。交叉询问环节到了，但我却不想说话。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坐在树下，离开这栋楼。我的检察官告诉我已经4点了，时间不够了。一个奇迹。我可以走了，星期一继续。我拿起证人席上的纸巾，飞奔出门，把橡子球还给律师，给了她一个拥抱：“周末愉快，周一见。”

我独自站在停车场里，还在发抖，身边有一个年轻的警官。卢卡斯和蒂法妮在哪儿？天色阴沉，一切都是灰色的，没有阴影。我无心闲聊，感到慌乱又轻松，累得甚至不想表现出有礼貌的样子。我的电话响了一声。“我们在法庭旁边的比萨店等你。”我跟警官说了声再见就要走。他坚持陪着我，快步走着以保持步调一致。他问我进行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对周一要面对辩护律师有点紧张。他说，别担心他，他是个混蛋。他的诚实使我吃惊。我已经习惯了每个人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当他看到我笑的时候，他也笑了。“你可以应付他，”他说，“你会没事的。”

我转过身，看见卢卡斯和蒂法妮穿着水手领毛衣，他俩中间放着一个热比萨，看到我露出满脸笑容：“你还活着！”我把头靠在桌子上，脸颊贴着冰凉的木头。他们的双臂环抱着我，我松了一口气。妹妹在揉我的背，把我脸上的头发拨开。我饿了，开始把一片又一片的热比萨放进嘴里。我闭上眼睛，品尝着融化的奶酪、香脆的橄榄和洋葱、冰凉的可乐和松脆的比萨皮。卢卡斯拿出一袋毛毛虫软糖，让一条毛毛虫跳着舞啄我的脸颊，吓了我一跳。我很安全，渐渐昏昏欲睡。他们挖出了一个温暖的地方，不用询问也不用解释，我就可以钻进去。我的恐惧消失了，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地方。

夜幕降临，妈妈要我们去放春节剩下的烟花。我说我太累，不想放了。但她坚持要我们那天晚上放，就好像它们是快要烂掉的香蕉一样。天空一片漆黑。烟花被点燃了，发出阵阵噼里啪啦的光亮。爸爸站在跳水板上，两手各拿一支烟花，挥舞着手臂，疯狂地指挥着。妈妈穿着拖鞋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对着小黄花、椭圆塔形的仙人掌等一堆植物念着无聊的咒语，卢卡斯追着她。我跑去找蒂法妮，让她出来，因为我们的爸妈都疯了。妈妈给了我最后一支烟花。我看着那滋滋作响的亮光噼里啪啦地在棍子上燃着。在最后的光芒中，我妈妈

说：“为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愿我们所有人都健康，我们所有人都幸福，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愿未来是光明的！”小小的祈祷，3月里的新年仪式，无月之夜的五道光芒。

卢卡斯飞回学校了。整个周末我都在用一些无聊的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有些事情我无法摆脱。如果我在飞机上醒来，发现自己一直张着嘴睡觉，我也会感到很尴尬。我慢慢意识到那天晚上有多少男人看到了我的裸体。我数着：彼得斯（1），他追赶布罗克（2），卡尔（3），他蹲在我旁边。兄弟会的人（4，5，6，7）报了警。有人看到一个人（8）站在那里，用灯光照射我的身体，然后逃离现场。泰勒警长（9）被派到现场，有个人（10）把他带到了我身边。其次是警官布雷登·肖（11），他的搭档埃里克·亚当斯（12）。紧接着是医护人员史蒂文·范基昂（13）和他的搭档亚当·金（14），他们捏着我的指甲直到我短暂地睁开眼睛，对疼痛做出反应，然后又晕过去。整个过程中，我都躺在那里，露着乳头，光着屁股，腹部皮肤垂叠着，擦得锃亮的鞋子踩在我周围的植物覆盖层上。警察们蹲着，做着记录：“整个屁股都露了出来，左胸露了出来，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胸部一片狼藉。”我躺在地上被拍照。这些照片，包括在医院里的照片，将被放到投影仪上，让法庭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到这里，我数不清了。

我害怕星期一的交叉询问。我记得大学时的一个晚上，我一个朋友喝醉了，拖着一块煤渣砖一路走回家。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因为我需要一个门挡！”我们笑了，因为这毫无意义，但在他的世界里，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想法。想象一下在法庭上陈述这件事。“你不觉得煤渣砖有点不合理吗？你为什么不选个轻一点的？或者买一个真正的小橡胶门挡？当你找到它的时候，煤渣砖大概在什么地方？是你偷的吗？你发现它的时候醉到什么程度？你是开着门睡觉还是关着门睡觉？你开着门的动机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油脂》<sup>⑥</sup>是在9岁的时候，我喜欢桑迪，她穿着桃红色的裙子，马尾辫光亮如丝。整个电影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最后一幕。突然，一个穿着黑色皮裤、画着紫色眼影的女人出现了，我陷入

恐慌：“桑迪去了哪里？她还好吗？她一定转学了。她知道约翰·特拉沃尔塔背着她和这个满头乱发、烟不离手的女人鬼混吗？为什么没人担心？”我看到一群朋友跑过狂欢节，而桑迪却不见踪影，我悲痛欲绝。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少年时代，我讨厌《油脂》这部电影。

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我看到的是同一个人的两面。在当时，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她们的外表和行为完全不同，我们怎么能在另一个人身上认出这一个来呢？系带白球鞋怎么变成了踩着烟头的黑色高跟鞋？现在辩方将会创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他将给陪审团展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

## 第二周，星期一

每个人都回到原位，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在开始交叉询问之前，检察官让我穿上蓝色的新衬衫，手里拿着一支红色的马克笔站在法庭前面，我身后是一个大大的白色便笺簿。我有画画的冲动，想让陪审团说出物品和动物的名字，我能在他们面前画得栩栩如生，让他们在我变回埃米莉之前看到真实的我。

那张纸上有一条时间轴，看上去就像一根垂直的脊椎，在我之前做证的人用绿色和蓝色的记号在上面做了标记。检察官让我填写我尝试给朱莉娅和蒂法妮打电话的时间。我犹豫着，不愿在写字时背对着大家。于是我后退一步，与白色的便笺簿肩并肩站着，笨拙地弯着手腕，在纸上标出我记得的通话时间。我的红色数字歪歪扭扭的，夹在其他时间记号之间。她没有其他问题了。我坐了下来。

辩护律师站起来，眼睛没有离开笔记本。他是一个结实、强壮的人。没有问候，没有早上好，没有微笑。“香奈儿，关于你今天早上提供的有关屏幕截图的证词以及你第二天在手机上看到的東西，你不仅不记得任何对话，你也不记得打过任何电话，对吗？”

我退缩了一下，我的红色马克笔线条一下子消失了。他盯着他的记事本，好像那是我的简历，而这是一次工作面试，想知道为什么我

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参加面试。

“你在卡巴奥发之家和你妹妹站在院子里，关于这一幕你最后的记忆是什么时候？”

我说出了一个时间。

“你没有任何方法知道确切的时间。这只是你尽可能的估计，对吧？”

我已经觉得我知道的比我原来想的要少。

“现在，你做证说——从你周五作证开始，你给了我们你的身高和体重。你告诉我们的是你2015年1月17日的身高和体重吗？”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1月17日那天我的体重是多少。

“在你的证词中，你提到——关于去卡巴奥发兄弟会的计划——你说要和你妹妹一起去，但你觉得自己更像她妈妈而不是她姐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那么说有问题吗？他听起来很生气，好像有一百个人排在我后面等着跟他说话。他问我那天晚上有没有在特雷西德纪念联合会的停车场下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只是把这地方想成了一块柏油路。

“是在斯坦福书店旁边的停车场。”我说。

“在书店后面还是在书店前面？”

但两者都不是；是书店旁边的那块地，而书店就位于学校中心。怎么解释呢？他问我离我下车点最近的建筑是什么。但我不知道学校附近建筑物的名字。

辩方：“你也提到过，在你刚到卡巴奥发兄弟会不久，你假装欢迎别人，唱歌，让你妹妹尴尬。那是你当时自己决定要做的，对吧？你自己故意为之的。”

我：“与其说故意欢迎别人，不如说是犯傻吧？”

辩方：“犯傻。”

我：“是的。”

那样不好吗？犯傻是坏的吗？

辩方：“好的。你喝红色杯子里的伏特加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你一口气就喝光了，对吧？就像，一口闷。”

我：“是的。”

辩方：“好的。那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对吧？”

我低下头，意识到这是个糟糕的决定。

辩方：“你在大学里经常开派对，对吧？”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是把它当作一种指控，而不是问题。

我：“我开过不少。我不认为自己是派对狂。”

辩方：“嗯，你在接受询问时也告诉警察，你大学时开了很多派对，对吧？”

哪个警察？金警探？我那样说了吗？

我：“当然。我——”

辩方：“好。”

我：“我是个喜欢交际的人。”

辩方：“那么所有——”

我正在被打压。我的检察官打断了。

检察官：“法官大人，我请求您要求他们不要互相交谈——”

法官：“同意。”

检察官：“——并让她把答案解释清楚。”

法官：“让我们——我们一个一个来。下一个问题。”

辩方：“好吧。你以前也有过暂时失去意识的经历，对吧？”

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引向哪里。

辩方：“如果你以前有过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深夜，对吧？”

我：“应该说是我不记得的某些夜晚的片段。”

辩方：“那么——”

我：“——并不一定是在深夜。”

这是一场速度比赛，垫脚石在我的脚下消失。我不能走得那么快，但我决心跟上。

辩方：“嗯，当你接受警察询问时，你告诉警察，也就是德弗鲁特警官，你通常在深夜暂时失去意识，对吗？”

德弗鲁特这个名字并没有让我想起某张脸，她是那个留着长发的警官吗？我看着他扬起眉毛，听到他大声呼气，因为我花了太长时间而生气。

我：“对。是的。但我会记住其他部分。”

辩方：“好的。在那段时间里，你是否记得你的电话响过，好像有人试图联系你？”

我：“我想我把它设成静音了，因为我不喜欢它在我拍照时发出咔嚓声，我当时正在拍照。”

辩方：“你确定那天晚上把它设置成静音了吗？”

我：“我经常让它静音。这很简单，如果它是一个滑动设置，你只要划一下。”

辩方：“我明白，但这不是我的问题的答案。”

他放下拍纸簿，手臂弯向臀部，歪着头，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我做错了。我体内的一切都在发出警报，我的身体紧绷着，仿佛看到一条蛇开始盘绕。他显然很沮丧。我们还在讨论电话的事吗？

辩方：“我的问题是：那天晚上，你还记得当时把手机设为静音的特定情景吗？”

我：“我告诉你了，我总是设静音，尤其是在拍照的时候。”

他垂下双臂，摇着头，开始飞快地翻着资料。



辩方：“好吧。你还记得10月份在此案预审中的证词吗？有人问你这个问题——辩方律师，这在第50页，第10到21行。有人问你这样一个问题：‘那天晚上，你在派对上，手里拿着手机，手机的设置是响铃，如果它响了，你就能听到。那是可以听见的声音，对吗？’你回答：‘我相信它的设置是响铃。有时我在拍很多照片时，我会把它关掉，因为我不喜欢它每次拍照时发出的声音，所以我把它设为静音。我想当时它是自动的，声音也很大。’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对吗？”

被打败了，被我自己的话。耻辱。我研究得不够细致。我没有料到他会把我变成自己的敌人。他可以退一步说，我不是在指责你，我只是在重复你之前说过的话。突然，我盯着自己的脸想，我怎么能自己反驳自己呢？

我的检察官站起来进行再直接询问。

检察官：“香奈儿，刚刚你被问到了一个关于预审和手机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我：“是的。”

检察官：“辩方律师漏掉了那句话的最后一部分。你是否也说过，‘但我也有可能把它设成了静音’？”

我：“是的。”

她逮住了他。他故意把那段话读到中途就停了，把我后面补充的话给删掉了。她开始引导我离开我被逼入的角落。她问我之前的暂时失去意识是否和1月15日的暂时失去意识不同。我说过，在以前的暂时失去意识的场合中，“我从来没有在外面半裸过”。我想对她行屈膝礼。她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澄清：

检察官：“当你毕业搬回家后，你的酒量如何？”

辩方：“反对。与本案无关。”

法官：“反对有效。”

检察官：“你的酒力跟大学时代比——跟你大学时饮酒的时候比——有什么变化吗？”

我：“有。”

辩方：“反对。与本案无关。”

法官：“反对无效。”

检察官：“它是如何改变的？”

她试图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说明，在我遭受侵犯的时候，我的酒精耐受性跟我上大学时相比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他却把她的问题打掉了。我试图通过两个不同的过滤器——检察官的问题和辩护律师的问题——来讲述同一个故事。他们的问题创造了叙述，建立了框架来塑造我所说的话。

当我被检察官盘问时，我感到很沮丧，我被迫与痛苦的记忆面对面，让陪审团看到我的痛苦回忆。辩方的盘问让人透不过气来。他不愿像她那样打开情感：他想让我窒息，抹去我的特殊经历，把我抽象为惯于派对和昏厥的刻板形象，问一些技术问题，把我的鞋带绑在一起，强迫我绊倒。

在听证会上我还发现了别的事情：“对”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他在他的问题中植入了答案，而不是让它们敞开：“对吧？这不是对的吗？正确吗？对吗？”在旁观者看来，他似乎只是在核实事实。但其中很多都是错误的。这让我有意识地在陪审团面前反复对他的观点表示异议：他们难道不会相信那个似乎万事俱备、西装革履的男人，而是相信那个记忆支离破碎的女人？我是一直在对谁说“等一下，实际上”？整个过程中，我感觉他一直在往一个方向拉拽我的手，而我一直在拼命反抗。

当他问我有多少次喝到失去意识的经历，我说有四到五次。我察觉到房间里陡然一震，人们低头记下了这一显著的事实，笔在我周围飞舞，我停顿了一下。该死。我想。我马上意识到，到了晚上，我就会在新闻上看到这个事实。我想知道，当检察官告诉我要诚实时，她是不是并不是说要这般诚实。我应该说两到三次。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这感觉不对，因为我之前昏迷过多少次并不重要。这次昏迷仍

然不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撒谎或者为我的过去道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责备自己，我的性格缺陷让我的整个团队更加困难。

辩方满脸严肃，语调平板，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那么你的晚餐是西兰花和米饭？”我盯着他，等着他说出什么妙语，但没有发现一丝笑意。

结束得很突然。当我被准许离开的时候，我坐了一会儿，就像我转了很多圈，现在却被要求走直线。我匆匆走出法庭，下了楼，把自己锁在车里，让椅背向后倾斜，直到平躺下来。

我本应该如释重负，但我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好还是毁了自己的信誉。在一个字斟句酌的环境中，他为什么要以西兰花和米饭来结尾？在我离开后，我意识到爸爸可能做的是藜麦，而不是米饭——藜麦可能降低了我的酒精耐受性。我给检察官写了条短信，澄清“那是藜麦，不是大米，可以让他们知道吗？”，但我犹豫了，因为我知道她已经在忙着盘问下一个证人。我失去了机会。手机铃声的重要性是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看我的眼神，就像我侮辱了他的母亲一样。为什么这么生气？是设置响铃还是静音比较好？在我的案子里，哪种会赢？藜麦还是米饭？书店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失去意识是有三次还是五次？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所有最沉重的时刻，反而专注于各种细枝末节，其中许多细节我似乎都搞错了。辩方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问题，而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回答。

我闭上眼睛，又想起了他说过的话：“这不是我的问题的答案。”意识到他对我的回答从不感兴趣，我觉得自己实在天真。他早已知道他想要的答案：他只是想让我说出来。我还听出了一个潜在的模式：“那就是你当时决定要做的事情，对吗？那是你自己故意为之的，是你做的决定。”他给我的夜晚散布了各种各样的意图和糟糕的决定，暗示它们与最后发生的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你决定去这个派对，故意喝得酩酊大醉，要别人相信你就想跟那些毛手毛脚的人鬼混不就很容易了吗？我用手掌根部轻轻敲着前额，告诉自己：“白痴，白痴，白痴。”

我的做证已经结束，但现在是我坚强起来的时候了：几小时后，蒂法妮将出庭做证。当我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时，我又看到了它们：鲜红的圆括号般的指甲痕，看起来就像洒在我皮肤下面的红色止咳糖浆。不管我表现得多么镇静，我需要寻找发泄压力的出口，双手在证人席下绞握着，指甲像螃蟹一样互相掐在一起，要把对方掐死，而我却毫无感觉。

到家了，台子上有一张爸爸留的便条：“姑娘们，今天我会想你们的。记住，真实会让你重获自由。通心粉、奶酪、三文鱼和心灵鸡汤。要坚强！”一盘盛在玻璃锅里的通心粉和奶酪，因为放久而变冷，我用金属勺把它们挖出来。

蒂法妮在卧室里准备着，她穿着猩红色的上衣，换了一件黑色的，又换回猩红色的，汗流浹背，我用吹风机吹干她的腋下。我忙着帮她做点什么：我知道如果我坐在一边沉思太久，我就不会再让她回到那个地方去。

那天早些时候，在离开法庭之前，我看到一名穿着西裤、提着邮差包的亚裔男子站在走廊上。我曾听说一位DNA专家将出庭做证，我想知道那是不是他。我后来得知，他的名字是克雷格·李，是个法医生物学家，还有医护人员少轩·史蒂文·范基昂和刑事分析师艾丽斯·金。当我在家确保蒂法妮和我吃好饭、做好准备的时候，他们都在为我做证。我在照顾她的时候，他们也在为我俩而战。

她开车把我们带回了法庭。我问她感觉如何，但她被一只紧紧粘在挡风玻璃上的毛毛虫吸引住了，毛毛虫的细白绒毛在风中飞舞。她说我们得救救它。我说我们要迟到了，但接下来她把车开到停车场，关掉引擎。我解开安全带，在中间的驾驶台里找到了一张皱巴巴的收据。我走下车，把收据一点一点地塞到它的小脚下面，然后把它放进草丛里。当我回到车上时，她问我是不是看到它爬开了，想确定它还活着。我又下了车，确认它在动。直到那时她才允许我回到车里。

妹妹的两个朋友，伊丽莎白和阿努莎，都在休息室里。我很感激她们让这个陌生的世界变得熟悉了一点点。几个小时前还在哭的那个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乐观又让人安心。时间到了，我让律师和她一起进去。

不再需要我了，我应该回家了。但我还不想离开。我走过通往法庭的走廊。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人看到我，指责我试图偷听。我透过法庭门上的窗玻璃往里看。

我10岁的时候，妹妹8岁，那时我们在中国，去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游泳池很大，里面空无一人，像温室一样带着玻璃墙，水延伸得很远，仿佛形成了一道地平线。热气给玻璃蒙上了一层黄色的雾。这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工作日早晨，只有一个年长的女人在水面上来回划着。爸爸给了我一把铜钥匙，钥匙可以打开泳池另一端的一间私人更衣室，然后他很快就在入口处的一把椅子上睡着了。

我们打开更衣室，光着脚沿着长凳跑，这里全都属于我们。后墙上的一扇门通向一间小浴室。淋浴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开始用洗发水，泡沫把头发凝成尖尖的发梢。妹妹想回到游泳池，但打不开门。当然是她开门的方法不对，我走过去自己轻摇门把手，直到我意识到我们被关在里面了。她站在那里，穿着金属色的彩虹泳装，额头上贴着护目镜，胳膊肘支在小肚子上，双手捧着脸，满脸期待地看着我。我告诉她门有点卡，所以我们只好等爸爸来。我们静静地坐在淋浴间里，我把洗发水往头上抹，但这么玩已经不再那么有趣了。很快水就凉了。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喊“救命”。“数到三，喊一声‘你好’，好吗？”我说。我还没数到三，她就开始尖叫，我从来没听过她叫得这么大声。更让我害怕的是随之而来的寂静，没有脚步声，没有门把手的推搡声。

每当妹妹哭的时候，我就陷入沉思。我爬上洗脸台往外看。只有高速公路。我想象着我们光着胳膊腿，在满是半挂卡车的河流中奔跑。然后我注意到木门底部的通风板。我用手掌推第一块木板，直到它像破碎的骨头一样断裂。我弄断第二个。我弄断第三个，碎片散落在我膝盖周围。我的手酸了，我转过身去，想看看妹妹是否能帮上忙，但她站在那里，捂着眼睛。我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把六块木板都敲了一遍，直到只剩下一个木框，木框的每一面都伸出钉子，像牙齿

一样。我把每根钉子都掰弯，让它们离我远点，然后吸了吸肚子，小心翼翼地把胳膊和脑袋从洞口伸出去。钉子尖擦伤了我肋骨上的皮肤。我挣脱了，但锁还是打不开。我伸长脖子从木框里望着妹妹，说：“待在这儿，数到一百，等你数完我就回来。”我跑过游泳池，把爸爸摇醒。他一睁开眼睛，我就哭了起来，喊着妹妹的名字。

爸爸找了个人来修门把手，而妹妹在另一边独自哭泣。那人说这门有时就是会卡住。我很生气，你看到我妹妹被困住了吗？门开了，她跑向爸爸，我看着那一小堆碎木头，心想：我把我们救出来了。我会找到办法的。

我穿着黑色外套，站在铺着瓷砖的走廊上，透过法庭门上竖直的薄窗凝视着里面。我可以看到她坐在那里，在房间的最前端，她的头在麦克风前，只有豌豆大小，嘴巴在动。我想把手从门上伸进去，像机器里的爪子一样，把她轻轻地拉出来，抱在我身边，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我的眼睛灼痛，因为我看着她，被困在门的另一边。

我和雅典娜约在一家面包房见面，一边等着蒂法妮，一边在雨中吃着杏子哈曼饼<sup>(2)</sup>。快到下午5点了。我们走向法院，期待着我妹妹随时会出现。只有一个记者站在外面。媒体不能和我说话，但她紧盯着我们。她倾斜着手机的样子让我怀疑她在拍照。这让我很紧张，所以我们从安检口走了进去，这时候电梯门突然打开，布罗克出现了，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家人和律师跟在后面。我以为他们会停下来，后退，这里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们是不能越过的。但他们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朝我走来，我没有时间移动，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好像我无足轻重，而我只是背过身站着。当我透过他们的眼睛审视自己时，我缩小了百倍，只不过是一个神志不清的受害者，是他生活中腐烂的污点。突然，我的律师出现了。她说蒂法妮已经在车里等着了。

我们坐在停着的车里，车窗一片模糊。她说等雨小一点我们就走。我知道她的意思，她需要不动脑子地坐一会儿。我知道她做证的时间不够了，明天早上她还得再来一趟。我想问她事情进展如何，告诉我一切，但又心生疑虑，担心我们会被指控互通消息。即使在一辆

被大雨的轰鸣声封锁的车里，我也害怕被人注视，害怕做错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止谈话。

那天晚上，我们看了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把所有的事情都抛诸脑后。她的手机响起，打破了寂静。是我的检察官，妹妹从放映厅里溜了出去。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湿湿的。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屏幕。“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搞砸了。”她说。我的安慰毫无用处，因为她坚持说我不明白，我不在那里。我讨厌我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得知妹妹做证说，那天晚上她离开我时，以为我会没事。辩护人以此辩解说，布罗克找到我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状态很好。如果他们能证明布罗克真的相信我是在清醒状态下同意的，他们就能顺利结案。“我是说我以为你会没事的。”她说。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她没想到她的姐姐会被强奸。阿拉蕾打电话告诉她，她需要澄清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辩方明天会在这一点上对她发动攻击。

我准备好了抓起钥匙，径直走出门去。我真想把车开到辩护律师家，跑上铺着地毯的楼梯，把穿着破睡衣、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的他叫醒。我要掀开棉被毯子，露出他毛茸茸的白腿和筒袜。我要问他是否知道他打扰了我的妹妹，他难道没法找一个该死的体面点的方法，这件事只是我和布罗克之间的事，看看白板上潦草的证据，我的血液酒精浓度，语音信箱，你还想要什么？因为我会终结你，所以你还想在这个过程中毁掉我妹妹吗？不知怎么的，这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过错，除了他。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在我面前崩溃，看着她试图承受这一切痛苦，我终于明白了。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自我意识，那挥之不去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错了。“不是你离开了吗？谁说她没事的？”他找到它，钩住它，把它注射进我们体内，让它生长，直到罪恶感充满我们全身。直到我们被自责淹没，被痛苦蒙蔽，失去看清真相的能力。

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俩被扭曲的现实蒙蔽，我们的话语被曲解，直到我们变得不确定，不可信，认为自己残



缺破碎。我们心甘情愿地把头撞到墙上，感到困惑，感到抱歉，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发声。我已经揭开了游戏的秘密：这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对耐力的考验。他的错误在于他在追击一个我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人。看，如果只是我在那里被攻击，我可能会退缩，退回到自我怀疑。但她呢？那天早些时候我被问到，当我说我对她来说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姐姐时，我是什么意思。我想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当一个人夹在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之间时，会发生什么，你读过那些被熊抓伤的事吗，那些被整个撕下来的脸。

我把精心打印的指南和鼓励的话都扔到抽屉里，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咒语：“操你的炒饭。”操你的你喝了什么、怎么喝、什么时候跟谁喝，操你的我在桌子上跳舞，操你的我在椅子上跳舞。你想要真相，整个真相，除了真相什么都不要？你的全部回答是，他弓着肩膀，垂着头，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全家都他妈的受到了伤害，为什么我丢了工作，为什么我的银行账户上只有四位数，为什么我妹妹没去上学？因为在一个凉爽的1月的晚上，我出去了，而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在那里，决定了是或不是，移动或静止，他想要操某人，有意图地操某人，而碰巧某人就是我。

这并没有使我产生缺陷。这并没有使我变得不够好。但这确实让我很生气。妹妹允许我看到自己需要看到的東西。痛苦，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我现在知道律师来这里要做什么了，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他相信他能打倒我们，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建造。

- 
- (1) 加州实行大陪审团制度，故本案的起诉由加州人民发起。
  - (2) “一致通过 (unanimous)”与“匿名通过 (anonymous)”音近。
  - (3) Bagel，又叫贝谷面包，以发酵的面团做成的环状面包，口感耐嚼，可添加不同配料做成不同的口味。
  - (4) Maya Angelou (1928—2014)，美国黑人作家、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非凡女人》等。
  - (5) Greek life，美国大学学生社团通常都用一至三个希腊字母命名，故通称为“希腊生活”，包括兄弟会、姐妹会等。

- (6) *Grease*，1978年上映的美国爱情歌舞片，讲述了高中女生桑迪与学校“硬汉帮”老大丹尼（约翰·特拉沃尔塔饰）之间的爱情故事。
- (7) Hamantaschen，又名哈曼的耳朵，是一种传统的犹太饼干，呈三角形，包裹不同口味的馅料。

## 8

尽管我不被允许进入法庭，庭审仍将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继续进行。我生活在奇怪的平行宇宙里：整天漫无目的地闲逛，晚上就查看本地新闻报道。星期二，蒂法妮完成了作证，我问检察官下一个是谁。“一个研究暂时失去意识的专家。”她说。我等着她告诉我她在开玩笑。我想说：我才是真正研究暂时失去意识的专家，对吧？那个专家，弗罗姆博士，布罗克一方付给她1万美元，让她在法庭上作证。她声称，即使我已经不记得那件事，我在当时也可能做好了准备，愿意并且能够表示同意。

星期三，布罗克作证那天，我系好了跑鞋。他会拿出一个经过仔细挑选并用于展示的新版本的我。他就像从盒子里拽出一个满是灰尘的人体模特，把她拖到舞台上，贴着她的臀部跳起奇怪的舞，拨开她的嘴唇，让她露出笑容，用亲吻来装饰她，把他写的台词灌输给她。我发现整件事情都很恶心，令人窒息，在那个小小的方形建筑里，我的身体卡在他的手里。我跑了好几英里，穿过蜿蜒狭窄的小径，经过一座座小山，下腹垂硕的马匹徘徊其间。

当天晚上新闻出现了，那篇文章在长方形的屏幕上闪闪发光。我眼前霎时一片模糊，重新定睛，思量着是否应该去读他说的话。我决定快速浏览一下，但当我看到一个很小的新单词“是”时，我停了下来。数一数他给了我多少个“是”：他说我“是”同意去跳舞的，“是”同意去他宿舍的，“是”同意他用手指侵犯我的。

我曾经上过一堂电影文学课，埃尔南德斯先生给我们展示了《大白鲨》<sup>①</sup>里的一个场景：主角马丁正要上船，向他的妻子埃伦告别。埃伦担心失去他，但她没有说“请小心，我爱你！”。她说：“我在你的——黑袜子里多放了一副眼镜，还有，还有你的东西，你鼻子用的软膏，百蕾适<sup>②</sup>润唇膏都在工具箱里。”作为回应，他也没有说“别担心，我会回来找你的！”，而是说：“不要用书房里的壁炉，因为我还

没修好烟道。”她点点头：“我该怎么跟孩子们说呢？”他说：“告诉他们我去钓鱼了。”

爱是含蓄的，爱是她收拾好的黑袜子，是他回来修理烟道的承诺，是保护孩子们的愿望，是对彼此生活的细致关注，是在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前给予彼此安慰的关切。最重要的信息是感觉出来的，而不是明确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对话。

然后我们来看看布罗克的证词。

我问她是不是要我给她用手指。

她回答你了吗？

是的。

她说了什么？

她说要。

他承认他曾试图亲吻蒂法妮。

检察官：“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有，她只是离开了。”

他说他脱下了我的内裤，把它从我的腿上扯下来，一直扯到两只靴子上。他说我高潮了。“我用手指摸了她一会儿，我以为她高潮了，然后——嗯，在那时候，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嗯啊。”当我读到这里，我从坐着变成趴倒在地板上，再躺下来。他说隔着衣服磨蹭生殖器使他的胃不舒服，说“当我意识到有个人就站在我旁边时”，他决定离开。他说他很害怕，因为他们说着“某种外语”。他说他们把他的手腕弄骨折了。当他被戴上手铐，他从来没有提到过手腕疼痛。现在他向陪审团解释他是如何打石膏的，他是如何遭受瘀伤和划痕之苦的。当布罗克解释说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害怕那些家伙会伤害他，阿拉蕾问：“你不担心他们会伤害香奈儿吗？”他说：“我没有回头看她。”在二年级时，我们有一种叫作绒绒币的东西，是一种五颜六色的小绒球。如果你表现好，按时交作业，你就会得到一个绒绒币作为奖励。布罗克的绒绒币数量一开始少得可怜。但在他做证那天，他带来了一

卡车的东西。它们在地板上倾泻而下，淹没了整个房间，没过他的膝盖，突然间，他有钱了，可以得奖了。我想知道陪审团是否会发现他的绒绒币是假的。

检察官：“你今天坐在这里，承认你逃跑了？”

布罗克：“是的。”

检察官：“那么你跟金警探说的是谎话，对吧？”

布罗克：“是的。”

受害者通常会自动被指责撒谎。但当行凶者被曝光撒谎时，这样的耻辱是不会长久的。为什么我们总是担心受害者会做出虚假的指控，却很少考虑有多少男人通过明目张胆地撒谎、贬低或操纵他人来掩盖自己的行为？

他把一切说得太简单了。如果我真的同意，他在被捕时就会告诉警察的。他创作的最新剧本太过厚颜无耻，以至于失真，太过方便，以至于令人难以置信。他重构的情节只是拙劣的写作，简直算得上是滑稽。站在这愚蠢对话的另一端是一种侮辱。

我笑着给卢卡斯打电话。“他说我想要！这种料太有价值了！这对我们好处，对吧？他完了，结束了。有人信这个吗？愚蠢至极。”但卢卡斯在电话的另一头安静了下来，他说他要吐了，并因此沉默了几分钟。当我听着电话那头的静寂无声，我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在变硬，怒火在腾起。“你得站在我这边。你得说：‘他个傻帽！’你得说：‘这个你可以搞定的！’”我没有生病，没有愤怒到闭目塞听的程度。我只是无法停下片刻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卢卡斯安静下来时，我的幻想动摇了，我看到了我所面临的残酷和压迫。法庭的规则不一定会保护我：宣誓只是一个虚幻的承诺。诚实只是用来要求小孩子的。布罗克会不加掩饰、理直气壮地说他需要说的，做他需要做的。他允许自己再次进入我的身体，这一次他把话塞进了我的嘴里，把我变成了他现实生活中的口技玩偶，把他的手放在我体内，让我说话。

星期四，法院关闭。我和我的朋友马特去了我最喜欢的印度馆子，坐在户外从一个金属罐里舀出橙色的米饭。桌上放着一份本地报纸，布罗克穿着西装登在头版。我瞄了几眼，不敢表现出太大的兴趣。马特浏览了一下报纸。我正咬着一个萨莫萨饺子<sup>(3)</sup>，他说：“你听说那个被强奸的女孩了吗？”我装傻。“最近吗？”我说。“不，那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他说。“哦。”我说。我感到潮水涨起来，我的头沉下去，然后水流干了，我再次回来。“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在这里臭名昭著，而且脸书上到处都是。”他说。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带走报纸，说里面有我想用的优惠券。马特在开车，我漫不经心地翻了翻。“你认为是她的错吗？”我问。他缩了一下，使劲摇了摇头。“晕，当然不。”他说。我只需要知道这些。我们开车去我家，马特在沙发上弹着曼陀林，而我试着和他一起弹钢琴，在第二天重新开庭之前享受我的自由。

星期五，也就是最后一天，布罗克的辩护律师请来了四名信誉证人<sup>(4)</sup>。里面没有斯坦福大学的人，这意味着只有了解布罗克过去的人飞来为他现在的自我辩护。这些人包括他青春期时的好朋友、前女友、他的高中游泳教练和高中法语老师。我也学了六年法语，但我从来没想过把桑夫人请来，让你知道我曾做过一场关于《小王子》的精彩演讲。他们来这儿想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把他的阴茎拿出来，从来没有摸过他的教练。

如果我可以进行一场表演，我会把布罗克放在地上的一具半裸的尸体上，而这四个人围着他站成半圈，用他们在法庭上说过的话与现场形成对比。以这位法语老师为例：“那种最极端的性侵或攻击性行为，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将其与布罗克·特纳联系在一起。”我会尝试录下“永远永远永远”，循环播放，让布罗克踩着每个“永远”的节奏插入。当布罗克脱去尸体上的衣服时，“我不相信他会做任何伤害任何人的事”。当布罗克起身逃跑时，教练会说：“我认为布罗克是一个非常谦逊有礼的人，你懂的，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他们的陈词滥调并不令人意外。我想知道的是，在一场旨在检验事实的审判中，为什么要留出几个小时来对他大加赞扬。他的生平包括他的童年、教育、暑期工作、恋爱关系。而我则是一到五次喝到不

省人事的历史。我的性格和他的性格一样在受审：我的行为、我的定力、我的可爱程度也在被评估。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是一个来自完整生活、被关爱所包围的人。

我的检察官在交叉盘问时没有浪费一丁点时间：

“现在，很明显——你有没有在他喝太多的时候和他在一起过？”

“没有。”

“你没见过他喝醉的时候吧？”

“没有。”

“17号晚上你没有和他在一起？”

“没有。”

“所以你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

“对。”

她的问话很简短，很快就证实了这几个证人毫无用处。她问他的法语老师是否曾经和他谈论过他的性欲望或性偏好，她说没有。当盘问他的前女友时，她说：

“你们永远不会在公共场合发生亲密行为，对吗？”

“我的意思是，定义你的……”

“当然。你们从没有在公共场合发生过性行为吧？”

“没有。”

“好吧。那是不寻常的吗？”

后来，有人向我描述了这位前女友脸上震惊的表情，当检察官问起公共场合的性行为时她抬起头的样子。我想说，是的，在垃圾桶后面发生性行为真的令人惊恐。检察官说，她唯一看到布罗克哭就是在他的前女友做证的时候。

我原本认为他们那些无关紧要的故事不值得我花精力去关注，但现在读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在庭审期间，陪审团被迫要做出选



择：他是健全的还是可怕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说的关于他的话都是真的。我需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帮你搬家、在游泳池里帮助老年人的善良的人，正是那个侵犯我的人。一个人可以同时具备这两面。社会往往无法理解，这些事实往往是共存的，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坏品质可以隐藏在一个好人的内心。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布罗克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姐姐。法语老师有三个女儿，游泳教练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和我年龄相仿。他们有女朋友、姐妹和女儿，但这些对我毫无帮助。不知何故，我与众不同，不在他们的同情范围之内。在法庭上，我的身份被简化为“他者”。

星期六，我以为在所有的证词都给出后我就会松一口气了。恰恰相反，我感到麻痹。我的控制力每天都在下降，事态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最核心的问题，一切都比我想象的更具侵蚀性而又更无关紧要。我在新闻上读到我是如何“无法克制地抽泣”，读到关于“那个女人阴部”的最新消息，读到“那个俄亥俄州人如何与那个女人进行眼神交流，如何将右腿搭在左腿上，如何轻拍自己的脚”。在网络上，有时看起来我似乎除了哭泣之外什么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基本功能开始退化：我不再睡觉，忘记吃饭，甚至不能正常大便。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精神萎靡不振，身体也开始萎缩。

妈妈打来电话。“你能去看看外公吗？”她开车把他载到机场，送他飞往中国。他装好行李，梳好头发，更新了护照，下载了戏曲，家里锅碗瓢盆都收拾停当，鞋子整齐摆在门口。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大家子在等着他吃一顿有腌芥菜、米粉和鹌鹑蛋的晚餐。但当他们到达机场使用自助值机设备时，他们发现他机票上有一个中文名字的字母打错了。航空公司拒绝让他登机，妈妈只好又开车把他载回家。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她让我去逗他高兴。开车去他那里的时候，我的火气上来了。

一个小小的字母怎么能阻止他飞行半个地球呢？我到的时候几乎没跟他打招呼。我走向电话机，开始打电话。当我对着一个无助的代理尖叫时，外公和他的朋友看着我，嘴唇微微张开。“他妈的他应该在

中国，你告诉我这有什么意义，你们一定有个办公室是开着的。”他从未见过我这副样子。我感到他把手放在我的背上，安慰我说我可以回家了，他们会处理的。但我被激怒了。就一个字母！我无法理解他所有的计划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打字错误而泡汤了。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会毁了一切？

在庭审中，所有的证据都已存档。但是如果有一个错误，一个微小的疏忽，一个字母的过失，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审员的脑子里漏进一勺疑团，一切就都结束了，不会有什么意外了，我们都会败北而归。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柜台上放着一碗煮鸡蛋，染上了浅浅的粉红色和黄色。我忘了今天是复活节。在一起强奸案庭审期间，只有爸爸还坚持，我们仍然应该在花园里的罂粟花中、在排水沟里、在鸟窝里寻找彩虹蛋。蒂法妮带着一大袋鸡蛋回到学校，开始她最后一个学期。我睡得很好，她逃离了正在下沉的船，回到了正轨上，钻研课本而不是笔录，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理论上我也可以离开老家，但我想跟进到最后。我留下来也是因为没有日常工作要做。

剩下的就是陪审团审议之前的结案陈词了。检察官说，她以前从来没有让受害人来旁听过结案陈词。她建议我不要去看她的前半场陈词，因为有太多的图片展示。陈词中途会休息一下，这样我就可以进来了。她似乎对我愿意来很是赞赏。“这样陪审团就会知道你有多在乎。”不言而喻的记分牌上会有更高得分。

星期一上午，我的家人和朋友为结案陈词聚在了一起。爸爸、妈妈、安奶奶、安妮和雅典娜都在法庭上。我这边的座席几乎和布罗克的一样满了。我独自坐在走廊的木凳上等待。我知道人们看到一些事情并一直瞒着我。但我把好奇心牢牢地拴在缰绳上，我想他们保护我是有原因的。现在，当我读到阿拉蕾的结案陈词，我略微知道了一点儿自己错过了什么。“她不知道被拍了这些照片……看看她的衣服，他把她搞成什么样子……但当她无法为自己说话时，这些照片代表了她。”

爸爸走出法庭，一边摇着头一边喃喃自语着从我身旁走过。我满脸惊愕地喊道：“爸爸。”他抬头看着我，脸上的紧张消失了。他看上去十分惶惑：“你看过那些照片吗？那天晚上你躺在……”我摇摇头。“你看上去像死了一样，”他说，“就像有人想把一具尸体塞进垃圾箱然后消失。如果这事没个结果，我会起诉的。”

爸爸不是一个会起诉的人。他用冰箱里的罐子酿蜂鸟花蜜，每个周末给喂食器添食。每当我越来越多说“恨”这个词时，他就会说：“小心，恨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他是那种在街上为吹单簧管的人鼓掌的人。夏天的下午，他一边做意大利调味饭，一边跟唱CSNY<sup>(5)</sup>的歌。但那时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一种新的愤怒，仿佛只要我一开口，他就会把整个地方都毁掉。

人们开始涌向走廊休息。我看到一个男人走近阿拉蕾，他的衬衫上有一个霓虹橙色的标签，上面写着“陪审团”，我觉得这很有趣，陪审团的成员们贴着标签走来走去，就像金吉达<sup>(6)</sup>香蕉一样。“对不起，打扰你了，”他说，“这个星期四我约了牙医，你认为我需要取消这个预约吗？”我对自己笑了笑，在她回答之前我就知道答案了。我的生活的味道，放弃的计划，未知的结局。

布罗克出现了。我本来应该躲在受害者休息室里的。他从我身边走过，他父亲把手搭在他背上，引着他向前走。他父亲低头扫了我一眼，然后抬起眼睛继续走。那只有一秒钟，但足以令我的五脏六腑为之一颤。这些都是我感受到却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些无言的冒犯没有被记录下来。他的兄弟姐妹们在走廊上徘徊。记者们逛来逛去。有个人上个星期把蒂法妮的朋友们逼得走投无路，想趁她一个人的时候顺便提几个问题。每天都有旁观者来围观。我厌倦了作为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而存在，他们书写我的故事，我却对此无能为力。

中间休息结束后，我和家人一起来到法庭。我喜欢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进来。检察官站起来面对陪审团。“现在，事实就是，这些类型的犯罪常常是机会犯罪。受害者是否美丽、行为举止是否得体、穿着是否得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能拒绝，她就在那里，而且她很脆弱。”我一直在点头，一切都明净透亮。

“审判是对真相的探索。现在，真相并不总是放在一个漂亮的包裹里，上面扎个蝴蝶结。有时候，他们会故意蒙蔽你看清真相的能力。”

她带我们浏览了一些幻灯片，比较了布罗克证词中不一致的事实，揭露了错误的推理以及新信息出现的方式。她将逃走的行为解释为内疚的表现。看着别人为我战斗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想象着自己通过她来说话，说着“串通”之类的话，说着“我要向你们证明”那样的陈词。她一点一点地抓住他论点的线索，直到他的马脚开始露出来。“我要请你们给香奈儿一个公正的裁决，明确他对她做的事是不可以的，他对她做的方式是不可以的，任何人都不能这样侵犯一个人。”

当她说完，我抑制住想鼓掌的冲动。

她坐下来，辩护人站了起来。有那么一秒钟，我打算溜出去。我想以这种饱满的高音结束。但是我听到“女士们，先生们”：为时已晚。辩护人首先要求陪审团裁定布罗克无罪。

“让我来解释一下。”他说，“‘当我离开卡巴奥发兄弟会的时候，香奈儿看起来很好，所以我并不担心把她留在那里。’谁告诉我们的？那是蒂法妮，她的妹妹。在这次审判做证的所有人中，有谁比蒂法妮更了解她？没有。蒂法妮最了解她……这就是她对她认识了一辈子的姐姐的描述。”

我起身到一半。但离开或留下都不重要，他会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打起精神，没有注意到我把妈妈的手几乎捏成了肉酱。她斜过身，在我耳边低语：“别听他的。”这些话让我重新镇定下来。

“我们从布罗克·特纳的证词和DNA证据中得知他把手指伸进了她的阴道。”我的双膝合紧。“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他并没有把手放在那里不动。他来回地摩擦。这与性侵应变小组护士的发现完全一致。所以她并没有对这个案子补充任何新信息。”阿拉蕾把我们推到了光明中，现在我们又被拉回到黑暗，逻辑被破坏了。妈妈低声说：“邪恶的小老头。”

为了解释布罗克的前后矛盾，他说：“所以人们不记得事情的细节是很常见的，尤其是那些发生得如此之快、令人情绪紧张的事情。”布

罗克头脑混乱是被允许的。受害者经常会因为创伤性阻塞和酒精造成的记忆空白而产生不一致的言行。他的前后矛盾则来自他在有律师之前说的话和他雇佣律师之后说的话。当布罗克被逮捕并接受警探询问时，我们之间后来这些所有想象出来的对话他都没有提，这并不是由于记忆缺失。这是因为他还没来得及找个律师来帮他构思一个故事，给他提供素材，拨开他心头的乌云，让他弄清楚哪个故事可以让自己免于责罚。

辩方的论据越来越弱，从我的指缝里溜过。他说我在语音信箱里听起来含糊不清是因为我和男朋友说话的“方式很傻”。他说，当我说我要奖赏卢卡斯的时候，“他完全明白其中用意……我认为这句话让我们对香奈儿在12点18分时的想法有了很好的了解……她说了两遍，她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他把手指放在香奈儿的阴道里……而且他是在她神志清醒时获得同意的，从他的所见所闻来看，他不可能相信她当时没有能力同意。”他拿着记事本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毫无热情的学生在念读书报告。“我希望你们能帮他卸下14个月以来的负担……”我本能地望向布罗克的肩膀。

我一直害怕辩护律师，怕到几个月来一直睡不着觉，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面色冷峻，神情憔悴，说了一段没有说服力的独白。这怎么可能是经过一年的调查之后所做的结案陈词呢？如果你要和我打一架，那就放马过来。但这算什么？所有这些人被召集起来，经过14个月的等待，忍受数周的辩论，所有这些伤害和精力都因为这个乏味的结局，因为“她的阴道，或者别的什么”之类的话而变成了一种浪费。当我的检察官在做报告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房间是围绕着她铸造的，所有的眼睛都跟随着她来回踱步。她说话时充满热情、迫切和机智，她的话摆在我们面前，使整个房间充满了理性和真相。我会感到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整个房间都在扩大。她尖锐但不恶毒，条理清晰：我们不是在追击你，而是在追击你做的事，现在我们要让你承担责任。

但当辩护人讲完，他的话并没有落地，只是飘浮在空中，几乎没有重量，没有着落的地方，更没有激发什么。房间里的空气静止下来，就像无风的帆船一样，我们所有人都坐在平坦的海面上。他结束每个句子的方式令我困扰，好像他自己也在质疑自己的论点，知道它们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

检察官站起来反驳。我想象着对方牙齿松动，挥动拳头——她所要做做的就是打出最后一拳，然后铃声就会响起。“我不打算反驳一切，因为坦率地说有些论点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被告抓住蒂法妮说香奈儿很好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免除被告的责任……在他把手指插入别人的阴道前，他有义务确保她能够同意，而不是她的姐妹认为她没事。”她把聚光灯转回到他身上，这才是它该照射的地方。她指出，要完成强奸，他所要做做的就是解开裤子拉链。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联想到一起：在我张开的双腿和他的勃起之间，唯一的東西是一条拉链上的小金啮齿。

“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先遇到一个男人，5分钟后阴道里就有了碎片。”没有一个女人。不只是香奈儿。没有一个女人。她，我，那个房间里的每个女人。这就好像她把我的鞋子扔到观众席上，让每个人都试穿一样。

“我们不是在论断你是坏人还是好人，但你那天晚上做的事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好的，是违反法律的。”一旦你剥去所有复杂的条款和形式，真相就变得坚实而纯粹。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永远都不能。这句话没有星号，也没有例外。

“别忘了这个案子里有个受害者受到他的侵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合理的结论，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合理的裁决，那就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有罪的……他在本案中的负担就是罪责的负担。”我又看了看布罗克的肩膀。我可以看到。

阿拉蕾找到我们，告诉我们回家等着。陪审团每天从9点到5点进行审议，裁决可能需要几天到几周的时间。一旦裁决结果出来，她就会给我发短信，我就有15分钟的时间赶到法庭。这意味着我得随时待命，不能闲逛到离法院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去。

星期二早上，我列出了一个名单，一旦裁决宣布，我就必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我穿上黑色平底鞋和衬衫，我小心翼翼地不让它起皱。我每小时都喷一次体香剂。我把头发紧紧地挽成一个发髻，看着它慢慢地耷拉下来。下午，妈妈教我如何做我最喜欢的虾。我们一起把虾去壳，剁蒜，撒辣椒片。水汪汪的灰色月牙形虾肉碰到滚烫的油，溅出的油在衬衫上留下斑点。我赶紧去洗。他们随时都会打电话给我的。

我上网查了一下，看到《圣何塞水星报》一篇关于香奈儿·多伊的文章。我开始颤抖，我的掩体被掀开，等待着通知一浪接一浪到来。这名记者曾和我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如此轻率地说出我的事，感觉就像遭到背叛。我的检察官修补了那个小漏洞，但损害已经造成了。我不相信任何人，无法逃避无处不在的入侵感。安奶奶告诉我，法庭上有个记者向她俯过身来，低声问她：“你们是什么关系？”奶奶挥了挥手让她闭嘴。我打电话问候她。因为听力不好，她错过了法庭上的大部分内容（一件小小的幸事）。相反，她主要关注的是肢体语言。她从检察官的姿势和表情中感受到了自信。她让我洗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衣。她说：“我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都在为你合十祈祷。”

太阳落山了，我没有收到阿拉蕾的任何消息。我脱掉平底鞋，蜷缩在床上。没关系。他们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但是胸口的感觉让我呼吸困难。难道他们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吗？

我知道我不会睡觉，所以我盖上被子，看《罗杰斯先生》<sup>(2)</sup>。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就被开场舞的动作迷住了：他走进来，脱下西装外套，把它挂在壁橱里，换一件毛衣，脱下工作鞋，穿上软底帆布鞋，系上鞋带。这个仪式保证了接下来半小时的掌控力和安全感。我躺在床上，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上的荧光，沿着视频的时间轴向后拖动圆点，回放视频片段，再看一遍。看着毛衣拉上又拉下，脱下又穿上又脱下又穿上，系上又解开。当太阳升起，我从毯子下面走出来，穿上我的黑色平底鞋，绾起头发，再次坐在床上。

人能在悬浮状态中活多久？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孤独的奶牛，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凝视着一座金属建筑，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巨大



的粉红色隔间，里面用链条吊着一排排白色肋骨。我身后是一片草地，微风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以下两种情况会发生一种：要么我将被绳子牵着走上金属通道，被搅成红色的肉泥，要么我将被释放到一个洒满阳光的牧场。在那之前，我只是站着，感受绳子在我的皮肤上痒痒的感觉。

太阳在天空中达到最高点，然后滚下来。4点钟了。如果陪审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没有做出决定，那么星期三就将结束。星期四是休息日。星期五休假。星期六。星期天。这意味着我至少还得再等四天。如果陪审团认为他是无辜的，我就不得不告诉自己，这种案子总是很难打赢。这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失败者。我试着让自己做好准备，但我知道，如果我输了，我会害怕自己接下来可能的举动。

卢卡斯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把电话搁在脸上，眼泪流个不停。他一直叫我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只是挠挠头，手指上油亮亮的。我的针织毛衣的领口松松垮垮，黑裤子上沾满散落的头发丝。他说话的时候，手机在我的脸颊上嗡嗡作响，一条短信。“出结果了。”我说，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挂了电话。

我朝卫生间走去。裁决结果将在15分钟内宣读。开车去法庭要8分钟，路上堵车的话要12分钟，也就是说我有3分钟的准备时间。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洗脸还是给别人打电话，是穿鞋还是换毛衣。我往眼睛上洒水，但中途停了下来，意识到我应该先通知大家。我转过身去拿手机，下巴湿漉漉的，大拇指湿漉漉的，手机屏幕上全是水。我不知道该按什么。我放下手机，匆忙地用手指梳理头发。我必须洗个澡，没时间了。我呆呆地站在水槽边，水龙头开着。那张列表。我在给奶奶打电话，长长的铃声太折磨人了，“出结果了。”我挂断电话，用颤抖的双手打出每一条短信。我的车钥匙不见了。我找不到我的手机了。它在水槽上。我走到客厅。妈妈和一个朋友坐在桌旁喝茶。我告诉她“出结果了”，她抬头看我，脸色突然变了，她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回到卫生间，从木抽屉里拿出唇釉，把它涂在我的嘴唇上，我看着我的嘴唇变得又红又亮，还带着点点闪光。我撕下一张厕纸，把它擦干净，我需要被认真对待。“这个能给你提亮气色。”她说。我看见她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唇釉，不顾一切地想

让我苏醒。我转过身，透过她的眼睛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这个苍白、瘦弱、眼神疲惫的人，一个忘了照顾自己的人。我转身面对妈妈，让她再次给我涂唇釉，然后我迫不及待地走出门外，告诉她可以在那里跟我碰头。

我的脑子已经进入了法院，而我的另一部分还关注着红绿灯。我像乘客一样坐在自己的身体里，望着窗外，仿佛在乘车，汽车像在轨道上一样平稳滑行，正确转过所有的弯。我担心自己是唯一在那里的人，短信发送成功了吗？他们会来吗？我不记得停车和到达，只知道我坐在第一排，现在是4点24分，雅典娜在我的左边，奶奶在我的右边，安妮，她们已经到了。

我能听到我的心脏不均匀地跳动，就像网球在烘干机里滚动一样。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得心脏病。对这么年轻的人来说可能吗？我需要在胸口刺一个洞来释放压力。法官正在讲话，但由于重重的心跳声，我听不见他的声音。一想到可能会在这里崩溃，必须离开，我就无法忍受，只能努力调整自己。我盯着阿拉蕾穿西装的灰色方形后背。我看见奶奶的手按在我颤抖的膝盖上。我把空气从嘴里挤出来，一只手平放在胸前，想象自己泄气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我让我的肺消失，我的心消失，我是一个简单的空壳，被无限的空气包围着。我慢慢地吸气，然后呼气，吸气，然后呼气。

我听到法官在讲话，仔细罗列了陪审团在审议时提出的问题。“最后，我们收到了陪审团的第五个问题，是陈述也是提问：‘与大阴唇内壁的接触或与小阴唇任何部分的接触会被认定是插入吗？’”我看到这个阴唇像一片生鱼片，在他们手中翻转，独立于我之外而存在。最后，法官问道：“五号陪审员，陪审团做出裁决了吗？”

一个男人从陪审团席站了起来：“是的，法官大人。”法官说：“请把裁决书交给法庭助手。”我没料到答案会写在纸上。我看到陪审团成员俯身将文件交给了一名助手。这名助手漫不经心地走着，就像把一颗大白菜放到他的购物车里，走，他妈的快走，穿过房间，把它递给法庭书记员。我真想跳起来，从她手里把它扯过来。

书记员站了起来，她蓬乱的金发在天窗下闪闪发光，眼镜反射着光，我看不见她的瞳孔，一件深粉色的衬衫，那张纸在她面前。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事实证明，整个审判过程中，她都在场，在我做证前宣誓时，就是她站在我面前2英尺远主持着宣誓仪式，但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意识里。她没有麦克风，没有麦克风！说话这么细软！我简直不敢相信。**大声点。**我向前倾着身子，眯着眼睛，好像盯着她的唇形有助于我听清。

“加利福尼亚州人民，原告，对布罗克·艾伦·特纳，被告，信息号码B1577162……”她读出每个数字。我要晕过去了……“陪审团的裁决：裁决。第1条，《刑法》第220（a）（1）条，重罪……”我只是在寻找“g”<sup>(B)</sup>的坚硬发音……“我们，陪审团裁定被告布罗克·艾伦·特纳犯有重罪，违反了加州刑法第220（a）（1）条，意图强奸醉酒或昏迷的人。2016年3月30日，首席陪审员，五号陪审员。”

某人被刺般的哀号穿透了空气。我的头猛地向右一转，看到布罗克妈妈脚尖直伸到空中，然后又猛地落回地面。她跺着脚，冲这个承受着寂静的房间大喊。他的父亲用自己的身体护在她身上，好像在保护她不受纷飞的箭雨的袭击。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很脆弱，我的脸张开，没有任何保护。我看起来如何？我应该有所反应吗？她的哭声试图插入我的身体，但我需要屏蔽掉声音才能集中注意力。我转身走到房间前面，忽略哭声。还有两项裁决。

女人继续读着，语气仍然很温和，数字太多了。但我听到了雅典娜亲吻我脸颊的声音。那一定意味着我们赢了两项，现在是两项。我感到房间里情绪的潮水在两边汹涌澎湃。有悲伤和窒息的庆祝，压抑的哭声，空气中充溢着难以分辨的声音。我盯着房间前面的这个女人，她金色的头发和玻璃般的眼睛，意识到她是一个天使。我最后一次听到“有罪”，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做到了。

书记员要求每个陪审员陈述他们的个人投票。她读了第一项罪名的裁决。“这是你个人的裁决吗？”一号陪审员回答：“是的。”她接着问二号陪审员。“是的。”三号。“是的。”四号。“是的。”五号。“是的。”我看到一个男人在陈述他的投票时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好

像这也是他的胜利。当他们发出这两个音节时，我看到了有人点头。这个陪审团，我心目中的一群人，开始分离成单独的个体。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去看清他们。我观察每一张脸，想要记住它们，描摹它们的轮廓，脸颊上的斑点，眼镜的宽度，发际线，睫毛，酒窝，鬓角。她继续读第二项裁决，他们又轮了一圈：“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她读到第三项，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吗？

[illegible]

这是一种纯净而恒定的节奏，不断地撞击着我。真相的朗诵。那一声声“是的”连续不断，就像带我们去往某个地方的脚步。当我的眼睛一个接一个地盯着它们时，我感到愤怒从我身上流走了，为其他东西腾出了空间。

我原本想我会去看看辩护律师那张可怜的脸，看到布罗克低着头，喊着要五彩纸屑，感受胜利的喜悦。但我认为不该那样做，也没有那种感觉。当我看着陪审团成员时，所有其他的声音都消失了。

这就像在水中回望沙滩时，才意识到自己漂流了有多远。我让自己走了多远。坐在这里如此渴望听到肯定答案的这个人是谁？我想起了那天早上的埃米莉，她站在淋浴间，挣扎着站直，周围都是蒸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成了一种声音，告诉她她是个耻辱，应该学会现实地思考。我告诉她，她应该受到伤害，质疑她的直觉。我多么想抛弃她，而又为她的生活考虑得有多么少。

我悲伤地坐着，吸着潮湿的空气，闭上眼睛，胸口颤抖。我走出法庭，痛苦太大了，我低下头道歉。我很抱歉。你没疯。那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我需要得到允许才能回到我的生活，等待着别人的认可。我向自己保证，今后我永远不会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答案总是“是的”“是的”“是的”。

话题已经转向，法官正在安排判刑的日期，到时候他将决定布罗克的刑期。他指着墙上的日历：“判决将在我们的日历轮盘上没有高亮显示的星期四进行。”我瞥了一眼那一排排小小的空盒子，有些方块是明黄色的。我几乎没注意到，判决是之后才宣布的。

检察官要求布罗克取保候审。但他从未戴过手铐，他的律师认为他应该继续保释。他将和家人一起乘飞机回家，在6月宣判之前，他将获得两个月的自由。我们可以走了。

我躲开那一排人，急于离开这个房间。我想离他家人的纠缠远一点。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炽热的能量，似乎要吞噬掉处于他们悲伤中的一切事物。一些红眼睛的家庭成员瞪着我，好像我是他们的敌人。我用我自己的红眼睛回视，毫不屈服。你们看错人了。

奶奶和雅典娜扶着我的手肘，我意识到自己正被她们拖着走。我们像游行一样走出法庭，媒体记者带着他们的包和小录音机聚在我们身后。我弓着背，将头埋在肩膀里，慌忙地挪动着双脚，担心如果我们放慢速度，就会被身后的人群吞没。我需要穿过门走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与公众隔离。

当我推开门时，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开始沿着墙往后退，挤进一个个小隔间。我还记得第一天来这里时，我胆怯地回答问题，妈妈给

我按摩着手。现在我回头看到阿拉蕾张开双臂向我冲过来。最后，我把脸靠在她的肩膀上，我们俩站在房间中央，抱在一起哭泣。

我们一小群人走进一间小会议室。没有庆祝，我们还在发抖，终于释放了被压抑的恐惧，心里知道我们离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结果有多近。“我曾经以为我的身体一文不值。我以为我不重要，但我其实很重要。”奇怪的是，我在点头，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检察官的眼睛又大又亮，她也在点头。如果你这时候问我关于布罗克的事，我会说：谁？关于他的念头已荡然无存。

检察官的上司罗森先生说，他为我们每个人感到骄傲，为我们所有的艰苦工作感到骄傲。事情会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好。他和检察官走出去对着摄像机和记者讲话，那些人站在大楼前的台阶上，就像小昆虫一样等着他们。在她离开之前，她递给我两个信封，信封的顶部已经撕开，她提前打开过，以确保里面没有伤害我的内容。我不知道信是谁寄的，怎么会有人知道如何找到我。

我告诉所有人去我家，我将在那里与他们见面。一名警官护送我穿过大楼的后门。到了外面，我最后一次转过身，看到保安们站在窗口，他们侧着脸在问着什么。我朝他们竖起大拇指，他们突然笑了起来，挥手，鼓掌，在玻璃后面跟我碰拳。然后我俯身躲在汽车后面穿过停车场。我要给蒂法妮打电话。

电话接通时她正在去给新生研讨班上课的路上。“我们做到了，”我说，“所有三项都成立。”她的话在我耳边噼里啪啦地响着，我们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此刻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因为我终于可以给她一些好的东西了，我内心深处如释重负。后来她说，当她站在教室前面时，她开始哭泣。她的啜泣变成笑声，全班同学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笑了起来。“对不起，”她说，“我只是今天过得真的很开心。”

我给卢卡斯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叫喊，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沿着同样的街道开车回家，但感觉焕然一新。有什么东西被剥掉了，我容光焕发。我看见曾经是南瓜地的停车场，我捉到水虫的小溪，学校舞蹈课结束后我们常去的塔可贝尔<sup>(9)</sup>连锁餐厅。我回来了，过去的自

我在我身后一一展示出来。我给了我们一个更快乐的结局。我终于回家了。

透过厨房的窗户，我在院子里看到奶奶、妈妈和雅典娜。我走进她们的怀抱，亲吻她们的额头。奶奶倒了一杯冷葡萄汁，在柜台上把黑巧克力块敲碎。我把巧克力塞进嘴里，让它在我的牙齿上融化，咕嘟咕嘟地喝着甜甜的果汁。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苏醒，妈妈柔软的双手抚平我的头发，轻柔地按摩着我的脖子。

奶奶说，她排练了一场演讲，以防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发展。我这才知道，如果事情没有如愿进行，每个人都准备要照顾我。雅典娜说，她很欣慰自己能站在那里，某种东西在她心中升起，就像她终于为自己曾遭受的侵犯赢得了正义。爸爸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你做到了吗？妈妈在吗？你还好吗？蒂菲的反应如何？”

夜幕降临，她们动身回家，厨房里弥漫着淡淡的薰衣草香。我预订了早上飞往费城的第一班航班，渴望再次成为香奈儿。我把所有满是汗味的出庭服装都扔进了洗衣篮，然后整理我的手提箱。爸妈偷偷把头探进来：“你确定早上就要走吗？我切了一些草莓，你想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带一件暖和的外套上飞机。”

我把这一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列成了一张表。他们走进我的生活，帮助我，不求任何回报。除了去过他们还给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他们。我抓起笔记本，画了12张小脸，从记忆中把那些愿意出来做证的人召唤出来。我记得包里有些阿拉蕾给我的卡片，就把它拿了出来。

第一张卡片上有一只猴子，上面写着“坚持住”，来自华盛顿特区。第二个信封是浅蓝色的，来自俄亥俄州，我曾对这个州产生非理性的恐惧。是一个叫纳迪娅的女人寄给我的。里面的卡片正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小女孩，穿着一件花外套，一双带褶边的袜子露在她的运动鞋上面，手里举着一块比她大三倍的长满青苔的石头。我打开卡片，看到龙飞凤舞的蓝色字母：



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你的事。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这张卡片时，我知道我必须为你买一张，因为这个小女孩让我想起了你的力量。

我寄这张卡片是想告诉你，你并不孤单。

我无法想象你经历了什么。

我们对你的勇气、坚韧和魄力感到敬畏。

要知道你身后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这个“你”听起来很英勇，很神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在浏览评论，寻找支持的迹象。我翻遍了本地报纸上的观点文章，想找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把自己锁在停车场的车里，对着热线电话哭泣，确信自己快要疯了。整整一年，孤独一直伴随着我，在工作的楼梯间里，在费城，在木制的证人席上，从那里我只能看见几乎空无一人的观众席。

然而，一直以来都有目光在注视着我，在他们的卧室、汽车、楼梯间和公寓里为我加油，我们所有人都躲在自己的痛苦、恐惧和匿名之中。我周围都是幸存者，我是“我们”的一分子。他们从来没有被欺骗，把我当成一个次要的角色，一具沉默的身体：我是前线战斗的领导者，整个步兵团都在我身后。他们一直在等我讨回公道。在我从未去过的州县、城镇和房间里，这场胜利将被静静地庆祝。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象自己漫步在干燥空旷的平原上。这张卡是水洼，让我意识到就在地表之下，有更多的水流向小溪、河流和海洋。这仅仅是个开始。我并不孤单。他们找到了我。

---

(1) *Jaws*，1975年上映的一部美国惊悚电影，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

(2) Blistex，又名“碧唇”，美国唇部护理品牌。

(3) Samosa，一种印度油炸糕点，面皮中可加入五香土豆、洋葱、豌豆、扁豆等蔬菜馅料或肉类。

(4) 在法庭中对涉讼一方人格名誉做证的见证人。

(5) 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要的乡村摇滚四重唱团体。

- (6) Chiquita，美国香蕉经销商。
- (7) *Mister Roger's*，全名《罗杰斯先生的邻居》（*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美国著名儿童电视节目，1968年起开始播出，风格温情治愈。
- (8) “有罪（Guilty）”的首字母。
- (9) Taco Bell，墨西哥风味快餐餐厅。

## 9

我半走半跑，穿过拥挤的人行道，经过煎饼屋，穿过旋转门，向我的心理治疗师宣布，这是一次彻底的胜利。我想要一枚情绪恢复奖章。就在七个月前，我还坐在沙发上，一想到要上庭就无法动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了，我们俩就是聊天而已，就像暑假前的最后一天。

“你听到这个好消息了吗？”我坐了下来，双手紧握在一起，“所有三项控罪都成立。”她祝贺我。我停顿了一下，感觉到自己脸上的变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内心的某种东西打开了盖子，我开始滔滔不绝，直到房间里的空气都被我的声音占据，“然后，然后，然后”，时间到了。屋里的空气吸收了我倾诉的一切，气氛依然紧张。我非但没有高兴起来，反而生气了。她几乎没有说话。

我两手插在口袋里，沮丧地走了回来。裁决本应将之前的混乱一扫而空。我还想要什么？我为自己还在生气这件事而生气。但我不应该感到惊讶。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宣布裁决结果的文章：“批评人士认为，陪审团对特纳过于苛刻，在一个充斥着酒精的模棱两可的时刻，他们却采取了非黑即白的态度。”上面说：“虽然特纳可能在6月2日宣判后上诉，但他曾经充满希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他非凡而短暂的游泳生涯如今已黯然失色，就像生锈的奖杯一样。”他的损失仍然是显著的。

宣判将在6月2日进行，他们建议我去，但不是必须要去。布罗克的三项重罪加起来最高可判14年监禁。我的检察官建议6年。她让我写一份受害者所受影响陈述，大概两到三页，讲述这次经历对我的影响。如果我想现场大声读出来，他们会给我买一张回家的票。如果我不想读，我的律师可以代劳。我必须在5月底之前交上去，确保法官有足够的时间事先审阅。蒂法妮和卢卡斯也可以写声明。这些都是可选的，我们有时间考虑一下。我说我会的，放下电话，把这事从我的脑

海中抹去。我有八个星期，其中七个星期我打算什么也不做，只去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回来的五天之内，我写了一部新的喜剧剧本，参加了试镜，并进入了春季秀的名单。在喜剧中，我可以不守规矩，蛮横无理，但不会受到质疑。在一次会议上，我们的主席文斯正在写我们的介绍。关于我，他说：“请给她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她生命中正在进行的唯一的事。”这符合人们对伴侣的刻板印象。“我是不是太刻薄了？”他说。我是笑得最大声的人：“那只有你知道。”

庭审结束两周后，我又一次踏上了“氦”喜剧俱乐部的舞台，我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欢呼。我被赞美和爱所包围。我们的团队从门票销售中赚了很多钱，我们去了费城的巴克利高级牛排餐厅。我从来没去过这么高档的餐厅，服务员拿着装在天鹅绒盘子里的餐刀走来，让我们每个人选一把。我切着软软的菲力牛排，希望能把那块肉换成能让我装进口袋的现金。这顿饭的花费比我的银行存款还多。

我羞于告诉卢卡斯或我的家人，我的银行账户几乎已经空了。一个月后，卢卡斯将毕业，搬到旧金山，工作机会摆在他面前。我将失业，不能出去吃饭，付不起房租。除了最后的开庭日期，我没有别的值得期待的事了。我打算再和父母住在一起，接着攒钱。我很高兴依然能选择我的旧卧室，但回到起点是痛苦的。

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别人：在晚餐和毕业晚会之间，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肩膀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在庭审期间，我为了熬过这一关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现在我的身体重新打开，却无力抵抗一阵阵袭来的痛苦。每当痛苦像呕吐一样难以遏制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锁在屋里，大口呼吸，眼睛刺痛。我害怕我的身体会一直诉说这些情节。我紧按水槽，打开水龙头来掩盖声音。你为什么伤心，我一直在想，你已经赢了。我不想让卢卡斯听到我的声音，不想让他意识到我仍然很受伤，无法让这一切过去。

我的收件箱里出现了一条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活动家米歇尔·多贝的信息，她要求斯坦福大学采取更多行动制止校园性侵。她也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不过我从十来岁起就没再见过她。上中学的时候，我

和她的女儿是同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我们骑自行车去百视达<sup>(1)</sup>租《魔女嘉莉》<sup>(2)</sup>，吃奇多，在小旅馆的睡袋里睡觉。

当我的故事第一次曝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看着新闻摄像机在米歇尔的家门口采访她，我在中学时代曾穿着满是泥巴的斯凯奇<sup>(3)</sup>走过那扇门。我需要她的智慧，但我知道，如果我和她说话，我就会被指责为心怀不轨。甚至《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也引用了一位批评人士的话说：“这位检察官是在迎合斯坦福大学女权活动人士的要求。”我看着米歇尔讲述这个案子，她没有意识到我是埃米莉，我为我们能如此亲密地共存感到着迷。很多次我都想说：那就是我。

不少报道文章中反复出现我妹妹、我的高中和大学的名字，她是根据这些推测出来的。她说她问自己的女儿，也是我儿时最亲密的朋友妮可，这是不是真的。我本想告诉妮可的，但她一整年都在印度学习乌尔都语。米歇尔和妮可都给我发了好几封道歉信，说“如果我知道我会帮忙的”。妮可买了一张机票回家来听宣判。米歇尔问斯坦福大学的学生领袖，他们是否有兴趣收集学生的签名表示支持。这些领袖写信要求至少两年的刑期，理由是需要树立先例，以遏制校园性暴力。她说，他们中的一群人可以集体戴着丝带来听宣判，但我太紧张了，悄悄地否决了这个想法，我想保护我的小小世界，精心挑选进入其中的人。我给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梅尔打了电话，她立刻从洛杉矶买了一张机票过来听宣判。我打电话给米兰达，她会带我去温泉放松。我告诉凯拉，她会翘班从旧金山开车过来。他们很快就制订了过来的计划，这让我很感动。我现在需要用两只手来数有多少朋友会来参加了。

4月过去了，5月即将来临。我还没有动笔写陈述，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很快就写”。检察官给我发了信息，我能在未来两周内给她发点什么吗？

在过去的17个月里，每当我想到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事情时，我都会把它记在手机的记事本里，并用布罗克名字的首字母作为标签标记出来。最后我坐下来搜索“B.T.”，出现了好几十条我写完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的笔记。我把所有文本复制粘贴到Word文档中，有了几十页

杂乱无章的笔记。我坐着一口气读完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我走出房间，有三天没有回到书桌前。

在多年前的写作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如果感觉一个话题太生涩，就把它放到一边，留待以后再讨论。创造距离。但最后期限已经定下了。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作业，要写出一份情感伤害清单。提示语令人沮丧。我为什么要记录自己也许会不可逆转地被毁灭的过程？我有一本“受害者影响陈述”的小册子，里面包括以下问题：“你早上醒来感觉怎么样？你多久哭一次？你每天有多少时间感到悲伤？你想过自杀吗？”

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未知号码的电话。我把它转到语音信箱。在信息中，一名女子称自己是缓刑部门的一名官员。我已经学会了谨慎。我打电话给检察官，问我是否可以和这个女人说话。检察官说，那名官员想让我对即将到来的判决发表意见，我应该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正在写一份可以分享的声明。

我很惊讶那个官员会打电话给我。我习惯了沉默寡言，很少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每项重罪都有最低刑期。我想象着这是她让我发表意见的善意方式，我期待着我的话真的值几个硬币，就像那些被扔进喷泉许愿的硬币。

我告诉缓刑监督官我在写一份声明。但她开始向我提问。我告诉她我受伤了，最令我伤心的是看着我的家人受苦。我把手掌放在额头上，闭上眼睛，努力集中注意力，回答她的问题，但总是还有更多的问题。我告诉她，我在一起校园枪击事件中幸免于难，凶手是一个从未得到任何帮助的人。我不希望布罗克脱离轨道，惩罚更多的女人，需要确认他可以接受心理治疗，在监禁期间可以上课。“所以希望你刑期不超过一年。”她说。我很困惑，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她解释说，我刚才提到了“监禁（jail）”，地方监禁（county jail）刑期最多一年。而监狱（prison）则没有上限。“哦，”我说，“他们在监狱里开设课程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布罗克能承认他所做的一切。我问她是否和他谈过，她说没有，但她下周会和他见面。我说我很难在不听到布罗

克回应的情况下完整地回答她。“你想让他明白这一点。”她说。她说她理解了。谈话很简短。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份陈述，写完后发邮件给她会更方便。但她说我的口头陈述没有问题，她已经大体记下了一些笔记，没有必要发邮件了。“你做得很好。”她说。我们挂了电话。

我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不适感。我真希望还有别人能听见我们的谈话。我告诉自己我有点多虑了，她会处理好一切的。

几天后，我接到检察官的电话，她的声音充满了忧虑。“你能告诉我你对她说了什么吗？”整整一年，我总是担心把事情搞砸，因为我知道得不够多：在证人席上弄错时间，在法庭上穿错衣服，用不恰当的语气说话。她解释说缓刑监督官提出了一个宽大的判决，说我只关心治疗，不关心监禁，暗示布罗克不需要进监狱。我想知道，为何我最终得到了一个我不想要的声音。法律是存在的，我想，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搞砸呢？

我告诉她我会再打电话给缓刑监督官，但检察官说太晚了，报告已经存档了。她会把缓刑监督官的推荐信连同布罗克的陈述一并寄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在自己的陈述中做出回应。我心烦意乱地打开了报告。

缓刑监督官只用了一段话来记录我的意见。她理解了我的话，却自己造出了句子，把上下文都抹去了。“我只是想让他好起来。”上面说。她给了我一种宽恕和顺从的声音，痛苦消失殆尽。她把我的痛苦降到了最低：“我没有从中感受到快乐。”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不需要坐牢。”这个女人，这个在整场战役中都缺席的女人，她来了，她要带走胜利。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爬出这个洞，我的手终于抓住了边缘。现在我却再次滑倒，眼睁睁地看着手指下的泥土变成泥浆。

这名官员指出，“受害者具有客观消化被告行为的严重后果的能力”，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词，“消化”。她错把我的力量当成消化能力了。也许她原本期待的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咬牙切齿、痛哭流涕的那种。她听不出我的肌肉是怎样紧绷的，也不知道



卢卡斯发现我通完电话之后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因为记忆的复活而筋疲力尽。

作为一名女性，我曾试图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又避免表现得自私自利或控制欲过强，所以我压抑了那个愤怒的受害者。现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处理得过于优雅了，我的镇定散发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他所做的事情并未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当我建议他去上课、接受治疗，她误以为这是一种体贴的被动、温和的宽恕。我的意思是要注意他的心理健康，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当男人难过、孤独或被忽视时，我们就可能被杀死。

“建议予以温和的地方监禁判决，正式的缓刑以及性罪犯的治疗。”我十分沮丧。“温和”这个词暗示他的罪行是不严重、低强度、可容忍的。这是在减刑：“与其他类似性质的犯罪相比，考虑到被告的醉酒程度，或许本案的严重性应予降低。”

她对布罗克做过询问，报告上说：“被告对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悔恨和同情。”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布罗克终于承担起了责任，她才建议量刑从轻。我打开了那个PDF：

“我发誓，如果（她）不愿意，我绝不会做这些事……我们正处于最激动的时刻。如果在任何时候我觉得她没有回应，我就会立刻停下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当成某个特殊的人来对待……在审判期间，我根本不想伤害她。那只是我的律师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我必须牺牲一切……事情可以在一个晚上从有趣变成毁灭。”他解释说，他一直在参与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公开反对大学校园里的饮酒文化和随之而来的性乱交”。

我不再读了，也不需要读了。当我翻阅这份报告时，我意识到报告底部有近40封信件，是由俄亥俄州的指导老师、教师和教练写的，并有他们的签名。我浏览了一下，然后停在他祖父母提交的一封信上：“布罗克是唯一对其他不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行为负责的人。”

还有另一张表格，是和我谈过话的警官填的。在受害人的种族一栏，她勾选了“白人”。我一生中从未勾选过“白人”。你不能在注意到我是“白人”的同时不承认我有另外一半是华人。这个简单的标记证

明，她只用了多么有限的时间来了解我，她仅仅通过打电话就设想我是白人，甚至没想到要跟我确认一下。

我不顾检察官说过的话，给缓刑监督官打了电话。消化你个屁消化，我会把手榴弹上的安全针拔出来，把她期待的受害者扔给她。我听着长长的清脆的铃声，争论在我的脑海中此起彼伏，但一段录音礼貌地请我留言，嘀的一声，然后安静下来。我挂了电话，手掌平放在桌上。我盯着一筒铅笔，墙上那张海滩的照片。一切都那么平静。没有什么能与我的感觉共鸣，我的愤怒无处可去。我啪的一声扔掉那筒铅笔，细细的笔杆落到了地上。“**我是华人。**”我尖叫着，用拳头猛击桌子，把椅子往后一甩，“**我是华人。**”

我走进客厅，卢卡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试图让我冷静下来：“没事了，没事了，发生什么事了。”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想让我也跟上他的语调。我推开他的手。我告诉他：“你需要生气。你读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我需要你生气。”我想让他发疯，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变成别的东西，我想让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想让他沸腾，想让他打碎东西。

性暴力被贴上“温和”的标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被激怒。也许一直以来他们不是想要平静，而是压抑、安静、克制。我的陈述将不再是关于我的感受的悲伤日记。检察官要我直接向法官陈述，但我要直接向布罗克陈述。我又给检察官打了电话：“我的陈述有长度限制吗？”她说，严格意义上讲，没有。

我拼命地打字，打得手指都蜷缩了起来。我推开桌子，绕了几圈才重新坐下来。愤怒会激发你，但过多的愤怒又会削弱你。现在。我必须现在做这件事。但我不停地中断，用手背摩挲着脸颊。我的身体承受不了，不能把我的愤怒汇聚到琐碎的按键上，我不能在身体崩溃的时候还在担心句法。

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梅尔，想要克服它。她说：“告诉我怎么了。”我解释了那些永无止境的障碍，那些空洞的道歉。当我终于停下来时，她说：“我刚把你所说的一切都打出来了。我现在把它发邮件给你。就用这个。”

那天晚上，玛格丽特·曹<sup>(4)</sup>同一家“氦”喜剧俱乐部表演。2015年，她发布了一段名为《我想杀了我的强奸犯》的音乐视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是主流文化中为数不多的亚裔美国人的榜样之一，我尊敬她，因为她毫不羞愧，为人坦诚。我坐在观众席的外围，看着她走出我曾走过的那扇门。她穿着红色高跟鞋，《杀死比尔》里主角穿的黄裤子，还有一件写着“OUI”<sup>(5)</sup>的黑色T恤。演出结束后，观众渐渐散去，我径直走向休息室，敲了敲门。两名保镖立即站过来，挡住我的去路。“我也是在这里表演的。”我说。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女人让我离开。我总是按照别人告诉我的去做，但我的脚像是在那儿扎了根。又有两名员工挥着抹布赶我走。突然，我看到玛格丽特的头出现在保镖的肩膀之间。我叫了她的名字。我说：“我也是个喜剧演员。”我们隔着男人们的肩膀交谈，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微笑着。我说：“我只是想说我喜欢你的音乐视频。”她谢过我，问我的名字。“香奈儿。”我说。她点点头：“很高兴见到你，香奈儿。”我们在男人们的肩膀上方握了握手，然后她就被推走了。

我转身的时候，有些东西掉了下来。我坐在一把木椅上，双手抱着头，开始抽泣。我停不下来。回家的路上，我放声大哭。我哭的时候试图挤出微笑，以免惊动街上的行人。我的愤怒被刺穿，绝望被释放了。她能理解当有人想让你崩溃时的感受。踢打和尖叫并不是你失去理智的表现。这是你站在自己一边的标志。你终于学会了如何反击。愤怒终于抵达，烧掉了胆怯。

但如何让他们倾听呢？我不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咆哮的受害者。我记得曾学过愤怒是一种次要的情绪，首要的情绪更接近于痛苦。我要让他们听到愤怒之下的伤痛。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把卢卡斯在我们第一次约会后给我买的空白招贴板用胶带粘好。我画了一条很大的路，一条环线，动物们坐着四轮马车和单轮脚踏车绕着它转：一只戴着围巾的鼻涕虫在风中飞舞，火烈鸟的脖子扭成一团，羚羊骑在摩托车上。画画，直到我的心又平静下来。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马特，他还不知道我是埃米莉。我周围的每个人都被训练得对布洛克和这个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抱什么期望。我希望有人能体验一种新鲜的震惊，听到以后刚开始会不理

解，“这怎么可能”。我觉得我疯了，我是疯了，我只是需要有人说“这让我也疯了”。我告诉他的时候，他的悲伤和沮丧使我平静下来。他是基督徒，他问我他是否可以为我祈祷，然后他就在电话里开始祈祷。他没有向上帝祈求力量，而是告诉上帝，他知道我有足够的力量渡过这一难关。

我已经很多次讲过自己的故事：但对我爱的人，我讲的是经过删查的版本。在法庭上，我只能通过别人问我的问题来发言。我拿出自己那本破旧的安妮·拉莫特<sup>(6)</sup>的《关于写作：一只鸟接着一只鸟》，这本书指导我读完了大学。她写道：“记住，你拥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你不能从别人的暗处写出来：你只能从自己的暗处写出来。”我将第一次讲述我的版本的故事。这是一封信，我写给布罗克的。

那天晚上，我对自己说，你要坐下来，然后你要感受这一切。黑暗、肮脏的东西会从你身上爬出来。场景会再次出现。你在每个阶段的不确定感和孤立感会再次被感受到。你会感到不舒服，感到悲伤。这不会有趣，会让人感觉不可能，但它将会完成。必须要完成。现在的我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去见那个在轮床上醒来的女孩，我们手拉着手，开始穿越可怕记忆的时间轴，让她慢慢地了解真相。打字的时候，我愁眉苦脸，常常大声说话，有时脖子上的皮肤发紧，我低声说话，我大声喊叫，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我发怒，我站起来，我瘫坐在座位上，我绕着圈子打转，但我脑海里的两个自我继续走啊走，现在的自我不断提醒过去的自我不要停下来，不要缩起来，就这样走过去。我一直写到当下，然后停了下来。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相拥，过去的自我消失了。那是早上7点，在九个小时里，我断断续续写了20页，我的第一份草稿。望向窗外，太阳正在升起。看看卢卡斯，他正平静地沉睡。我穿着睡衣吃了一些幸运符<sup>(7)</sup>麦片，听着寂静中勺子碰着碗的叮当声，淡黄色的阳光洒在建筑物上。我能看到下面有一辆公共汽车，一个小长方形的车停在那里，人们正在过马路。又一天开始了。我还好，这个故事并没有吞噬掉我。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起床后就把自己塞进椅子上，连牙都不刷。只有当卢卡斯把一个盘子硬塞到我面前时我才吃东西。往常享受的长时间淋浴变成了快速冲洗。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把这份声明

从头到尾大声喊出来，确保每个词正确无误。我担心邻居们会报警，因为我尖叫着：“**你已因为故意、强行、恶意的性侵被判有罪。**”我想在前门上贴一张小纸条：“只是在练习。”

我一直在拖延我的最后期限，要求多给我一两天时间。当截止日期终于来临，我把它寄了出去。法官在宣判前有一周的时间阅读它。

我几乎立刻就生病了。我完全失声。声音不是变得沙哑，而是消失了，呼吸之间只有空气刮擦的声音。我去来爱德连锁药店买了一袋柠檬薄荷止咳糖，但我的卡付款失败了。我迅速把它们推回柜台，点了点头表示歉意，然后离开。我上网查询银行账户，还有2美元83美分。这是我一年前找到第一份工作时自豪地开设的账户。我在房间里翻来翻去，寻找我可以退货的东西。我发现了一本书，收据还塞在书页里。是查尔斯·布考斯基<sup>(8)</sup>的《你有时如此孤独，这是有意义的》。我是被这个标题吸引才买的。我走到书店拿回了我的16美元。

卢卡斯毕业那天，我穿着他的黑色大外套，一言不发，独自走去典礼现场。他的父母飞过来庆祝。他们带我们去了一家叫“地火”的巴西牛排餐厅，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小托盘，一面红色，一面绿色。如果你把绿色的一面朝上放在桌子上，服务员会举着肉架蜂拥而至，直接把肉切到你的盘子里。红的一面则意味着我暂时很满意，请不用为我服务。我喜欢那种控制感，那种翻翻盘子就能让服务员围着我转的感觉，那种红色能让一切停止的感觉。

卢卡斯的父母仍然不知道案子的事。他们原计划在6月2日宣判那天全家一起去塔霍湖<sup>(9)</sup>，但卢卡斯告诉他们，他必须留在帕罗阿尔托“帮助一个朋友”，第二天他会开车去跟他们会和。我信任他们，总是感受到热烈的欢迎，案子从来都不是问题。被性侵并不是我愿意与大多数人分享的事情。这件案子的公共性使我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他们在新闻中看到这个故事的展开，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也牵涉其中，但我难以抉择：是我有隐私权还是他们有知情权？我也想让他们有机会在认识作为埃米莉的我之前更好地了解作为香奈儿的我。

在费城的最后几天，我们把窗台上的书装进箱子，把我一年里积攒下来的锅碗瓢盆都包起来。我在热可可机旁给安东尼留了一张卡



片，希望他在早上遛弯时能发现。我和坐在办公桌旁的女士们拥抱道别，此前我通过照片和故事认识了她们的女儿，我便买了马克笔和书送给那些女孩儿。卢卡斯和我坐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喝着冰冷的罐装汤。我问他能不能读一下他的陈述，他犹豫了一下，担心会伤害到我。我向他保证我会没事的。

“香奈儿厌恶谈论她被侵犯的那个夜晚……”他写道，每当我提起这个案子，就会在言语上变得充满敌意、心烦意乱、粗暴无礼。我想起摔碎的手机，还有那些尖叫比赛。我记得看电影看到一半，一场强奸戏在屏幕上展开，我大喊着“关掉它，关掉它，该死的遥控器在哪里”，我起身离开，砰的一声关上门。他写道，由于身体上的不安全感，我无法独自入睡，要一直开着灯。他注意到我有时离开公寓，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闲逛，需要独处。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期的更具侵入性、公开性，也耗费更长的时间。“香奈儿私下里允许我，也只是因为我们的亲密关系，偶尔瞥见那份伴随着对她身体的公开侵犯的痛苦……请不要将这种力量与一名男子公开性侵一名无意识状态下的女子所带来的深层次、永久性的负面影响，以及随后长达一年充斥着媒体的审判混为一谈。”我们已经努力将这一丑陋的事件融入我们的生活，现在它却在我们的关系中重新抬头，我为此感到心痛。

“……香奈儿习惯性地躲在我们公寓的卫生间里，锁上门……时不时地待几个小时。当我在附近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在卫生间的门后哭泣。”我觉得脸颊越来越热，突然感到不自在。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香奈儿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她在情感上的坚韧值得称赞。”

“对不起，”他说，“我以为这是份作业。你知道你有多厉害，对吧？”我点了点头，眼泪涌了出来。我有一点窘迫，但更多的是感动。当他被要求写一封信说明他注意到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没有说：“哦，我不知道，我当时不在那儿。”他本可以与我的疼痛保持一臂之遥，一段安全的距离，或者完全远离我。但他一直在卫生间门的另一边倾听着，试图设法照顾好这个新的我。

当蒂法妮把她的陈述发给妈妈时，妈妈回了几句话：“对不起我的蒂菲，妈妈没法读这篇，哭得太厉害了。”我鼓起勇气去读它。和我想象的一样痛苦，但其中又有另一种风格。

“你攻击她的那一刻只是开始：你把她拖倒时你自己也倒下了，因为你失败了。你看到一个喝醉了的女孩孤身一人，行动不便——你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呢？我正在找她。你几乎摧毁了她的精神，但你没有成功。你无法弥补你给她带来的伤害，你让我们经历黑暗，但你现在终于可以让我们自己疗伤了。我唯一为你感到难过的是，在你侵犯我姐姐之前，你根本不了解她。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我从来没有在妹妹身上听到过这种反抗的声音。“你失败了。别打扰我们。”我被她的力量惊呆了。也许我的妹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小。也许我在听证会后和她一起回加州理工是因为我害怕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想让她照顾我，在她上下课的时候睡在她的床上。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试图保持一种我可以毫不动摇、胜任一切、从不依赖的幻觉。但是他们已经看穿了。

朱莉娅也提供了一份陈述，但她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她在蒂法妮身上看到的变化。这真是令人震惊，这件事情的影响之广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想到我的痛苦时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凄风惨雨：读这些陈述却像看着整个天空变成漆黑一片。当所有伤害都被打印、摆放出来的时候，实在令人震惊。每个人都成了这桩罪行的受害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秘密遭遇。我需要找到一种净化天空的方法。

缓刑监督官的报告对我们来说是个障碍，但我写了12页的陈述，几个亲友写了陈述，还有两百多个斯坦福学生的签名，我们有机会。我被告知，我的时间有限，只能朗读陈述的节略版。我会集中在我想对布罗克说的话。我预计他至少要被关上两年，这将对他的告别。检察官说，我读完后，我们可能要离开法庭，因为如果布罗克被戴上手铐带走，他的家人会非常激动。我记得他们的跺脚声、哀号声，没有忘记伴随着胜利而来的痛苦和混乱。不管我有多生气，看到别人痛苦也不会让我快乐。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拿出电脑做着修改，手肘缩起来，只用两根手指打字。突然，坐在我左边一排的一位女士喊道：“他不太好，来人啊！”我看着她旁边的男人颤抖着，脖子像油灰一样向后弯曲，嘴巴张得大大的。他的T恤上印着全家福。他的小儿子抬头看着他，十来岁的女儿坐在我旁边。两个男人出现了，说他们是医生。当那位妈妈还在慌乱地做着什么时，我看到姐姐安静地示意弟弟过来坐在她的腿上。我看着她搂着他，然后平静地向医生解释她父亲的病史。我看着她盯着那些伸长脖子站在过道里的人。“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她说。我理解当公众观赏着你的痛苦时，你只想为你的痛苦盖上一条毯子的感觉。她的妈妈气急败坏，弟弟张口结舌，但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消化。

宣判的前一天晚上，蒂法妮开车从学校回家。她回来一晚，就得回去参加期末考试。她躺在我的床上，翻看着俄亥俄州人写给他的支持信。我看得出这让她很烦恼。我坐在书桌前，对我的陈述做最后的润色。我告诉她别看了，不要担心。我有更好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的焦虑消失了。我提醒自己，我去那里只是为了把事情搞定。那天早上我穿上了燕麦色毛衣。这将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法庭上穿它。我在手提包里放了一个馅饼。蒂法妮很早就去法院见她的朋友了。我拿着打印好的陈述走出家门，忘记带钥匙，把自己锁在门外，无法发动汽车。蒂法妮不得不回来接我。她开车时，我坐在副驾上修改台词，心不在焉，自言自语。当我们坐在受害者休息室里，我给卢卡斯念了几行：“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不可以？”

我知道有几个朋友要来，但我不知道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这一侧会是什么感觉。梅尔、凯拉、雅典娜、妮可、米歇尔和她的女儿、安奶奶、安妮、朱莉娅、迈尔斯、蒂法妮的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走出自己的生活来到这里。这个我以为只属于自己的沉闷世界，一个悲惨的领域，而现在它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我对自己说：“你现在明白了吧，你的亲人想要为你加油，你只要让他们加油就行了。”

我对迈克·金警探笑了笑，觉得自己所向披靡，甚至兴奋不已。但有几件事让我困惑。我以为自己会站在证人席后面，就像我做证时那样，面对着观众发表我的陈述。但这次相反，我会背对法庭上的每一个人，直接面对法官。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检察官要我写一份以法官为对象的陈述。布罗克和他的律师会背对着我坐在桌边。

我突然还想到，陪审团不会在那里，他们的席位是空的。我感到难过，他们不会在那里看着我重新找回我的身份，改写他们看到的我唯一的形象。在我右边，检察官的上司罗森先生坐在那里，腿上放着两张纸。如果进行得顺利，用一份讲话稿：如果进行得不顺利，用另一份讲话稿。他不停地用手指交替轻轻弹着它们。

我们坐在那里等候时，我意识到我的案子只是所有在排队的案子中的一个，每一排都坐满了陌生人。我们全家都看着一个男人因酒后驾车被判刑。接着，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年轻华人女子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沓薄薄的文件。她的声音颤抖，英语不是她的母语。她谈到了前未婚夫对她的身体虐待。她问法官她是否可以展示她被殴打后的脸部照片。法官勉强地笑了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看呢？”她举起一组大照片。她的下半张脸看上去被番茄酱粘住了。我听见他吸了一口气。慢慢地，人们意识到，站在她右边几英尺远、双手随意交叠在背后的那个男人，就是这样对待她的。她说她现在就穿着流血时穿的那件衬衫。当她说话的时候，法官的手举了起来，问她还要讲多久。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他有权利阻止你。她说她快讲完了，又接着说，努力加快说英语的速度。我的眼睛在法官和她之间来回切换，担心她无法把话说完。我可以看到她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我们快到最后一段了，我们差不多就要讲完了。法官再次打断她的话，提醒她我们需要陈述重点。他已经在整理文件了。她向他保证她只剩几行字了。她站在那儿，离攻击者几英尺远，用一门外语在异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但却被间接地告知：你的问题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这名男子被指控犯有严重的人身伤害罪，却要求从轻处罚。她说：“当我挨揍的时候，我能要求更好的待遇吗？”

我暂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这名男子将被判处72天的周末监禁，这样他就可以在工作日继续上班。我甚至不知道周末监狱的存

在。在周六和周日被监禁，周一再回到办公室工作。我被她那血淋淋的脸的形象给掏空了，而法官在她脚边催促，快点，快点。

有人在推我：“你准备好了吗？”我低头看着我的包，惊慌失措。不，我没有。我的陈述还没有删改好，需要划掉更多的段落，我的笔呢？我被叫到前面。我机械地站了起来，沿着这排座位往旁边挤，一边告诉自己要集中注意力，一边撞到别人的膝盖上。检察官站在我旁边。我试图把发言台上弯折的文件弄平整。就看着这些词，读下去。当我开始的时候，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就像我是在一座吊桥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来吧，找到你的路，你走了这么远才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还没读完第一页就被打断。别哭了，你已经哭够了。

然后我感觉到检察官的手，平放在我后背中央，把我稳住。她那温柔的手掌把我托在中间，告诉我：“我就在这里。”很快我听到人们抽泣，他们在哭泣。奏效了，他们在听。我想。我的讲述平稳了下来，我的能量恢复了。我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有多大，麦克风放大了我的叫喊声。我没有放低音量。我直视着法官，不断地与他对视，提醒他我还没说完。这次我把他的脸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指着辩护律师花白的后脑勺。他从未转过脸来面对我。我仔细端详着布罗克一动不动的侧脸，他那坚忍的侧影。我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指着他。我希望每个人都被我的声音所吞噬，在我的控制之下。

我说完最后几句话，全场鸦雀无声。我坐下来的时候，又回到了每个人的怀抱，就像从天而降一般，他们都接住了我。人们悲痛欲绝，痛哭流涕。他们俯身耳语，捏我的胳膊，揉我的背。我颤抖着，在他们的触摸中找回了自己。我坐到卢卡斯和蒂法妮之间，感到自己的胃变软了。我做到了。我让一切尘埃落定。就这样，结束了。

令我吃惊的是，布罗克的父亲站了起来。我很感激，以为他要代表他的儿子道歉。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有看我，而是径直走向发言台，调整了一下腰带，与法官对视。“布罗克愿意做任何事来让时光倒流，让那一夜重新来过。”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布罗克在小学的故事，每周的拼写测试，棒球，童子军。我眨了眨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一个受害者

说话，但没有人认识她，她能发出声音吗？他解释说，布罗克除了运动天赋以外，他首先是凭学业表现被大学接受的，一级联赛的很多教练对他都有兴趣。在法官耐心等待的时候，他的父亲停顿了一下，哽咽了。布罗克是游泳队里GPA最高的新生，获得了60%的游泳奖学金。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只有4%。

他解释道：“（布罗克一直）努力融入社会。事后看来，布罗克显然是拼命地想要融入斯坦福，并陷入了一种饮酒和派对文化之中。这种——这种被游泳队许多高年级学生追捧的文化，显然在2015年1月17日和18日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布罗克在斯坦福的短暂经历，我真的认为这不是最适合他的。”我从未想到乡愁也能用来当作辩护理由。他说布罗克的生活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再也不会是那个性格随和、笑容可掬、无忧无虑的男孩了”。

我们是来参加布罗克的葬礼的。“我总是很兴奋地给他买一大块肋眼牛排烤着吃，或者给他买他最喜欢的零食……现在他只为了生存而吃东西。”我能听到家人们骚动起来的声音。

“这些裁决从各个方面粉碎了他和我们的家庭。”他说起那些裁决，仿佛它们是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一种疾病。对什么的裁决？罪行。什么罪行？性侵。谁发动的性侵？布罗克。是你的儿子毁了你的家庭。但他永远不会这么说。

“在他二十多年的人生中，20分钟的行动让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一动不动。我只是想让他完蛋。

“他之前没有犯罪记录，也从未对任何人施暴，包括他在1月17日晚上的行为。”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直接击中目标，是专门发送给我的信息。我直视着前面空白的墙壁。我感到每一排的紧张气氛都在加剧，就像一场战斗即将爆发。布罗克的立场突然变得更有道理了。他生活在一个永远不会接受裁决、永远不会被追究责任的庇护屋檐之下。

接下来是布罗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一年多来，他在法庭上一直是一张沉默的面孔。现在他弓着背站着，手里拿着一张对折的纸。透过纸的光线只映出几行字。我凝视着那张轻飘飘的纸：从

我坐的地方吹一口气，它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我低头看了看膝上那厚厚一沓钉好的陈述，上面标着删改的记号。他的声音慢慢地传出来，每一个字都像从井里拖出来的沉重的桶，单调得令人不安。“我为这段时间的每时每刻感到抱歉……我的思想、我的心、我的身体都在为我给香奈儿、蒂法妮造成的折磨和伤害而痛苦。”

我想把我们的名字从他嘴里剥出来。他宣读的陈述只有十句话，只是一般性的道歉，并计划在1分钟内教育学生们“了解酒精的危害”。他拉着我们转了一小圈。我坐在那里，难以置信。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走到了裁决的另一边，但似乎又什么也没有改变。

法官下令暂时休庭。每个人都怒气冲冲，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天啊，会是什么鬼结果。我很不安，但我告诉自己没关系，这只不过是他们得到应有惩罚之前最后一次徒劳的挣扎。法官听到了我的话。

当我们重新开始时，法官引用我说的一些话作为开场白。他说他会大声读出来，因为它们与量刑决定有关。这让我充满希望。但法官说话的声音很轻，就像我们在图书馆里一样，他不想打扰任何人。他的目光落在他来回翻动的文件上。他重温了刑法典，在某个时候他说了“六个月”这几个字。我耐心地坐着，等着他宣布最后的判决。但很快他开始解释他的理由。他说“这是一个禁止缓刑的案件”，我想，是啊，好啊，“除了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的案子不同寻常。

“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被告是自发实施了案件，但他到底是喝醉了还是在完全清醒状态下实施蓄意强奸，在法律上醉酒的被告承担的道德罪责较轻。”我在缓刑监督官的陈述中也听到了这种观点。酒精能解除布罗克的道德罪责。

法官给出了一个又一个理由：他年轻，没有犯罪前科，没有武器，而且“受害者的经济损失程度并不适用”。他说，这起案件没有显示出犯罪的复杂性，布罗克没有利用信任或信心的优势地位来实施犯罪，被登记注册为性犯罪者已经是一个不利后果。“显然，入狱服刑对他会有严重的影响。”我挣扎着去理解，想要前倾去拍一拍检察官：“发生了什么事？”

他谈到“重罪判决会给被告的生活带来不利的间接后果。而这些都是很严重”。他说，布罗克亲友对他的人格评价显示了巨大的间接后果。如果我们惩罚他，我们也会伤害他的社区。“媒体对本案的关注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受害者，也影响了特纳先生。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案件没有公开，那么对被告生活产生的间接后果就可以最小化。”他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无法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保密。我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法官的话，但还是不明白。他接着把话说得更清楚了。

“第七点在于被告是否懊悔。这可能是本案中最矛盾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特纳先生今天来到我们面前，说他对他给香奈儿和她的家人带来的所有痛苦感到由衷的抱歉。我认为这是一种真诚的懊悔。而香奈儿表示，他并没有真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认为她曾经写过或说过‘他——他就是不明白’。所以你让特纳先生表达了悔恨，我认为，从主观上来说，他是真诚的，而香奈儿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悔恨，因为他从没说过‘这是我干的。我知道你醉得有多厉害。我知道你有多生气，但我还是那样做了’。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双方之间那座桥可能无法跨越。”

“香奈儿没有看到这一点。”是我，问题出在我身上。我没看到法官做了什么。我一直在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这里的原因，来跨过这座桥。我能看到法官在半空中折断了它，桥塌了，只剩我留在自己这边，而布罗克待在他那边获得细心照料。他周围的每个人都成功地把他们保护在他们的幻想里。我试图把他拉出来。法官相信了他。我终于感觉到地面在倾斜，一切都向他那边滑过去。

“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他主观上对事件的看法。而陪审团显然不认为事件是这样进展的……一旦陪审团做出裁决，每个人都应该受到裁决的约束。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个裁决，包括特纳先生。但我认为，他对裁决不是完全认同，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悔恨，因为我确实认为他的悔恨是真诚的。”一个道歉就永远有效不会变吗？如果他说对不起，但坚称自己无罪，这不是更像一种操纵而非和解吗？我看着他让鱼回到水中，游向深处。我一直以为法官是头颅，陪审团是身体。他们是一体的。但是陪审团已经来了又走了，现在只有头颅在说话。

“我认为他不会对别人构成危险……人格评价表明，到目前为止，他遵守了社会和法律规范，甚至超越了一般守法之人所做的。”如果说我们从这一切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布罗克实际上比一般人优秀。4%的录取率。这不是定罪的时刻，而是赞美的时刻。

“最后，我还发现另一个影响量刑判决的合理因素是人格证据——在庭审和与此量刑有关的听证会上均有所展现——直到该事件发生前，特纳先生过去的人格证据。”

“该事件”，“不幸的结果”，“20分钟的行动”。在游泳比赛中，一百分之一秒定胜负。然而，他们却认为20分钟是无关紧要的。20分钟只是个开始：谁来计算我们在全中国往返6小时的航班？谁来计算看医生的次数，花在治疗上的时间，花在躺着睡不着觉上的时间？谁来数去科尔士百货时，想着“这件衬衫是不是太紧了？”的次数？谁来数没有写作、没有阅读、没有创造，却在思考为什么我应该在早上醒来的日子？谁来数这些？

法官允许大家提出反对意见。检察官站了起来，迅速地还击了所有的问题。我很惊讶她能一下子把这么多要点连在一起。她指出，六个月的县监狱刑期实际只意味着三个月：每一天的良好表现都意味着他可以得到一天的减刑。6月、7月、8月。布罗克会在夏末回到家，远在感恩节之前。她说：“至少，应该保证一年的县监狱刑期——至少。”我们是如何发现自己处在乞讨一年刑期的位置上的？权力何时发生了转移？

我望着身边的人，检察官在奋力拼搏，每个人都在废墟中。我转过头看向他们那一边，他们下巴抬起来，双手合十，神情镇定。没有陷入悲痛和哀号——相反，有一种轻松的气氛，平静而沉着。他们一直都知道是吗？辩护律师一边站着，一边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称赞法官的英明。他重申，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法官应该判处缓刑，在县监狱服刑六个月足矣。

我最后的希望是缓刑部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站了起来。她说：“在听取了受害者今天的发言并审查了双方提交的文件之后……缓刑部门确实做出了一个公正而完整的建议。”我觉得我的胸中有点底气



不足，但还是一动不动。都是为了这一刻。“你被判处在县监狱服刑六个月。可以减掉一天。”因为他被捕时在监狱里待了一晚，所以他在判决中可以抵消一天。那晚甚至还不到一整天，我想。伤口上撒盐。

“你如欲提出上诉，必须在自今日起计60天内向本法院书记官提交书面上诉通知书。”辩护律师发言了：“我相信现在法庭上有一名律师，他将在上诉中代表特纳先生，他可以在法庭上简短地说几句话吗？”我转到右边，一个白胡子男人站了起来，他胸膛宽阔，提着一个公文包，穿着合身的西装，看上去有点像布罗克的老律师的翻版。这就是我下一个要对付的人吗？我转身面向前方。我以为我杀了一条龙，但这里有一条更大的龙。我太累了，不想和它搏斗，只想让这一切结束，蜷缩在它的嘴里。他声称已经准备好了上诉通知，并询问要提交到哪里。布罗克也许真的懊悔不已，但他聘请了一位权力更大的律师，把我再次描绘成一个说谎者、酒鬼和心甘情愿与他发生关系的人。

法官说了声谢谢，我们就获准离开了。

我感觉这是一出戏，我们在片场，道具随时都会被拿走，每个人都做得很好。这就是我们需要你做的，谢谢你的到来。“这就完了？”妹妹说。我内心冒火，说不出话来。我感到备受羞辱，真希望没有人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让人进来，为什么独自做事更好。我对自己表现出的这种戏剧性的感情流露，这种糟糕的情绪化独白，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怒。我没能看清房间里的情形。这太多了，太多了，但同时又还不够。

在小学，我们每天都要写日志。有一天，我们正在默读，老师在教室后面批改日志。我听见了我的名字，回头看见她把我的日记本举起来，书页松散地飘动着：“香奈儿，根本就没有1月42日这种东西！”我写过1月31日以后，接着写1月32日，1月33日，一直写到1月42日。全班同学都在笑，我羞得脸都红了。我忽略了这个世界上一些明显的规则。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现在法官把我的陈述抛在空中，每个人都笑了起来，我的脸发烧了。1月有31天，强奸犯获得三个月刑期；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我。

“我马上就回来。”我赶紧离开了法庭，还需要把我的手提包从受害者休息室里拿出来。我走到走廊尽头，试了试门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我转过身去看是否有人能给我一把钥匙，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我。我爱的每一个人都看着我，带着担忧，带着希望，而现在，更糟糕的是，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我很抱歉，因为那已经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以为我能拯救我们，但我失败了。我的话一文不值。

我看见朱莉娅在外围徘徊。她上上下下地挥着胳膊，声音哽咽，说着“我恨他，我恨他”。她代表了我们的感受，为我们所有人表达着这种感受，而我们却呆呆站着，焦虑不安，在打击中失去了知觉。

检察官拿着钥匙出现了。我只看到过她的坚强，她总是说“我们做到了”，但现在她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

我们聚集在后面的会议室里。我能从爸爸的声音里听出他的愤怒，他告诉罗森先生：“他的父亲甚至都没有正眼看她，他怎么可能看都不看她。”我又成了隐形人，一个需要父母为我奋战的人，可怜又无力。罗森先生说我做得很好，但我也知道他手里拿着的是哪篇讲稿。他的同事说，这是他二十年来听到的最精彩的陈述。他告诉我，我说出了许多受害者感受到的但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他肯定对每个受害者都是这么说的，这只是安慰的话术。警探提醒我，如果没有我，他们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这是真的。这些恭维话使我如释重负。我只是看着他们，我太熟悉他们那柔软的肩膀姿势，温柔的手臂伸展，微妙的音调。我不想要这些，不要同情，不要安慰。

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我的案子只是一长串挤在日程表里的案件中的一项。那个打女人的男人被判了70天，我现在明白了，按照同样的减半规则，这其实只意味着36天。在我看来，案子是一件大事，但法官可能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案件，我只是一个过客。我突然发现我在质疑自己这一年来一直都在做些什么，甚至在悲伤什么。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辞掉工作，为什么要住在东岸。我把我的陈述折成越来越小的方块，藏在手提包里。

罗森和阿拉蕾问他们是否可以发布这份陈述。我说当然，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我想象它会发布在社区论坛或本地报纸的网站上。米歇尔说我们会继续战斗，这应该是一种安慰。我点了点头，但我已经做完了该做的事。阿拉蕾和罗森先生走到前面的台阶上，对着饥饿的摄像机讲话。他说：“惩罚与罪行不相称。这个判决没有考虑到性侵的真正严重性，也没有考虑到受害者正在遭受的创伤。校园强奸和校外强奸没有区别。强奸就是强奸。”

我和家人从后面的楼梯井往下走。这一次，我没有急匆匆往前走。我不再感到保护自己的紧迫性，我所有的盔甲都已经卸掉了。那天阳光灿烂，很安静。汽车驶过，他们是前往加利福尼亚大道吃午饭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午。我试着安慰自己：“你得重新做个正常人。”但这不是自由应该有的感觉。我看见他的家人和辩护律师站在100英尺开外的停车场里，围成一圈。我想象自己漫步而过，现在障碍已经消失，面对他们。你们怎么还没看见我？我的家人一直在说：“我们回家吧，我们还待在这儿干吗？”我只是站在路边，默默地相信如果我们再多等1分钟，他们就会把我们叫回去，说他们弄错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但我还是留在那儿。

我的朋友带我去买冻酸奶。我们围坐在桌子周围，搜索县监狱（jail）和监狱（prison）之间的区别，试图把这弄明白。县监狱通常是针对轻罪：你可能会因为在海滩上挖篝火坑、驾驶无人机、摆弄灭火器、擅自进入建筑工地而被判六个月的监禁。我们说，也许我应该在沙子上挖个洞，然后被送进监狱，自己去对付他。我们谈到了他父亲提到的牛排、布罗克的拼写能力。我说有一次我因为拼错了“西葫芦”（zucchini）而在拼写比赛中淘汰。我们发现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仍然不知道如何拼写它。我们四处走动，分享着被侵犯、被骚扰、被偷去而非失去贞操、被强行触摸，在帐篷里、在舞会上，我们希望曾为自己争求更多权利的时刻。我们都有一个故事，很多故事。在获得公正方面，我是所有人中走得最远的。我想这就是正义的样子，疲惫地坐着，手里拿着一杯融化了的酸奶。

下午渐渐过去，卢卡斯开车去塔霍湖和家人团聚。蒂法妮赶回学校准备期末考试。我的朋友们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在家里，父母安

静地待在一角。到了晚上，我又彻底孤独了。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至少我实现了这一点。我看到米歇尔发来的电子邮件，她一直在与纪录片《狩猎场》的制片人埃米·齐林联系。埃米的女儿建议由一位值得信赖的记者凯蒂·J. M.贝克在BuzzFeed网站上发表这份陈述。我想这样也可以。我浏览克雷格列表网站，寻找零工和暑期工作。我想在夏令营里教美术。我想坐在外面的野餐长凳上，把羽毛粘在木棍上，吃着棕色纸袋里的花生酱三明治，这没什么风险。我不介意每小时挣8美元，住在我高中时住的卧室里。不管我接下来做什么，我都得做出选择。我草草记下几个营地的名字。这得多棒啊。我的眼里开始涌出泪水。我关掉了所有的网页。

他们告诉你，如果你被侵犯了，高高的山上有一个王国，一个法院，可以在那儿找到正义。大多数受害者在山脚下被拒之门外，被告知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进行这次旅行。有些受害者为了攀登牺牲了一切，却在途中惨遭杀害，举证的负担重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出发了，有一支强大的队伍陪伴我，他们帮我扛起重担，直到我登上顶峰，到达了很少有受害者能到达的地方，那片应许之地。我们有了逮捕，裁决有罪，只有一小部分罪犯能被定罪。是时候看看正义是什么样了。我们推开门，里面却空无一物。这让我喘不过气来。更糟糕的是，当我往山下看时，我想象着那些满怀期待的受害者们抬起头，挥手，欢呼，憧憬。“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怎么样？当你到达时会发生什么？”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一个并不是为你而存在的体系。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痛苦是不值得的。这些犯罪不是犯罪，而只是麻烦。你可以战斗，但为什么而战斗呢？当你受到攻击，只需要跑，永远不要回头。这个判决并不坏。这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

在判决开始时，法官就说他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关进州立监狱是给香奈儿遭到毒害的人生的正确回应吗？”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方式很奇怪。对他来说，我失业了，我的家园被毁了，我的小额储蓄账户，我被偷走的快乐，全部加起来只抵得上在县监狱里待90天。

我想知道，在他们眼中，受害者是否仍然停滞不前，永远活在那20分钟的时间里。她仍然是冰冷的，而布罗克变得越来越多面，他的故事徐徐展开，生活和记忆的图景围绕着他打开。他必须是一个人。

而她的救赎故事在哪里？没有人谈论她可能继续要做的事情。我暴露了我的痛苦，但我缺少一个关键因素。法官给了布罗克一种我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同理心。我的痛苦从来不比他的潜力更有价值。

不会有任何改变。不管有没有坐牢，法官已经把他释放了，让他回到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他不会做错事。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目标是什么，比赛的结局是什么？从来没有人强制他去想象一次被他的行为彻底改变的人的生活。如果说这场战斗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它固化了布罗克扭曲的内心，强化了他坚守阵地的需求。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我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我只值三个月的人。我理性的那一面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但我不能假装知道了更好的事。在那一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屈服。我承认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夜晚。

我让自己崩溃。哭声在我心中起伏。我用两个胳膊抱着枕头，下巴陷进去，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等一下，我说。我用牙齿贴着枕头，憋住哭声，小心不要吵醒父母。我中毒的生活，三个月。

但我也知道这种感觉不会是无休止的。太阳一出来，最糟糕的日子就被甩到身后。当太阳升起，我将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我再也不会踏进那个法庭了。太阳现在在哪里，我想。我一直望着外面，世界无尽的黑暗，等待着色彩的变换。黑暗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我想往东跑，往那儿跑太阳就会更快照到我身上。我一个人在卧室里，闭着眼睛，想象着它在移动，这个发光的能量体一寸一寸向我移动，地球沉重而缓慢地转动着。如果你熬过了今晚，你就有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活下去。

我打开笔记本，盯着空白页，然后写道：你的价值不止三个月。又写一遍：你的价值不止三个月。我的脸扭曲发皱，我的手试图逃脱我的思想。听听你的身体想要告诉你什么。你的价值不止三个月。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说，你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画画。你打算做什么？我要画画，我要说话。你的价值不止三个月。我不是负担。我不受限制，我一直在扩展。你的痛苦是有意义的。你的价值不止三个

月。他们不可能真正拒斥我，因为他们从未完全了解我。你的价值不止三个月。性侵案从来不是我的全部。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战斗，在纸上笔耕不辍。你的价值不止三个月。我的手绷紧了，挣扎着，然后软下来。房间里的光线是灰色的，我拨开百叶窗，透过窗户往外看，树木和汽车的轮廓显露出来。我放下笔。睡觉。

---

- (1) Blockbuster，美国一家家庭电影和 videogame 租赁服务供应商，已在2010年申请破产。
- (2) *Carrie*，1976年上映的惊悚片，讲述了女高中生嘉莉利用超能力报复霸凌她的同学的故事。
- (3) Skechers，成立于1992年的美国鞋类品牌。
- (4) Margaret Cho（1968— ），美籍韩裔脱口秀表演者、演员、编剧、导演、制作人。
- (5) 法语，意为“是的”。
- (6) Anne Lamott（1954— ），美国作家，古根海姆创意写作奖金得主，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及全美各地多个写作研讨会教授写作。
- (7) Lucky Charms，美国谷物食品品牌。
- (8) Charles Bukowski（1920—1994），美国德裔诗人、作家。
- (9) Lake Tahoe，北美最大的高山湖泊，位于内华达山脉北部，是美国西部的一大旅游热点。

早上我的眼睛刺痛，外面很明亮，又是新的一天。我想享受从这个案子咬紧的牙关中解脱出来的滋味。我要用缓慢和阳光来充实我的星期五。我要骑着豆腐去盐沼看白鹭。我会从乳品店买一杯奶昔。我想去游泳。在那一刻，那是我生命的全部计划。

但我的手机一片混乱，全是未接电话和新信息。埃米发来的邮件：凯蒂·J. M.贝克在等我授权她在BuzzFeed上发表陈述。对我的案子的所有报道里，没有一篇让我有理由认为一个记者会把我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但凯蒂以前处理过这类案件，我觉得很疲惫，这份陈述似乎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不太在乎它最后会落在哪里，只要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就行。我坐在床上说“你好噢”，清了清早晨的嗓音，然后给她打电话。她听起来很兴奋，热情洋溢又和蔼可亲。我告诉她，他们想删什么就删。她说编辑们不会去删改。这让我感到奇怪：我知道它页数太多，还有连写句和放错的逗号。相反，她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告诉她：“我想让法官知道是他点燃了星星之火。”

陈述是当天下午4点发出的。在这篇文章的顶部有一个红色的长方形，以白色字体引出陈述中的句子。强大的格式。但看起来它就像站在一个装饰着绉布横幅的空礼堂里，担心没有人会出现。我无法忍受。我关上电脑，去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塑料冰格，把冰块放到我的杯子里。我希望有一个银色的冰箱，里面有自动取冰器，冰块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冰箱里掉出来。这些都是我想用余生去思考的世俗之事。

我回到那篇文章。左上角会显示点击量。20分钟内，已经有1.5万人阅读。凯蒂开始把读者的邮件转发给我。

我在办公桌前看哭了。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在工作，但我想说……

我为你的痛苦而哭泣，为你的胜利而哭泣。我不是容易哭的人……



虽然我读了你的文章胃感到很不舒服，我.....

这篇文章很难读，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接着读，这样来回几遍。我勉强通读了，但很高兴我做到了.....

考虑到我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我不记得在工作时有没有差点吐出来，但这是一种安慰——暂时.....

我收到的每条信息几乎都是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哭。他们先是被激怒，再是悲痛欲绝，然后他们说谢谢，说每个人都必须读它。这种反应太过复杂，难以归类，但听起来，读到最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更清晰的空间。我被这种集体性的窃窃私语吓了一跳，有点担心自己把他们惹哭了。

我看着点击量上升。几个小时后，当数字达到80万次时，我爸爸给打电话，让他上网。“Buzzbee吗？我怎么才能找到——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卢卡斯正骑自行车穿越森林。当他发了一张他戴头盔的照片给我时，我回复说：“有情况。”蒂法妮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我不想让她分心，继续学习，不要上网！

到达一百万的时候，我给妈妈发短信，她在杂货店。“我的故事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了。”她回答说：“妈妈给你买了四种不同口味的冰激凌！”三个烟花表情符号。我想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电子邮件源源不断地涌来。我紧张地看着这篇文章的评论部分，等待着和我从法官那里听过的一样的轻视。但我发现了振奋人心的话。“她直视骄阳，为我们讲述了一切。你对这个世界很重要。**要大力宣扬。**”金警探给我发短信说：“你成超级明星了。”蒂法妮发来短信：“你的声音就可以让任何模棱两可、刻薄或指责受害者的言论消失。”

爸爸回家后开始打印一些评论，他喜欢给它们画下划线，和它们坐在一起。我也被人们使用的词汇迷住了。“能言善辩。灼热。锥心之痛。发自内心。勇敢。有说服力。一个新出现的英雄。”埃米莉是个英雄。勇敢而清醒，倔强顽强，毫无羞愧，是真理和力量的象征。在这个人身上，我还没有看到我自己。

“我想，如果我在几年前读到这篇文章，我就不会感到那么内疚，那么愚蠢，而会更有力量，更有价值，更有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星期五快结束的时候，我盯着自己发光的屏幕。爸爸进来道晚安，微笑着说：“也许下一个打电话来的是白宫！”这正是一个父亲会说的话，伸手去摘月亮。星期六早上，点击量继续攀升。我的家人在刺痛中感到一丝甜蜜，在肯定中变得更加成熟。凯蒂给我转发了数百封邮件。妈妈端着一碗粥进来，告诉我不要靠电脑屏幕太近：“对你的眼睛不好。”但我沉迷于无休止的信息流，觉得有必要在它们转瞬即逝之前明白它们的意思。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每次我的案子出现在新闻里，我都会看着它被更大的新闻所取代。到了星期天晚上，我以为我的庆祝活动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周即将开始，世界的注意力将转移。当我睡下的时候，我记下阅读量：6月5日星期日晚上11：00, 4, 432, 947。

不久，这份陈述发表在《卫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上。它在推特上流行起来，我的信息提醒里出现了连串的红色矩形。米歇尔告诉我，主播阿什莉·班菲尔德会在CNN直播节目上完整朗读我的陈述。我的第一反应是告诉她不必整篇读完，但是她完成了。这份陈述在世界范围内畅行无阻地传播。我开始给自己发短信记录，好像我能画出它的传播轨迹似的。

6月6日星期一晚上8：50, 6, 845, 577

6月7日星期二晚上8：40, 10, 163, 254

6月8日星期三下午5：04, 12, 253, 134

6月9日星期四晚上11：30, 14, 523, 874

6月10日星期五下午12：40, 15, 250, 000

人们大声朗读整篇陈述的视频剪辑出现了。强奸热线电话响个不停，电话和志愿者越来越多。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妻子奇兰·麦克雷共同主持了一场朗读会。加州女议员杰姬·斯派尔在众议院带头进行了1小时的朗读。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特德·波说：“她写了记录性侵害受害者经历的《圣经》。”《女孩》剧组献上了一段视频《她就是某个

人》。播客“我最喜欢的谋杀”报道了这件事。《魅力》杂志随后将埃米莉·多伊列为2016年度女性之一。这份陈述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日语。一位名叫金永基的韩国大学生请求允许他将其译成韩语。在克里斯汀制作的一段视频中，陈述用手语表演出来，她并不知道我们是高中同学。中国一个女权组织贴出了一些女性举着标语牌的照片，上面写着：“没有人有权强奸。就算他是游泳健将，那还是强奸。”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虽然我远在太平洋彼岸，但我离她和她的痛苦如此之近，我对所有帮助过她的人深怀感激。”另一条：“你让印度一个寂静的小镇上的人感受到你的痛苦、你的坚持和你的意志。”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男子告诉我，他凌晨3点在走廊上哭泣。有好几天，我流着泪坐在房间里，笔记本电脑旁放着一碗粥。每一条信息都把我推向一个空间，在那里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布罗克以前的一个高中同学AJ发了一篇帖子：“终于，我只想为自己做一个声明。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8年多以前，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就说我是个讨厌鬼，对我有各种看法。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这个‘讨厌鬼’知道如何带着尊严和尊重对待人类，无论他们在哪个性别领域，而你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性侵代言人。”

我开车去法院见阿拉蕾。她的门上贴着一块牌子：#做个瑞典人。这个小小的法院被五颜六色的长方形信封塞满了，邮箱里到处都是信件。她递给我一个沉重的袋子，我用双臂抱着它。我们都处在震惊中，不知道该如何招架这个突如其来的新结局。当我把战利品搬到车里，车子因为装满了宝贝而发出嘎嘎的响声：一条可以保佑我的象头神<sup>(1)</sup>项链，一对晃来晃去的自行车耳环；一位新西兰老师的来信，亚利桑那州一支垒球队的来信；一位女士拍下了令人惊叹的松树照片，用美丽代替惊心动魄的记忆；一幅画了灯塔的水彩画；一位爱尔兰的女士寄给我两根紫色巧克力棒，在安奶奶给的食物以外我又添了新的零食。如果你那天早上在轮床上告诉我，再过一年半，会有一个爱尔兰女人贴邮票，然后寄给我一个装满糖果的包裹，我会笑的。妈妈说得对：“你得等着看看生活如何展开。”

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白宫的消息。乔·拜登给我写了一封信。我难以置信。我内心仍然有屏障保护着我，害怕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敞开心扉。我告诉自己需要把内心的障碍移开一会儿，去真正地倾听。

他在信中写道：“我看到你了。”美国副总统停止他正在做的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写信给我说“我看到你了”，这种意义不言而喻。

侵犯埋葬了自我。我们忘记了如何以及何时才能获准去占据空间。我们生来就怀疑自己的能力，说话时容易受到贬低。我的陈述已经燃烧，爆发，不屈不挠。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那就是这条路一定有个尽头，他们会说，你已经得到够多了，从这条路上出去吧。我正等着被重新打回原形，回到那个我觉得属于我的小地方。我在边缘地带长大；在媒体中，亚裔美国人被分配去当配角，顺从、轻声细语的次要角色。我已经习惯了不被人注意，也习惯了永远不被人完全了解。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主角。我得到的认可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的慷慨盛情。然而，人们不断地把我拉上来，直到我收到国家最高层的来信。副总统并没有降低到我的位置，而是把我举起来并感激地鞠躬。

他停下工作来读我的陈述意味着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停下手头的工作去阅读它？“我看到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性的无限潜力——充满了可能性。我看到我们对未来的梦想寄托在谁的肩膀上。”第一次，我开始明白父亲说他为我感到骄傲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在数百万知道我勇敢并重要的人当中，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拜登说：“你给了他们战斗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相信，你将拯救生命。”我想起那个穿着黑色厚夹克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坐在轨道旁的折叠椅上拯救生命。我意识到，从17岁开始，那就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我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写下这些能让你留在这里的文字，看到你的价值，看到你生命的美丽。所以，如果你在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来到这里，我希望能够抓住你，温柔地引导你回来。

即使99%的人是积极的，那1%的人仍然让我感到最害怕。当家里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安全的幻想就破灭了。那是一个大型早间脱口

秀节目的新闻主播。她说：“我也是半个亚裔，所以我们可以做朋友。”这就像我在说：“你睡觉的时候看起来很漂亮。”她怎么知道我呢？卢卡斯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蒂法妮在领英上的浏览量上升了数百次。一个记者联系了朱莉娅的祖父母，想找到朱莉娅，找到我。媒体提出，为了保护我，应该给我的脸打码，给我的声音变音。陌生人的骚扰信开始出现在我家。我把它们交到实验室进行指纹鉴定。记者们来敲门，爸爸说“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就关上门，而我躲在被子里。

这份声明仅在BuzzFeed上就被阅读了1800万次。你几乎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东西，但我仍然不为人所知。我认为这证明世界是慈悲的：他们没有把我推到耀眼的灯光下，对着麦克风，说我们想要更多。他们没有问你要证件，也没有问你“你到底是谁”。

一位女士在信上签名：“你真诚的，曾经的埃米莉·多伊。”许多人写信给我，说他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经历，他们想让我知道幸存者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向我讲述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孩子和体贴的伴侣。这就是你的生活在10年、20年后的样子。他们给了我一千种成长的可能。在匿名的情况下，我试着过他们的生活，看着他们试着过我的生活。他们又变年轻了，终于得到他们早就应得的东西，收回所有被夺走的东西。在那片空白的空间里，疗愈成为可能。

这份陈述为幸存者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他们走进来，大声说出自己最沉重的真相，重温他们的过去中未被触及的部分。如果我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房间就会塌下来，屋顶会被我的经历、种族、家庭这些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沉沉压住。少数发现我身份的人会拍下我以前的口语表演视频截图，配上字幕泄露出来：“布罗克·特纳得了黄热病。不会把我的老二放进她湿滑的穴里。疯狂的亚洲佬。亚洲女人不能喝酒。亚洲红<sup>(2)</sup>，红脸，无足轻重，荡妇。”

相反，我变成了那个蓝头发的女人，那个戴鼻环的女人，我62岁，拉丁裔，我是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既然我们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追着我不放？成为受害者的最大危险之一是被单独拎出来：你的所有特质和奇闻逸事都会遭到指责。在法庭上，他们会试图让你相

信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不同的，你是个例外。你更脏，更淫乱。但这是个诡计。侵犯绝不是针对个人的，但指责是。

由于我的照片没有公开，我很好奇文章会配什么样的照片：一个女孩望着窗外的剪影，一滴泪珠挂在脸颊上，胶带封住她的嘴。所有这些在表达孤独和沉默方面都是准确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受害者也是那个穿着绿色围裙微笑着给你煮咖啡的女孩，她刚刚把零钱找给了你。她刚给一个一年级的班上完课。她戴着耳机，在地铁上轻轻用脚打着拍子。受害者就在你周围。

回顾这个夏天，我的脑海中涌现一个个场景，检察官交给我成千上万封装在食品袋里的信。一名女子说，她和女儿坐在沙发上，周围都是箱子，准备逃离虐待她的前夫。她告诉我，她知道她们不再孤单。一位母亲从她的小房间里拿出她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节日卡片，在卡片背面潦草地写道：“这就是你在拯救的人。”妻子把丈夫叫醒，打开侧灯，告诉他我的故事。我收到一封来自一个16岁女孩的邮件，她说她终于可以在早上起床了，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那张现在已经空了的床。

我可以告诉你吗，在庭审前的一年中，我每天晚上都偷偷地掀开一幅帘子，里面隐藏着一种与我现在平行的生活，在那种生活中一切都从未发生。我想象着我会做什么，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朝九晚五，阳光灿烂的日子，健康的身体，节日派对。然后我拉上窗帘，坐回现实中。现在，我看着她的空床，明白了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是接近她的唯一途径。最后，我接受了发生的一切，意识到它所带来的后果。我再也没有碰过窗帘，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早上，一个16岁的女孩把她的腿从床上甩了下来，轻轻地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我24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一些戴着黑色帽子的学生举着标语，阳光穿过纸上醒目的红色字体：“**斯坦福保护强奸犯。布罗克·特纳不是例外。你是个战士。**”他们的勇气就像一份生日礼物。我可以想象一个母亲一只手拿着相机，另一只手做着拍打的动作：“贾森，把牌子放下1分钟，笑一笑。”贾森说：“妈妈！这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说，他们把残酷的事实带到欢乐的庆祝活动中是有意

义的。我希望斯坦福大学会很快发现，你只能把那么多人扫到地毯下面，然后你的地毯就会变得像山一样凹凸不平。毕业典礼演讲人和纪录片制片人肯·伯恩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被性侵了，认真对待这件事，听听他们说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让这位幸存者的雄辩言辞变得和马丁·路德·金博士从伯明翰监狱发来的信一样重要。”这个比较真是慷慨。

罗森先生提议，针对那些因性侵失去意识者或醉酒者而被定罪的人，应实施一项新的强制性监禁，并应扩大加州对强奸范围的认定。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签署了两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阿拉蕾给我寄了一份签署文件的复印件，它就像一份给予我安睡权利的证书，因为我知道这个糟糕的判决不会再发生了。我开始重新相信正义。

米歇尔·多贝发起了一场罢免珀斯基法官的运动。这是闻所未闻的——自1932年以来，加州从未罢免过任何一位法官。米歇尔希望将罢免投票放在两年后的下次选举中进行。妮可成了外勤业务的联合主席和联合主管之一：她激励志愿者，花几个小时写时事通讯，激发人们的斗志。她解释说，他们需要在圣克拉拉县收集至少58,634个签名，才能让珀斯基的名字出现在6月的选票上。一旦投票，他们需要至少50%的选票才能让他被罢免。

常有人把陈述转发给我说：“你得读读这个。”我想回复：“这就是我写的。”一次有个朋友说：“我听说她是我们认识的人。”我僵住了，盯着她的脸，想看看她是不是在考验我，但并非如此。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耸耸肩：“我什么也没听说。”妹妹在她住的小区里遇到一个人，他牵着一名叫西兰花的狗，主人解释说：“一开始他叫布罗克，但你听说过布罗克·特纳那家伙吗？”我妹妹点了点头。“这伤害了我的狗的口碑，所以我给它改了名。”我在旧金山找到一位新的心理治疗师，但我过了几个月、在多次疗程之后才告诉她我就是埃米莉·多伊。我只说我被性侵了，她回应说：“你读过斯坦福受害者陈述吗？”她向我推荐了我自己的故事，说了一些关于深思熟虑和力量的话，形势逆转了。我点了点头，然后转向另一个话题。埃米莉目中无人，勇敢无畏，似乎拥有一切答案。但我更想让人们通过我所有的笨拙、困惑和日常生活，知道我是香奈儿。



我开始透过更柔和的滤镜来看世界。如果有人在路上对我按喇叭，我就会看后视镜，想：“也许你为我哭过。”在杂货店拥挤的队伍中，我想知道我前面的那个女人是否写了一封信，和我分享她隐藏悲伤。

6月的一天，当我读完陈述离开法庭时，我心中毫无勇气可言。现在我明白了，在我这一生中，我做了一些好事，从痛苦中创造力量，提供安慰，同时对受害者所面临的困难保持诚实。反过来，他们也向我展示了我是谁。现在的问题是想想该如何道谢。

小说家安妮·拉莫特通过凯蒂跟我联系。我向她寻求指导。她回复：

“我相信你会感到有人在拉你的袖子，一些来自内心深处的东西会回到你的身边，告诉你什么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去追求或尝试……你知道你该如何跳入一个即将扑到你头顶的大浪中吗？写作可以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把我从混乱和即将来临的压力中拉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点庇护，留下记忆、愿景和深思……”

在挣扎了这么长时间才从案子中解脱出来之后，我感觉让自己再次沉浸其中是违反常理的。但我也明白，穿行是前进的一种方式，我需要倒退才能再次前进。我得到了指示。陈述只是浪花。现在是时候潜入更深的地方了，回到起点。

---

(1) Ganesha，印度教神话中的象头神，是湿婆的儿子，可以帮助人消除障碍，带来好运。

(2) Asian glow，指亚洲人常见的酒精性脸红反应。

那个夏天，我告诉自己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正常的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了。但是现在什么是正常呢？晚上我的噩梦加剧了。宽慰和欢欣是暂时的。我确信，如果我给布罗克带来了痛苦，一定就会有人来折磨我，把比分扳平。这就是埃利奥特·罗杰的世界运行的规则：“我渴望女孩，但女孩从不反过来渴望我……这是一种不能不受惩罚的不公。”我在床边放了一袋信，慢慢地翻看，期待能尽可能长时间地记住里面的内容。每天晚上我读两到三本书。它们帮助我入睡，替我盖好被子，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一位母亲的温暖建议。

我和卢卡斯步履沉重地走在旧金山的山坡上，寻找公寓，我们最初申请的几家都没成功。我的信用评分、工作地点和之前房东的推荐信那几项，都是空白空白空白。我想写：“情商高，善于自我反省，经历过很多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小的方形房子，我们把它叫作“纸巾盒”。我们在屋后种上了翡翠色的多肉植物，把鸟食撒在栏杆上，把罗勒放在厨房窗台上，它一天就变黄了。我买了一些喜欢家庭生活的成年人会买的东西：格子毛巾，沙拉搅拌机。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把我的新地址写在任何东西上，我的家是个藏身之处。在这里我打算重建我的生活，开始写作。

“你通勤去南湾？”一个朋友问。“什么？”我说，忘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在南边开车30分钟远的地方，忘了他们仍然以为我在那里工作。“哦，这很好。有时很糟糕，但没关系。做播客。”我想说我的通勤时间是12秒，从我的床到办公桌，偶尔会打破这个轨迹，穿着睡衣去煮咖啡。

刚毕业的卢卡斯正在协商他的下一份工作：在进入商学院之前，他曾是一名咨询顾问，每周有四天要出差，他得到老东家热情洋溢的回复。但一想到他要走，我就慌了。我不希望我的顾虑变成他的顾虑。我想说：“自由地去吧，我是个独立的女人！”但这感觉不可能。

如果你问我：“你能一个人睡吗？”简短的回答是肯定的。长篇大论的回答是：下午4点左右，我用一个金属衣架抵住前门。太阳下山时，我把每一盏灯都打开。我把楼下的炉子点着，这样天黑以后我就不用下楼了。蒂法妮过去常常为圣诞老人做陷阱，在烟囱周围放上椅子，椅子上绑着铃铛和塑料袋。我把椅子叠放在门前。我在辣椒喷雾的喷嘴上画了一个记号，确保自己朝正确的方向喷。我睡觉时旁边放一把大剪刀，因为刀子会滑，而剪刀有抓握的地方，还能在坏人的颈窝上戳一个洞。然后我会躺在沙发上，而不是卧室里，看着黑暗吞噬房子，世界关闭，留下我自己照顾自己。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人们可能会问，“你不是在房子里被强奸的，也没有入侵或破门而入。”但睡眠会让我处于一种无意识的脆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遭受侵犯的那天晚上，我错过了反击的机会。我试着想些新办法，睁只眼闭只眼地睡觉，不断漂进漂出。有时我不小心打瞌睡，醒来时胸腔里响着警报：“我错过了什么？”早晨5点钟，当光明变成希望时，我伴着投递报纸的声音、第一辆公共汽车的轰鸣和鸟儿的啼唱渐渐入睡。

第二天我总是昏昏沉沉，跟不上世界的运转速度。当邮差按门铃的时候，我要进行一个解除藏身装置的仪式，一边喊他等一等，一边把椅子挪开。在白天，这些保护措施让我觉得很愚蠢，障碍物和辣椒喷雾证明了我脑海中的异想天开和奇幻现实：我正在进行一个人的战斗。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个人睡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三天。

过去，我打瞌睡的能力让我骄傲。当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抱怨维修人员会把他们叫醒，然后去修床上方的空调。我说：“他们没有修我的。”但我的室友说，当穿着薄荷绿连身衣和靴子的男人稳稳地站在我的床头柜上修空调时，我正在下面打鼾。这在当时很有趣，但现在让我感到害怕。

每当发现女性朋友住单间公寓，我都会大吃一惊：“那谁是你的证人？谁来保护你不受任何可能发生事情的伤害？难道你不明白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你吗？”我试着想象那种生活，独自回家，用一杯雷司令

白葡萄酒煮意大利面，看电视，打哈欠，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我羡慕那些活得没有防备的人。

我记得大学时裸泳。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水会太冷。我们五六个男孩女孩，会从悬崖边的公寓派对里披着浴巾溜出来，沿着木楼梯小跑到松软的沙滩上。我们从衬衫里探出头来，从袖子里抽出胳膊，回到我们出生时的样子。我们把衣服扔在长满青苔的巨石上，向玻璃般的水面飞奔而去。梅尔和我又惊又笑地把头往后仰。海草被套索缠住，贴在我们的脚踝上，我们把它捡起来，像光滑的围巾一样披在彼此的肩膀上。我们游到水面平静而深沉的地方，脑袋在水面上摆动，水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好像散落的锡纸。

裸泳时，只有广阔的天空、开阔的大海和一轮皎洁的皓月。光线柔和，景色无限。阴茎只不过是面条的形状，胸部就像一堆堆橡皮泥。我们看上去滑稽又自然，无拘无束。

这是最美妙的夜晚：我们轮流站在热水淋浴喷头下，沙子堆积在排水管周围。做墨西哥粉饼，穿着旧T恤，裹着破毯子，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就像窝里的熊一样。我们凌晨4点睡着了，衣服上撒满了盐，耳朵里满是沙子，湿漉漉的头发浸在枕头里。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些温暖的细节，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再来一次。

一天晚上，我和卢卡斯从南加州开车回家，途经圣塔芭芭拉。我让他在高速公路靠边停车，我有三年没来过这里了。我们把车停好，我领着他下了木楼梯，站在水边。它和我记忆中的一样美，但它不再是我的了。我左顾右盼，望着那一大片我看不清的黑乎乎的海岸，纳闷自己当初怎么能那样大声、那样赤身裸体、那样引人注目。裸露皮肤的脆弱性。要伤害我太容易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抵抗。没穿衣服。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会相信我。“你不是一开始就没穿衣服吗？晚上在海滩上喝醉了？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光说“我只想要做自己，跟些朋友在一起，还有大海”，那是不够的。

一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在我遭受侵犯的那个晚上被剥夺了。如何区分自发和鲁莽？如何证明裸体不是乱交的同义词？谨慎和偏执的界线在哪里？这就是我所哀悼的，这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找回来的东西。

但我仍然保留着这些记忆，我记得，男人们也有可能赤身裸体，并且不会因此受到质疑。那个张开双臂奔向大海的女孩不见了。代替她的是一个裹着两件外套的女人，她盯着黑色的海水，把一块块海草误认为是沉睡的尸体，把石头误认为是蜷缩着的男人。卢卡斯拉着我的手，问我愿不愿意散个步，我摇摇头，小跑着回到木楼梯上。

我无意间筛选笔录时发现了一份清单。三页，是作为证据提交的照片描述。“多伊女士左边头部的照片，头发里有植物。右锁骨下方擦伤照片。颈部下方及背部上方擦伤照片。近距离拍摄臀部多处擦伤照片。尺子测量病号服附近皮肤擦伤的照片。女性生殖器照片。女性生殖器照片，小阴唇内有碎片。”

我的身体被分成方块，放在大放映机上。我的臀部，我的胸部，我的阴道，都显示在屏幕上，一个4英尺高的阴唇，供法官、布罗克、他的兄弟、他的父亲以及在场的每一个记者和陌生人观看。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一定是在走廊的尽头，在浴室的镜子里抚平我的衬衫，往头发上沾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我现在感受到了耻辱，因为我走进进去的时候毫不知情，面带微笑。

知道这一点让我想吞下一根火柴，点燃我的五脏六腑，我的胃就像一个红色的、滴水的洞穴，烟从我的耳朵、鼻子和眼睛里喷涌而出，直到我变得坚硬而空洞。一个烧焦的空壳。

性一旦走上法庭就会死亡。我看着辩护律师的嘴，老迈的舌头，老迈的呼吸，存放太久的鹰嘴豆泥颜色的嘴唇：“香奈儿的阴道。来回摩擦。”我真想把他的舌头从喉咙里扯断。我只是不需要它，性，我想，我可以一生都不需要它。

性毫无关怀。性意味着把A插入B，各部分分别标记，我的“左臀部”标记为“证据43”。性意味着手指或阴茎插入，它进入我有多深或离开我。他的什么器官接触了她的什么地方。性是嵌入你手掌的硬砂砾。性爱被戳穿，你的空气被掏空。即使在瘀伤愈合后，在几个小时坐在睡椅里的心理治疗后，我仍然不确定如何在我的身体里栖息。如果性是伤害我的东西，它怎么能提供快乐或安全呢？我想填补我的那

些洞，把所有地方都锁上，让我身体里的机器关闭，齿轮生锈，变得安静。

从法律上讲，在法庭上提起受害者的性经历是违法的。但即使从未明确说明，它也会被提及。“你有男朋友吗？你专一吗？你性活跃吗？”我觉得如果我继续沉浸在自己的身体里，如果我再次公开渴望性爱，我就证明了辩护人是正确的。他谈起我的性生活，就好像我隐瞒了什么似的，好像只要暴露这一点，布罗克就有了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权利。我是一个对性的选择太过随意，因而不受尊重的受害者。

在做爱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问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我会用熟悉的符号使自己安心：床单的颜色，卢卡斯头发的质地。放松。但我的内心一直在扯断连接线，重新连接，把它们插到错误的装置上。我的身体一直在请求允许：这样可以吗？我们会被责备吗？我需要一张脸，需要光线，需要安稳，需要一步一步来，我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可以享受这一切。它是抑制性的，不允许骑马、开花、雄鸡打鸣、翻页、激情做爱。相反，我有一个小小的吹毛求疵的秘书，我要向她汇报：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

“性侵”这个词有点误导人，因为它似乎与性无关，而更与掠夺有关。性侵是偷窃。单方面的需要，压倒对方的感觉。真正的性爱是一种交流，一种来回自如、互相应答、流畅有趣的力量，一种专注地与你的伴侣共舞的乐趣。

检察官：“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没有为她着想？”

布罗克：“我想我不可能去为她着想。”

整个庭审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同意。“是”或“否”。我们表现得好像只有一个交通灯，红的或绿的。但性是一条道路，有很多十字路口，该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让行，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加速。

口头上的同意常常被嘲笑会破坏气氛。但是想想我们用这种方式在生活中做了多少自然的交流。以杂货店里的柜台为例：你拿起一块

饼干，和小贩对视一下：“可以吗？”他们点点头：“尝尝吧。”微妙而迅速。

我从来没有大声说过的是，强奸让你想变成木头，坚硬而不可穿透。身体相反的一面应该是温柔的，接纳的，柔软的。有时我看完一个强奸故事后太生气了：“我得剁下一个鸡巴。”有时我的欲望波动甚至消失。如果我没有伴侣，我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一旦你第六次拒绝爱意，事情就不对劲了。有时他会做手势让我把头靠在他的胸口上，他只需要触碰，简单的触碰，就知道我们还联结在一起。

这种与我身体的距离感并不是由侵犯开始的。在这个世界上，年轻女性已经很少有自信了，我在法庭上的自信更是迅速减退。我的青春期是在治疗湿疹的燕麦浴中度过的。有个男孩叫我猎豹，于是我把萨莉·汉森牌日光浴喷雾抹在我那斑驳变色的皮肤上。我在高中时穿桃红色连裤袜，这是一种买来的表皮。上大学时我才第一次穿裙子。但我与身体的关系仍然是半心半意的。

我想知道在每个女人的生命中，是否都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想要吞下石头。也许她想知道为什么她的例假来晚了，或者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或者偶然看到一份身体部位的清单，上面整齐地划分成数字。这会让她想吞下石头吗？又大又滑，一口吞下去。我想象着它们在我的胃里堆积成一堆，然后走进一个池塘，不是为了死去，而是为了让身体下沉，只有我的灵魂从水里出来。干净多了，我可以重新开始，不受阻碍。

在湖边的一家小书店里，我读到了迪帕克·乔普拉<sup>(1)</sup>的一段话：“身体需要改造。要想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必须使用你的身体——没有身体你就无法体验任何事情——所以你的身体也应该是有意义的。”我在公园里看到鸽子，它们把胸脯挺得鼓鼓的，竞相跃起。即使是鸽子也会发生性行为，它们明白这是自然的，不是可耻的行为。你才二十五六岁。你的前额多么光滑，你的锁骨多么美丽，你的心多么红润。我有一个爱人，每天都在我身边。当他洗完澡冒着热气出现时，我也应该为他庆祝，应该高兴！性爱不仅应该被容忍，而且应该是快乐的。



是滑旱冰让我意识到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卢卡斯和我在一间装了迪斯科灯光的空教堂周围来回穿梭。我中途坐在一张靠墙的长凳上休息。我看着女孩们放松手臂，摆动臀部，露出肚脐。她们在自己的环境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在所有这些优雅、健美的肌肉和流畅的动作中，轻松自如地移动着，这是我所渴望的。那是什么感觉？呈现我的身体而不害怕伤害或审视，完全不受束缚而优雅动人。

我曾经认为瑜伽是为那些有护肤习惯和良好体态的人准备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笨拙，很不自然，我环顾四周，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做错了，直到一位教练说：“如果你没做好，没人会在乎发生什么。”我喜欢在垫子上待一个半小时，我那杏黄色的长方形瑜伽垫贴在地板上，有一条小边挡住外界的干扰。慢慢地，我学会了把注意力转向内心，从我的跟腱延伸到指尖。我想象着自己体内抱紧的细胞舒展开来。

在前台有一盒白色的代用币。你可以拿一个放在你的垫子上，那意味着：“请不要碰我。”我喜欢它传达这种微妙需求的方式，希望我能在公共场合把它贴在我的额头上。我曾经从盒子里拿过一个。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了，有时教练会把手放在我的背上，那种重力，那种坚定的压力，让我泪如雨下。这不是哭。这是手掌的温柔，我的脉搏在触摸下跳动，连接，某种东西在我体内冒泡，以眼泪的形式释放出来。它完全进入我的身体，让我感到美丽、强大，让我想要被消耗，去分享我的每一个小部分。

“没有理由去剥夺你的身体的爱、美、创造力和灵感。”乔普拉说。我写下一些儿时的感官记忆，重拾被滋养和抚慰的感觉。米饭蒸着，外面下着雨。裹在高高的火炉烤热的毛巾里，双脚打湿硬木地板。柏油路上阳光的味道。早上凉水浇在我脸上。在半夜吃一碗麦片。有人读书给我听时翻页的声音。桃子掉落的声音。沙尘的味道。可可的焦糊味，融化的棉花糖黏糊糊的薄膜。面包松软的内层吸收了西红柿和伏特加酱。我的感觉被唤醒了。我消耗的方式，我的感官渐渐张开，去接受，放松，放纵。

在这个城市的第一年我害怕黑暗，试图重新定义黑暗。我告诉自己要去欣赏那漆黑的山丘，拿着柠檬草挥发藤条、鼾声如雷的邻居，在公园里小跑的郊狼。在性爱中，我从小事做起，细细品味每一件小事：彼此靠在一起入睡的简单愉悦。这种亲密，这种安静。性是一种未被剥皮的圆满感觉。我想到性的语言：我喜欢“做爱”这个词，身体不停地翻滚，制造出汗水和热量，直到真爱产生。“砰砰砰”，当你躺在床上，皮肤闪闪发光时，它看起来就像闪烁的粉色灯光飘浮在床上。

我仍然在家庭和熟人的界限之外挣扎。我早该来做宫颈刮片检查，这程序听起来就像在企鹅粪便中发现的一种疾病。我本想在签到表上写个便条：“遭受侵犯，请小心处理。”但是没有多余的地方了。主要是我不想接受询问。我想要自己勇敢面对，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来去自如。我决定向医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以减缓这个过程。但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年轻护士进来观察，改变了情况。我看见护士盯着我看，感到自己在无声无息之中变得暴怒：你在看什么，我不是标本，别管我，停下。我的胃紧绷着，一阵恶心袭来。一艘帆船出现在天花板上。我听到：“都完成了！我给你时间穿衣服。”

他们离开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脑子里空空荡荡。我的脚穿不上鞋。我应该带个人来，让那人告诉我把胳膊穿进袖子。我的眼睛盯着病号服上的小蓝星。门开了，扎着马尾辫的护士探进头来：“噢！”她意识到我还没换好衣服，很快就找借口离开了。我脑子没法转那么快，来不及说“别走”。如果我试着站起来，我会晕过去的。几分钟过去，她又进来了，发现我还是原来的样子。我问她有没有小零食。她拿着巧克力饮料回来了，我用颤抖的手端起来咕嘟咕嘟地喝着。“我不习惯做这个。”我说，声音发抖。有什么东西被登记下来。“没关系，”她说，“不着急。”她和我坐在一起，直到我镇定下来才离开。我把额头搁在方向盘上，筋疲力尽。我想要一个白色代用币。

一位老师曾经解释说，我们在子宫里时就已经拥有了一幅无形的蓝图，我们将用它来建造我们自己。在中胚层，一个人的骨骼、结缔组织和心脏就形成了。“我们知道如何形成我们的生命，”她说，“我们

现在仍然有这个信息，它仍然在告知我们。”即使我身体的某些部分减少了，我依然相信它们是可以修复的。我相信，当我给予身体爱、温柔的触摸、伸展、阳光、力量和性时，失去的东西就会以新的形式重新生长。

我想起我家后院的池塘。我们把金鱼装在塑料袋里带回家，让它们漂浮在水面上。爸爸解释说，它们需要时间来适应池塘的温度，然后才可以放进去。如果这么小的生物都需要这样的照顾，想象一下受害者为了重新融入日常生活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没有正确的方法，只有倾听对你身体有益和舒适的事物。也许你现在很害怕，在你周围透明的塑料容器里上下浮动，想着：我被困住了，这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只要记住：温度是慢慢变化的，你是在适应。你会成功进入那个池塘。再多一点时间，你会获得自由。

---

卢卡斯接受了一份在城里的工作。我睡得很安稳。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家里有个伴，想要一只斗牛犬或德国牧羊犬，一只肩胛分明、眼睛锐利和面部宽阔的运动犬。我们驱车前往动物收容所，透过铁链栅栏往里看。走回车上，我们经过人行道旁一个黄色的木制标牌：马特维尔高级犬类救助站。我们跟着黄箭头上了楼。一间满是阳光和小垫子、演奏着爵士乐的大房间。40只小狗在四处游荡。墙上的白板上写满了名字：核桃，埃塞尔，蛋卷，杜丝，腰果，普拉姆教授，大黄蜂，哈维尔。我们了解了一下代养规定：我们可以把狗带回家，直到他找到一个永久的主人。我的脚踝被一条失明的拉萨狮子犬撞了一下，它重重地踩着，好像它的爪子踩在木偶的提线上。长长的刘海从它乳白色的眼睛上垂下来。它的名字叫海雀。

卢卡斯给它买了一双特殊的绿色袜子，防止它在我们的木地板上打滑。我给它煮了粥。它大部分时间都歪头坐着，穿着绿袜子，盯着冰箱。它又聋又瞎，我知道如果我被谋杀了，它会坐在我的尸体旁边等着吃早饭。一天晚上，卢卡斯去看望家人了，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像是一艘小型汽船的轰鸣。我看到它的肚子起起伏伏，意识到自

己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治愈变成了一条老狗的鼾声。

一年里，我们代养了6条狗，一次一条。我会花几个小时擦拭电线上的尿液，在干燥的粪便组成的群岛间航行。如果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纸巾，我会被逮捕的。我的粗毛地毯弄脏了，卷起来，扔掉，再买，再扔掉。布奇跑到我们的浴室，在马桶上小便。里米，我们喜欢回想它拿着一个金属探测器，从一个房间摇摇摆摆地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样子。腊肠狗乌贼会唱歌。萨尔瓦多喜欢韩国烤肉。它们看起来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从床上滚下来，或在炉栅里打滑，如果你把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它们就会从台阶上滚下来。它们大多数都服用多种药物，我在它们的食物里撒了一些看上去像可卡因的东西。它们提醒我，有额外的需要并不会带来太多困难或太浪费时间，而是值得同情和爱。

它们带我出去散步，经常是后腿摇摇晃晃地拖着我。它们吃饭时我也吃，这是照顾自己的一个简单法则。我的小房子变成了一个恢复和过渡的地方，把它们收拾干净，给它们剪指甲、梳理毛发，为它们永久的家做准备。我喜欢看到它们变得更自在、更本真，逐渐显露出自信和个性。

蒂法妮发现了那条留下来的狗。一条10岁的棕白相间的博美犬，重8磅，牙齿细小。它被发现遗弃在萨克拉门托附近。它是快乐的化身，总是带着微笑，就像有人告诉它要去迪斯尼乐园一样。领养请求纷至沓来，但我一个都没回复。我盯着它看了很长时间。

这不在计划之内。代养狗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一只会咆哮的大型犬。在遭受过一次侵犯之后，这个世界告诉你要提高警惕，要反击，要小心。这个世界不会提醒你松开拳头，去散个步。但你不必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如何幸存下去上。没人说“领养这条博美犬吧”。我本打算用更高的门和更锋利的牙齿把自己包围起来，但也许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也许我可以只在内心建立这种安全感。

我们给我们的狗起名叫“蘑菇”。它每天都让我想起马特维尔的口号：“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这是对它的承诺，也是对我自己的承

诺。无论你来自何方，你都不必回头。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写作，不同小狗轮流睡在我的腿上，往我的房间里放屁。我第一次坐下来看笔录；我不在法庭上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事无巨细地说了好几百页。事实证明，我的通勤时间很长，每天都要回到过去。令我震惊的是，即使我已经得到了数百万人的认可，愤怒的情绪仍会毫发无损地卷土重来。我用红笔批注笔录：“笨蛋，混蛋。”尽管那份陈述已经表达得如此清晰，宣泄得如此充分，我仍然在挣扎。我们通常认为受害者的对手是行凶者和律师，却忽略了受害者自身就是自己的敌人。关于我是谁的旧观念又出现了，它告诉我，被伤害了，变得没有价值。有些耻辱已经固化，对赞扬无动于衷。

有些日子，我什么也不做，把房间的门关上，就好像把自己不敢进入的时光机给关上了。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放弃了一切，穿着黑色羽绒服慢跑着去吃三明治，把香菜叶子粘在嘴唇上，眼睛又干又红，然后我会坐在图书馆儿童区的地毯上。我渴望更轻松、更甜蜜的世界。卢卡斯会看到我很晚才回来，怀里抱着满是关于龙和煎饼的儿童读物，他慎重而犹豫地问我：“你今天写了些什么？”这是他弄清楚我脑子里有什么声音的方式。

距离我上次出庭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担心自己会永远站在证人席上。我的思想比以前慢一拍。我称之为滞后。以前我生活在现实时间中。现在我在进入一个时刻之前要先做一番评估。我总是在请求许可，因为我预见到自己必须面对一个看不见的陪审团，在辩护人面前回答问题。当我拿起一件衣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穿这件衣服，他们会怎么想？当我去什么地方，我会想：我能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吗？如果我上传了一张照片，我想：如果这是作为证据提交的，我看起来会不会太愚蠢？我的肩膀会不会太裸露？我付出太多时间在质疑自己在做什么、把事情翻来覆去、让自己回归正常这些事上。

一天晚上，我本来打算拿瓶金酒去参加派对。但我站在推车旁，眼睛盯着蓝色的玻璃瓶，心想：这里面会藏着什么经历呢？谁会喝

它，谁会受伤，他们会问我是什么牌子的吗？在派对上，我衡量着一切。如果没有烈酒杯，我就拿着瓶盖，弓着背来掩饰我对这些细节的过分关注。我看到人们倒酒，就会盯着他们看。那是免费的，我想，你不能这么做，他们会说多少，多少盎司，杯子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什么样的杯子。如果有人去了洗手间或者和一个男人离开了，我就会变得紧张：你说她走了是什么意思？她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去的？我要确信每个人都到了家。我会给朋友发短信，早上我会收到回复：“哦！对不起，我睡着了。”他们不知道我整个晚上都在痛苦中度过，我的思绪纠结在最坏的场景里。

当我和治疗师谈论饮酒或过去的性经历时，她会说：“嗯，你感觉如何？”我会说：“哦，我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想。”我陈述了类似的事实。她说：“在那种程度的监督下，生活是不可能的。”

读了布罗克的证词，我注意到我们在那天晚上被放置到一个多么不同的框架内审视。在审问布罗克时，辩护人以下列问题开场：“你注意到在这些派对上人和人都紧贴着吗？人们在桌子上跳舞吗？那也是一件平常的事吗？喝酒呢？喝酒似乎是这些派对的主要活动？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怎样？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在喝酒，对吗？”

在每一行中，我都能发现“普遍，普遍，一部分，每个人，每个人”这些词。这种模式并非偶然。他领着布罗克回到大流中，在那里他可以融入舒适的群体。跟他盘问我的时候相比：“你开过很多派对。你以前有过喝到失去意识的经历。”那是一个“你”接一个“你”，镜头固定得那么近，我被剥去了周围的一切。对布罗克，他的目标是让他融入整体，而对我则是要孤立。

我发现辩护律师给弗罗姆博士发过一封邮件：“我可以传唤把她送到圣克拉拉谷医疗中心的救护人员的记录。他们是否会对我们的案子有害而不是有益？”弗罗姆回复：“尚不清楚这些医疗记录是有益的还是可能有害……可能对我们不利。”

在整个做证过程中，弗罗姆博士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不要让我在这件事上承担责任。天啊，我不是很懂法律。我不是Excel高手。我可

以这样告诉你。”我不能忍受当我的身体被贬抑的时候，还有人在混淆视听或轻描淡写。

弗罗姆博士作证说，语无伦次的语言并不能推断出我没有能力进行自愿行为。她把这比作牙医给的普鲁卡因<sup>(2)</sup>：“你说话有点问题，但你的思维仍然可以很清晰。例如，含糊不清的语言从来不会阻止人们在易趣网上进行愚蠢的购物。”不用说，被强奸不是网购，酒精也不是普鲁卡因。如果我的行为是自愿的，难道我不可能自愿把他赶走吗？谁会认为我的行为是顺从的呢？

总是有人提醒我，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现在我意识到，是啊，也许这是你的工作，但它仍然需要一个特定的人来完成这份工作。审判揭露了令人恐惧和迷惑的现实，提高了言语的恶毒程度。我变得愤世嫉俗。折磨使你发疯，使你发狂：当人们开始攻击我的致命要害时，我想反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高大，我只想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渺小，感到刺痛。

但我告诉自己，不要成为他们。专注于自己想成为的人。我努力修改这本书的草稿，以减少其中的讽刺和人身攻击。我发誓不会对别人加以贬低或非人化。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侮辱，而应该是引导，去揭露更大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学到一些东西。我想做我自己。所以我使用自己的力量不去向后推，而是控制自己的声音。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有一个人想要伤害我，就有更多的人想要帮助我。我希望法庭上应该有一个掠夺研究专家、受害者研究专家、同意研究专家来更好地引导陪审团。我们仔细研究受害者的行为，而不是性侵者的行为模式。观察酒精如何降低抵抗能力，使四肢软弱无力，只会对掠夺者有利。

布罗克：“她滑倒了。”

辩方：“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她是怎么穿的吗？她穿的是什么？”

布罗克：“她穿了条裙子。”

辩方：“好吧。当她滑倒时，她的身体怎么了？”



为什么要用专门的时间解释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能解释他的行为吗？我进入法院系统，希望它井然有序、为民服务、有建设性。现在我知道谁的声音在法庭里被放大了，谁的声音被减弱了。宣判时，法官引用了布罗克的朋友写的一封信。我将在此略去她的名字，相信她已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她在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他未来十多年的命运建立在一个女孩的决定上是不公平的，她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她为了指控他而喝了多少酒。我不会因为这件事直接责备她，因为那是不对的。但我们该如何划定界线，停止时时刻刻担心自己是否政治正确，并认识到校园里发生强奸并不总是因为人们就是强奸犯……这与一个女人在停车场走向她的车时被绑架和强奸是完全不同的。那是强奸犯。而这些不是强奸犯。这些都是喝了太多酒的傻孩子，他们没有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判断力也很差。”

我的陈述一出来，她的信就被公开了。那年夏天，她原计划参加一个由三名女孩组成的乐队并一起巡演，但场馆相继取消了演出，称他们无法容忍强奸文化。乐队从唱片公司除名，巡演解散，她发表了公开道歉。更令人不安的是，在39封信件中，只有这一封是法官在宣判时引用的。她所受的误导是意料之中的，而法官则不然。

通过引用她的信作为观点来源，他支持了她对强奸的过时而扭曲的定义。我们知道熟人强奸比陌生人强奸要普遍得多。如果我们削弱了熟人强奸或派对上发生的醉酒强奸的严重性，治愈就会大大延迟，恢复的过程会遭屠戮，掠夺者就会毫无畏惧。

布罗克的母亲写道：“每天早上醒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是我。那天早上妹妹来接我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感谢上帝，是我。”感谢上帝，是我，而不是她，不是朱莉娅，不是一个将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学业的18岁女生。我很幸运已完成学业，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中。我有一个家，离法院不远，诉讼结束后我可以在那里休养。父母会在我睡着的时候为我关灯，给我盖上毯子。我存了钱。我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做好了开启这段旅程的准备。

虽然数以百万计的人现在知道了我的故事，但在遭侵犯的那一年，我只告诉了家人以外的两个人。第二年，我又告诉了几个人。在那之后的一年，我告诉了三个人。奇怪的是，向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坦白是很容易的，而向认识的人坦白要难得多。也许因为他们有着包含你过去的口袋：你是谁，他们对你的看法。让这些想法消失，围绕着我的新身份进行重新设定是很难的。当我告诉我爱的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在搜寻，好像在等着我告诉他们这不是真的。当爸爸告诉安奶奶我是受害者时，她不停地说：“什么？什么？”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报纸上关注这件事。她只会说：“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是香奈儿。”不管我治愈了多少，遭受侵犯本身永远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得接受这一切。我必须停止催促他们去看那些涌来的信件。我得给悲伤留点空间。

更多时候，我不是在兴奋，而是蜷缩着身体，不断提醒自己有多少事情是对受害者不利的。但无论绝望还是疲惫，我相信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渴望以及来这里看到它的渴望永远不会消失。渴望本身就够了。

妈妈最喜欢的笑话是关于一只蜘蛛和一只蜈蚣在喝茶的故事。蜈蚣起身提议去买零食。他走出门，几个小时过去了。蜘蛛很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打开门，却发现蜈蚣坐在门垫上，还在穿鞋。我想象自己是蜈蚣，挣扎着系好我的一百只小鞋子，我比大多数人都走得慢。但我会一只又一只地把鞋穿上，直到我能站起来再次行走。

---

(1) Deepak Chopra，美国印度裔著名心灵导师。

(2) Novocain，一种局部麻醉药，毒性较小。

我在法庭上宣读陈述之后仅仅5个月，特朗普当选了。我被法官说“六个月”时那种同样的感觉击中了。措手不及。失望。毁坏。

当特朗普的《通往好莱坞》录音<sup>(1)</sup>曝光时，一般人都认为他所说的话粗俗、下流、肮脏。安德森·库珀<sup>(2)</sup>直截了当地问特朗普，他是否明白自己是在谈论性侵，整个国家都看到他耸耸肩说：“更衣室谈话”<sup>(3)</sup>。在公众面前，我们变得疲惫不堪。我们听到录音带重放了一千遍，辩论了两千遍，下体下体下体；在报纸上，在广播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争论不休：“你是不合适的，不，你是不合适的”，直到耳朵对这话变得迟钝。我们逐渐习惯了同样的转移、防守、稀释的模式。“这段录音是2005年的，男人们说话就这样。”他们想让我们接受这种狗屎，继续前进。

语言使我烦恼，但更使我烦恼的是语境。“我只能看到腿。哦，看起来不错。”特朗普和比利·布什在评价一个女人，不是顺便提起，也不是凭记忆，而是在一辆缓缓向她驶来的大巴车上。她在这场，人们能看见她，但被排斥在外。我想象着她站在外面，微笑着，耐心地等待。她是头鹿，而我们知道山狮潜伏在灌木丛中，我低声对她说话，让她竖起耳朵。快跑。当这两个人走下大巴台阶，他们粗声粗气的谈话就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公开的自我。“给唐纳德一个小小的拥抱怎么样？”我看着她热情地迎接他们，走在他们中间，挽起他们的胳膊，我的心中充满恐惧，想起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切方式。

“这是更衣室里的玩笑，是多年前发生的私人谈话。”他没有道歉，而是把这对话从车上拖到更衣室里，那是女人无法进入的另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应该是不妥的，只是说这应该是私人的。他想把我们拒之门外，而我们根本不想听。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并不后悔，只是后悔被抓住了。特朗普听起来像是我认识的人。

我只是开始吻他们。只是吻。我连等都不想等。“我吻了她。”布罗克说。“你吻她之前没有征得她的同意，是吗？”我的检察官说。“没

有。”布罗克说。我像个婊子一样在她身上动。“我吻了她的脸颊和耳朵，”布罗克说，“我摸了摸她的乳房。我把她的裙子拉下来。”抓住她们的下体。“我脱下她的内衣……然后我用手指进入她。”我确实想上她。<sup>(4)</sup>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难区分一个总统和一个19岁的性侵者的话。

社会赋予女性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把无害与危险区分开来，预见有些男性可能做某些事的能力。当我们受到攻击、大声呼喊时，特朗普说，我认为你不明白。只是口头上的。你这是反应过度，过度自卫，歇斯底里，粗鲁，放松！！！所以我们无视威胁的言论和警告的信号，为我们的妄想道歉。我们参加派对或会议，以为只是派对或会议。但是当我们被利用了，爬着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你怎么能这么天真，你没能发现危险，放松了警惕，你以为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明确表示，游戏是被操纵的，规则在不断变化。你认为什么是侵犯并不重要，因为到最后，由他决定。

在录音1分10秒的地方，你可以听到啫喱糖<sup>(5)</sup>在小盒子里晃动的声音。我最好吃点啫喱糖，以防我开始吻她。有人会说：“他只是个男人！吃颗薄荷糖！在大巴上！”但它让我想到，如果你听到有人在你身后关门时上锁的声音，你的身体就会紧张。女性被训练去注意微小的动作，去扫描和预测所有的后续行动，不断衡量威胁的话与现实有多远。我们的任务是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场景中保护自己，规划逃生路线，在指关节间带着钥匙行走，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然本能。

2016年7月6日，也就是我的陈述发布一个月后，年轻的黑人男子费兰多·卡斯蒂尔从杂货店开车回家，一名警察拦下他，因为他的尾灯坏了，然后朝他开了7枪。他的未婚妻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拍下了他弯腰驼背的样子，他的白衬衫染成了红色，就像一面日本国旗，而坐在后排的是一个4岁的女孩。我想：证据，就是这个，这个案子会有裁决。它就在那里，你无法回避，无法为你的行为找到理由。

然而，2017年6月16日，陪审团做出了无罪裁决。在奥克兰，人们涌上高速公路。有人称之为骚乱，但我看到了原因。我的证词不完

整，因为我晕过去了。费兰多不能做证，因为他已经死了，甚至不能参加自己的审判。我真希望公诉人叫费兰多站到证人席上，强迫陪审团盯着空无一人的证人席，让他的名字在沉默中回响，然后继续提问。“你给那个小女孩起了什么绰号？你抱她的时候胳膊累了吗？你知道那天早上穿衣服的时候，你会穿着这些衣服死去吗？你的婚礼想要什么样的蛋糕？”

警官说他当时很害怕，有理由相信费兰多正伸手去摸枪。让我看看那个场景。一个男人坐在车里，后备厢里面装满了正在融化的杂货，身上穿着薄薄的一层棉布，一个小女孩坐在后座上。准备掏出他的枪，射穿警察的防弹背心，让自己成为一个逃逸司机？为什么费兰多要射杀一个刚刚认识40秒的无辜的人？而为什么就是这个警员？

让我们回到埃尔南德斯先生的电影文学课，回到《大白鲨》。埃尔南德斯先生指出，直到影片进展到大约80分钟，我们才真正看到鲨鱼。此前，我们听到可怕的故事，瞥见它那阴险的鳍，准备好要被吓到，所以当鲨鱼初次登场时，我们看到了所有我们被教导要看见的东西，无情的、嗜血的下颚。警察把费兰多叫到路边之前，他报告说这个人就像一个抢劫嫌疑人，评论了他的“宽鼻子”。警察走到窗边的时候没有看到费兰多，他看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宽鼻子、黑肤色、枪支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脑海中的“威胁”。问题不在于我们是谁，而在于你认为我们是谁。你投射到我们身上的现实：费兰多会很暴力，我会在垃圾桶后面要求做爱。

费兰多的警官做证说：“我以为，我要死了，我想他是不是，他有没有，肆无忌惮地在一个5岁女孩面前抽大麻，还让她吸二手烟，给她的肺部和生命造成风险，而前排乘客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那么他怎么会在意我呢？”在他的证词中，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期待：一个受害者必须是完美的才有资格活下去。“肆无忌惮地抽大麻”为死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辩护人称我是“派对动物”，这意味着我也应该被强奸。

布罗克在他的陈述中写道：“我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从未真正体验过与酒精有关的庆祝或派对。”警方对布罗克的手机实行了调



查，发现了他在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的短信和他喝酒、抽烟的照片，一个水烟筒<sup>(6)</sup>：“你觉得我要不要买些蜡，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点大麻精？”大麻精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大麻。“老兄，我上周和克里斯蒂安吃了迷幻药。”朋友的短信：“我很想来一次迷幻之旅。我很确定。”还有关于“转糖果”的短信，一种LSD致幻剂和摇头丸的混合物，“我他妈的要试试。听说那个很棒。”

我不介意，这不能证明他是坏人，我不是来这里评判他吸毒的。扯开那个水烟筒，小子。你可以在早餐、午餐和晚餐吃蘑菇。你可以把你的心掏出去，不管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你的生活，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但你不能做的是，带着你的陈述来到我的法庭说：“我对喝酒和派对没有经验，所以我只是接受了（游泳队的人）向我展示的这些东西……在学校的四个月里，我曾短暂地经历过派对文化和冒险行为，它们让我崩溃。”

在宣读裁决那天，《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援引布罗克的话说，他希望在十年内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的姐姐写道：“奥运再见。再见，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另一个写信的人说：“你可能已经知道，布罗克上大学的目标是学习生物医学工程……他的个性与典型的工科学生相当一致，恭敬、低调、谦逊……”我在缓刑监督官的报告里找到了他的简历。案发时，他已经做了两年的救生员，当时正在一家名为“快脚”的商店打工。但我从没在任何地方读到过这些。他没有被迫承认他现在的事实。人们谈论的是他失去的潜力，他永远不会成为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他们说得好似他的未来正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到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你的未来并不是许诺给你的。它是通过你所做的选择日复一日地构建起来的。你的未来是通过努力和行动一点点赢得的。如果你不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个梦想就会消失。

如果惩罚是基于潜力，那么有特权的人会得到较轻的刑罚。布罗克被隐藏在像他这样的人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预测里。“整形外科医生。生物医学工程师。全美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员。”法官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很多，放弃了很多机会。那些一开始就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人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不是一个19岁的斯坦福运动员，而是一个19岁的在兄弟会厨房工作的拉美

裔青年，也犯了同样的罪，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有不同吗？《华盛顿邮报》会称他为外科医生吗？

我的观点可以用布罗克写的一句话来总结：“我只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事情会出错或者没有人会认为我会犯错的现实中。”肤色浅的人享有特权，这让他坚信后果并不适用于自己。在这个体系中，谁是不可触碰的？谁是被任意处置的？我们打算保护谁的生命？谁下落不明？谁是真正的破坏者？那个开枪的人，那个用手指侵犯别人的人，谁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问题？布罗克说，在他最初被捕时，他没有告诉警长这么多重要的细节，因为“……我的大脑正以每小时100万英里的速度运转，我不可能清楚地思考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我们总是希望受害者能够清楚地思考，恐惧从来都不能用作借口。毫无意义的暴力仍在继续上演，而你却要求提交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这是不够的，再试一次吧。

即使性侵的指控被提交给警方，也只会有一小部分会被检察官受理。这并不是因为检方不相信受害者，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举证难度极高，因为一个人必须证明袭击“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如果证据不足，一开始的机会就很低，检察官就不会让你经历整个过程，这意味着即使受害者想要前进，事态的发展也不总是由她决定。

这就只能在民事法庭提起诉讼，这种方法需要的证据标准较低，只需“充足的证据”。但她仍然需要找到一个律师，说服并聘请其来接手她的案子。在民事诉讼中，受害者的名字是不受保护的，她可能会被指控意在索赔。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两到三年。

当一个受害者在大学校园里被侵犯，通常受害者想要的只是确保自己的安全，他永远不会再犯。人们指责大学缺乏处理这些案件所需的经验，因为他们不断变化的纪律系统仍然存在混乱，所以他们会再次建议受害者向警方报告。严重的犯罪需要严肃的系统来处理，我同意这一点。但她将牺牲自己的教育，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斗争数年。学校不具备进行全面审判的条件，但它们有能力创造安全的环境，并通过将肇事者赶出校园来实施有限的惩罚。每个人都应该得到适当的程序，这是绝对正确和不可否认的，尤其是在后果很严重的情况下。我



们不是说要让大学有能力把人送进监狱，这是荒谬的。学校只能说，你不能再在这里学习了，你不能再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或者食堂，你必须去找另一个图书馆和食堂。学生会因剽窃或贩卖毒品而被迅速开除，那么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对他人构成了威胁，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哦，但是他的名声！这才是他真正痛苦的地方。”我的建议是，如果他担心自己的名声，那就不要强奸任何人。

布罗克写道：“在这之前，我在遵循法律方面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打算继续保持下去。”2014年11月15日，就在我遭受侵犯的三个月前，肖警官发现几个年轻人拿着啤酒罐在斯坦福校园里走来走去。他们要被拘捕的时候逃跑了。一个人被抓住并拘留，他承认逃跑的人是布罗克。布罗克被召回。警方记录说：“他穿着一件鲜橙色的燕尾服回来了，肖警官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他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里面装着淡啤酒，手里还拿着一瓶啤酒。他承认试图藏起啤酒，并知道他不应该喝，因为他未满21岁。他说，当他看到肖警官接近时，他决定逃跑。逃跑的时候，他听到了要他停下来的命令，但还是继续逃。他说那是一瞬间的决定，他后悔了。”三个月后，肖警官将会是侵犯事件后为我的身体照相的人。

在我被侵犯六个月后，两名年轻女子找到金警探并报告说，在我被袭击前的那个周末，她们在卡巴奥发兄弟会遇到了布罗克。警方报告指出：“他给她戴上帽子，然后她把帽子摘了下来。然后他开始在她身后跳舞，并试图让她转过身来面对他。她感到不舒服，试图把身体转开，这样他就不会直接在她‘身后’。他变得非常‘敏感’，把手放在她的腰和肚子上。他甚至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感到非常不舒服，就从桌子上下来了。她说，被告因为他的坚持而把她‘吓了一跳’。”

同一个地方，一个星期之前。我很庆幸女孩们花时间找到了我的警探，我知道，看到新闻，然后说“哇，是派对上的同一个人”，然后继续生活，这要容易得多。相反，她们贡献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安安静静地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2015年1月18日凌晨，在被告被捕后不久，警探注意到‘飞聊’应用程序在被告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一条信息。上面写着：‘那些乳头是谁

的？”这些图片已被组里的第三方删除。有人猜测布罗克拍下了我的胸部，然后发了出去。如果这是真的，我不想知道。

布罗克背着装满康胜啤酒的背包从警察那里跑出来，在女孩子身上蹭来蹭去，吸大麻，嗑迷幻药，拍乳头，这些故事都没有出现在他的亲人和媒体所投射出来的形象中。《华盛顿邮报》称他是一个有着“纯洁的娃娃脸”、脸颊绯红的小天使。写信的人坚持认为“他被误解为罪犯”。他们称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为他的自由而战。喜欢玩乐。他的身体里没有一根恶毒的骨头。很容易脸红。如果我可以选择一个词，那就是温柔……那种我觉得像拉布拉多犬的人……亲切，关心别人，有才华，谦虚，负责，值得信赖。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

即使在定罪之后，他们仍然认为他有权不受惩罚。他们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他们拒绝称其为侵犯，只称其为“可怕的混乱，这种不幸的情况”。他们仍然说：“布罗克不是一个相信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或拥有任何特权的人……作为一个女人，我从来没有被他吓倒过。”在他母亲长达三页半的单倍行距陈述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我。抹除是一种压迫，一种拒绝去看的态度。

2017年1月20日，在《通往好莱坞》录音带发布四个月后，全国人民看到特朗普微笑着，举起手，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我在发抖。那是咔嗒咔嗒的声音，是成千上万的滚动的嘀嗒糖发出的声音。你可以为所欲为。

---

消息传来时，我在雪地里。那是2017年12月2日，距离判决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卢卡斯和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小屋。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听到他穿着雪裤四处走动的嗖嗖声，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在响，水槽里的水流动着，热风从通风口吹进来。我拿起手机，在床上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刷屏。我看到未接来电，坏消息，布罗克的上诉。指控审判不公，证据不足。这份简报长达172页。《纽约时报》指出，其中大约60页是关于我的醉酒。雪景消失了，冷杉树也消失了。我必须回

去，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打电话给检察官和父母，说：“是的，我听到消息了，是的，我会没事的。”

上诉是非常普遍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上诉，但一想到只要这个案子没有永远结案，就还有机会，不管机会多小，都会被重审，我就很纠结。检察官告诉我没有办法。该州的首席检察官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写一份回应。提交上诉之后，布罗克的上诉律师马尔特霍夫将在明年某个时候，在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小组面前进行口头陈述，具体时间待定。我在宣判时看到的那个白发苍苍的上诉律师已经被这个寡妇般消瘦的男人取代了。

蒂法妮打来电话。她一顿早午餐中走出来，留下一桌子围着吃饭的朋友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没事吧。”她一个人站在外面，而我坐在大雪中的一个房间里，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小屋里的每个人都在吃面包，头上戴着护目镜，沉浸在我已不再是其中一部分的现实。卢卡斯回到房间，注意到我心烦意乱，手机不离手，没换好衣服，他问我怎么了。当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决定不让这个消息破坏我们这一天，我们本打算去滑雪。我摇了摇头。

这种事他以前见过太多次了。他不仅对上诉本身感到愤怒，而且对它给我造成的影响感到不安。他想把我从它的魔爪里拽出来，把我扔到一个滑雪缆车上，那是我本来要去的地方。但我不想动弹或在别人面前假装高兴。卢卡斯最后说，他会给我私人空间，拿上他的手机，这样只要我准备好了，我们可以随时碰头。我听见每个人都拖着脚步走出门去，直到最后房子里一片寂静。

172页。我看了一下目录，看到了小标题为《多伊女士的妹妹》《多伊女士的男朋友》《朱莉娅》的部分。我看到我爱的人又一次被拆散，在新的一轮比以前更恶毒、更具侮辱性的争吵中受到指责。我想把他们的名字从纸上撕下来，让他们离我更近些，不让律师抓到。

我写陈述是为了让他停止。不要践踏我，不要否认我的事实，不要推诿。我受够了，我忍受得太多了，我不能再忍受了。现在结束了。这是他们说“不”的方式。他们的说法是：“这是172页的‘不’。”他们住在一个隔音的盒子里，打算让我和他们一起在里面窒息。

当你要求受害者报警时，你知道你是在告诉她要走进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吗？“她为什么不报警呢？”我有警官，警探，护理人员，我有警车，救护车。我让他们给他戴上手铐，给我拍照，记录目击者的描述，记下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从我脖子上的细链子到我的鞋带，我的衣服被收走，他的衣服也被收走。我在侵犯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提出了指控，三年后，我在这里读到上诉律师的陈述，他说我“显然是在垃圾箱前面”，而不是以任何方式“在垃圾箱后面”。他如何只是对我“张开的生殖器进行了外部按摩”，我们如何“不理解年轻人表达他们的性冲动的方式”。当你说到“报警”，你会预想到什么？我很感激我的团队。但警方会继续处理其他案件，而受害者将被滞留在痛苦而漫长的司法程序中，她将被质问，然后忘记她是谁。你只是身体上受到攻击吗？这里有一些信息，会让你知道多年来承受言语侮辱是何滋味。通常，独自忍受强奸似乎比面对因寻求支持而导致的肢解更加容易。

当受害者寻求帮助时，她被视作在攻击侵犯者。寻求帮助是她的主要动机，而他的后果是次要的，二者是分离的。人们教导我们：如果你发声，他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你会因为他没有得到的每一份工作、未能参加的每一场比赛而受到责备。他的家人、朋友、社区、团队会叫你下地狱，你确定你想要这样吗？我们强迫她认真思考这对他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从未考虑过他的行为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从本质上来说，受害者是寡不敌众的。她是他进行性侵的唯一对象，她要凭借一己之力毁掉他们多年来的温情故事所支撑的所有坚定信念。他们会说：“我们从没见过他那样做，所以你一定是在撒谎。”这种情绪反映在布罗克姐姐的声明中：“在他的审判中提出的证据和对他的性格做出的结论仅仅来自他生命中的一个夜晚，来自不认识他的陌生人：他的存在的一个零头的零头。”受害者不是单个的人：我们是一个整体。

当社会质疑受害者不愿被报道时，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你们这是要求我们牺牲理智，与那些意在压制我们的过时体制做斗争。受害者没有时间这样做。受害者也包括学生、教师、家长，他们不能放弃工作或教育。普通成年人几乎找不到时间去车管所更新驾照。要求受害者把生活放在一边，花更多时间去追求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拥

有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这与受害者缺乏努力无关。这是由于社会未能建立起一个让受害者感到有可能获得安全、公正和复原的制度，而不是让他们再次遭受创伤、公开羞辱、心理折磨和语言伤害。我们真正需要问的问题，不是“她为什么不想报道”，而是“你为什么要报道”。

布罗克将永远是“变成强奸犯的游泳运动员”。他很伟大，然后他倒下了。而我以后做的任何事都是那个“写书的受害者”干的。他的才能先于悲剧。而她可能是命中注定。他伤害我的时候，我并不存在。“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有声音，他把它剥夺了，让我哑了一阵子，但我总是拥有声音的。我使用它，就像我此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它一样。我不是因为他才成功，那是我自己的成长，他没有创造我。

2017年6月17日，[科斯比](#)的第一次审判陷入僵局；六名陪审团成员抓耳挠腮，无法信服，别管那两颗药，是的，但是，我只是，我不确定，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你会认为安德烈娅·康斯坦德在经历了一场折磨人的无效审判后会筋疲力尽地放弃。再次证明：“你可以做任何事。”但在2018年4月26日，第二次审判的判决结果被大声宣读，科斯比的双臂反铐在背后。有五十多个女人跟她一起说，不，科斯比，你不能。

你不能不问一声就亲吻，不能抓下体，不能掩盖你在做的事，不能关掉麦克风，不能把它挥走，不能让我们忘记，因为“你不能”是一种许诺，我们跟着它的节奏在走。长久以来，男人可以，他们真的可以不受惩罚。他们逃掉了，但他们所做的事却永远不会消失，即使我们的头脑想要忘记，那些事却已变成了一种有形的记忆。不管我们的大脑多少次把它当垃圾扔掉，我们的身体会把它储存起来，无论我们多少次被告知要继续前行，承担责任，长大成人，不管过了多少年，如果我们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我们的孩子有了孩子，我们的身体仍然记得。当我们的思想试图完全抛弃它的时候，在深夜，独自躺着时，我们的身体仍在抗议：“你不能。”

2017年10月，阿什莉·贾德和罗丝·麦高恩站到了最前线，韦恩斯坦倒下了。[⑧](#)有权势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女

人走上前去，结果这些人都下来了。但这不是以眼还眼，而是以一眼还百眼。这些男人没有意识到，这么多年来，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掠夺女性时，他们创造了多个证人和不止一个的支持者，感谢上帝，因为很明显，一个人是不够的。科斯基，60个。韦恩斯坦，87个。纳萨尔，169个。新闻使用了诸如“雪崩式的指责”“海啸式的报道”“翻天覆地的变化”之类的短语。这些比喻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但把它们与自然灾害相比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根本不属于自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虽然有人把它称为海啸，但不要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生命都是一滴水，多少滴水才能形成一个巨浪。这种损失不可思议，令人震惊，令人发狂——我们应该在它还是一滴水的时候就抓住它。相反，社会上到处都是走上前来的幸存者，每个男人都制造了几十个幸存者，只是为了有一天，在他老了的时候，他能尝一尝她们一直以来的感受。

塔拉纳·伯克发起的“我也是”（Me Too）运动，让人们看到了性侵犯和骚扰发生的庞大数量，以及暴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指出了无数我们被教导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对话和姿态。“我也是”在英语里通常放在句子尾端，意味着附加上，“另外一个”。它无法从一个更大的群体中解脱出来，不能孤立使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需要详细地透露你的整个故事，你只需要点头，然后举手。发声并不会让你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它只会让你为一个光彩夺目、不可胜数的整体贡献一己之力。“我也是”运动给了我一种解脱感，因为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看看没有了它，自己走来走去、呼吸、微微抖动手臂是什么感觉。

有人说这是猎巫，说“她在追击他”。我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击的。值得纪念的一天。追溯回去。我几乎可以肯定，在那次遭受侵犯之后，她试图过自己的生活。问她第二天做了什么，她会说，我去上班了。她没有拿起干草叉，也没有请律师。她整理床铺，扣好衬衫，洗了一个又一个澡。她试着相信自己没有改变，继续前进，直到她的腿再也走不动。每个敢于发声的女性都是因为她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她实在无法在自己努力经营的生活中再多活一天了。所以她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对它。社会认为我们活着是为了对他穷追不舍。事实

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就是这样。他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试图继续走下去，但做不到。每次幸存者重新出现时，人们都很快地问她想要什么，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不是那时，为什么不是更快。但伤害不会只在最后期限内发生。如果她出现了，我们为什么不问问她怎么可能和这种伤害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问问是谁教她永远不要揭露它。

受害者经常被指责为寻求报复，但报复只是一个微小的引擎。我知道，当小木槌下落，当手铐咔嗒一声合上时，我的平静就会到来。他可能坐在牢房里，但他永远不知道在自己的身体里无家可归是什么感觉。我们不为自己的幸福结局而战。我们为了能说“你不能”而战斗。我们为责任而战。我们努力开创先例。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祈祷自己将是最后一个感受到这种痛苦的人。

当希拉里·克林顿的书《发生了什么》出版时，我得知她引用了我的最后一段话：“在你感到孤独的夜晚，我与你同在……”然后她写道：“11月9日清晨，在决定我在败选演讲中要说什么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受到她们的鼓舞，我写下了这些话：‘所有正在看这场演讲的小女孩们，永远不要怀疑你的价值和力量，你值得世界上的每一个机会去追求和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无论她身在何处，我希望埃米莉·多伊知道她的话语和力量对许多人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重大损失的时刻，她为了寻找希望而查阅了那份陈述。她回到我最黑暗的地方，为我照亮前进的道路。

- 
- (1) 2005年9月，特朗普受邀参加《通往好莱坞》节目录制，在前往拍摄场地的大巴车上，与节目主持人比利·布什关于女性的低俗言论被录音，并于2016年美国大选季期间曝光。
  - (2) Anderson Coope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王牌主播。
  - (3) 指男性之间具有冒犯性、通常含有性意味的交谈内容。这种谈话经常发生在高中更衣室里。
  - (4) 本段中楷体字部分均为特朗普在录音中的言论。
  - (5) Tic Tac，由意大利糖果制造商费列罗生产的一种小而硬的薄荷糖。
  - (6) 用于吸食大麻、可卡因等毒品。



- (7) Bill Cosby, 美国“电视喜剧之父”。2018年9月25日, 80岁的比尔·科斯基因2004年在家中下药和性侵安德烈娅·康斯坦德罪名成立, 被判3年至10年监禁。
- (8) 2017年10月, 《纽约时报》披露, 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在几十年内涉嫌对多名女性进行性骚扰, 阿什莉·贾德和罗斯·麦高恩是最早站出来指证韦恩斯坦的两位女性。2020年3月11日, 韦恩斯坦被判入狱23年, 并将正式注册为性犯罪者。

## 13

2018年1月，超过160名年轻体操运动员不再光脚站在塑料垫子上，而是穿平底鞋站在瓷砖地板上，一个接一个地站在台前，向拉里·纳萨尔<sup>(1)</sup>宣读自己的陈述，纳萨尔脸上满是胡茬，仿佛埋进了泥土里。新闻播出时，我正在切胡萝卜和豆腐，喂蘑菇，电视开着当背景音。当这些年轻女人的声音进入房间时，我任凭一切燃烧，蒸汽升腾，而我入迷地坐在那里看着她们。她们的话是铁铸成的。甚至当她们的声音颤抖时，她们的眼睛仍然盯着他。我想，如果我，作为一个幸存者，是由和她们一样的纤维组成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由相似的线头组成的，我将是不可动摇的。那一天，我胸中有一种东西在灼烧，我觉得我可以举起一辆车，爬上一座山，我为自己属于幸存者而感到自豪。她们散发出力量。“小女孩不会永远都是小女孩，”凯尔·史蒂芬斯说，“她们会变成坚强的女人，回来摧毁你的世界。”

也许拉里认为时间是站在他那一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熟练地掌握了自己的技术。但在这段时间里，她们变得越来越强壮，在寻找合适的温度，以便安全站出来。他们的力量之源也在我身上显现：只有承受过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人，才能达到那种境界。

但有些事情不同。我的注意力不断地转移到在女儿宣读陈述时站在她身旁的母亲身上，她的身影阴沉，背景中是一张茫然无言的脸。观众席上坐着一排排父母，低沉而肃穆。我们很少看到另一种影响，坚强有力的女儿和她们内心不安的所爱之人的悲伤回音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角色转换了，成年人退后一步，看着自己15岁的孩子走上前来要求补救，而他们却沦为无助的旁观者。在每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之后，家长们眼中似乎都表现出第二层次的思考，一种内疚，更或许是浓重而沉郁的对话。其中有一种痛苦：“你太年轻，还不知道这些。”还有一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来防止这一切？”

安奶奶问我妈妈：“香奈儿告诉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妈妈说了四句话：

“我试着不去记住。”

“我的膝盖都软了。”

“是我开车送她去的。”

“我本应该掉头带我的孩子们回家。”

朱莉娅说：“是我邀请你去参加派对的。”

蒂法妮说：“走开了的人是我。”

卢卡斯说：“我是最后一个和你通电话的人。”

我告诉过他们多少次，你是让我留在这里的原因，而不是让我受伤的原因。我仍然能从我的父母身上看到这一点，每当提起这个案子时，他们的表情就会变得严肃，就像乌云在太阳上短暂地飘过一样。

看着这些体操运动员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在屏幕上看到法庭的内部。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避免在电视、表演、电影，甚至动画片中涉及法律程序的地方看到法庭场景。我看到一个在万圣节装扮成法官的婴儿，小黑布，小木槌，然后我就讨厌那个婴儿，讨厌那些认为这很有趣的父母，我知道我疯了。

我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太残忍，太耗时。我的信心正在消失。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想听一个受害者得到照顾、正义得到伸张的故事会如此困难？接着，阿奎利娜法官出现了。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他们给我阅读陈述的时间太短，直到阿奎利娜法官拿出169份陈述。她明确表示每一件事都很重要。在那个我只将其与折磨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里，她把恢复与同情邀请进来。“把罪行留在这里。它不值得你们一家花更多的时间。”她赶走了消极力量，“不要再羞辱和责备父母了，”她说，“相信我，你不可能预知。你也不会做任何不同的事。”她对女性们说：“你们不要再痛苦了，出去干你们的大事吧。”我不知道这样的指令也可以。在法庭上，法官是这艘船的船长。我的船长把我们沉没了，而把她她们的船掉转，驶向地平线。我希望斯坦福也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保护幸存者的领导者机构。

我出生在斯坦福医院，当我小的时候，我相信这理所当然会让我变得聪明。我骑车经过棕榈树和桉树，经过红瓦屋顶下。我现在仍然不能说出大部分建筑物的名字，但我可以提供我的回忆之旅，可以指着校园里的任何地方说：“这就是什么什么地方……”这是我坐在折叠式桌子前卖女童子军饼干的地方。上中学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身高很在意，所以安奶奶带我去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女子篮球队见面会并和她们打招呼，让我看看高个儿女孩可以长成什么样的人。每场比赛我都举着爷爷的望远镜，套上小毛巾欢呼，喜欢跳舞的树状吉祥物，它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厕纸卷，长着一对大眼睛和松软的叶子。在斯坦福，我在喷泉旁上中文课，在电脑课上学习如何打字和编辑视频：我制作的第一个视频是关于一个有超能力的叉子（叉子大师3000，它可以挖洞，可以给你的宠物梳理头发）。蒂法妮和我会在斯坦福高尔夫球场旁的草地上找到高尔夫球，想象它们是特殊的鸡蛋，然后把它们带回家孵小鸡。

我所在的高中毕业班大约有20名学生被斯坦福录取。去斯坦福拜访朋友是很平常的，比如参加无声迪斯科派对，或者在假期玩苹果派对<sup>(2)</sup>游戏。斯坦福是由朋友、偶像和老师组成的。我可能从来没有在这里当过学生，但在我知道它是一所大学之前，它就是我的社区。这是家。

在我遭受侵犯后，我在沉默中滞留了整整10天。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系主任知道我的名字，但没人联系我。没有人问：“你怎么样？你回到家还好吗？”我想这是因为我不是斯坦福学生，于是没有资格获得来自学校的支持。但我仍然希望在这关键的时刻能得到帮助。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寻求帮助，但如果有人主动提供帮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可能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坐在我的车里拨打热线电话。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有一些关心的表示，一些帮我找到资源的指导，一些对已发生之事的承认。

当我开车在帕罗阿尔托周围辗转的时候，斯坦福的缺席成了一种常态。这次袭击伤害了我的身体，但还有更大的东西被破坏了。对机构的信任破裂了。对一个我以为可以保护我的地方的信念丧失了。我可以忍受他们的冷漠和拒绝道歉，但最让我困扰的是他们没有提出那

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他们把我受侵犯这件事看作是一起孤立事件。布罗克主动退学后，他们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们不允许他再回学校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动。对我的侵犯来了又走了。但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

布罗克不是害群之马，他只是暴露出校园性暴力这个潜在的更大的问题。斯坦福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程序和政策进行系统的审查，以确保当受害者受到伤害时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提供相应的服务。重新评估校园安全。让幸存者感到受到支持。他们应该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很重要。”

我的陈述在网上疯传几天后，斯坦福大学也发表声明：“关于斯坦福大学的作用，流传着大量的错误信息。在这个案例中，斯坦福大学、大学的学生、警察和工作人员都尽其所能。”他们说，在得知我的身份后，“学校秘密地施以援手支持她”。当我读到他们毫无歉意，几乎是充满骄傲的声明，“斯坦福在对待性侵问题上极其严肃，并一直是采取具体措施的榜样……”这是在伤口上撒盐。

斯坦福大学校友、心理学教授珍妮弗·J.弗赖德给奥巴马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她谴责他们“沾沾自喜的防御姿态”。她讨论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术语，“制度背叛”，这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伤害，这种伤害的发生远远超过性暴力本身所造成的伤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度背叛不仅对那些依赖制度的人有害，而且还会困扰制度本身”。

那年夏天，米歇尔在新闻上指出斯坦福缺乏歉意。她说我的侵犯案“不是不可预测的，不是随机的，他们为此制造了条件”。她的终身教职保护了她，允许她公开批评学校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徒劳的。

陈述的新闻热了又过了，夏天来了又走了。2016年8月31日，就在布罗克出狱的前两天，我接到米歇尔的电话：“好消息。”一名位高权重的女士告诉米歇尔，斯坦福想要道歉并为我的治疗支付费用。我叫这位女士苹果籽。吃下一粒苹果籽是无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吃得太多，它们可能有毒，不易察觉、有腐蚀性，而且不可分解。苹果籽说她会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只要在上面签字就可以收到钱了。我说，我希望他们同意与我见面，讨论我的侵犯案是如何

处理的，并让我了解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在此之前我拒绝接受任何钱。米歇尔建议我们在斯坦福改变主意之前接受这个提议。

这让我很生气，这通电话是在布罗克获释前两天打来的。我质疑他们的动机，以物质补偿来为自己正名，在媒体再次围绕我的案子展开讨论之前避免负面宣传。我去找卢卡斯：“我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他们是认真的，几天内就会收到报价。”他还问他们有什么目的。所以我问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你承诺不会提起诉讼。”

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被视为一个人，而是一个法律上的威胁，一个严重的责任。

我想嗤之以鼻，我不需要斯坦福。“谁是斯坦福？”米歇尔说，“你知道，斯坦福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信托公司。你不能把一个复杂的组织人格化。”这是一个品牌，一种他们出售给你的体验。就像米老鼠其实是一个成年人，为了得到报酬，他无声地站在一个令人窒息、僵硬的壳里，身上披着黑色毛皮，戴着厚厚的白手套。与此同时，她也说斯坦福不是一块巨石，是由怀着不同动机的不同的人组成的。“有些人你可以憎恨，有些人却在试图帮助你。倾听那些试图帮助你的人。”米歇尔相信苹果籽，相信改革的潜力。米歇尔有个主意，把垃圾箱改建成一个花园，上面立一块写着我选的名言的牌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就同意了。

2016年9月2日，我打开手机浏览新闻，看到布罗克穿着一件有纽扣的衬衫，从县监狱的玻璃门里走出来，灯泡的闪光和一堆麦克风点亮了他，然后他被熟练地塞进了一辆SUV里。但那年夏天，我觉得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他又出来了。人们在网上列出了许多比他的刑期还长的东西：海猴的平均寿命，《玛卡雷娜》<sup>(3)</sup>待在榜单100强的时长，我冬天的腿毛，我等待短信回复的时间，妈妈遇到朋友时的聊天时间。

我点击了另一段他和父母一起入住酒店的视频，摄影师们簇拥着他：“你对受害者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在那一瞬间屏住呼吸聆听着。他站在电梯前，戴着墨镜，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他的父母在一旁露出含有讥讽意味的笑容。我不知道我还在期待什么。

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房子，慢跑着去了一家餐馆。一名男子坐在柜台边笑着说：“你是科罗拉多来的吗？”我意识到自己穿着一件有科罗拉多标语的运动衫。“美丽的州，就像你。我来自北边的一个小镇——”我走到后院，点了蓝莓煎饼，一共6个。当我回来经过那个人时，我看着他抓起糖粉和枫糖浆，回到角落里我的桌子上。在那时，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将自己拽回到现实之中，将我的世界与一系列固定的、可触的事实断断续续地连接起来：我正在吃美味的薄煎饼。太阳出来了。我很温暖。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秋海棠。

布罗克出狱了，生活继续前进，我开始与斯坦福进行某种谈判。我的自尊心太强了，真想那笔钱分文都不要。我最担心的是，当受害者收到任何一笔钱时，他们会感到内疚、羞耻和侮辱。但如果妹妹想要心理治疗，我希望她能有这个选项。如果我拒绝了那笔钱，她来找我帮忙，我能说什么？去找爸爸要？让他工作更长时间？我希望能够照顾他们，给他们一些好的东西，哪怕就一次。如果我接受了，我是否会把校园里所有其他的受害者都抛在身后？

经过一年半的法庭程序，我从未从刑事司法系统收到过一分钱。既然该说的、该做的都已完成，我应该申请赔偿，提交我的住院和治疗费用，让法庭命令布罗克支付这些费用。但由于他没有工作，他们说需要建立一个支付计划，让他在几年里一点一点地偿还。我想切断和他的一切联系。另外，他已经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如果他收到邮寄的发票，我担心这会激发他的上诉律师进一步与我对抗。

米歇尔把我介绍给一位律师，他为我列出了我们的选择，所有办法都会在法庭上多耗两三年。当他解释证词是如何起作用的，我的诉讼时效为何已接近过期，这些流程在我脑海里变成了浑浊的水。我知道我没有这种能力。斯坦福大学提出将总共支付15万美元，这笔钱会用于支付我和妹妹几年的心理治疗费用。受害者收到任何一笔钱都会受到热议。几乎没有人会承认疗愈是很昂贵的。我们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给受害者，用于治疗、额外的安全支出、潜在的搬迁成本，让他



们重新站起来，买一些简单的出庭服装之类的东西。正如米歇尔指出的那样：“预防性侵比事后解决要便宜得多。”

我要求斯坦福大学设立一个专门为受害者服务的案件主管，受害者可以随时向他们通报情况，确保获得足够的支持。我所经历的求救无门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我需要他们重新审视他们在强奸案发生后接触受害者的相关政策。我想为校园的公共安全部门提供培训，让他们能更好地告知受害者关于法庭程序和行动选项的信息，尤其是在提起诉讼的时候。另外，请在兄弟会黑暗的后方区域增加照明设施。

米歇尔要求在户外和高危地区增加照明设施和视频监控。她主张采取更系统的补救措施，“评估体育项目中的性暴力文化”，审查兄弟会系统的做法，致力于提升数据透明度，使其更具包容性和扩展性。

这次会面发生在2016年9月6日，也就是布罗克出狱后的第四天。我努力保持温和的愤怒和坚定的信念。进去，提出要求！我走进去，握了握手。我的脸很快就皱了起来。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忘词了。我没有威胁任何人，也没有坚持任何事。当我低声说多么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时，我的胸口好像鼓起了一个小小的气囊。米歇尔与她当面对峙，痛斥斯坦福在袭击事件发生后未能施以援手。他们明明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名字，知道怎么找到我。苹果籽道歉了。

苹果籽说，当时“对于如何联系非学生资源，他们没有明确的实践操作”。她说他们想尊重我的“代理权和匿名权”。她说他们试图帮助我，留了希望向我提供心理健康帮助的记录，但我从来没有来过。

我的意识挖掘着发旧的记忆，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个？是那个深夜，我坐在宜家停车场锁着的车里的时候吗？我仔细检查了我的工作包，找到了斯坦福热线的电话号码。我告诉那位女士和我坐在一起就好，我需要知道我并不孤单。当我终于平静下来时，电话里的女士告诉我，她不知道对非学生的政策，但我可以去，可以第二天去办公室，告诉他们你是谁。当电话结束时，那个没有脸的女人又消失在虚空中，而我被留在一堆问题里。如果我去，我要见谁？我要出来见前台的人吗？我会被随机分配一个治疗师吗？我不能给热线回电话，我会被转接给一个新的应答器。不寻求帮助的部分原因是我

对自己的位置无所适从，我从那个女人的声音中听到了犹豫：“我们通常不这样做，但是……”

我以为热线是保密的。我突然尴尬起来，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是学生，也没有什么协议，他们本该对我做什么呢？协议已经打印好，签字的时候纸上还有热度。苹果籽急着要去办什么事，门关上时，我明白了，我已经签字同意了她的要求。米歇尔很乐观，认为这将是一个持续性的对话，但我担心关于赔偿的承诺不会兑现。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我打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已经陷入了危险的低谷，绝望地伸出了手。她没有弄清楚重要的一点：接听热线电话与主动尽早地向受害者提供资源并在她崩溃之前介入，二者是不同的。“我试过了。”我应该反驳，“那是我打的，不是你们。我主动打电话给你们。”我应该反击。我不是已经在法庭系统中感受到这种回声了吗？“香奈儿没看到。”昏暗的煤气灯，把责任和负担转移到受害者身上。

我参加会面是为了寻求一种公开的个人对话，讨论如何做出补偿、提出合理的要求、寻求解决方案。我本应该意识到，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动机承认自己犯了错。苹果籽也面临压力，作为大学的发言人，她代表利益相关者和律师发言。

那天晚上我觉得不舒服，就早早地睡了。凌晨两点，我醒过来，朝我们新买的柳条篮子里呕吐，液体凝结在一起，从编织木条的缝隙中滴落下来。我脱下衣服，像胎儿一样躺在浴室的垫子上，在厕所和淋浴间之间爬来爬去，脸颊紧贴着排水管。感觉就像有人在割我的腹部。整个浴室都是酸味。我在那里躺了九个小时。

我不敢相信自己会食物中毒。这很奇怪，有一次在中国，我吃着用不熟悉的油烹制的肉，人们习惯光脚蹚水去抓鱼，在木桩上把鱼内脏掏空，然后在我面前炖着吃。我在一张粉红色的便利贴上写了一张清单：“星期四，香蒜意大利面。星期五，鸡肉。”痉挛持续。一个星期后，父母来看我，发现我停止了进食，让我去看医生。

“你怎么啦？”我坐在那张皱巴巴的纸上，拿出粉红色的便利贴：“星期四，香蒜意大利面。星期五，鸡肉。”诸如此类，直到医生说：“你一定是有点感染。”医生建议我服用胃药。我摇了摇头：“我已经吃完了，它们都变成了吐出来的粉红色的东西。”医生说我应该吃些咀嚼片，而不是口服液，然后等感染痊愈。我当时恍然大悟。我创建了一张错误的列表。“星期四，与斯坦福大学对话。星期五，强奸犯出狱。”一次恐慌发作、一次失败的会面、金钱带来的内疚感、谈判中的政治手腕，所有这些都压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一直感到焦虑。”医生问：“你试过心理治疗吗？”我点了点头。“好吧，也许我们下次可以探讨这个问题，但焦虑是普遍的，所以让我们给它几个月的时间……”我盯着地板。

在陈述发布后，我得到了大量的支持，相信自己的日子会一帆风顺。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我觉得我有力量。我太激动了，有人说我“带来了变化”。如果我可以带来变化，我肯定就可以完全改变它的方向，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世界。我参加那次会面的时候很天真，以为自己能在一个小时内结束校园里的性暴力。

但米歇尔知道事情需要多长时间。她和斯坦福大学打了十多年的仗。她曾说过：“社会变革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你只能在你所拥有的时间里尽你所能。”她所说的时间指的是一生，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想要纠正的一切切实发生，但我们仍然要战斗。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实质性变革的过程，体系是多么庞大而根深蒂固，它是多么不可能被拆除，而我是多么渺小。

一周后，我向律师道歉，抱歉我做得不够。我希望我们还能一起努力为斯坦福带来改变。他说：“我们都希望这对你来说是真正积极的一步……我们钦佩你的巨大力量……你有一道光，那是特纳碰不到的。”

他的律所合伙人说：“我希望因为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而产生的焦虑可以很快消失，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但羞耻感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愚蠢、渺小、自私，淹没了他们鼓励的声音。

有张支票寄到了。我开车去了一家新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把密码给了爸爸，以供家里急用。我把钱存入妹妹的退休金账户。

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听到父母谈论经济压力，不禁涨红了脸。我想用这笔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高兴了。没有痛苦，就没有挣扎。我结束了我们的悲伤。我做成了一件事。

那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改造成花园，所以米歇尔白天带我去看了看，这是侵犯发生后的第一次。胃又抽筋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沮丧，多么令人失望，这片拼凑起来的脏兮兮的草坪，下垂的树枝，一堆枯死的松针，狗屎和啤酒罐，塑料汤匙和碎玻璃，一包番茄酱和两个黑色的垃圾箱。就这里？就是这里吗？这就是我的整个人生被定义的地方，这个导致我牺牲感情、失去工作、丧失身份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被这个可怜兮兮的兄弟会的院子搞砸了、偷走了。几年了，我怎么还没有摆脱这个地方，和斯坦福为一盏该死的灯这么简单的事情进行谈判。一盏灯！站在那里，我的一生和我所有的痛苦，感觉就像个笑话，我想笑，想把我的拳头插到地上，挖开一块块泥土，用我记得曾在上面跳舞的木椅砸碎院子里的玻璃门。我什么也没说，站在阳光下眨着眼睛，几分钟后，转身走回米歇尔的车旁。

半年过去了。苹果籽通过我的律师转给我一条信息。“我希望你蒸蒸日上。”将会有有一个案件主管，照明也添加上了。她告诉我，有关我性侵的信息应该来自我的检察官的办公室，这从来不是他们大学的责任。他们不会说，永远不会说：“我们应该保护你，但我们失败了。我们应该跟进，但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早点来找你的，我们下次会来的。”

我参加了针对校园性侵和关系暴力的幸存者的艺术治疗项目。一天晚上，我驱车一个小时，从旧金山来到一个餐厅后面的小房间。工作坊由两名女性领导：一个是负责保密的人员，另一个不是。当我告诉她们我会来的时候，我有些偏执地疑心她们会注意到我来了，报告给苹果籽，然后如果我说斯坦福应该做得更多，她们就会说：“我们这

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香奈儿从洗管器和记号笔中获益良多。”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去看看。

角落里放着一个装着水和软糖的金属罐。下着倾盆大雨。工作坊中没有讨论，我们在沉默中捏着黏土。如果我们想聊天，可以把小卡片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把它翻过来，那个负责保密的女人就会过来跟你耳语。和其他幸存者坐在一起给我带来了平静。没有说话或假装欢呼的压力。我内心的一部分感到疼痛，发现自己暗自愿意融入周围那些默默工作的人，于是我开始把那些美好的愿望引导到自己身上。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学生，她们一定有很多的作业，仍然会花两个小时来做小雕塑。其中的渴望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的是什么，需要滋养的是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的凶手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在雨夜默默地聚在一起，触摸泥土，而他们却继续过着他们的生活？

我一有机会就会来。有一个研讨叫作“暴露愤怒”。我们要做的是把愤怒人格化，做成纸板面具：面具是一种识别情绪的方式，但它会创造足够的距离，让你不会完全被它吞噬。我打算做个大屁股面具。当我到达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来了，我和那两个女人，还有一些空凳子。那位负责保密的女士问我是否想留下来谈谈，我答应了，所以那位不保密的女士离开，这样我就可以畅所欲言。也许这是诉说我对苹果籽永远没法说的话的机会。但回想起被抛弃的感觉、寡淡的道歉、情感上的伤痕、拒绝承认缺乏关心的态度，我又哭了起来。多么可悲，我一直在等待有人恢复我对这个从小就如此珍视的地方的信仰。

“你属于这里，”她说，“愤怒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对作恶者、旁观者、社会的愤怒是一种健康而正常的反应。“有些直接的愤怒向内指向自己，以为这是表达愤怒唯一安全的方式。”这可能会导致消极的自我对话，将创伤归咎于自己，以努力调和先前关于正义和意义体系的信念。

老问题又回来了：“谁是斯坦福大学？”如果她就是斯坦福大学，那么斯坦福大学是友善且令人信服的。“谁是斯坦福大学？”外面一个

男孩在吹大号，演奏《圣诞快乐》。他是斯坦福大学吗？苹果籽是斯坦福大学吗？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剪了一个又大又平的纸板面具，面具上有着弯弯的角和一个鼻子。我开了一个小时的车，筋疲力尽地回家，把面罩靠在墙边，看着它滑落到地板上。

当我和别人说斯坦福大学更注重自我保护而不是关心某个人的时候，人们会以最温和的方式说：“不是吧！”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对大学的期望如此之少？为什么很少能听到一个偶然的故事，说大学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并与受害者一起努力改善校园安全？我们在艺术治疗室里的几个人只是一个样本，因为全国各地都有满屋子的幸存者，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帮助。

受害者往往都会辍学或转学。她无声无息地离开，而学校不受阻碍地继续前进。我不会天真地期待更好，我不会妄想得到更多。我知道透明能够治愈，问责能够治愈。苹果籽说：“这种安静的暴力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田园般的校园里……我从没忘记过这事。”从这句话里，我听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声音，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这是原本一尘不染的校园里的一个黑点。但我们知道数据，所有那些耀眼的红色身体，她和她和她。这很普遍，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无处不在。

我回到艺术疗法中。这位女士开始谈论进化，我们能想到任何进化的东西吗？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开始讲一只青蛙的各个阶段。我想了一会儿，又看看周围的年轻学生。她们在这里是因为她们希望有一天变成青蛙吗？根据定义，我难道不就是青蛙吗？我经历了法律体系，长出了腿，直面攻击者，说出真相。但我和她们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我变得多么强大，多么自信，我永远是一只蝌蚪。我相信这就是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感觉，跟你体内那个游得很快的、难搞的小东西一起生活。大多数人说发展是线性的，但对幸存者来说这是循环的。人在成长，受害者在成长：我们在受伤的地方变得更坚强、更成熟、更充实，但脆弱的核心永远不会消失。不仅仅是变成一只青蛙，我相信生存就意味着要学会和这只颤抖的蝌蚪永远生活在一起。

苹果籽要在花园里竖起的青铜牌子上引用一句话。我提供了我的陈述中关于重新认识自我价值的几句话，开头是这样的：“你让我成了受害者.....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学习我的真名，我的身份，重新认识到这不是我的全部.....我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我的生命被搁置了一年多，等着想清楚我是否有价值。”苹果籽拒绝用这句引文。我的律师反驳道：“一个漂亮的花园，留一条没有人注意到的更柔和的信息，实际上还不如之前那个垃圾箱有实用价值。”苹果籽屈服了，同意做一个模型。几个月来，我收到了许多关于花园复杂的平面图的更新：“石面座椅墙，暗色河卵石，表土，无扶手木凳，石头颜色：浅褐与中灰各半，石板灰浆接缝颜色待定，石林的漩涡喷泉，长凳的确切位置待定，只在墙的外侧打斜面，样品由景观设计师审核。”但是仍然没有第九条<sup>(4)</sup>的调查，没有政策审视。仍然没有牌子。

一天晚上，我收到一封来自大学的电子邮件，通知我他们的仪式安排：教务长宣布开幕（5分钟）、关于提供支持服务的公告（5分钟）、埃米莉·多伊的演讲/信（5分钟）、结束语、为支持性暴力幸存者的默哀（5分钟）。当你受邀参加自己的强奸花园仪式时，你会怎么做？我想做个演讲：《感谢石头》。他们如此关心机构，他们自己承担起责任，公开展示他们的支持，邀请摄影师，安排一个整齐的流程，还有象征性的剪彩。他们给了我三个可供选择的日期。我很感谢他们把那个地方清理干净，学生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安慰，但奇怪的是，仍然看不到立牌。我请我的律师礼貌地转告他们不能举行仪式。

我更多地想到了愤怒，想到了我要创作的艺术作品。在这里放一件叫作《建造》的纪念作品也许更合适：每个受害者都得到一颗钉子，因为她每天都在忍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校园中心放一堆杂乱的木头。受害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钉子钉进木头里。人们整天都能听到砰砰的响声、不停的钻孔声和持续的干扰声。这和生存有很多相似之处，你试图继续下去、完成工作，但你的过去负担在你身上，让你分心，让这变得不可能。到最后就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木结构，胡乱地钉在一起，大而无用，尖利而危险，人们被迫绕着它走，破坏树林的美景。这也是受侵犯的感觉：拿这个干什么，把它放在哪里，它是什么。



或者是一个灯光装置。我可以在晚上进来，在整个校园里安装带有延长线的客厅灯，树上挂着大纸灯笼，校园里到处都是明亮的灯泡，直到每个黑暗的角落都在发光。我会把这件作品叫作《我想要的一切》。

或者做件更令人不安的东西：我会做一个拖把，把深色的长毛绑在木杆的末端，在松针和树叶间拖曳。拖过所有的植被和瓦砾，拖过校园里的小路，一个受害者看守人。这件表演作品叫作《我们想要尊重你的机构，匿名者》。

在我们会面一年、花园建好一个月之后，牌子仍然没有出现。当我的律师询问此事时，苹果籽写道，这个空间意在“鼓舞人心”，不应该“针对”或“谴责”一个人。她说，他们不会把我写的引文放到牌子上，因为他们必须“优先考虑我们所有学生的福祉”。她提出用下面这句话：

“我就在这里，我很好，一切都好，我就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里，这句话还挺有意思的，反讽和荒诞感太明显了。在我最难受的走出医院的时刻，我用这些话来安慰妹妹。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总结了 my 经验，我几乎就要同意用这句了，但当然，我不能，因为这是被断章取义的事实。我开始想，如果在斯坦福，每一个被侵犯的人都拥有一个花园，她们的花园是不是该绵延几英亩，景观美化公司的订单要接到天荒地老吧？干燥的山坡，到处都是长椅和成堆的铺路石？每个花园都钉着这块牌子，我们用这个谎言告诉自己：“我很好，一切都很好。”

苹果籽建议的另外两句话来自我的陈述的最后一段。“在你感到孤独的夜晚，我与你同在。”这句话是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写的，是在费城的一间高层公寓里独自培育出来的，那时我唯一拥有的只有希望。我写这句话是为了生存。你怎么能在过去的两年里抛弃了我，现在重新出现并要带走这句话呢？还要隐藏损害，抛光之后再呈上来。我想给学生们一种团结起来的感受，但如果斯坦福没有给我任何理由让我感到希望的话，我就无法给斯坦福带来希望。我不能向受害者兜

售一个虚假的梦，一个平静而令人兴奋的存在。在那些你孤独无依的夜晚，你是被留在孤独无依里的。“请让我们知道可以用哪条引语。”

我当时应该退出的，已经说够了。但我还是提交了一条新的引语：“你带走了我的价值，我的隐私，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的安全，我的亲密，我的信心，我自己的声音，直到今天。”苹果籽说她已经将这句话转给了保密支持小组，接下来的句子以“虽然我们很欣赏”开头，然后又是同一个词：“担心”。

她解释说，这可能会“引发情绪波动，让人心烦意乱”，而不是治愈。他们说，我可以选择他们所选的，或者找一句更“振奋人心、积极肯定”的话。

作为一名幸存者，我觉得有责任为治愈过程的复杂性提供一个现实的观点。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重塑他在学校制造的混乱的。我没有责任把他的所作所为变成社会能够消化的治愈性话语。我不是为了要成为永恒的火焰、指路明灯，或是在你的花园里绽放的花朵而存在的。我给我的律师发了邮件：“如果你有机会，请告诉苹果籽，我决定不提供引语。”

我挣扎着想要弄清如何作为一个幸存者生活，如何向世界展示我的故事和我自己，有多么多或多么少的内容要揭露。有很多次，我没有提起我的案子，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不高兴或者破坏气氛。因为我想保护你们的舒适感。因为有人告诉我，我要说的话太黑暗、太令人不安、太“有针对性”、太“激发情绪”，让我们低调一点。你会发现社会要求你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告诉你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再回来，当你说的话能让我们感觉更好的时候，当你有更“令人振奋”、更“积极肯定”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丑陋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的，它落在了我身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担心它会使我变丑。这使我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无人愿意倾听的悲伤故事。

但当我把丑陋和痛苦的部分写进陈述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世界并没有堵住它的耳朵，而是向我敞开。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激怒受害者，而是为了安慰她们，我发现受害者更认同痛苦，而不是陈词滥调。当我写到弱点，写到我是如何勉强渡过难关，我希望这会

让她们感觉好一点，因为这符合她们生活的真相。如果我说我被治愈和救赎了，我担心受害者会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就好像她们没有足够努力去跨过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终点线。我要站在她们的苦难旁边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听到的最有治愈效果的话是：“不好也没关系。”崩溃是正常的，因为当你心碎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希望受害者知道她们不会被留在那里，我们会在她们复原的时候与她们在一起。

苹果籽没有听到这句引语里的秘密，就在最后四个字里，“直到今天”。我无法承诺你的旅程会很好，我只能保证它不会好。我无法承诺闪亮的日子或光辉的救赎，只能保证截然相反的未来：你将面临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痛苦绵延不断、顽强不屈，但当你觉得一切都失去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转折，一个火焰，一个小小的改变。它很微妙，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等待它。这是宇宙的法则，也是我生命中唯一知道的真理。无论你的旅程有多艰难，有多漫长，我都可以向你保证。总有一天它会好起来。

受害者所在的社会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但有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你我们还在这里，这就足够了。否认黑暗并不会使任何人更接近光明。当你听到一个关于强奸的故事，所有的画面和令人不安的细节，克制想要转身走开的本能；相反，仔细看看，因为在血迹和警方报告的下面是一个完整而美丽的人，他正在寻找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方法。

现在，米歇尔和苹果籽已经不再说话了，有太多的背叛和不信任，米歇尔脸色铁青，苹果籽也没有让步。自第一次会面以来，一年多过去了，承诺没有兑现，调查也没有完成。匿名的学生刊物《喷泉漏斗》发现了引文被拒的消息，并通过电子邮件在全校范围内对此事进行了猛烈抨击，标题是：《**斯坦福大学最后一次对布罗克·特纳的受害者说“去你妈的”**》。

用苹果籽的话来说：“我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布罗克出狱一年后，我收到一些钱，呕吐，上了几节艺术课，收到一些植物，但没有立牌——换成了一个汩汩作响的喷泉。安装了一盏灯，很好，谢谢。

垃圾箱挪到了前面，雪松墙围绕着它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自己很苛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但我正在学习。

我担心斯坦福会将此视为一种打击，一种名誉的玷污，并将发布一份声明，要求我停止用毒种子来命名他们的员工。但在走上辩护席之前，我希望他们能聆听我的话，因为这其实是一封情书，只是方式有点奇怪。我无休止地试图调和并重建我成长的世界。我写这些是希望学校能看到他们有多大的力量去帮助或伤害受害者。当幸存者来到你身边时，倾听她们的声音。当她们需要帮助时，给她们提供帮助。不要写礼貌的邮件，告诉对方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说其实那并不是你的工作。直接帮助她们。如果我真的指责斯坦福大学不支持受害者，我希望他们能证明我是错的，能说他们的确关心受害者，然后向每个人展示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鼓励你坐在那个花园里，但当你坐下来的时候，闭上眼睛，我会告诉你那个真正的花园，那个神圣的地方的故事。离你坐的地方90英尺，布罗克双膝跪地，瑞典人把他扑倒并喊道：“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你觉得这样可以？”把他们的话写在牌子上。记住那个地方，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立了一座纪念碑。应该被记住的不是我被侵犯的地方，而是他倒下的地方，是我获救的地方，在那里有两个人说停下来，不能再这样，这里不行，现在不行，永远不行。

当他们抓住他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自由。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有机会说出我的话，不会有听证会，不会有审判，不会有陈述，不会有这本书。因为他们，我现在在这里。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成长，让我战斗，让我重新找回自我。这花了很长时间，而且仍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将一事无成。

我常常害怕说出来，害怕面对比我更大、装备更好的律师和机构，但当我害怕时，我所能做的就是想到他们两个。我想我该如何报答他们：把沉重的负担从你身上卸下来，不要成为一个大喊大叫的人，把你的恶魔压在泥土里，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自由了，有机会开始你的旅程，独自成长，发现你的声音，找到你回来的路。当你离开的时候，我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

- (1) Larry Nassar，美国体操队前队医，几十年间利用职务之便，性侵了上百名女性，受害者几乎都是未成年人，包括数位奥运冠军。2017年至2018年间他三度获刑。
- (2) Apples to Apples，一款英文词配对的聚会游戏。游戏卡牌分成红、绿苹果。红苹果为名词，绿苹果为形容词，游戏玩家为其寻找最佳配对。
- (3) *Macarena*，西班牙二重唱河边人二重唱（Los Del Rio）的专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拉丁音乐唱片之一。
- (4) 美国《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禁止在学校课程与教学活动中的性别歧视。后来该条款常与性暴力和性骚扰相联系。

写作是我处理世界的方式。当我有机会写这本书的时候，上帝在高处说着什么，“你实现梦想了”。我说：“其实我想找一个更轻松的话题。”而上帝就会说：“哈哈！你以为你可以选择。”这是我被赋予的主题。如果我身上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我也会写下来的。当我为所发生的事情而激动，我告诉自己，你只是一双眼睛。我是一个被随机挑选出来，获得完全进入法院系统的通行证的平民。我的体验包括侵入、羞耻、孤立、残忍。我的工作是观察、感觉、记录、报告。我学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的痛苦会导致什么后果？人们有时会说：“我无法想象。”我如何让他们想象？我写作是为了向大家展示受害者在当下的遭遇，记录我们文化的温度。这是一个标志，我希望二十年后，受害者不会再承担这种筋疲力尽的后果。

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就像黑色的山峰，被固定在房间中央最高的座位上。我们站起来，围着他坐下，只能把他称作“阁下”。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否可以移动我们的位置。

每当我心烦意乱或心碎时，妈妈总是说：“去读读历史吧。”这是她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历史是一本可以随身携带的厚书，而不是你可以创造的东西。午饭后，我在一间有空调的移动教室里待了一个小时，观看内战重演。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吃一种过期的硬饼干，这样我们就可以体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的饮食。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历史正在发生，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历史中，你会发现那些经历过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的人。他们不仅去过那里，而且还挺过来了。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改变了历史。又是谁的斗争启发了他们呢。历史告诉你，在你之前的人们忍受了什么。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安妮塔·希尔<sup>(1)</sup>在参议院做证。2018年，她发信给米歇尔表达自己的支持，感谢她促使法官严肃对待强奸案，并在结语中写道：“我所有最好的祝愿，安妮塔。”历史表明，如果你是少数派，如果没有人相信你，那并不意味着你错了。相反，它意味着社

会太慢，还没追赶上你。如果那些少数人不屈服，不放弃他们的真理，世界就会在他们脚下发生变化。

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法官说：“有一幅关于我的漫画获准四处传播。”他反对自己的新身份的单一性。我能理解，因为这就是我作为受害者的感受。所有的性格特征都消失了，我的身份缩小成一个标签：醉酒的受害者。

人们还在收集签名，以便将他列入投票名单。妮可告诉我有关志愿者的事，有对退休夫妇每个周末都要开上一个小时的车，去帕罗阿尔托农贸市场的一张桌子前工作。我听说有个女孩一直拿着写字板在收集签名，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对她进行了口头攻击，之后她坐下来，擦干眼泪，继续做下去。很多志愿者都是幸存者，在请愿时被人搭讪会很容易受伤。但她们还是来了。

有很多次，陌生人提醒她们“受害者不应该喝得烂醉如泥以至于失去意识”，而妮可的部分工作就是帮助她们知道如何应对。珀斯基的律师吉姆·麦克马尼斯声称：“这名女子没有受到攻击。”这些侮辱意在使受害者崩溃，结果却让她们更容易行动起来。

每年圣诞节，外公都会从沃尔玛给我和蒂法妮挑选一些东西，每年我都会想象他在商品过道上徘徊，想着：“一个8岁的孩子想要什么？一个9岁的孩子呢？”我们收到的礼物有拖鞋、条纹花瓶、独角兽毛绒玩具、紫色活页夹、指甲修剪套装、发卷、驱蚊蜡烛。因为他年纪大了，我第一次开车送他。那是一个阴沉的星期二下午，当我们穿过停车场时，我看见布罗克和法官的平头画像挂在前门外的一张桌子上。我们走近，看见桌子后面有一个年纪更大的人。我安静下来，就像在野外看到了一只鹿。人们从他身边走过，下午风很大，凉飕飕的，纸页翻飞，他把一页又一页的纸夹在手里。整个下午他都待在风口，希望能再征集到几个签名。我走过去对他说：“谢谢你在这里。”他说：“啊，这很重要。”并祝我有美好的一天。外公用中文问我为什么和他说话。我没法说：“我写的一封信掀起了一场风暴，现在我们的社区正在团结起来，要罢免那个主持我的庭审噩梦的人。”于是我



说他是我朋友的爸爸。外公点了点头。我们进去了，外公慢慢逛着。今年我们得到了巧克力、橘子和马克杯。

我看着家乡草坪上竖起的标牌，开过几个街区，一直觉得布罗克的眼睛在盯着我。我在用我家附近的房子玩一个“爱我，不爱我”的游戏。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有人可能会反对罢免，但仍然支持我。许多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都认为判决太过宽松，但他们支持珀斯基，认为他没有违反法规。慢慢地，我开始不把反对意见看作针对个人的举动。

2018年1月，近9.5万个本地签名被收集并提交，成堆的请愿书塞满了一摞一摞的白盒子。我盯着新闻里的盒子，想知道里面储存了多少个小时，有多少人坐在树荫下，有多少路人停下来签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着那堆盒子时泪如泉涌。

随着选举临近，我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我的房子处于警戒状态。一名来自特别受害者小组的探员来了，高个子，一身灰色西装。他说我窗户下面的灌木丛需要修剪一下，那里可以藏四五个人。我一直认为那只是茂盛的开花灌木，不是一个可以藏四五个人的地方。我的写字台靠着窗户，从街上就能看到，所以我得把它挪开。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摄像头，并在后门上再加一把锁。我的邻居们都提高了戒备。有人建议我保持警惕，避免独自步行。我的检察官的办公室开会讨论了我的安全问题，提出让我住旅馆。

我一直在写作。食品及卫生局局长的电话号码贴在冰箱上，旁边是家人的照片。我拉上房间的百叶窗，不顾黑暗，调亮灯光，继续写作。我不再播放音乐，让自己沉浸在静默中，一直在写，但一只耳朵一直在听。每收到一封令人不安的信，我就给新来的警探发短信，他会过来，把这封信添加到他不断增厚的证据文件夹中。警车在我家周围巡逻。随着威胁的增加，我不再带蘑菇出去散步。由于整晚紧握双拳，我早上会感到手臂疼痛。有一天，我停止了写作。

那天我站在围篱前，手里拿着剪刀。我修剪篱笆，折断树枝，砍断手指一般粗的树干。白色汁液从断茎中流出，碎木刮伤了我的小腿。我拔掉地上的杂草，发现有黄蜂住在半透明的囊里，甲虫用自己

钳状的小屁股从土洞里钻出来。泥土粘在我发热的皮肤上，我的膝盖变成了粉红色，印上了路面的纹理。太阳下山了，我正在脱手套的时候，看到水泥车道上被丢弃的花茎，洋红色的小小花蕾，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我狂躁的时候，我把它们剪了下来。那些本该是在我的窗下盛开的花。生活中有太多的牺牲，把事情缩短，压制生命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以使它走向明天。我想让那些鲜艳的花瓣绽放。我跑上楼，胳膊上满抱着绿色的茎秆，把它们浸入水中。

罢免之争愈演愈烈。草坪上的标牌被偷，争论偏离到阴暗面和个人隐私上。6月1日，《赫芬顿邮报》的朱莉娅·约费写道：“埃米莉·多伊的陈述也引起了反罢免人群的热烈猜测。‘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想是（米歇尔·）多贝写的那篇受害者陈述。’科德尔告诉我。巴布科克也表示怀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太老成了。’珀斯基的律师吉姆·麦克马尼斯也是斯坦福校友，他也确信不是埃米莉写的这份陈述。‘一个我不能透露其身份的人说这是一个处理受虐妇女案件的专业律师写的，’麦克马尼斯解释说，‘我无法证实，但我尊重告诉我这件事的人的判断。’”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种赞美。我太“老成”了，令人难以置信。我也不介意作者是一个律师的看法：我的律师们都是有思想、果断又聪明的人。但我持异议的是，他们暗示受害者是骗子，是撒谎精，不值得信任。我该委托谁来写一篇12页的第一人称叙述呢？这种对话会如何进行？“嘿，你介意花七千字写写我生活中最隐秘的痛苦吗？”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受害者不会写作。受害者不聪明，不能干，也不独立。她们需要外界的帮助来表达她们的想法、需求和要求。她们太情绪化了，无法写出任何连贯的东西。不可能是那个不省人事的醉酒女孩，也不可能是媒体所说的那个在整个做证过程中控制不住哭泣的女孩。在内心深处，他们想要夺走我的写作，我不会轻易放弃。讲一段历史：

我妈妈26岁的时候参演了纪录片《流浪北京》，它讲述了一群生活在贫困中的非主流文化艺术家的故事。在这群人里，她是作家。她

说：“你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有多光明。我到美国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先找份工作。”

在我的童年时代，妈妈在干洗店工作，做过健美操教练、协管员、房地产经纪人的，在花店、装裱店、当地报纸工作过，但每天晚上，我都看见她坐在黑暗的客厅，肩膀上披着毯子，在电脑屏幕的亮光前写作。每天早上爸爸带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都会经过她的门口，看到她睡着了。

在我24岁生日之后，我坐火车去纽约为我的第一本书签合同，买了一道烤桃子甜点来庆祝。我给妈妈发了一张夕阳映照着高大的银色建筑物的照片。她回复说：“你就是妈妈的梦。”

我的写作是复杂的，因为我的起点很高，因为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创作，因为这之前我是我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有幸使用了一门她用了一生去理解的语言。当我发表反对意见时，我感谢我的声音没有受到阻挠。我知道我能自由书写、有丰富的藏书、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能自如使用英语，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妈妈是个作家。不同的是，她生命的前二十年都是为了生存。我也是一名作家，二十年来，我却一直在家里和教室里吃饱喝足，享受天伦之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我不值得赞扬。它属于我的妈妈，她在签售会上牵着我的手；属于安奶奶，她在灯芯绒沙发上给我读书；属于二年级的托马斯夫人，她帮我们压制书皮、装订成册，把我们的教室变成了出版社。它属于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邓拉普先生、威尔逊、欧文、卡罗琳、艾伦、特迪、基普。属于我的祖母巴姆，我的祖父洛维克，他是一位身高6英尺2英寸的“二战”老兵，他读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但他坐在办公室里，身边放着一小沓我手写的诗，他把它们一首接一首地打出来，这样就永远不会丢失。有很多人都应在这份感激名单之列，他们每个人都教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集中注意力，如何畅所欲言，他们告诉我，因为我的观点是有价值的，我值得被倾听和被看到。

2018年6月5日，法官被罢免。我记得他在《旧金山纪事报》上说过：“女性对社会对待她们的方式感到沮丧，对刑事司法系统对待她们的方式感到沮丧。这种激情是真诚的。需要被表达出来。”表达是一个错误的词。我们这些受害者已经厌倦了表达，我在他的法庭上表达得够多的了。我们需要的词是：承认，被考虑并被严肃对待。

在我宣读陈述的那一天，我回家时以为自己失败了。有多少受害者被侮辱、被贬低，因为没有其他声音来反驳既有的信念。我们中有多少人被弄得深感羞辱、情绪激动，而不是充满智慧与勇敢。一个人就能阻止我唤醒数百万人。质疑是谁在书写你的现实。重新审视是谁下的指令。谁决定你是重要的。法官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人，穿着黑罩衫，是一个小领地的首领，是格兰特大街上只有一个房间的王国的统治者。他不是唯一说真话的人，不是制定规则的人，也不是最后拍板的人。他是民选官员，最后以62%的投票被罢免。

当他被罢免时，没有正式的仪式。我想，有那么一天，他醒来后意识到自己不会再拉上黑色罩衫的拉链，只好把它毫无生气地挂在衣橱里。《洛杉矶时报》报道，法官在宣判后表示：“我预计会有一些负面反应。但并不是这样。”法官知道我会对他的判决不高兴，但不知道还有1800万人会愤怒，而本地20万人会投票让他出局。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次罢免，志愿者们教会了我一些让我终生铭记的东西：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2018年7月25日，布罗克的上诉律师出现在法庭上，向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小组陈述他的案件，称布罗克只是想要获得“非性交性快感”。《水星报》报道了法官富兰克林·伊莱亚的回应：“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总结了我能说的一切。

2018年8月8日，检察官发来短信：“维持原判！”上诉被驳回。这就像最后一口气的声音，一种节奏，就像鸟儿轻盈地从金属丝上起飞。时隔三年零八个月，该案终于结案。这让我想起了古代波斯诗人哈菲兹的一首诗：

然后，一切然后都停止了，  
在时间的秩序中，没有什么还是待完成的

## 当一切都静止的时候

没有更多的电话，没有更多的更新，没有更多的下一步，没有更多的“无从得知”。我已经忘记了，没有他我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一个不跟他捆绑的生活。那天晚上，我独自买了奥利奥饼干庆祝，把它们倒在一碗牛奶里，放一会儿再捞出来。我那天没有回复检察官的短信，第二天也没有回复，我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结束了。几周过去了，我对这个好消息保持着警惕，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终于自由了。

我不确定治愈到底是什么或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它应该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在我4岁的时候，我连一加仑牛奶都提不起来，不敢相信那块白色的晃荡的巨石有多么沉重。我拉过一把木椅，站在柜台前，用两只颤抖的胳膊倒牛奶，结果弄湿了麦片，洒了一地。回想起来，我不记得我是在哪天轻松地举起它的。我只知道，现在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到，可以单手去倒，一边匆匆忙忙地讲着电话。我相信同样的规则也适用，总有一天，我将能够在不会动摇我的根基的情况下讲述这个故事。每一次都不需要有牛奶洒出来、满头大汗、一团乱要清理、纸巾湿透这些问题。它将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每天都能比前一天更不费力地把它轻轻提起来。

拉姆·达斯曾说过：“请允许自己此刻并没有生活在错误的地方。考虑游戏中没有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只是考虑一下。考虑到并没有出现错误，你盘子里的所有东西就是这样的，而我们在这里。”我不相信被强奸是我的命运。但我的确相信“我们在这里”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太痛苦了。我的头脑倾向于游离。我曾经以为目标是要遗忘。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治愈不是前进，而是不断地返回去寻找某种东西。写这本书让我回到了那个地方。我学会了留在伤害中，拒绝离开。如果我被困在法庭的场景里，我就会低头看看蘑菇，然后想，如果我真的还身处过去，那这个闪闪发光的東西是怎么进到我家里的呢？我用组装和重组字母的方式来描述我的所见所感。当我重新审视那片风景，我变得更有控制力了，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来去自如。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已经不需要再收集别的东西。

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笔录现在只是一张张纸。我开始更多地属于现在，而不是过去。我不再努力想要有所成就，只是问自己：“你在进步吗？”有时答案是“今天没有”。有时我在退步。但我脑子里的声音现在温和多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都怀着耐心和理解。

从哀伤中长出了信心，我记住我所承受的一切。从愤怒中生出了目标。把它们藏起来就意味着忽视这次经历带给我的最有价值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否原谅了他，我只能说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会占据太多的自我空间。是的，我永远不会停止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原谅了他，并不是因为我圣洁，而是因为我需要清理自己的内心空间，让那些不快的情绪得以平息。

我们中的许多人挣扎着从我们被赋予的东西中爬出来，在被设定的小定义之外建立自我。有时，我担心自己会失去想象力，因为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受害者的角色中。但是当我被困住的时候，我知道我仍然可以在内部移动。当我感到沮丧，我就写作，顺着咖啡豆、我要画插图的童书、我院子里将要养的小鸡、柔软的亚麻棉布、柜台上蘸了酱汁的木汤匙想象我的未来。重要的不是按部就班地一件件实现它们，而是想象的过程。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这个世界可能残酷而可怕，而且往往不可饶恕。我写作是因为有时候我感觉不喜欢生活。我写作是因为，美国的司法体系慢得像蜗牛，受害者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抗争，而不是花时间去创作、绘画、烹饪。我写作是为了揭露我们社会中权利、性别暴力和阶级特权的残暴行为。但是，如果你没有被人性所打动，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而从这本书走开，那我就辜负了你：那成千上万的手写信件，那海底绿色嘴唇的鱼，那眨眼的法庭记者。所有的小奇迹都支撑着我。我们可能会花一半的时间到处闲逛，想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值得付出努力。但生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来到这里，哪怕只是短暂地感受与他人共情的深度和广度。最重要的是，我写作是为了告诉你，我看到过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多么美好。

我从没想过，大学毕业后，我会在7个月后遭到性侵，然后住到普罗维登斯，然后住到费城，在出庭做证期间潜水、哭泣，写了12页能在全球引起共鸣的文章，搬去和一个高个儿男孩还有一条小狗住在一起，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写作。我在痛苦中创造了一个自我。回顾过去，这起侵犯案现在已经与更大的事件密不可分。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就像我在6月出生，在1月被强奸一样。可怕的感觉可能依然存在，但我处理它们的能力已经提高了。我无法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本书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而没有结局才是快乐的，因为我总能找到继续前进的方法。

2018年9月23日，加州帕罗阿尔托市为克里斯蒂娜·福特<sup>(2)</sup>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确认她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做证。叫它“守夜”感觉怪怪的。也许这是在派她上战场之前的集体自勉，因为她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一轮白色的大月亮挂在天上。我开车离开旧金山，走熟悉的路。当我靠近时，我看到一群群发光的人穿过街道，摇摆着灯笼，向市中心走去，聚集在埃尔卡米诺和加尔韦斯两条大道的交叉口，离我父母的家很近。我听到表示支持的汽车鸣笛。我把车停在路边，灯光映在后视镜里，长长的方形上布满了发光的小点。我本想出去，却打开门坐着，脚搁在路边，哭泣着。我听着夜晚空气中的喇叭声，持续不断的喇叭声，美丽的愤怒，家乡的支持，人们挤满了我长大的人行道，在这些街道上，我和蒂法妮曾经玩滑板车、喝柠檬汁。我听到他们在唱“我们是她，她是我们”。一个更年轻的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渴望看到这一幕了。

妈妈来了，塞给我一个她放在口袋里的红豆月饼。我们走进人群，安奶奶正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边走边唱“我们相信你”。第二天，中秋节，外婆在中国去世了。我想起每次去看她，她都会说的两句话：“你的酒窝真漂亮！脚真大！”她的祖母裹小脚。4英寸的脚。现在，我的脚是9英寸半。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更自由一些。

几天后，福特做证。我醒来看到福特的照片，她闭着眼睛，举着手，一动不动。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那是投降的象征，即将走进你自己的伤口。整个早上我都无法



集中注意力，只能去城里的桉树林里散步。那天早上下过雨，我让自己包裹在薄荷和潮湿的覆盖物中深深呼吸。

我回到新闻频道去看卡瓦诺做证。恼怒、抽鼻子、尖刻、讥讽，眼睛里闪着怒火。当参议员埃米·克罗布查尔问他是否喝得烂醉如泥到失去记忆，他说：“你问的是暂时失去意识，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很好奇你有没有过。”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克制地坐着，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回敬。我不明白，一个即将坐上这片土地最高法庭的男人，为什么不能保持他的风度，却只能吐唾沫回去，为这一切的不公平而感到痛苦。

我看着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甜菜红面颊，龇牙咧嘴，指责别人。我曾经在刺耳的音调面前退缩，曾经害怕。直到我明白人可以无缘无故地充满敌意。什么都不需要。你很容易成为那样的人：大喊大叫，乱扔煤块一般燃烧的话语，散发霓虹灯般的红色怒火，故意伤害别人。我知道我是水。煤块发出滋滋的响声，一碰到我就熄灭了。现在我明白，那些火红的煤炭只是黑色的石头，正在沉入水底。

多年来，性侵罪行都依赖于我们的沉默。害怕知道我们发声的后果。社会给了我们一千个理由：如果你缺乏证据，如果这件事发生得太久，如果你喝醉了，如果这个人很有权势，如果你将面对反击，如果它威胁到你的安全，那么就不要说话。福特打破了所有的规则。她不受制于那些社会在我们敢于开口之前就告诉我们的任何要求。她完全有理由隐藏起来，但她却直接走进了可以想象的最公开、最动荡、最好斗的环境，因为她只拥有她所需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真相。

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路障将不再起作用。当沉默和羞耻消失时，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的嘴被捂住、身体被进入，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幸存者被教导永远不要越过一条线。但在她抬起手的瞬间，她越过去了。

那天有那么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听不到，却能感觉到。卡瓦诺和格雷厄姆的话在房间里回响，刻薄、轻浮、紧张、飘忽不定。唾沫横飞的爆发，满脸皱纹和裂隙，成群的苍蝇似的谩骂，含糊不清的侮辱。谁在那个房间里掌握着重心？是她。她的话发自内心，

在全国引起共鸣。她是那座山，他们的话像疾风骤雨，她却岿然不动。她的话发人深省，悲伤填满了我们的内心，直到每个人都在座位上坐下。真相是有分量的。

几天后，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集会上嘲笑她：“你怎么回家的？我不记得了。你怎么到那儿的？我不记得了。这个地方在哪里？我不记得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是在哪个社区？我不知道。房子在哪里？我不知道。楼上，楼下——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喝了一杯啤酒。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事。”人群放声大笑，鼓掌。但我看到的是特朗普在扔煤块，而我们还是水。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被迫在一个我不理解的司法体系中战斗，对抗一个穿着黑袍的秃头法官，一个戴着窄眼镜的辩护律师。布罗克垂着下巴，他那不苟言笑的父亲，上诉律师。障碍越来越大，我面对的是比我更有学识、更有力量的人，比赛越来越艰苦、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肃。我读过那些嘲笑我的痛苦的评论。我记得我当时很无助，很害怕，很丢脸，我前所未有地放声大哭。但我记得在宣布“罪名成立”时律师那一动不动的肩膀。我知道布罗克在监狱的硬床上睡了90天。那个法官再也无法踏进法庭一步。上诉律师的要求被驳回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力量，颓然倒下。当尘埃落定，我环顾四周，想看看还剩下谁。

只有埃米莉·多伊。我活了下来，因为我保持柔软，因为我倾听，因为我写作。因为我紧紧拥抱我的真相，保护着它，就像在一场可怕的风暴中保护一团小小的火焰。当眼泪流下来的时候，当你被嘲笑、被侮辱、被质疑、被威胁的时候，当他们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当你的身体只剩下空洞的时候，请抬起你的头。这段旅程会比你想象的要长，创伤会一次又一次地找上你。不要变得和伤害你的人一样。与你的力量温柔相待。永远不要为了伤害而战斗，而要为了提升去战斗。战斗吧，因为你知道在这一生中，你值得拥有安全、快乐和自由。战斗，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不是别人的。我做到了，我就在这里。回首过去，那些曾经怀疑过、伤害过、差点征服过我的人，都离我而去，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我掸去身上的灰尘，继续赶路。

---

- 
- (1) 1991年，安妮塔·希尔在参议院做证，控告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对自己性骚扰。其时托马斯刚刚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 (2) Christine Ford，加州帕罗阿尔托大学的心理学女教授。2018年9月，福特指控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36年前酒后性侵自己。卡瓦诺发声明严正否认后，福特在9月16日向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身份，并接受采访。

## 致谢

生活总是需要平衡。假设你今天过得很糟糕，有人走过来，给你一颗多汁的小枇杷，突然这一天有了一些好东西，它就变平衡了。这些人不断帮助我获得平衡，所以我从来没有留下太多不好的感觉。

在医院里，我遇到了好人。在法庭上，有更多的好人。我一生都是靠好人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言语不足以表达对你们每一个人的感谢。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会继续尽我所能，因为我知道我有你们。谢谢！

感谢爸爸，感谢他种出了新鲜的西红柿，鼓励我和蒂菲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感谢妈妈，我是朝着您的方向成长的。蒂法妮，我永远尊敬的小家伙。感谢卢卡斯，感谢你让我在写完东西很晚才上床的时候用冰冷的双脚靠着您，帮助我直面最艰难的时刻。谢谢蘑菇，我那八磅重的办公室经理，它从来没有发过一封电子邮件，现在睡在我的转椅旁边，我努力不让自己滚到你身上。

安奶奶和纽曼。爷爷洛维克。奶奶巴姆。外公。外婆。我的米勒一家，我的张氏亲人。感谢你们无尽的爱。

朱莉娅，谢谢你那宽广的心胸和清醒的头脑。安妮，你每天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副地方检察官阿拉蕾·契亚讷奇，谢谢你的才华，我希望女孩们长大后能像你一样。迈克·金警探，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创造了一个不带偏见的空间。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支持者布里·范内斯和克莱尔·迈尔斯，我的证人席伙伴，我的洗手间伙伴，你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性侵应变小组的护士们，感谢你们温柔的关怀和举重若轻。每一位照顾我的警官。感谢肖恩，他拦开了媒体。

妮可，致我们一起长大的果园，愿你的小宝贝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克莱尔，希望我们能从这些起起落落中走出来。雅典娜，感谢你总是能帮我找到回到中心的路。梅尔·罗森堡，和你的每一次散步、每一次电话都支撑着我，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凯拉，我们在旧金山度

过的所有夜晚，那些越南米粉和茶。米兰达，和你在一起，最悲伤的事也会变得有趣。感谢TJ，你用肉桂面包和咖啡治愈着我。我爱你们，蒂法妮在特曼和加州理工的朋友们。卢卡斯一家，感谢你们和我共享的每一餐。

凯蒂·J. M. 贝克，她把我的故事带到这个世界上，保护了我。米歇尔·多贝，她给韧性和不屈不挠做出了表率。约翰·C，感谢你保护我。乔恩·克拉考尔，谢谢你的鼓励。

我对所有给我不及格的数学老师表示抱歉，但我希望母校胡佛、特曼、冈恩、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英文老师们感到高兴。谢谢你，德布，在费城使我拥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感谢我在本市的治疗师陪伴我写完这本书。C和S，我最喜欢的姐妹。感谢和班布度过的一个个下午。感谢胡桃街的门童。萨克斯比斯·里滕豪斯咖啡馆的温暖。切西，谢谢你美丽的来信。感谢每条热线的应答者。感谢普比斯。

感谢马特维尔。女青年会。感恩服装。圣克拉拉县受害者援助项目。

致在伊斯拉维斯塔失去生命的人：王伟翰，洪晟元，陈乔治<sup>(1)</sup>，薇罗妮卡·韦斯，凯蒂·库珀，克里斯托弗·迈克尔斯-马丁内斯。你们的名字铭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谢谢理查德·马丁内斯的演讲。我们跟随您的带领。

感谢安德烈娅·舒尔茨，我在维京出版社的编辑，感谢你让我保持清醒，让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有趣，感谢你在最崎岖的地形中充当发光的向导。你让我不再害怕。弗利普·布罗菲，谢谢你的面包布丁，谢谢你在我做到之前就知道我可以做到。埃米莉·文德利希，谢谢你带我到下一层。简·卡沃利纳，我的版权编辑，当我的句法变得古怪时，你让它恢复了秩序。感谢埃米莉·纽伯格、艾琳·博伊尔、林赛·普雷维特、凯特·斯塔克、玛丽·斯通、布赖恩·塔特、贾森·拉米雷斯、特丝·埃斯皮诺萨和整个维京管理编辑和制作团队。感谢拉腊·伯格索德、希拉里·格罗斯、莫格伦、西尔维娅·莫尔纳。感谢斯特林勋爵文学代理公司的绿色蛋糕组。

感谢两个瑞典人。你们教导我们，我们都有责任大声疾呼，奋力拼搏，确保安全，给予希望，采取行动。我们不需要等着什么坏事发生才做个瑞典人。作为瑞典人，首先要尊重身体的自主权，尊重我们选择的语言，尊重他人的准许永远不能被预先假定或践踏。我们必须保护弱势群体，为彼此负责。愿世界上有更多的卡尔和彼得斯。

感谢所有我不知道名字的人，那些拿着剪贴板征集请愿签名的人，那些和蝌蚪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些写长信给我的人。我写字时就把那盒信放在桌子旁边。当写作进行不下去时，我就会去读。你们教会我自我同情，鼓励我继续前进。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值得为之奋斗。你的性格不是造成伤害的原因。你不是一个统计数据或刻板形象，所以当它们贬低你，把你非人化，把你物化，你必须用你的整个重量，用你一生的经历来反击。致那些不知名的人，那些保持匿名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你们教会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

(1) 前三名受害者姓名为音译。

# 埃米莉·多伊的受害人影响陈述

2016年6月3日，凯蒂·J. M. 贝克

发布于BUZZFEED NEWS

这是斯坦福大学性侵案受害者  
写给侵犯者的一封信

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的话，陈述的大部分内容，我想直接对被告说。

你不了解我，但你曾进入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2015年1月17日，一个安静的周六晚上。我爸爸做了晚饭，我和回家度周末的妹妹一起坐在桌子旁。我那天一直在工作，快到睡觉时间了。我打算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会儿电视，读会儿书，而妹妹和她的朋友要去参加派对。然后，我觉得我难得能和她待一晚上，我没有更好的事可做，所以为什么不去离家10分钟远的地方参加个愚蠢的派对呢？后来我去了，像个傻瓜一样跳舞，让我妹妹难为情。在去那里的路上，我开玩笑说，大学生们还戴着牙套。我妹妹取笑我穿了一件米色开襟羊毛衫去参加兄弟会派对，就像个图书管理员。我叫自己“大妈”，因为我知道我是那些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我做着傻傻的鬼脸，放松了警惕，酒喝得太快，没有考虑到我的酒力自大学以来已经大大下降了。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自己躺在走廊的轮床上。我的手背和手肘上有干掉的血迹，绑了绷带。我以为我可能摔倒了，现在是在学校的一个行政办公室里。我很平静，不知道妹妹在哪里。一名警官解释说我被侵犯了。我仍然保持冷静，确信他找错了谈话对象。这个派对上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当我终于被允许上厕所，我脱下医院给我的裤子，然后拉我的内裤，却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现在依然记得我的手碰到皮肤时什么也没碰到的感觉。我低头一看，什么也没有。那块薄薄的布



料，我的阴道和其他东西之间唯一的屏障，不见了，我体内的一切都沉寂了。我至今仍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感觉。为了保持呼吸，我想也许警察用剪刀把它剪下来用作证据了。

然后，我感到松针挠着后颈，开始把它们从我的头发里弄出来。我想也许是松针从树上掉在我头上了。我的大脑告诉我不要崩溃，而我的直觉在说，救救我，救救我。

我拖着脚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身上裹着一条毯子，松针在身后撒了一路，在我坐过的每个房间都留下几根。警察要求我签署一份写着“强奸受害者”的文件，我想真的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的衣服被收走，我就光着身子站着，护士们拿着尺子在我身上各种各样的擦伤处测量、拍照。我们三个人忙着把我头发上的松针清理干净，六只手装满了个纸袋。为了让我冷静下来，她们说那只是些枯枝败叶，枯枝败叶。我的阴道和肛门里插了很多棉签，打针，吃药，还有尼康相机对准我打开的双腿。又长又尖的器械尖头探进我的体内，阴道上涂着冰冷的蓝色涂料，以检查是否有擦伤。

这样过了几个小时，她们让我洗澡。我站在浴室，在水流下检查我的身体，然后决定，我不想要我的身体了。我害怕它，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如果它被玷污了，是谁碰了它。我想把我的身体像夹克一样脱掉，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留在医院。

那天早上，我只得知我是在一个垃圾箱后面被发现的，可能被一个陌生人性侵了，由于后果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我应该再做一次HIV检测。但现在，我应该回家，回到我的正常生活中去。想象一下，回到这个世界，只有这些信息。她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只允许我保留我的项链和鞋子，我便穿着她们提供给我的新运动衫和运动裤，走出医院来到停车场。

我的妹妹接到我，她的脸被泪水打湿了，痛苦地扭曲着。我出于本能地想立即消除她的痛苦。我对她笑了笑，让她看着我，我就在这里，我很好，一切都好，我就在这里。我的头发洗得干干净净，她们给了我奇怪的洗发水，让我平静下来，看着我。看看这些有趣的新运动裤和运动衫，我看起来像个体育老师，我们回家吧，我们去吃点

东西吧。她不知道，在我的运动服下面，我的皮肤上有抓痕和绷带，我的阴道很痛，而且由于所有的外物刺激，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黑色，我的内裤不见了，我感觉太空虚了，无法继续说话。她不知道其实我也很害怕，也很沮丧。那天我们开车回家，妹妹静静地抱住我待了好几个小时。

我男朋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那天他打电话来说：“我昨晚真的很担心你，你吓到我了，你回家还好吗？”我吓坏了。就在那时，我得知我在失去意识的那天晚上给他打了电话，留下了一段听不懂的语音邮件，我们也通了电话，但我口齿不清，他很担心我，所以他一再告诉我去找我妹妹。他又问了一遍：“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回家还好吗？”我回答是的，然后挂断电话哭了起来。

我还没准备好告诉我的男朋友或父母，我可能在垃圾桶后面被强奸了，但我不知道是被谁，是什么时候，怎么发生的。如果我告诉他们，我会看到他们脸上的恐惧，而我的恐惧会增加十倍，所以我假装整件事都不是真的。

我试着把它从脑海中抹去，但它太沉重了，我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不和任何人交流。下班后，我会开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尖叫。我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不与任何人交流，与最爱的人保持疏离。事故发生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告知我那天晚上或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消息更新。唯一能证明这不是一场噩梦的东西，就是我抽屉里从医院穿来的那件运动衫。

有一天，我上班时用手机浏览新闻，看到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读到并得知了那晚的事：我被发现时不省人事，头发蓬乱，长项链缠绕在脖子上，文胸从裙子里拉出来，领口拉到了肩膀下面，裙子推到腰部，从臀部到靴子上沿都裸露着，两腿分开，被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用异物侵入。这就是我如何得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坐在我的办公桌前阅读新闻。我知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人也知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时我才意识到头发上为什么有松针，它们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他脱下了我的内裤，他的手指在我的身体里。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我到现在也还不认识

这个人。当我读到关于我的报道时，我说，这不可能是我，这不可能是我。我无法消化或接受这些信息。我无法想象我的家人不得不在网上读到这些。我一直读下去。在下一段中，我读到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原谅的事情：我读到他说，我很享受。我很享受。再说一次，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感受。

这就像你读到一篇文章，一辆车被撞出了凹痕，翻到沟里。但也许那辆汽车享受被撞的感觉。也许另一辆车不是故意撞它的，只是碰了一下。汽车总是出事故，人们不总是集中注意力，我们真的能说是谁的错吗。

然后，在文章的末尾，在我了解了自己遭受性侵的具体细节之后，文章列出了他游泳的辉煌成绩。她被发现还有呼吸，毫无反应，她蜷缩成胎儿的姿势，内裤扔在离她赤裸的腹部6英寸远的地方。顺便说一下，他很擅长游泳。如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那就把我跑一英里的成绩也写上。我擅长烹饪，把它写进去，在文章末尾列出你的课外活动来抵消所有已经发生的令人作呕的事情。

新闻出来的那天晚上，我让父母坐下来，告诉他们我被侵犯了，不要看新闻，因为它让人心烦，只要知道我没事，我就在这里，我没事。但在跟他们讲到一半的时候，妈妈不得不抱着我，因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事情发生后的那个晚上，他说他不知道我的名字，说他在一排人中认不出我的脸，没有提到我们之间的任何对话，没有说话，只有跳舞和接吻。跳舞是一个可爱的词：是打着响指、转圈，还是在拥挤的房间里身体互相摩擦？我还想知道，是不是一张张脸胡乱地擦过就算接吻？当警探问他是否打算带我回宿舍，他说没有。当警探问我们是怎么倒在垃圾桶后面的，他说他不知道。他承认在那次派对上亲吻了其他女孩，其中一个是他推开的我的亲妹妹。他承认想要勾搭上某人。我是那畜群中受伤的羚羊，完全孤独而脆弱，无法保护自己，所以他选择了我。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没有离开，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后来我意识到，它还是会发生，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即将步入满是醉酒女孩和派对的四年，如果这是你开始的第一步，那么你没有

继续倒是正确的。事情发生后的那个晚上，他说他认为我喜欢这样，因为我抚摸了他的后背。抚摸后背。

从没提过我表示同意，甚至没提我们说过话，只是摸摸背。又一次，在公开的新闻上，我了解到我的臀部和阴道完全暴露在外面，我的胸部被摸，手指带着松针和碎片插入到我体内，我裸露的皮肤和头部在垃圾桶后面的地面上摩擦，而一个勃起的大一新生骑在我半裸半醒的身体上。但我不记得了，我怎么证明我不享受呢？

我以为这件事不可能进行审判：有目击者，我身上有泥土，他逃跑但被抓住了。他会和解，正式道歉，然后我们都继续生活。但恰恰相反，有人告诉我他雇用了一个强大的律师，还有专家证人和私人侦探，试图找到我的个人生活细节来攻击我，在我的描述里找到漏洞使我和妹妹的证词无效，以证明这次性侵实际上只是一次误解。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世人相信他只是一时糊涂。

我不仅得知我被侵犯了，还得知由于我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严格来说我不能证明那不是我自愿的。而这扭曲了我，伤害了我，几乎把我击垮。这是一种最可悲的困惑，当我得知我被侵犯，几乎被强奸，而且是堂而皇之在公开场合，但我们还不能确定这到底算不算侵犯。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证明，这种情况是有问题的。

当他们告知我要做好准备，以免败诉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准备。我一醒来，他就是有罪的。没有人能让我摆脱他给我造成的伤害。最糟糕的是，我得到警告，由于他现在知道你不记得了，他要开始编造故事了。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人能反对。我没有力量，没有声音，毫无防备。我的短暂失忆将被用来对付我。我的证词十分薄弱且不完整，我被迫开始相信，也许我还不足以赢得这场胜利。他的律师不断提醒陪审团，我们唯一能相信的人是布罗克，因为她不记得了。那种无助给我带来了深深的创伤。

我没有花时间去疗伤，而是花时间去回忆那个夜晚里令人痛苦的细节，以便为律师的问题做准备，这些问题将充满挑衅和侵略，旨在诱导我偏离方向，用操纵答案的提问方式来使我和我妹妹自相矛盾。他的律师并没有说：“你注意到有擦伤吗？”而是说：“你没有注意到任

何擦伤，对吗？”这是一场策略游戏，仿佛我的价值会被一一骗走。性侵已经很明显了，但相反，我却在庭审现场，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

你多大了？你的体重是多少？你那天吃了什么？那你晚饭吃了什么？谁做的晚饭？你吃饭时喝酒了吗？没有，连水都没有喝？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喝了多少？你用什么容器喝的？谁给你的酒？你通常喝多少？谁开车送你去派对的？在什么时间？但是，到底是在哪里？你当时穿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这个派对？你到那儿后做了什么？你确定是你做的吗？但你什么时候做的？这段短信是什么意思？你在给谁发短信？你什么时候小便的？你在哪里小便？你和谁一起在外面小便？你妹妹打电话来时，你的手机是静音的吗？你记得把它设成静音了吗？事实上我想指出的是，在第53页你说把它设置成了铃声。你在大学里喝酒吗？你说你是派对狂？你有过几次喝得失去意识？你去兄弟会参加派对吗？你跟你男朋友是认真的吗？你和他有性行为吗？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约会的？你劈过腿吗？你有劈腿的历史吗？你说要奖赏他是什么意思？你记得你什么时候醒来的吗？你当时穿的是开襟羊毛衫吗？你的开衫是什么颜色的？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吗？不记得了？好吧，那么，我们让布罗克来补充。

狭隘尖锐的问题不断打击着我，这些问题剖析了我的个人生活、爱情生活、过去的生活、家庭生活，空洞的问题，堆积的琐碎细节，试图为这个连名字都不愿问就脱去我衣服的家伙找借口。在遭受身体上的侵犯之后，这些旨在攻击我的问题再次侵犯了我，这些问题说：她的事实前后不一致，她疯了，她就是一个酒鬼，她可能想勾搭他，他就是个运动员，对吧，他们都醉了，不管怎么样，她记得的医院的事都是事发之后的，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呢，布罗克承受着各方压力，他现在真的很难。

到了他出庭做证的时候，我才明白再次受害意味着什么。我想提醒你，事情发生后的那个晚上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要带我回宿舍。他说

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躲在垃圾箱后面。他起身离开，因为他感觉不舒服，他突然被人追打。直到他得知我不记得了。

一年后，不出所料，一场新的对话出现了。布罗克有了一个奇怪的新故事，听起来几乎像是一部蹩脚的青春小说，里面充斥着亲吻、跳舞、牵手，还有激情四溢地滚到地上，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新故事里，突然两个人成了你情我愿。那件事发生一年后，他想起来了，哦，对了，顺便说一句，她其实同意了，对所有事情都说了可以，所以么，你们懂的。

他说他问过我要不要跳舞。显然我答应了。他问我要不要去他的宿舍，我答应了。然后他问我能不能用手指插入我，我答应了。大多数人不会问，我能用手指插入你吗？通常情况下，事情是自然发展的，是双方自愿的，而不是一场你问我答。但显然我完全同意了，他对此确凿无疑。但即使在他的故事里，在他让我半裸着躺在地上之前，我也只说了三遍：是的，是的，是的。各位，如果你不确定一个女孩是否同意，看看她是否能说完整的句子。你连这个都没做。只有一串连贯的单词。如果她做不到，那就是不行。不是也许，而就是不行。有什么好困惑的？这是常识，是做人的基本体统。

据他说，我们滚在地上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摔倒了。注意：如果一个女孩摔倒了，你应该做的是帮她站起来。如果她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摔倒了，不要骑在她身上乱动，不要脱下她的内衣，不要把你的手伸进她的阴道。如果一个女孩摔倒了，扶她起来。如果她在裙子外面穿了一件开襟羊毛衫，不要把它脱下来，然后去摸她的乳房。也许她会觉得冷，也许这就是她穿开襟羊毛衫的原因。

然后，当两个瑞典人骑着自行车朝你过来，你就跑开了。当他们抓住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住手！没什么问题，去问她，她就在那里，她会告诉你们的。”你不是说你刚刚已经征求了我的同意，对吗？我是醒着的，对吧？当警察赶来询问那个把你扑倒的瑞典坏蛋时，他因为眼前的景象而哭得说不出话来。

你的律师多次指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失去知觉的。你是对的，也许我还在眨眼睛，还没有完全走不了路。但这不是重点。我

醉得说不出话来，醉得倒在地上，根本没法表示同意。从一开始我就不该被他触碰。布罗克声称：“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没有反应。如果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她没有反应，我就会立刻停下来。”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打算在我没有反应的时候才停止，那你就还是不明白。我昏迷的时候你都没停下来！直到有人阻止了你。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注意到我在黑暗中没有动弹，所以不得不阻拦你。而你在我身上，怎么可能没注意到这一点呢？

你说你本来打算要停下来去寻求帮助。你既然这么说了，我想让你解释你会如何帮助我，如何一步一步地带我走出这一切。我想知道，如果那些邪恶的瑞典人没有发现我，这个夜晚将会怎样结束。我要问你：你会把拉到我靴子上的内裤穿回去吗？解开绕在我脖子上的项链？合上我的腿，掩盖好我的身体？从我的头发上摘下松针？问我脖子和下体的擦伤是否疼痛？然后你会去找一个朋友说，你能帮我把她弄到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吗？如果那两个人没有来，事情可能会怎样发展？每当我想到这里，我就无法入睡。我会怎么样呢？所以你永远无法为这些问题找到合理的答案，即使在一年后你也无法做出解释。

最重要的是，他声称我在一分钟的手指插入后达到高潮。而护士说我的生殖器有擦伤、裂口和泥土。这是发生在我来高潮之前还是之后呢？

你在法庭上发誓并告诉我们所有人，我想这样做，我允许你这样做，你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被瑞典人无缘无故地袭击，这种做法是令人震惊的，是疯狂的，是自私的，是有害的。经受性侵的痛苦已经足够。而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这种痛苦的严重性和正当性，目睹这些更加令人痛苦。

我的家人不得不看到我的头被绑在一个装满松针的轮床上的照片，我的身体躺在泥土里，双眼紧闭，头发乱成一团，四肢蜷曲，裙子撩起。即使在那之后，我的家人也不得不听你的律师说那些照片是事发后拍的，我们可以不予考虑。他说，是的，护士确认她体内有红肿和擦伤，她的生殖器有严重的创伤，但是当你用手指插入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而这一点他已经承认了。你的律师试图把我描绘成一副狂放女孩的嘴脸，好像这样就能说明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他说我在电话里听起来像喝醉了，因为我很愚蠢，这是我愚蠢的说话方式。他指出在语音邮件中，我说我会奖励我男友，大家都知道我说的“奖励”是什么意思。我向你保证，我的奖励是不可转让的，尤其是对任何接近我的不知姓名之人。

在庭审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我们不得不沉默地坐着，听他编造那个夜晚的事实。但最终，他毫无根据的陈述和律师歪曲的逻辑没能骗过任何人。真相获胜，真相不言自明。

你是有罪的。12名陪审员判定你犯下的三项重罪均排除合理怀疑而成立，每项12票，36票赞成，这是百分之百、一致认定的有罪。我想事情终于结束了，他最终会承认他所做的一切，真诚地道歉，我们都会继续前进，变得更好。然后我读到了你的陈述。

如果你希望我因过度愤怒器官爆裂而死去，那么我已经快到那一步了。你已经快达到目的了。这不是又一个关于醉酒的大学生互相勾搭并做出糟糕决定的故事。侵犯不是意外。不知何故，你还不明白。不知何故，你听起来还是很困惑。我现在将宣读被告陈述的部分内容并一一做出回应。

**你说，我们都喝醉了，我不能做出合理的决定，她也不能。**

酒精不是借口。它是一个因素吗？是的。但酒精并没有把我剥光、用手指插入我、在我几乎全裸时把我的头拖在地面。我承认喝太多酒是个业余的错误，但这并不是犯罪。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曾后悔在某个夜晚喝了太多酒，或者认识某个亲近的人，他曾后悔在某个夜晚喝了太多酒。后悔喝酒和后悔性侵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喝醉了，不同的是我没有脱下你的裤子和内裤，不当地触碰你，然后再逃跑。这就是区别。

**你说，如果我想认识她，我应该要她的电话号码，而不是让她回我的房间。**

我不是因为你没要我的电话号码而生气。即使你认识我，我也不想陷入这种境地。我的男朋友也认识我，但如果他要在垃圾桶后面用手指插入我，我会扇他一巴掌。没有一个女孩愿意处于这种境况之下。没有任何人会愿意。我根本不在乎你知不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

**你说，我愚蠢地认为我可以像我周围每个人都在做的那样喝酒。我错了。**

再说一遍，你喝酒没有错。你周围的人都没有对我实施性侵。但你做了别人都没有做的事，你躲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把你裤子里勃起的阴茎推到我毫无抵抗能力的赤裸身体上，参加聚会的人看不见我，也保护不了我，我的亲妹妹也找不到我。喝火龙威士忌不是你的错。你错在把我的内裤像糖果包装纸一样剥掉，然后把你的手指塞进我的身体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在解释这个。

**你说，我根本不想在庭审期间伤害她。那只是我的律师和他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

你的律师不是你的替罪羊，他是你的代理人。你的律师有没有说过一些让人极度愤怒且有辱人格的事情？他说过。他说你勃起是因为天太冷了。

**你说，你正在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建立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你以自己的经历“公开反对大学校园里的饮酒文化和随之而来的乱交风气”。**

校园饮酒文化。这就是我们在争辩的话题吗？你以为这就是我过去一年奋战的目标吗？你丝毫没有意识到，校园性侵、强奸，或学习识别什么是同意才是我的目标。校园饮酒文化。打倒杰克·丹尼威士忌。打倒蓝天伏特加。如果你想和别人谈论饮酒，那就去参加戒酒互助会吧。你意识到了吗，有酗酒问题和酒后强行同别人性交是不一样的？男人要做的是如何尊重女人，而不是如何少喝酒。

饮酒文化和随之而来的乱交风气。随之而来，就像你点了什么东西，旁边配个薯条一样。我们的案子和乱交有什么关系？我没见过这样的头条新闻：《布罗克·特纳因为酗酒和随之而来的乱交获罪》。校

园性侵，这才是你的第一张幻灯片应该讨论的。请放心，如果你不能确定你演讲的主题，我将跟随你去到你的每一所学校，并做一个补充演讲。

**最后你说，我想让人们知道，一夜酗酒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是你的生活，你忘了还有我的生活。让我来换个说法，我想告诉人们，一夜的酗酒可以毁掉两个人的生活。你和我。你是因，而我是果。你把我拖过这个地狱，把我一次又一次拖回那个夜晚。你推倒了我们的双塔，在你倒下的同时我也倒下了。如果你以为我幸免于难，毫发无损，今天骑着马走在夕阳下，而你却遭受了最大的打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没有人是赢家，我们都遭受重创，试图在这些痛苦中寻找意义。你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失去头衔、学位和入学资格。我受的伤害是内在的，看不见的，如影随形的。你带走了我的价值、我的隐私、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的安全、我的亲密、我的信心、我自己的声音，直到今天。

看，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早上都起不来。我对苦难并不陌生。你让我成了受害者。在报纸上，我的名字是“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八个字，仅此而已。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学习自己的真名，自己的身份，去重新认识到这不是我的全部。我不只是一个在垃圾箱后面被发现的兄弟会派对上喝醉的受害者，而你也不只是一所顶尖大学里此前声誉清白、现在陷于困境的游泳运动员。我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我的生活被搁置了一年多，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什么价值。

我曾经享有的独立、自然的快乐、温柔和稳定的生活方式变得面目全非。我变得封闭、生气、自嘲、疲倦、易怒、空虚。这种与世隔绝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你无法让我回到那一晚之前的生活。当你担心自己的声誉会受损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把勺子放在冰箱里，这样当我醒来，我的眼睛因为哭泣而红肿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勺子按在眼睛上减轻肿痛，好让自己看到东西。我每天早上上班都会迟到一小时，然后找个借口躲在楼梯间里哭。我可以告诉你那栋楼里所有最合适哭泣而没人能听到的地方。痛苦变得如此严重，我不得不向老板解

释辞职的个人原因。我需要时间，而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我拿着自己的积蓄去尽可能远的地方。我没有全职工作，因为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未来请几周的假来参加听证会和庭审，而听证会和庭审的时间一直在变。我的生活停滞了一年多，我的整个人生崩溃了。

我晚上只能开灯入睡，就像一个5岁的孩子，因为我做噩梦，梦到有人摸我，而我无法挣脱醒来，所以我一直等到太阳升起，觉得足够安全时才睡觉。有三个月，我每天早上6点才上床睡觉。

我曾经为自己的独立感到骄傲，现在我不敢在晚上出门散步，不敢和朋友一起参加需要喝酒的聚会，我本应放心大胆地跟他们在一起。我变得黏人，总是需要有人在身边，需要我的男朋友站在我身边，睡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觉得自己软弱不堪，在生活中胆小如鼠，总是小心翼翼，时刻准备着自我防御，时刻准备着生气，这些都令我感到难堪。

你不知道我有多努力去重建身体中仍然脆弱的部分。我花了八个月时间才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能再和朋友们联系，不能和周围的每个人联系。每当我男朋友、我的家人提起这件事，我都会对他们大吼大叫。你从未让我忘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听证会和庭审结束的时候，我累得说不出话来。我筋疲力尽、一言不发地离开。我回家关掉手机，好几天不说话。你将我送往了一个孑然一身的世界。每次看到新的报道，我都会担心整个家乡会发现我就是那个被侵犯的女孩。我不想要任何人的怜悯，我仍在适应接受受害者作为我身份的一部分。你把我的家乡变成了一个让我不舒服的地方。

你无法弥补我的不眠之夜。当我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有个女人受到了伤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抽泣。简而言之，这次经历增加了我对其他受害者的同情。因为压力，我瘦了很多，当人们这样跟我说的时侯，我只能告诉他们我最近经常跑步。很多时候我不想被触碰。我必须重新告诉自己，我不是脆弱的，而是有能力的，我是健康的，只是暂时有些苍白无力。

当我看到妹妹受伤，当她在学校跟不上功课，当她失去快乐，当她不睡觉，当她在电话里痛哭，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她很抱歉那天晚上把我一个人留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当她比你更内疚，所有这些让我更不会原谅你。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想要找到她，但你先发现了我。你的律师的结案陈词是这样开头的：“（她妹妹）说她很好，谁比她妹妹更了解她呢？”你想利用我的亲妹妹来攻击我？你的攻击点那么孱弱，那么低级，几乎令人尴尬。你不能碰她。

你本不应该这样对我。其次，你不应该让我抗争这么久来告诉你，你本不应该这样对我。但现在事已至此。伤害已经造成，没有人能挽回。现在我们两个都面临选择。我们可以让它摧毁我们，我可以保持愤怒和伤痛，而你可以拒绝承认，或者我们可以直面它，我接受痛苦，你接受惩罚，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你的生活还没有结束，你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来重写你的故事。世界很大，它比帕罗阿尔托和斯坦福大学都要大得多，你会在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做个有用而快乐的人。但现在，你不能只是耸耸肩，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摆出一副困惑的样子。你不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已因为故意、强行、恶意的性侵被判有罪，而你所承认的却仅仅是饮酒。不要说是酒精让你做了坏事，你的生活是如何被颠覆的。你应该弄清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现在来谈谈判决。当我读到缓刑监督官的报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被愤怒吞噬，最终平静下来，没入深深的悲伤。我的陈述因为删减而被曲解，被断章取义。在这次庭审中我努力抗争，决不会让一个缓刑监督官来破坏结果，这位缓刑监督官试图在15分钟的谈话中评估我目前的状态和我的愿望，而且谈话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回答我关于司法体系的疑问。说话的语境也很重要。布罗克还没有发表陈述，我也没有读过他的只言片语。

我的生活停滞了一年多，这一年充满了愤怒、痛苦和不确定，直到一个站在我这边的陪审团做出裁决，证实了我所忍受的不公正。如果布罗克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深感悔恨，早点主动提出和解，我可能会

考虑从轻判决，尊重他的诚实，感谢他能推动我们的生活向前发展。但是，他冒险走上法庭，在伤害的基础上再添侮辱，让我把个人生活和性侵的细节重新暴露在公众面前，迫使我重新体验伤害。他让我和我的家人经历了整整一年无法解释的不必要的痛苦，他应该为否认自己的罪行、质疑我的痛苦、让我们为正义等待那么久而承担后果。

我只是告诉缓刑监督官我不想让布罗克在监狱里慢慢腐烂。我并没有说他不应该坐牢。缓刑监督官建议在县监狱服刑一年或以下，这相当于一种温和的休假，是对他所犯严重罪行的嘲弄，是对我和所有女性的侮辱。它传递的信息是：一个陌生人可以未经适当的许可就进入你的身体，而他所得到的惩罚将少于最低刑期。缓刑也不应该执行。我还告诉缓刑监督官，我真正想要的是布罗克理解并承认自己的错误。

遗憾的是，在阅读了被告的报告后，我感到非常失望，认为他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真诚的悔意或承担。我完全尊重他接受庭审的权利，但即使在12名陪审员一致判定他犯有三项重罪之后，他所承认的一切仍只是饮酒。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不应得到减刑。他试图用“滥交”的暗示来淡化强奸的做法是极其无礼的。从定义上说，强奸不等同于没有滥交，强奸是没有得到同意，他甚至看不出两者的区别，这让我深感不安。

缓刑监督官说一个重要因素是考虑到被告年轻且没有前科。在我看来，他已经到了辨别是非对错的年纪。在这个国家，你18岁就可以上战场了。19岁的时候，你就应该承担试图强奸别人的后果。他虽年轻，但他已经长大了，应该更为懂事。

由于这是初犯，我能理解宽大处理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而言，我们不能原谅每个人的第一次性侵或用手指强奸。这没有道理。我们必须清楚地传达强奸的严重性，我们不应该创造一种文化，暗示人们需要通过反复试错才能得知强奸是错误的。性侵的后果必须足够严重，使人们感到足够的畏惧，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即使在他们喝醉的情况下也能起到预防作用。

缓刑监督官强调他已经为此放弃了一份来之不易的游泳奖学金。布罗克游得多快并不能减轻事情对我造成的伤害，也不应该减轻对他的惩罚。如果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初犯被指控犯有三项重罪，而且除了酗酒外他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他的判决会是什么？布罗克曾是一所著名私立大学的运动员，这一事实不应成为获得宽大处理的理由，而应成为一个向外界传递信息的机会：性侵是违法的，无论社会阶层如何。

缓刑监督官指出，与其他类似性质的罪行相比，考虑到被告的醉酒程度，这起案件可以算作程度较轻。对此我只能说，这让人感到沉重。

他做了什么值得被宽大处理？他只是为酗酒道歉，至今都没有把他对我做的事定义为性侵，他不断无情地再次伤害我。他被判犯有三项重罪，现在是他接受其行为后果的时候了。他不能默默地抽身而退。

他一生都会被登记注册为性犯罪者。这不会过期。就像他对我做的事不会结束，不会在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一样。它会一直伴随着我，它是我身份的一部分，它永远地改变了我对待自己的方式，改变了我余生的生活方式。

最后，我想说声谢谢。感谢每一个人，感谢那天早上在医院为我做燕麦粥的实习生，感谢在我身边等我醒来的警官，感谢安慰我的护士，感谢耐心聆听我的述说、从未论断我的言行的警探，感谢我的律师们坚定地站在我身边，感谢我的心理治疗师教我在脆弱中寻找勇气，感谢我的老板对我的宽容和理解，感谢我了不起的父母，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化悲痛为力量，感谢我的奶奶偷偷把巧克力带进法庭给我，感谢我的朋友们提醒我如何保持快乐，感谢我耐心而有爱的男朋友，感谢我那不可征服的妹妹，她是我心灵的另一半，感谢我的偶像阿拉蕾，她不知疲倦地战斗着，从不怀疑我。感谢每一个参与审判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感谢全国各地给我的检察官写卡片的女孩们，感谢这么多关心我的陌生人。



最重要的是，感谢那两个救了我的人，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他们。我在我的床上方贴了我画的两辆自行车，以此来提醒自己这个故事里有英雄存在。我们会不断寻找下一位英雄。我永远不会忘记曾认识所有这些人，并感受到他们的保护和爱。

最后，世界各地的女孩们，我和你们在一起。在你感到孤独的夜晚，我与你同在。当人们怀疑你或轻视你时，我与你同在。我每天都为你而战。所以永远不要停止战斗，我相信你。正如作家安妮·拉莫特曾经写道的那样：“灯塔不会为了寻找船只而走遍整个岛屿；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发光。”虽然我不能挽救每一只小船，但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你能感受到一点点光，略微知道你不能被噤声，为正义得到伸张感到小小的满足，为我们取得的小小进展略受鼓舞，并且深深地知道你很重要，毋庸置疑，你是无与伦比的，你是美丽的，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不可否认，每一天的每一分钟，你都是强大的，没有人能把这一切从你身上夺走。世界各地的女孩们，我和你们在一起。谢谢！

#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前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致谢](#)

[埃米莉·多伊的受害人影响陈述](#)